

中统作为蒋介石打击政治对手的长矛，
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统特务实录

安子 著

黑色统治
风云间谍

本书配入大量手绘插画

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下中统的众生相

从成员、事件、组成，架构多个方面深度解读中统内幕，
多角度、多切入点地揭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较场口血案、『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二九』惨案、『中九』血案，

案案惊心动魄，读之令人切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黑色统治
风云间谍

背影书系

中统作为蒋介石打击政治对手的长矛，
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统特务实录

安子 著

本书配入大量手绘插画

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下中统的众生相

从成员、事件、组成，架构多个方面深度解读中统内幕，

多角度、多切入点地揭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较场口血案、『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二九』惨案、『中九』血案，

案案惊心动魄，读之令人切齿！



北方文艺出版社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
第二章 顾顺章案
第三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
第四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二
第五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
第六章 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

第一章 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

1.陈立夫出道

中统是个怎样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它为什么一度成为“暗杀”、“破坏”、“臭名昭著”的代名词？它究竟像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既神秘又令人闻风丧胆？究其一切，还得从1928年的“党务调查科”开始说起……

说起党务调查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同为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年轻时代的陈立夫仪表堂堂、谈吐文雅，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颇有江南才子的味道。1917年，19岁的陈立夫以上海市第五名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工矿（类似于现在的矿业大学的采矿专业），后来又在美国匹兹堡“海龟”了几年，拿到了硕士文凭。那时候，硕士文凭好比金钥匙，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启一扇成功之门。正因如此，陈立夫站在成功的门口，正准备朝自己的梦想挖矿！

年轻的陈立夫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初入社会，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思想单纯，喜欢学术钻研，并且以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拿到了硕士学位。自此，他立志在煤矿事业上贡献一份力量，打算做一名工矿工程师。等到他拿到煤矿公司的一纸聘书时，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我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这一年是1924年，也是黄埔军校成立的年份。怀揣梦想的陈立夫兴高采烈地卷起铺盖，来到山东枣庄这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上班，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与此同时，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不久，正是广纳人才之际。就在此时，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出现了。陈果夫这个时候正在为蒋介石招兵买马。当他弟弟回国之后，他希望陈立夫能够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在政治方面取得成就。于是他找到了陈立夫，希望他能够弃文从政，跟着蒋介石干。

陈果夫说：“弟弟，挖煤有什么前途？挖煤既辛苦，又赚不到钱……只有那些穷人，才会冒险下井。堂堂一个海归硕士，放弃优厚条件去挖煤，难道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做官多好？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以当官为荣，难道你就不想当官吗？”

陈立夫思考了一会儿，问：“难道千里迢迢去美国匹兹堡，费尽心思考下来的文凭，就这么白瞎了？更何况，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陈果夫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当官跟你的梦想并不冲突……”陈果夫掰着手指给陈立夫算了一笔账：“弟弟，你看……如果你混上官，你的工矿理想就更容易实现了！你可以掌管煤矿，不仅可以当工程师，而且还可以当煤老板！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是野心家，一个是梦想家！我知道你有梦想，但是只有梦想，没有野心是万万不成的！难道你就不想取得成功吗？”

陈立夫犹豫了一下。

陈果夫趁热打铁：“弟弟，当官是一件美差……天下之大，哪个人不想当官？如果你当上大官，地位有了，钞票有了，女人也有了，吃喝不愁，而且还能做自己平时不敢想的事，多么好啊？更何况，咱们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看看咱们的国家，战事不断，死的死伤的伤，你难道想袖手旁观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弟弟，趁自己年轻，应该立下大的志向！更何况三叔（蒋介石）跟咱家交情好，而且黄埔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难道你忘了自己入党前发过的誓吗？”

陈立夫犹豫了片刻，还是拒绝了陈果夫。

但从这之后，陈立夫思绪很乱，仿佛一下子蒙上了阴影。他茶不思、饭不想，就连工作也受到了影响（遭到了矿领导的批评）。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陈立夫托着下巴，陷入了无限深思。

他以一副“思考者”的姿态，双目深沉地看着坑洼不平的地面，开始回想自己上学、求学、入党的经历，想起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也时常参与到国际形势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一下子变得富强起来……尤其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这句话也曾深深刺激过他。他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同时也感觉到：当务之急，是救国，而非当什么煤矿工程师！他失眠了，一宿没睡……

陈立夫虽然还在坚持自己的“矿工梦”，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渴望自己的矿工梦一样。而他的哥哥陈果夫却是一个急性子，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给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求贤若渴的蒋介石得知大才子陈立夫留学归来，口水忍不住往下淌。于是他第一时间给陈立夫发来电报，急切希望陈立夫能够来黄埔军校上班。没想到热情的蒋介石，竟然吃了陈立夫的闭门羹。

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拒绝信，有点郁闷。

他摸了摸光脑壳，心想：这个臭小子，翅膀果然长硬了。难道这样的美差都打动不了他？于是蒋介石效仿刘备，玩起了“三顾茅庐”，再次致电陈立夫：想开矿，就来开采革命之矿……没想到这一次，陈立夫感动了。之后，蒋介石三番五次给他发电报，邀请他南下广州。此时的陈立夫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加之哥哥陈果夫的催促，最终促使陈立夫离开上海，到黄埔军校报到。

蒋介石见到陈立夫，高兴得不得了。老蒋两眼放着金光，跟陈立夫套着近乎：“立夫，想当年我跟你叔陈其美可是拜把子兄弟，你叔是老大，我是老三……以后你直接喊我三叔就行了！来到广州不要见外，就把我当自己人，把黄埔军校当自己家……”

陈立夫初到黄埔，年龄不大，还算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他没有拒绝蒋介石的安排，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三叔，我是个书生，没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所以我只是想从事文字这一

块，请三叔见谅！”

听陈立夫这么一说，蒋介石二话没说，就把陈立夫安排到自己身边，当起了机要秘书。至于住宿伙食问题，蒋介石更像长辈那般贴心：不仅让陈立夫跟着自己吃住，甚至连上厕所也带着他……简直把陈立夫当成了宝贝疙瘩！

当上机要秘书的陈立夫，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从政”了！如此一来，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多了一名著名的政治人物。

2.投奔蒋介石

有人会问，陈立夫为何投奔国民党蒋介石，而不去投奔共产党呢？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第一，陈立夫的革命出身，是国民党。其叔陈其美一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不但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而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也一直追随国民党，陈立夫是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出身。第二，陈立夫留学美国，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教育，这种“资本”理念与国民党推崇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第三，共产党成立时间较晚，不过是一个小党派，没有形成气候。第四，蒋介石确实喜欢陈立夫，三番五次邀请他南下广州。

陈立夫终于被蒋介石所感动，与此同时，蒋介石确实爱才，并且希望陈立夫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两个人迅速打成一片，甚至茶余饭后常常聊天，相互沟通意见和看法。但起初（1925年），陈立夫的梦想依旧是采矿，他还在考虑，如果有机会，还是回到采矿中去。

某个晚上，陈立夫跟蒋介石聊天。陈立夫便支支吾吾说出自己的想法：“三叔，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去采矿，毕竟那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蒋介石皱了一下眉头：“立夫，如果革命成功了，你完全可以去采你的矿，挖你的煤！但是记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滚滚大潮，等着你去征服它！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身不由己，毕竟一只脚已经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但是不图政治的陈立夫还是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三叔，我是书生出身，对打仗、政治一窍不通。如果让我跟着你干，我会千方百计支持你！但是……”

“你还有什么顾虑？”

“古人常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我对三叔提的唯一一个意见，望三叔斟酌。”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这个你就放心吧！”

蒋介石也算一言九鼎的人，在此后25年，蒋介石从未向陈立夫发过火，就更别提“侮辱”二字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一个凉亭，而后坐下来纳凉。秋日的广州天气依旧炎热无比，于是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喝茶。

蒋介石此时便问陈立夫对革命和政治的看法，为什么入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依此了解他的政治立场。当时，陈立夫还是一个思维相

对简单的人，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认为父亲和叔叔们跟着中山先生搞革命、打天下，虽然不是党员，但熟知孙中山先生建立国民党是想真正建立一个爱国为民的党派，加入国民党是受父辈影响。其次，国外的求学经历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再次，国民党已经是主流党派，国民党则代表着政府，政府则代表着未来国家的走向。陈立夫的口才、文采都好，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立场坚定地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拥护和支持，让蒋介石乐得合不拢嘴。

“立夫，你说得好！党国就是要你们这些思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有志之士啊！中山先生死得早，遗留下来的革命旗帜需要你们去扛。自从中山先生去世后，各个党派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如果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死不瞑目！”蒋介石假装叹气，实则探一探陈立夫对其他党派的看法。

陈立夫说：“毫无疑问，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是国民党！至于其他党，还不成气候，而且也没有能力控制革命的方向！”

蒋介石则顺口提了提共产党和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希望听到陈立夫的观点。

陈立夫说：“共产党，恐怕就是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党派罢了！人类发展至今，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天下？至于之中乌托邦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年月，只要能够平息战争，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至于工农运动嘛，我猜想跟洪秀全的起义军差不多，打着不同旗号，另有所图吧！”

蒋介石高兴了，他觉得陈立夫虽然不懂政治，但绝对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中山先生去世后，革命陷入混乱，能够找到一个革命立场如此坚定的新青年，实属不容易。他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举起茶杯，喊了一声：“干杯！”

陈立夫羞涩地端起茶杯，也喊：“干杯！”

一声“干杯”，其实就是统一战线，建立革命互信关系。一方面，蒋介石需要一个懂英语的人翻译一些外文文件，其次还希望陈立夫能够拿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供自己参考。机要秘书嘛，该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些……但是蒋介石却不这么想，他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每走一步棋都要谨慎思考很长时间。而蒋介石为了陈立夫这枚“棋子”，可谓费心颇多。自从这次彻夜长谈，蒋介石总算放心了，陈立夫不愧是陈其业的儿子、陈其美的侄儿，而且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分子。稍加时日，陈立夫一定会有所成就。

此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东征之后，在国民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随着地位越来越高，他也感到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蒋介石出了名之后，迎来的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政治圈与娱乐圈一样，都是一个“绯闻不断”的地方。可能今天他上一趟洗手间，后面就会跟着一群疯狂的“狗仔队”。这让蒋介石十分烦恼。

当然自从蒋介石出了名之后，他就再也不是过去的蒋介石了。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山先生离世后，他就开始觊觎那个“大总统”的宝座，甚至连做梦，也会梦到自己身披统帅服的威武相貌。他反共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与苏联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再就是另外一个想要

篡权的汪精卫……一时间，蒋介石可谓四面楚歌，唯独能够体谅他、安慰他的就是机要秘书陈立夫了。

某一天，陈立夫看到闷闷不乐的蒋介石，于是放下手中的文件，给蒋介石沏了一壶茶。蒋介石发自肺腑地感慨道："立夫，三叔没有看错你！"

"校长，我能帮你什么？"

蒋介石摇摇头："有些忙你帮不了，谢谢！"

蒋介石觉得这个机要秘书越来越贴心，也越来越重要。慢慢地，他开始参考陈立夫的建议，试着让陈立夫独自处理文件。陈立夫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他也逐渐开始参与政治、领会政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3.中山舰事件

"三二"中山舰事件可以说是一件严重动摇"国共合作"的事儿，后来影响了国民革命进程。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表面上是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其实实则也是对准自己的政治死敌汪精卫。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到底如何？事情还要从孙中山革命时期说起。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他们都曾为革命上过刀山、下过火海。从表面上看，起初两个人的私交还可以。称之为三杰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在党内的地位比蒋介石高一些，蒋介石只能算个小辈了（虽然年龄小，但野心最大，早早瞄准了孙中山的总理宝座）。所以孙中山去世后，党政大权落到了汪精卫的手里，而地位矮一截的蒋介石有些不服气。这种政治格局并未持续多久，由于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早早掌控了兵权，在党内的地位飙升。但是一个党，不可能有两个领袖，于是两个人开始为了"王位"明争暗夺起来，慢慢就结下了梁子！

1926年初，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因在北伐及军费分配方面发生了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拉拢苏联顾问季山嘉，落井下石。气得蒋介石牙齿直哆嗦，一度血压蹿高。两个人针锋相对干了起来。

先是汪精卫伙同季山嘉拉拢蒋介石的属下王懋功，后来被蒋介石发现，下令开除了王懋功。后来汪精卫又以贩卖私盐等罪名撤了蒋介石把兄弟陈肇英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

汪精卫毕竟是一个政治高手，稍微年轻一点的蒋介石还不是他的对手。交战几轮，蒋介石不但没能占着便宜，而且连失两员大将，差点被迫下台。这一天，陈立夫本来心情不错，但看到蒋介石一脸愁容，便安慰蒋介石："校长，不要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蒋介石面色凝重："能不生气吗？大战将临，军饷还没有着落，靠什么打？我们不是义和团，没有刀枪不进之躯！尤其那个汪精卫，大战之前撤我的帅（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立夫安慰道。

"立夫，校长一直器重你，希望你以后能够替校长掌舵！如果把你放

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

陈立夫想了想，没有什么好主意，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校长，你知道我不懂政治，换作我，可能只能躲避一下了！”

当时，广州已经谣言四起，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听到“躲避”一词，竟然眼前一亮，陈立夫不愧是蒋介石的福将啊。于是蒋介石拍了拍脑袋门子感慨了一番：“是啊，为什么不躲躲呢？古人都说，攻可进，退可守。以退为进不是没有道理啊！”于是蒋介石决定去苏联躲一躲，借此让汪精卫等人难堪。

1926年的2月9日，蒋介石辞去军事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要求去苏联“休养”。但是汪精卫却看出蒋介石心机，于是例行公事去黄埔军校劝蒋介石：“老弟，革命尚未成功，你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些仓促？”

蒋介石回答：“有汪主席在，革命早晚会成功！”

汪精卫看出蒋介石的心意，就没有强行挽留，故意把球踢给蒋介石，做顺水人情：“如果出去，要注意身体。”

蒋介石此计不成，反被汪精卫将了一军。于是蒋介石的日记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蒋介石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让陈立夫买了船票。

1926年3月19日，车开到码头，蒋介石又改变了想法。这个改变蒋介石想法的人，又是这个“不懂政治、直言快语”的陈立夫。

当时陪同蒋介石的陈立夫看到蒋介石左右为难，便起了同情之心。据说，陈立夫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性情中人肯定会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

到了码头，蒋介石临江眺望远处，老泪差点窜出来。这一幕又打动了性情中人陈立夫。陈立夫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到了码头，也不定无路可走。此时他又联想到蒋介石说过的国际形势，此时选择政治避难无疑等同自杀。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陈立夫的内心起了变化。

陈立夫道：“校长，手握重兵，岂有躲避的道理？在我看来，应该躲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是啊，为什么要躲？为什么不直接跟他干？”

由此看来，陈立夫的一举一动影响了蒋介石，而陈立夫在政治沼泽里也是越陷越深。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回去之后，一方面防备着汪精卫，另一方面则继续泼共产党的脏水，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把共产党排挤出去。于是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一手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算是陈立夫进入政治圈后的一次中考，且成绩不错，可以给个优秀。但是陈立夫心思缜密、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地为自己的主子卖命，则说明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且有自己的识人、用人之道。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1926年3月19日，车还在回去的路上，陈立夫就劝蒋介石：“校长，既然做，为什么不搞出点声响来？”

蒋介石将信将疑：“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此时也拿不出具体的想法，但是他说：“我觉得汪精卫是占着茅厕不拉屎，而中共也想借机窃取政权……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汪精卫和中共都难受！”

蒋介石："好吧！"

蒋介石回到学校后，便让陈立夫通知陈肇英、欧阳格等人来黄埔开会，商量对策。这段时间，陈立夫不仅发挥其组织才能，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期间蒋介石总会问："立夫，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校长，我们不但要制造点声音，而且还要散布言论：说共产党借机叛变……如此一来，也能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此时蒋介石命令欧阳格传一道命令，让海军局的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速派得力兵舰两艘。李之龙接到命令，并没多想，便通知了中山舰和宝璧舰开往黄埔。

在一场政治阴谋下，中山舰就这么乖乖地来了……

等两舰到位后，此时陈立夫带领欧阳格等人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显露共党阴谋……而共产党授意李之龙，准备强行劫持蒋介石、陈立夫两位同志至苏联海参崴，图谋不轨……此时谣言四起，街道上乱成一片。

1926年3月20日的凌晨3点，钟声一响，蒋介石离开家赶到造币厂，下令全城戒严。此时的广州城已经弥散着一股恐怖的味道。

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抓捕行动开始了。首先虎门司令陈肇英和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在广州文德楼的家中逮捕了海军局长李之龙；刘峙接替王斌功二师师长的职位扣押了二师所有的共产党代表，而蒋鼎文则带领二师五团占领了海军局，解除了海军局的武装；而陈策、欧阳格等人则借机控制了中山舰。与此同时，还逮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左派代表，并派人监视邓演达的一举一动。蒋介石还一纸电文撤销了远在潮汕的第一军，完全夺得了粤海第一军权。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国府主席汪精卫也终于坐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蒋介石这个举动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我看他，早就吃了豹子胆，想造反啊？"

在陈立夫等人的献策下，广州沦陷，完全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都害怕了。于是他向蒋介石妥协了，偷偷坐车离开了广州。蒋介石的做法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攻击了共产党，又赶走了政治死敌汪精卫。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蒋介石的血压降下来了，自然也就高兴了。机要秘书陈立夫一下子成了蒋介石手上的一张王牌，后来蒋介石提拔他为机要科科长。

4.迁都之争

北伐战争终于开始了！1926年的5月，叶挺将军带着他的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作为尖刀，首先向吴佩孚的腹地插进。一直到1926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为完成中山先生遗愿，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蒋介石也迎来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他成了这支北伐军的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

7月9日晚上，蒋介石掷地有声地宣读北伐誓词：嗟我将士，而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开始后，身为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也没有闲着，虽然他没有亲自带兵讨伐（他从来也没带过兵），但却跟着自己的哥哥陈果夫在党内帮助蒋介石搞起了“迁都”这门子事。所谓“迁都”，就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通俗点说，“迁都”就是搬家。但是这个“迁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迁都，这一次迁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一次政治阴谋。

1926年11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迁都武汉是必然的。但此时蒋介石又打起自己的算盘。他认为迁都武汉之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前景。恐怕自己费尽心思打出来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于是他内心起了矛盾，成了迁都武汉的坚决反对者。

蒋介石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定都武汉”有两个风险：其一，唐生智。唐生智曾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部第四师的师长，后来他归顺了北伐革命军。但是此人骁勇善战、处事果断，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的部队已经拥有了十个师的兵力，且武器装备精良，精神状态好。而此时的唐生智又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皆为蒋介石死敌）的支持，让蒋介石变得忧心忡忡。其二，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高涨，不利于老蒋反共准备。尤其是武汉的工人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震惊了世界。蒋介石经过权衡，必须坚决反对“定都武汉”，才能守住自己的革命果实。

在此期间，经陈果夫的介绍，另一位国民党高参、号称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为中统的“影子领袖”。随着一个又一个厉害角色的加入，CC系已经初露端倪。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不是那个怀揣“工矿梦想”的陈立夫，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客，就连他的每个举动都带着政治色彩。后来他伙同自己的哥哥陈果夫上奏折，蒋介石再次动了心，他向陈立夫交代：“立夫啊，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陈立夫也随即发誓，决心替蒋介石解除另一块“心病”。从某种程度上看，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理医生”，关键时候总能施展医术。

于是蒋介石让陈立夫联系张静江、张群、谭延闿等人来南昌，顺便截留了一些准备去武汉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注意，只是临时的），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蒋介石为此可谓处心积虑，他还亲自跑到武汉游说：“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南昌更是适合作为党政府的首都！”

没想到蒋介石一个人的反对声实在太小，被迅速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蒋介石不信“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非要借机搅和搅和。而此时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蒋介石身边解释：“校长，其实定都武汉是大势所趋啊……与南昌相比，武汉的革命气氛更浓，而且地理位置更加重要。至于经济，南昌更无可比性！所以我们要开辟新的地方……”

蒋介石："开辟新的地方？你说去哪？"

陈立夫："经济是革命的后盾，凡事离不开钱。其次是政治氛围，没有拥护党的氛围，也是瞎忙活！"

蒋介石："那好吧，你抽空去上海看看吧！"

1927年的3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大大缩小了蒋介石的党政军权力。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

后来蒋介石以"退席二届三中全会"为幌子打探自己的党内地位，没想到遭到各个党代表的痛斥。甚至连申诉、还口的能力都没有。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人民公敌"，被众家讨伐。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已经此起彼伏。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重重地拍桌子，气得脸色发红。

迁都之争没有成功，但是陈立夫的赤诚忠心则完全打动了蒋介石。不管自己主子境遇如何，陈立夫一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不过后来，蒋介石费尽心思取代了谭平山，当上组织部部长，而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则纷纷被剥夺了职务，如此一来，共产党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排除掉了。而陈立夫和陈果夫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各地区发展国民党右派，在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开始为另一个更加阴险的阴谋做准备。

5.九江、安庆事件

192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太多了。陈立夫在1927年又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年，陈立夫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清党"！所谓"清党"，就是清除党内异派。迁都失败之后，蒋介石一直在谋求新的方式同汪精卫等人斗争。既然露出了狐狸尾巴，那就干脆摘掉面具，名正言顺当个反派。1927年的春天，惊蛰刚过，蒋介石终于开始自己的行动。当然这个清党，主要指的是"反蒋"派别，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左派和支持三民主义的民主人士等。正是因为清党，陈立夫错杀、滥杀无数革命党员，在自己的人生簿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笔。

清党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残忍、血腥！采用武力残酷排斥异己，一时间中国的上空笼罩了一层白色阴影。清党开始的标志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在谋划"四一二"之前，残酷的清党运动已经秘密开始了。

1927年的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所谓的"政治会议"，与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温建刚等人预谋，达成了一致共识。其一，全面夺取各地政权。其二，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所有条件。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南昌所在地江西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几乎被瓦解，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老巢。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蒋介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清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抢夺各地军权，其次才是党政。

对于清党运动，憎恨共产党的陈果夫、陈立夫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是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认为，想要彻底清扫干净，就要逐级、逐层一点一点清洗（类似洗衣服，去除污渍死角）。

与此同时，1927年的3月15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于次日一早抵达九江。到达九江后，陈立夫立刻与当地一黑恶势力“青洪帮”接上了头，为捣毁“左派党部”做准备。有钱能使鬼推磨……陈立夫搂着青洪帮头头的肩膀头子去了一家高档饭店，宴会上便行贿青洪帮。陈立夫说：“校长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手里有钱也有权。以后打下江山，如果兄弟们支持他，他一定不会忘了你们！所以我要让兄弟们帮几个忙……”

陈立夫让这群爪牙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左派是反革命分子，图谋不轨。其二，打上标语旗号：总司令万岁，打倒一切赤化分子！其三，为蒋介石的清洗壮胆。其四，作为先头部队，参与清党、夺取政权的行动。蒋介石听到陈立夫的汇报，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下指令：如有反抗者，杀无赦！

“九江事件”就这样慢慢拉开帷幕——在金钱刺激下，一群青洪帮分子、流氓、无赖（乌合之众）等等开始围攻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许多人，一下子将国民党九江党部和总工会捣个稀烂。利用这次九江事件，蒋介石顺利拿下了九江的政权，扫清了江西范围内的障碍，为继续北上做准备。但此次事件，陈立夫也背上了一个“自相残杀”的罪名。因为九江事件被打死、打伤的多数是国民党左派，陈立夫甚至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可见陈立夫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利益，可谓“大义灭亲”，不择手段！

九江事件之后，也就是1927年的3月20日，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姚爵吾等人乘坐永蜀号军舰来安庆打前站，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安庆，而陈立夫则寸步不离，与蒋介石形影相吊。蒋介石到达安庆后发现安庆没有欢迎的标语和口号，并且捡到一份传单，传单上写：许多反革命势力正在总司令部内酝酿，请总司令清除反党分子！于是蒋介石大发雷霆：“到底怎么搞的？安徽人是不是在搞革命？如此一盘散沙如何保住革命果实？”

1927年的3月20日晚，蒋介石终于得到消息，安徽政府里有支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和大量的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又开始担心起来，便问陈立夫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反倒问起安徽人杨虎：“杨兄，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杨虎考虑自己是安徽人，所以有些犹豫，便说：“现在很难分清哪些是共党，哪些是左派，很难下手清理。如果强行清理，岂不落下个不好的名声？”

陈立夫见杨虎吞吞吐吐，便亲自下决定：“什么分开不分开，只要是反对校长的，一律斩草除根！这事我说了算，你去准备准备吧！”

3月22日，蒋介石刚刚参加完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总政治部的命令就下来了，要求右派省总工会“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该工会委员长舒沛澄拒不执行命令，率众会见蒋介石，要求明令保护他们。而此时恰逢左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等人前来向蒋介石汇报代表大会的开幕情况，没想到早已无法淡定的舒沛澄（绰号舒老四，青帮分子，右派鲁班阁安徽总会的领导人物）在其他右派分子金维

系等人的煽动下，命令他人围殴光明甫，光明甫被打得鼻青脸肿。闻讯赶来的郭沫若义正词严地说：“右派破坏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反动……”没等郭沫若说完，蒋介石便拍了桌子：“简直是胡扯！我也是革命功臣，赶快把你的有色眼镜摘掉！”蒋介石发完火，便要求郭沫若尽快将左右两派合并。

到了晚上，蒋介石依旧十分气愤，对陈立夫说：“安徽人就是和稀泥，在这里搞革命真麻烦！”

陈立夫劝蒋介石息怒：“校长，如果你嫌麻烦，就把事情交给我，我来处理！”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辛苦你了！”

陈立夫得到进一步授权，并交代杨虎：“需要钱的地方尽管说，只要把这个事搞好，你的前途大大的！”于是陈立夫向蒋介石请示，拨了一笔款子。为了鼓励青洪帮、流氓无赖们的积极性，采用了金钱悬赏政策。流氓们见有“杀人还能发大财”这等事，便兴奋起来。他们手持大棒，迅速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

“3·23”安庆事件在一场春雨中爆发了。右派省工会委员长舒沛澄及杨虎、刘文明等人带领着大批青洪帮流氓分子开始冲击安徽省国民党（右派）党部和（左派）省总工会。他们见人就砸，见文件就抢，符合“恐怖打杂事件”的一切标准。此次行动打伤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人士数十人，沿途也开始放起鞭炮庆祝。事件结束后，青帮流氓无赖们如愿领了红包，蒋介石的“反革命之心”暴露无遗，而陈立夫也在九江、安庆事件中不遗余力、出谋划策，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厉害的人物。

6.汪陈宣言

安庆事件结束后，蒋介石和陈立夫并没有休息，翌日启程，赶往上海。路上，蒋介石忐忑不安，他告诫陈立夫：革命之路是有去无回的，不管生死都要走到底！陈立夫点点头，表示会忠诚党的事业，坚持走革命道路，坚决不回头。此时的陈立夫，已经被蒋介石完全“洗脑”，无论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蒋介石。

3月26日，蒋介石和陈立夫到了上海后，立刻与吴稚晖、李石曾、白崇禧、潘宜之等人联络，让他们前来开会讨论“分裂共产党”之办法。席间，吴稚晖表示：以中央监察会名义弹劾共产党动摇后方等议案，从而组织监察委员会成员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跨党之首要，听候代表大会裁判！公开清除共产党否定武汉权威，因为还牵扯到苏联顾问（财神）的关系，蒋介石有些犹豫。蒋介石前后左右犹豫了几天。

在这期间，蒋介石解散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和红色公会组织，公开反共，所以反对蒋介石的各党派也正在寻求对策，预防蒋介石反革命力量的“流感细菌”。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共产党于1927年的2月22日率先打了“防疫针”，准备在上海掀起武装起义，建立临时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蒋介石携陈立夫来到上海后，也与刚刚成功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说：“现在革命形势不错，而且上海的工人运动逐渐进入高

潮，非常希望你们能够保护工人们的利益。”

陈立夫回答：“工人运动本就是反政府的运动，凭什么还要为你们这次非法运动提供保护？”

周恩来愤怒地质问陈立夫：“工人决定生产力，决定未来的国家命脉，不保护他们，保护谁？”

而陈立夫也非等闲之辈，其口才也是一流的。他不仅找到诸多辩解的理由，而且认为“工人运动”并非单纯的运动，而是具有政治企图的。很明显，陈立夫的反驳是为蒋介石的“清党”做准备。于是两人大战三百回合，没有分出输赢，最后不欢而散。后来甚至连周恩来都不得不承认，陈立夫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敌人。共产党摸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后，放弃了这根腐朽到抓不住的稻草，而是亲自提醒参加工人运动的革命同志：“既然国民军认为我们是非法组织，那么我们的运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要派一部分同志提前打入，抓一部分武器，公开利用身份训练！而且我们还能最大程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希望同志们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完成这个足可以改变历史的任务。”此时，工人革命越来越活跃，而陈立夫则建议蒋介石尽快下手，斩草除根！

4月2日，陈立夫跟随蒋介石来到北伐军东路军前线指挥部商量对策，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呈文“反党”。“坏点子”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的，他说：“舆论上，我们必须要制造出声音……而且要官方制造的声音！”

蒋介石一听：“具体说说看！”

吴稚晖说：“我们要以中央监察委和执行委的名义公布，让全国人民知道共产党的野心！”

此时蒋介石在武汉的地位十分尴尬，中央监察委和执行委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他摇了摇头：“主意不错，但是武汉那边……恐怕不容易说服啊！”

一听蒋介石犯了愁，聪明的陈立夫站了出来：“校长，不用担心！呈文的事情交给我，我可以搞定！”

“你具体说说看。”蒋介石将信将疑。

陈立夫说：“校长，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手续都不可能严格把关！至于呈文公章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原章自行雕刻两枚……只要呈文一发，枪声一响，武汉那边也就控制不了了！”

起初因为两枚公章还犯愁的蒋介石，听陈立夫这么一说，也露了笑容：“好吧，这件事你安排就是了，但是千万别出什么闪失，做好保密工作。”

后来陈立夫找来吴倚沧，让其找一家刻章技术一流的店铺刻上两枚。于是吴倚沧去了一家上海老字号刻章店刻了两枚章。事后蒋介石夸奖陈立夫脑子灵活，以后必成大事。而陈立夫则十分虚心，从来不抢主子的风头。此时陈立夫的奴才面孔也暴露无遗，只要是蒋介石需要做的，陈立夫都会第一时间蹦出来出主意。

4月2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于是带着陈立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来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进行商讨，顺便摸摸汪精卫的态度。随同蒋介石的陈立夫在车上就一直提醒蒋介石：“校长，这个人阴险狡

诈，说不定他这次回上海，趁机拉拢共产党……这一点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也要防着他！”

蒋介石问：“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先斩后奏！先把呈文发出去，给他施加施加压力！”

“好吧，你去安排吧！”

不久，呈文发出去后，引来极大的关注。汪精卫也看到了呈文，骂骂咧咧道：“这个蒋介石到底想干什么？非要跟我对抗到底吗？”

蒋介石一行几人到了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见汪精卫假装一副惬意状，蒋介石先向他打了个躬，于是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汪主席，武汉虽为国民党总部，实则为共党操控，清共之路已经迫不及待，请抓紧时间定夺！”

而此时披着“左派领袖”外衣的汪精卫自然没有表态，他本希望拉拢共产党率先消灭蒋介石，以报当年“中山舰”之仇。但是汪精卫也有自己的打算，毕竟他眼前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搞不好又要吃亏。于是他继续听取他人的意见和看法。

而吴稚晖也气愤地说：“共产党就是要打压国民党，盗取革命果实！单纯这一点，早就违背了‘三民主义’，这个党如果不除，必将留下巨大的隐患。”

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因为“清党”问题高谈阔论起来。汪精卫琢磨了一下，想了一个万全之策：“还是等党部迁到南京后再说吧，毕竟‘分共’和‘清党’不是小事。”听汪精卫这么一说，蒋介石心里没底儿，便以惯用的口吻匆忙发表通电：自汪主席归来之后，所有军权、民权、财权和外交等，皆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但是通电刚刚发出，4月4日一早，蒋介石就听到自己的总司令一职被免了，于是率众人再次来到汪精卫下榻的地方交涉。期间蒋介石和吴稚晖痛斥鲍罗廷和共产党，说他们反国民党的意图非常明显，要马上进行“斩草除根”行动！没想到汪精卫不但没向蒋介石妥协，反倒答应了共产党人陈独秀，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著名的《汪陈宣言》：

>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
>
> 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地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
>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否要一定死板地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

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足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精神。

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图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摘自1927年4月5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

《汪陈宣言》一宣布，引起了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以及李宗仁等人的强烈质疑。尤其是吴稚晖，他极其愤怒，指着汪精卫的鼻子便骂：“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只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只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只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

吴稚晖的怒斥声算是说进蒋介石的心坎儿里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蒋介石忍不住心花怒放。此时陈果夫、陈立夫也伺机提供意见：“校长，我们的机会来了……”

蒋介石则故意阴沉着脸：“共产党不好对付，汪精卫现在还给他们撑腰！”

陈立夫说：“校长，我们手里有军权，不用怕汪精卫！至于共产党，在安庆的时候，我们不是试过了？对付共产党，我们就要下手，而且下手要狠！”

蒋介石说：“你具体说说做法！”

陈立夫说：“我们要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广东、浙江、江西都有我们的人，我们就要成立专门的组织跟他们斗争，对抗！只要谁反抗，我们就把他抓起来。共产党是革命道路上的毒药，即便抓错了，也不能轻易放掉一个！”

蒋介石看出陈立夫的决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凡事都要讲究策略，不要蛮干！”

陈立夫点点头，遵从蒋介石教诲。

在陈立夫等人的帮助下，一切都朝着蒋介石的想法进行着！而蒋介石谋求叛变革命，彻底摘掉面具的时候也快到了。他开始亢奋起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及那些跟着蒋介石走的人都有些亢奋。他们亢奋的方式与普通人有些不同，就是开会！

也就是1927年4月8日这天，《民国日报》刊出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宣称：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讨论国民党人如何被把持的情况。最后采纳了汪精卫的观点：一切以和平为主张，暂时选择容忍。但是蒋介石掌控着军权，他不会听汪精卫瞎哼哼。

还是4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早早就以总司令的身份发布公告，查封了听从武汉那边的指挥部，并且声称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实乃丧失本军之信用，妨碍北伐大计，于是下令软禁了邓演达，让其只能喘气、不能发话！而4月9日，蒋介石继续下令，在远在三百公里外的南京实施了一系列抓人、暗杀事件。其中包括张曙时和侯少裘等。4月10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既已解散，而白崇禧则解除了工人武装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空气中已经响彻“打倒共产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街上的人似乎早已经嗅到一丝血腥味……“四一二”马上就要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灾难、永远无法被人遗忘的事件到来了！

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说起“四一二”，不得不提上海滩青帮三个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个人物可谓是当年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蒋介石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青帮成员，而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陈立夫的叔叔陈其美也是青帮成员。如此看来，蒋介石在上海滩与三个大佬强强联合是避免不了的，随着白崇禧的加盟，几个人合力上演了一场绝美的“黑白配”！

先说说三黑之一黄金荣，祖籍余姚（老板菜产地），苏州出生，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此人当过学徒工，也干过名声不太好的巡捕，后来来到上海，学了一套勾结幕僚、政客的本事，一步一个台阶，从一个小爪牙蜕变成了青帮头头，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流氓大亨”，彰显其流氓本质。在上海滩，黄金荣自然是人民的敌人，同样也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如此看来，当时他决定参与“四一二”时，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黑之二杜月笙，名镛，号月笙。其人生性机灵狡诈，善解人意，

后来得到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帮助黄金荣贩卖鸦片。后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后参与了“四一二”，并且设计陷害上海工人运功领袖汪寿华。此人还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三黑之三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号啸林。此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喜欢寻衅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后来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结为把兄弟。“四一二”张啸林率领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后得到蒋介石提拔，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一职，享受少将军衔。

所谓“一白”指的是白崇禧。白崇禧是广西人，桂系军阀，有“小诸葛”之称。其人在台儿庄大战、桂南战役时有过出色的抗日表现，算是爱国将领。但他也是“四一二”的制造者，先后几次秘密参加反共会议。尤其是4月2日那次会议，白崇禧发言最多，反共决心十分坚定。他曾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以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武器，有自己的首脑，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势必会引发外国人的严重不满，导致战争！如此一来，将严重影响北伐步伐。”白崇禧还单独提到三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是坚决反共的，而且他们也有武装力量！”言外之意，白崇禧对“共产党”亦是恨之入骨。

四·一二

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黑白配上场后，随着蒋介石“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发

出，“四一二”算是开始了。各地爪牙们接到指令后，如同打鸡血般兴奋异常。而在上海，黑白两道各自行动。其中杜月笙用了“调虎离山”这一招，把汪寿华骗至杜宅，最后将其活埋于上海郊区的枫桥这个地方，汪寿华成为“四一二”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

60年后已经耄耋之年的陈立夫再次回忆汪寿华时，说：“那完全是一个有来无回的鸿门宴！”可见，当时设计陷害汪寿华的幕后人，也有陈立夫。

如果蒋介石是“四一二”的制造者，而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则是“本次事件”的具体指挥者。4月12日半夜，白崇禧安排的上百名特务、青帮流氓全副武装，身穿蓝裤子，臂缠“工”字标，从法租界乘着黑色轿车散出（有点黑社会的感觉）。

此时多数人还在睡梦中，那些可怜的工人运动的发起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伴随着一声枪响，大难临头的时候来了。

青帮和特务们一路沿着道路狂奔，大呼小叫着……也有一些人则见东西就摔，见人就打，不分青红皂白。

当另外一群流氓杂碎们疯狂进攻上海市总工会以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时，则大演苦肉计，以备让及时赶到的驻军以制止械斗为借口，强行缴下工人纠察队员手里的枪械，总共1700多支。此时纠察队员毫无反抗能力，遭到了反动军队和流氓们的殴打、袭击。最后打死打伤数百名纠察队员，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指挥部被占领。此时才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

就在这时，枪声开始连连响起。工人纠察总队的指挥顾顺章（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叛徒）到总会馆视察，结果遇到六十多名反动军人的围攻。后来这一股反动军人的头头向里面的纠察队员喊话：“我们只缴械，不杀人！请你们把武器放在地上，不要还击！”

此时顾顺章大义凛然、不畏生死：“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凭什么缴我们的械……我们是革命军！”顾顺章的话没有起作用，枪械还是被缴了，而且人也被扣押到上海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内。

此时天微微亮，但是上海总工会外已经一片狼藉，死伤人数众多，上面布满了打砸留下的一摊摊血迹。事情发生后，为了掩人耳目，白崇禧在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声明发布之后，满城上下贴满了告示，警告工人不准搞“罢工”、不准“集会”，更不准“示威游行”！

此时上海的工人力量遭到了重创，而主要指挥人周恩来等人也被扣押，上海滩重回蒋介石等人之手。但是集会、游行并没有在“暴力”中结束。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上海地下总工会再次发布通电，号召全上海的工人继续罢工，反抗到底。于是这一天，各个机关的工人开始罢工，有学生、工人、司机、海员等等，扛起反抗大旗，在全市开始游行示威。

刚刚离开不久的蒋介石打电话给陈立夫：“立夫，上海的事怎么样了？”

陈立夫说："共产党还在组织力量反扑，我们正在想办法控制！"

"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上海……"蒋介石语气强硬，毕竟上海是"小金库"，没有"小金库"支撑，蒋介石就没法闹"革命"！陈立夫接到命令后，立刻下令各组织进行抓人！如再不行，就开枪！

4月13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似乎老天有眼），上海闸北区的工人们向上海军事当局施压，要求军民当局给予正面回答。而此时，接到上级指令的第二十六军二师突然向示威的工人们开枪扫射。顷刻间，集会的场所变成了"血腥"的海洋。惨叫声、呼喊声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枪声持续了15分钟，地上已经躺下数百人，鲜血染红了集会广场，血流已经成河。

当时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目睹了"四一二"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她这样写道：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摘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后来这名美国记者亲身体会到上海已经是"血腥屠杀"的地方，根本不宜久留，之后便离开了上海，去了即将走到终点的"国民政府"武汉避难。

而上海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同民族之间的屠杀绝对是不可饶恕的，是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而实施者就是陈立夫、白崇禧们。4月13日，枪声响过之后，陈立夫吩咐陈群的事已经开始落实了——一个自称"上海工联总会"的组织突然代替了上海总工会。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取缔。共产党人费尽心思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就在两天之内瓦解了，实在令人痛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势力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6日指使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八十余人。广东一地，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二千多名，其中包括萧楚女、熊雄等人。而远在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也纷纷响应蒋介石的号令，采取了"清党"，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到白色恐怖之中。

4月14日一早，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七人联名上书，强烈谴责军方暴行。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军方总指挥白崇禧则安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王瑞华，兵分两路抵达上海临时市政府，封闭了市政府。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只能完全撕下面具，他发布了《清党公告》，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公告声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中共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个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选《蒋介石言论集》）声明发表之后，随即电令各军师长逮捕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军政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等跨党分子。而其提到的“和平待遇”一直是蒋介石作风，只不过一句客套话罢了。

4月17日，由于共产党和左派长老级人士联盟上书给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此时又觉得蒋介石过于嚣张，于是下令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和军衔。但一天之后的4月18日，蒋介石却在南京立山为王，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争。

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两个有名的权力要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成立了，而这两个委员会的头头分别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从此以后，国民党内的“CC”派也就逐渐成形了。只不过此时的陈立夫，主要任务还是“清党”。在他的建议下，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清党”检举委员会，誓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共产党。

陈立夫俨然已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就像有人常说的一句话：某某人，我放心！此时的蒋介石也对陈立夫十分放心。

8.第二次清党

经过了“四一二”，陈立夫似乎对“清党”上了瘾，诸如某些人对“嗜血”上瘾一样，每当他听到“清党”二字的时候，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似乎自己是专门为“清党”而生的一样。

1927年4月底的某一天，蒋介石找来陈立夫聊天。蒋介石是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便直奔主题而去：“立夫啊，你对排除异己、清除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陈立夫说：“校长，我觉得共产党明显在跟国民政府对抗！这无异于清晚期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想复辟皇权……”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还不能这么说……不过共产党发展之快，大大超过我的预料！革命不久，国内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党，令人望而生畏啊！立夫，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陈立夫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我觉得现在各地还有大量共产党的余孽。余孽不除，必成后患！古人常说，防祸于未然！我们要借着革命的东风进一步清除余孽，以绝后患！宁可杀错人，也不能放掉一个共产党！”

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拍陈立夫的肩膀：“好吧，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好好干，校长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校长！”

一个经历、目睹过血腥镇压的人往往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第二个反应就是变得更加血腥和残忍！陈立夫属于第二种，他骨子里对共产党的憎恨，在与蒋介石谈话后愈发加深。于是他开始做梦，

梦到自己手持大棒亲自拷问共产党。他连续几个晚上睡眠不好，眼圈发黑，他的助手也提醒他要注意身体。这些都是亢奋导致的结果。这个面部洁净的读书人，清秀的面庞在狂躁中隆起两颗青春痘。陈立夫开始喝茶，从此养成了每次大事到来之前必须喝茶的习惯。

4月底蒋介石做了“清党总动员”，5月初便成立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蒋介石下决心如此之快，离不开陈立夫的旁敲侧击。而这一期清党与“四一二”之前的清党有所不同，这一期重点是利用警察和军队的力量，以取缔共产党及其机关团体，彻底清除各组织、各机关的共产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陈立夫又慷慨陈词一番：仅仅从各个组织中清除共产党是不够的，连同与共产党紧密联系的其他党派也要清除，以防止其他党派成员受到共产党教唆，转而投奔共产党。

自从“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几乎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为了把“清党”搞得轰轰烈烈，陈立夫和蒋介石没有少费心思。蒋介石让陈立夫向各组织、阶层传达指令，要求每一个国民党员都参与这次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在传达鼓动下，弄得各个国民党党员的眼睛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敌视，甚至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大会。就连蒋介石都无奈地摇摇头：看来真是反了！

随着“清党”运动的深入，清理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有一次，陈立夫向下级人员交代具体的清理办法：“不能只靠武力，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如今，共产党都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要加强辨认能力，敢于揭发、检举！当然检举是有好处的，每检举一个共产党，校长都会在功劳簿上给你们记一笔！”

有一些小喽啰不解，便问：“如何才能辨别共产党？”

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三个特点：一、说我们国民党的坏话；其次他们总是笼络人心、搞阴谋；再次共产党人还会秘密收集我们的情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向上级反映！”

小喽啰：“如果抓错了人，怎么办？”

陈立夫：“我们不会随意冤枉一个无辜，也绝不会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听陈立夫这么一说，下面的喽啰们就讨论起来，“清党”之风由此刮向大江南北。

虽然“清党”的呼声强烈，但是反对“清党”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其中广东的陈孚木就公开批评：今日清党，许多人兴高采烈同室操戈，排斥异己，不仅动辄打杀以前与共产党接近过的人，甚至“以共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异了我们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志接近共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内有人打着反共的旗号，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替共产党赶水捉鱼。如果说某些同志以前是和共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

周凤歧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近期清党从来，往往有任意拘押人犯，径行审判。值此时期，事权混乱，物议沸腾，将何以彰德意？职等为统一事权，慎重人命计，特照戒严法组织临时军法处，请派专员秉公办理并通令淞沪军警及各团体，此后不得任意拘人。即应捕获之罪犯，其与军事有关者，亦应于廿四时以内送该军法处办理，以一事权而免物

议，是否有当？

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清党”的诸多弊病，于是向陈立夫求说法。

陈立夫说：“校长，革命者不能为其舆论而分散精力！既然我们选择了‘清党’，就要按照原先预订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蒋介石摸摸头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提防共产党利用舆论在党内制造混乱。”

“校长如果不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去处理！”

此时的陈立夫不仅对“清党”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也有坚定的决心。但是“清党”的各种矛盾和不满还在继续发酵。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着“二次清党”的开始（第一次清党1927年的3月份，标志事件：九江、安庆事件）。

1927年的儿童节这天，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本党在四月十五日未清党以前，各地往往受共产党之暗示，执本党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有出轨举动。迨清党以后，到处又绳以常法，诸多牵累，甚有不安生业之情状。此近于不教而诛。‘故’凡惩办土豪劣绅之案，党人曾有自动行为，除其本人实系共产党，仍归清党机关请该管官吏办理外，其余事犯在四月十五以前概令具结保释。其未到案者免予捕拿，以安生业。”其实“清党”最初面临的压力，是许多国民党党内分子打着“清党”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造成的。

但是“清党”并未因为这些舆论声而停止，就如陈立夫所说“革命者不能因为舆论声而分散精力”一样，他积极参与清党，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自己的亲信参加清党。清党委员会中，其中段锡朋、曾养甫、吴倚沧、郑异、肖佛成等人就是陈立夫处心积虑安插进来的人员。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了。这次蒋介石的下野虽然疑问重重，但多多少少也跟“清党”有些关系。1927年初，蒋介石在陈立夫等人的帮助下发动的“清党”非常成功，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也打乱了国民党的内部权力格局，汪精卫坐不住了，许多国民党元老都坐不住了，于是宁汉分裂越来越严重，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兵分三路逼供南京政府，让蒋介石下野。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因北伐连连失利也向武汉方面靠拢，于是蒋介石迫于压力，无奈下野。

但是蒋介石下野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跟宋美龄结婚；第二件事，继续清党。

蒋介石在“清党”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拥簇，他怎肯停歇“清党”之举。在蒋介石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后，也时不时会问一问陈立夫“清党事宜”进展如何。

每一次陈立夫都如实汇报，并且说：“‘清党’是校长的英明决定，为今后革命成功打下基础……”

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位后，“清党”还在继续。陈立夫公开强调“清党”的必要性。于是也就有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此次会议全面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和《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决议，进一步“清党”。而陈立夫等人也随即着手组织整理

党务，誓死“消灭共产党”！

为了“清党”，陈立夫先是招兵买马，后来又是捋起袖子亲自上阵！陈立夫与哥哥陈果夫合谋，挑选了一些既熟悉党务内部又坚定的反共分子参与“清党”。这其中包括张道藩、于井塘等人。

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政治、军事上的大权，但是他心里明白：人心难测、政局依旧混乱，为了独断统治，必须加强打击异己（尤其是共产党）。于是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建议下，经蒋介石同意，一个新的机构成立了，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而参与各地清党运动的，皆由“党务指导员”负责。

这些党务指导员十分卖力，在各个地方不遗余力、大肆宣传“共产党阴谋论”，并对共产党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由于其“清党”动作逐渐转入到地下，于是之，这些“党务指导员”也逐渐变成了特务。

蒋介石对“清党”十分重视，于是也非常在乎这个“党务调查科”，任命陈立夫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继续“清党”，排除异己！“二次清党”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过这次大范围的清党，不仅清除了大量共产党，与此同时也清理了大量国民党。据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清党”前期，有国民党100万人，“清党”之后，国民党只有65万人。可见这次“清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真是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感觉！

后来，晚年的陈立夫回忆“清党”时，曾这样说：“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选自《陈立夫回忆录》）

可见“清党”多数是通过“打斗”、血腥暴力来实现的，因此也有无数“冤魂”。后来CC派成员吴开先向陈立夫爆料：“死的人大多数是无辜的！”

陈立夫也摇摇头，无奈地说：“都是历史的抉择，我们只不过是历史找来的替身罢了！”

9.党务调查科的成立

党务调查科，应该就是收集整理党务内的各种资料，做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会调查……可是这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党务调查科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偷偷调查那些妨碍蒋介石统治的人和组织。党务调查科可以说是一个“特务组织”，也可以称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阴谋组织。下面简单列举一下“党务调查科”的组成机构和成员。

从设置机构上看：调查科分为采访股和整理股。采访股的主要工作是调查，整理股主要负责档案归类。每一股有一个人负责，其中采访股总干事叫杨剑虹，整理股总干事叫吴大钧。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国民党右派，早期加入青帮，系青帮成员。“四一二”事件发生后，杨剑虹带

领青帮分子殴打、杀害共产党数人，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其进入陈立夫的法眼，当上了股长。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国民党右派，早年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好！由于其“革命”意志坚定，在“档案归纳”等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当上了整理股股长。

从职能上看：调查科主要职能是反共、剿共、清共，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中统”的名声不太好，主要跟特务活动、暗杀等有关。

从理念上看：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

党务调查科是在一个特殊时期成立的。1927年的一天，清党运动正在浩浩荡荡地进行着，蒋介石邀请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在自己的会客厅喝茶，谈论起风云变幻的形势来。

席间，蒋介石向陈氏兄弟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自己过去年轻时候加入青洪帮，干过特务暗杀工作。说起“特务”这个词，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解释：“有的时候，光明正大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是啊，校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啊！”陈立夫补充道。

“要想把工作做好，还必须要有一些耳目……”

“耳目？”陈立夫不解。

蒋介石喝了一口茶水，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解释道：“就是能够借助他人之目看自己平日看不到的事情，借他人之耳听自己平时听不到的事情。信息非常重要，如果掌握不了信息，事态就难以控制了！”

陈立夫明白了校长的意思，是成立一个特务组织的时候了。

其实蒋介石对“特务”一直情有独钟。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特务组织”。比如明朝的“厂卫”，比如清朝的“粘杆处”！蒋介石觉得有两个宝贝可以镇守江山：首先是军队，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其次是特务，有些事必须暗地里“搞”，暗地里“搞”才能“搞”出名堂来。以至于后来，“军统”、“中统”都是蒋介石一手搞出来的。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提到过“搞特务”的重要性，他曾在日记中说：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扬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选《蒋介石日记》）所以蒋介石对于这些特务组织极其大方，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尤其国共分裂以后，面对转入地下工作的共产党，蒋介石更认识到“特务工作”的重要性。比如“四一二”之后，隐藏在上海各地租界里的共产党依旧还在活动，他觉得必须依靠“特务”才能瓦解和侦破共产党组织。

说到“党务调查科”，蒋介石一方面考虑设置“特务机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人而设。

自陈立夫当上机要秘书以来，蒋介石就发现这个“毛头小伙子”在特务方面有很大的潜质。他也曾多次试探，觉得陈立夫能够搞好“党务调查工作”。还有一次，他单独找陈立夫谈话。

“立夫，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如果不除掉，必然会有麻烦！但是现在革命形势混乱，共产党也都纷纷藏了起来！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办？”蒋介石假装对此事头疼，顺便考验一下陈立夫。

此时的陈立夫已非过去的陈立夫，尤其是“清党”开始后，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他开门见山道：“校长，我觉得我们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专门对

党内的一些异己分子进行调查、控制，并且建立起档案。对于这类分子，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就抓起来论处！”

“你仔细说来听听……”陈立夫说到蒋介石心坎儿里了，所以他瞪了瞪眼睛，提了提精神。

“我觉得有三个必要：第一，有组织名号，所有的活动都是合法的，也不会受制于人；第二，共产党十分狡猾，他们一直在暗地里搞斗争，所以他们给我们玩阴的，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搞明的；第三，这个组织是完全服从校长命令的，而且它就是校长的眼线！校长，其实过去袁世凯也搞特务活动，为什么他们能搞，我们不能搞？”

蒋介石想了想：“可以搞！”

陈立夫：“校长，我想要几个人……”

“谁？”

“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张国栋等。”

蒋介石果断答应了陈立夫的请求。后来叶秀峰、张道藩、徐恩曾皆在“特务机构”担任要职，尤其是后来的徐恩曾，一下子当了十几年的中统局掌门人。

蒋介石也算是个诚实守信的人，1928年他再次登上朝纲，便许诺成立这样一个组织。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也借机上书：原来的组织部过于庞杂，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应该对组织部进行调整，没有用的科室应该果断砍掉！组织部只保留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

当然陈果夫、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趁机把自己麾下的“CC”分子们倒腾进组织部，由此一来，国民党组织部几乎成了陈果夫、陈立夫的天下了。担任调查科科长的就是陈立夫，而这个调查科也是组织部里最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不过陈立夫担任该职位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由叶秀峰担任此职。到了1929年，徐恩曾又接替了叶秀峰担任调查科科长，并且前后从黄埔军校和中央党务学校调来20名学员。此后N年，又不断招收各类学员，组织不断壮大，最后只能在党务调查科基础上成立特务工作总部，表面上仍隶属党务调查科。徐恩曾掌管的特工总部，就是所谓的“中统”。

党务调查科成立以后，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针对党内斗争搜集情报；其二，反共。前期主要以搜集各派系党内情报为主，后来逐渐转向反共。尤其在调查科第一次会议上，陈立夫说：“我们调查科主要任务是：收集党内异派分子的信息，收集共产党情报，逮捕共产党！”会议上亦是热闹无比，大家慷慨陈词。

有人问陈立夫：“组织刚刚成立，人员不够，如何实现调查工作？”

陈立夫说：“以人为单位，发展成组，一个人负责一个大的方向，人员不是问题！”

还有人问：“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陈立夫说：“重点是调查各组织、党派情报，让校长清楚地了解各个党派的现状。”年轻的陈立夫眉清目秀，像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而会议台下面的人则个个面目狰狞，似乎有点不太搭调。

当时陈立夫对此也有点矛盾，为此他去请教戴季陶。戴季陶语重心

长地对他说："立夫，做调查工作离不开这些三教九流、面目狰狞的家伙，但是这些人更需要一个慈眉善目、有智慧、秉公处理事情的人去管理，你就是这样的人！你记得十八罗汉面相狰狞，但管他们的则是面相和善的如来佛祖，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校长相信你，你就要想方设法让他满意！校长对你不薄，你也不要薄情于他！"戴季陶一席话，让陈立夫茅塞顿开！虽然他年仅28岁，却显露出不相称的成熟。

调查科成立后，陈立夫将其分为两个组，一组负责调查，另一组负责统计。而负责此项目的人各个身怀绝技，有的懂电台，有的懂情报，有的擅长特务追踪工作，有的则拥有高超的枪法、顶级的暗杀手段。甚至陈立夫曾在回忆中骄傲地说："我们的特工甚至比美国人还要厉害一些……"

调查科的用人制度也几乎是按照现代职能部门的管理条例制定的，可见陈立夫是一个拥有前瞻思想的人。尤其在对人员的培训、实习方面也下了极大的功夫。比如一批新人刚刚进入调查科，就先要从基础做起。首先要了解调查科的主要职能，其次是推心置腹一番长谈，能洗脑的则直接洗脑！熟悉完工作职能后，便下派到各个点实习。在实习过程中，也进行详细的记录和观察，以便对实习生进行筛选和归类。等到实习结束后，再分门别类将实习生分配到各个岗位中！

陈立夫是如此评价党务调查科的，他认为：特务组织是一个政府必不可少的部门，也是一个搜集机密、控制机密的核心部门。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领袖安全，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至高利益，只有最出色的、忠贞不贰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工作！所以在陈立夫的回忆中，总是充满了对"特务"这项工作的敬意。

正是如此，党务调查科在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期诞生了！

到了1928年底，党务调查科已具雏形。尤其是蒋介石召开反共会议后，陈立夫和他的调查科对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党务调查科与警察署合作，时常打着警察的旗号进行搜查、通缉、逮捕的工作。尤其后来，有大量共产党叛徒进入"中统"，使共产党处处遭到重击，白色恐怖已经拉开帷幕。

陈立夫是党务调查科的创始人，也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所在。甚至连后来的徐恩曾、叶秀峰担任了中统局长后，也时常跑到陈立夫的府上商量对策。

29岁的陈立夫本想当一名挖矿工程师，不料却成了中国最著名特务机构的头头，虽不能说是造化弄人，但也是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纵观整个历史，陈立夫也仅仅是一个过客，在他走后，徐恩曾等人进一步发展壮大中统，使之成为类似于FBI那样的著名的特务机构。

10.CC系与调查科

调查科的成立，不得不提一个组织：CC系。CC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维生素，更不是一种药品或者产品名称。所谓"CC"是英文"central-club"的简称，或者也可以理解为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意为"二陈"。CC系是一个政治派系，成员遍布中统局、国民党组织

部、各地方党部以及各大学校。

前面我们讲过CC系领导之一是陈立夫，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则是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陈果夫1892年生于浙江吴兴，小时候在湖南长沙度过一段时光，并且在长沙的明德学堂读书。肄业后，陈果夫跟着叔叔陈其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果夫竟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黄埔军校创办后，应蒋介石之邀，他主要负责招生工作。中山舰事件后，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陈果夫成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大权独揽。后来与弟弟陈立夫成立“CC”派系，稳定自己的党内地位，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其次成立了“中统”，建立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打压党内异族，与共产党斗法。后来陈果夫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创办大量公司，并且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建国后迁至台湾），拥有大量资本，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三人组成中国四大家族。

CC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浙江社、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执杖派。

浙江社，顾名思义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浙江老乡会（国民党右派组成的），主要成员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浙江成员。由于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所以浙江社在国民党内是非常吃得开的。

AB团，全称叫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nti-Bolshevik的缩写。这个名字已经显示出其职能，与布尔什维克有所瓜葛的都在它的反对行列。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段锡朋和程天放，重要组成部分为青洪帮分子。

西山会议派，由国民党右派组成，主要成员有林森、邹鲁等，其职能亦是反对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所有派系（主要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1925年，西山会议派公开提出“清党”，并且开除了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等人的党内职务和国民党党籍。“四一二”之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合流，继续反对共产党。

孙文主义学会，同样是右派组织，最初是在黄埔军校内成立的。他们亦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要成员有戴季陶、陈诚、贺衷寒和王柏龄等。这个学会在黄埔军校曾经与另外一个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年会）进行对抗，而青年会的主要成员则是由共产党组成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周逸群、胡秉铎等人。中山舰事件后，孙文主义学会解散。解散后，其成员纷纷加入CC系，成为CC系重要政治力量。

执杖派，从名字上就容易理解：拿着大棒吓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组织成员亦是一群青帮分子和国民党右派。

CC系成立后，成员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身居组织要职的人物，所以CC系几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和党政部门。甚至有段时间，CC系给蒋介石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CC系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1937年，CC系成员竟然多达一万人。CC系秉承胡汉民说过的那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话，而这句话亦是蒋介石所推崇的。实际CC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击党内异己（主要指国民党左派），争夺党内“正统”。但是由于CC系过于直白了，后来陈立夫和陈果夫都不承认“CC”的称谓，直到1932年，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成立后，才有了一个具体的名称。

青白团成立于1932年，据陈立夫的回忆，这个组织并非是他和哥哥

陈果夫所为，而是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成立的。而1931年，蒋介石因为“九一八”等事件消极处理遭到反对，后来被迫下野，下野后他曾感叹：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无人扶翼，余不能自主……（选自《蒋介石日记》）他迫切希望成立一个组织建立自己的权威，重拾政治首领的信心。于是“青白团”成立之前，蒋介石曾多次与陈立夫对话，并且阐明了要成立一个组织。1932年，蒋介石已经年满45岁了。在他考虑许久后，终于找来陈立夫谈话。

蒋介石先是感慨一番：“立夫啊，时间过得真快，眼看我马上就要年过半百了！但是放眼看去，革命形势还不明朗！时间不待人啊，我们有必要加快步伐。现在党内问题也很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陈立夫说：“委员长，你过去说过党内存异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历史也表明了这一切。一个党派想要发展壮大，必须统一意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消除党内异己，巩固当前政权。不过现在党内的小组织、小派别非常多，管理起来非常棘手。”

“其实你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处理这些事情！”蒋介石开门见山地点出来，他继续说，“我也害怕啊，这些党内分子看似不起眼，若有一个发展壮大起来，就足以动摇国民党的根基！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准备，不能让那些火苗燃烧起来。”

“对！”陈立夫点点头。

“那么你就依照力行社的形式筹备吧！”蒋介石把话搁下，并且授权给陈立夫。

其实“青白团”就是CC系，CC系的主要成员都在青白团。青白团的干事长是陈果夫，陈立夫为副干事长。其他CC派系成员有余井塘、张励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成员大约173人。后来在“青白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会内组织职位由青白团的组织者兼任，其实也是CC派系的名称罢了。其主要作用有两个：一、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二、牺牲个人利益，放弃“民主集权制”，强调“绝对集权制”。

不管CC系换过多少外衣，但是它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而党务调查科的目的和利益与CC系是一致的。党务调查科成立后，CC派系一边扩大党内影响，打击党内反蒋的异派（主要指丁惟汾的丁派和汪精卫），另一边替蒋介石鼓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重要性，并且由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等，舆论上为蒋介石造势。为了蒋介石，CC系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党务调查科就是这样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党务调查科离不开CC系，CC系借党务调查科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为自己的主子蒋介石卖命。在蒋介石的眼里，CC系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蒋介石同意的事，二陈为何不去做呢？

调查科成立后，陈立夫马上扩大了“调查”范围，通过改组调查科，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形成一张巨网。先是从组织内部成立调查室，后来调查室逐渐细化、扩大，乃至全国上下都有。而陈果夫当上组织部长后，自然就有人员的任免和安置权，只要是蒋介石同意的，他就会把自己的人安置到各个点里（有点类似往一个机体中注射DNA）。不到一年的时间，CC派人员基本到位了。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既然二陈有了本

事，自然就会让自己的人当家。

据陈立夫回忆："北伐完成之后，中央召开全会，家兄认为以往本党同志以前在军阀势力范围之下，从事党的工作，而不能用本党名义，否则难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种不同的名称，以资掩护，而经组织部备案者，例如华北有兴中会、事件社、大同盟等，长江一带AB团、学术研究会等。""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唯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选《陈立夫回忆录》）

虽然陈立夫一再否认CC，而CC只不过是拥护蒋介石的政治工具罢了，但是他也不否认，CC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做了许多事情。

第二章 顾顺 章案

1.顾顺章其人

与"党务调查科"相对抗的，则是共产党成立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其实就是共产党的"FBI"，但是与FBI不同的是，中央特科是被动产生的。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迁至上海，为了保留住革命的火种，收集国民党情报，防止高层关键人物被暗杀，针对国民党特务渗透而成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当然中央特科还有一个职能，就是铲除、暗杀叛徒。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大叛徒顾顺章。此人被人评为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人到底有多危险？就是此人掌握的信息足可以改变共产党的历史！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当地人，早期加入青帮，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在“五卅运动”中有过出色表现，曾经以“钳工”身份带领卷烟厂工人进行工人运动，得到党内的认可。1926年，顾顺章去苏联镀金，回来后与周恩来等人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后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后，其主要负责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四一二”事变中，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青帮分子的冲击下，义正词严，俨然一副大英雄的面孔。

不过顾顺章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特务”胚子，顾顺章此人长相平庸，身体略微有些发福，高鼻梁，但由于早期曾加入过“青帮”，所以也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性格自由散漫、桀骜不驯，党内高层对其并不是很放心。但是此人天资聪明，善工心计，能够三缄其口，而且领导发起上海“五卅运动”，对上海青帮流氓、泼皮、小赤佬进行了痛殴，组织能力可见一斑。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顾顺章：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评价是：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留学苏联期间，他自学化装易容术、魔术戏法、机械修理以及心理学等等。此人的枪法了得，而且左右开弓，徒手杀人技巧也十分了得。所以国民党老特务万亚刚曾说：“顾顺章擅长特务所有的技艺，而且样样会，样样精通，堪称特务中的大师！”就连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也十分崇拜他，认为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

“四一二”之后，中共中央为了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尤其是“中统”特务的破坏、电台监听破译、暗杀等活动，成立了中央特科。特科下设三个部门，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保卫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主要负责机关设立、会场布置等总体事务工作。情报科科长是大将陈赓，当然陈赓也是共产党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他主要负责建立情报网络，收集敌人情报等工作。至于保卫科，科长就是顾顺章！由于其机智过人、枪法了得，打狗锄奸等任务就交给了他。而保卫科也有一个绰号，叫“红队”，也就是“打狗队”！后来中央特科又根据情况增加补充了一个“无线电通讯科”，科长为李强，主要负责通讯以及通讯人员的培养工作。后来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打狗队队长”由康生担任。

担任“打狗队队长”的顾顺章早期也做过几件好事，尤其在打狗锄奸方面。但后来小有成绩的顾顺章，也犯了普通人常犯的毛病，居功至伟、大言不惭。其人曾说：“论地位，我和周恩来平起平坐！”

顾顺章在上海滩出名后，又犯了“名人”常犯的错误。他有点迷失方向，开始了糜烂而奢侈的生活。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的“顾公馆”装修、布置也是相当奢侈的。后来顾顺章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简直像一个“青帮头子”。他越来越放纵自己，而且还染上了毒瘾。老人说的没错：一旦染上毒瘾，这个人就废掉了！此时的顾顺章也废掉了，只要毒瘾一发作，他便点上大烟猛吸几口。

其实在归顺国民党之前，周恩来对顾顺章的奢靡生活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陈赓大将也曾说过：“顾顺章叛变是早晚的事！”周恩来为了防止其背叛革命，让康生取代了他保卫科科长的头衔。此时的顾顺章十

分郁闷，觉得共产党不念旧情、冷酷无情，为他走上叛变之路埋下了伏笔。

顾顺章叛变革命的这天是1931年的4月25日。而4月24日这天，他还化名“化广奇”，技痒难耐，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挣外快！就是这么巧，顾顺章竟然被国民党特务尤崇新（曾经是中共汉口的负责人，后来叛变革命）认了出来，尤崇新兴奋得不得了。于是他赶忙回到总部向蔡孟坚汇报：“我发现了一条大鱼。”

蔡孟坚还蒙在鼓里，便问：“什么大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委会负责人顾顺章！”

“顾顺章！”蔡孟坚惊喜万分，这个“打狗”英雄竟然稀里糊涂跑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而且还是来表演魔术的，简直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等奇怪的事。但是蔡孟坚还是有些怀疑，他有点不信，于是问：“当真是顾顺章？”

尤崇新：“反正非常像……这个名叫化广奇的魔术师晚上还有一场魔术表演。”

蔡孟坚有点生气：“让你抓共产党，不是让你抓魔术师！”

尤崇新忙解释道：“蔡处长，顾顺章好像也会魔术，而且据说他的化名就是化广奇。不管对与错，不如先扣住他审审！”

蔡孟坚：“好吧，如果真是大鱼，老子好好奖励奖励你！”

于是尤崇新带着几个特务早早在外面埋伏，就等着化广奇现身了。天色还不是很黑，化广奇踮着脚步从里面出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特务扣住了。到了武汉一秘密审讯点，顾顺章摘下黑面罩，一脸疲态，似乎烟瘾又犯了。

蔡孟坚问：“你到底是谁？”

顾顺章似乎早有准备，一副傲慢无礼的神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是我掌握了大量共产党的秘密情报！而且你们那档子事，我也门儿清！你不是蔡孟坚吗，徐恩曾派来的特派员！快送我去南京，我要面见蒋委员长，亲自把话说给他！”

蔡孟坚纳闷：“你小子，就不能对我说吗？”

顾顺章一听，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上海的共党总部，是我和周恩来负责的！如果机密一旦泄露出去，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蔡孟坚听顾顺章这么一说，愣住了！

不过顾顺章十分狂妄，他补充道：“你不用害怕，如果我见到蒋委员长，一定会提提你的名字，说不定以后给你加官晋爵呢！”

蔡孟坚此时还是将信将疑。

顾顺章则继续吹嘘着自己当年去苏联镀金，而且在“契卡”（后来改名克格勃）接受过特殊训练！后来跟周恩来等人在上海创办工人组织，甚至党内地位比周恩来还要高出一截。他越吹越过瘾，说自己是国民党曾经谈之色变的共产党红色保卫局长。后来顾顺章又说出自己化名“化广奇”并不是为了表演魔术，而是为了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当主席，顺便筹备张国焘经粤汉路转株洲、萍乡，然后再去井冈山！这等秘密一下子引起蔡孟坚的兴趣。他开始相信这个魔术师“化广奇”的话。

其实蔡孟坚也非等闲之辈，此人也是徐恩曾手下的一员猛将，号称“铲共专家”，与顾顺章曾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是当他遇到这样一

个“牛人”时，也只能自叹不如。后来他曾说：“顾顺章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突出，当他开口说话时，才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于是蔡孟坚给徐恩曾发了一份电报，而且亲自押送顾顺章。经过两天两夜，终于将其押送至南京中山路305号。

当顾顺章一下车，便发现南京中山路305号就是共产党卧底钱壮飞所潜伏的地方。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我党潜伏在中统的特工。幸亏钱壮飞早已获得徐恩曾的密码本，及时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信息，早早离开了中山路305号，并及时通知了联系人，避免了中共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据老帅聂荣臻回忆：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选自《聂荣臻回忆录》）

此时的顾顺章为了抓住国民党这根稻草，拼命地交代共产党的人员和行踪。第二天，也就是4月28日这一天，他向中统特务机关交代了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化名王作霖正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身份没有暴露）。后来恽代英虽被积极营救了出来，但还是在南京雨花台遭到了袭击，最后惨遭杀害！

顾顺章的积极参与得到了蒋介石和徐恩曾等人的信任，他不仅帮忙献策，而且还帮着中统特务训练培养新学员。据说他还曾在训练班开设过魔术课，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个性化”特务导师。顾顺章尝到了甜头后，更加深入叛变革命，交代共产党的秘密。在1931年的6月份，顾顺章带人抓捕了蔡和森，后来将其残害在监狱里。

2.双面人顾顺章

顾顺章这个人，从人格学角度上分析，他是一个双面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顾顺章早期加入青帮，在青帮浸淫多年，染上了一些流氓习气。其二，顾顺章后来参加了“五卅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召唤，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留学苏联！但此人并没有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早期自由惯了，放荡成性，自律性差。其三，随风草的品行，先是在共产党这边“打狗”，后来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主义”分子！后来顾顺章生活腐化，吸毒嫖娼打老婆，而他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时常在大会上走神儿。

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女士说：“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选《杨之华评传》）

给顾顺章的定位是“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且流氓无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共产党宣言》中也曾对顾顺章这类分子有过一个粗略的定义：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可以看出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此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可以除掉叛徒，又可以当叛徒的顾顺章。

我们先看看共产党时期的顾顺章。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顾顺章的名气虽然不大，但已经崭露头角。作为一个钳工工头，他带领一支工人队伍加入到工人运动中。而当时“五卅运动”的发起人是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等人，顾顺章只能算一个运动中的小头目。但是顾顺章带有些许老上海的流氓习气，脑袋机灵，勇敢无比。后来由于在运动中的夺目表现，最终加入了共产党。据说有一段时间，顾顺章还当上了俄国人鲍罗廷的保镖。

加入共产党后，顾顺章和陈赓去苏联留学。顾顺章在苏联学了不少“业务”，掌握了大量“特务”技能。学成归国之后，此人一跃成为党内重要人物。“四一二”之后，国民党进行了血腥的清党工作，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被捕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多，叛变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拥有多项技能的顾顺章就当上了“保卫科科长”，专门负责“打狗”。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那么顾顺章则是执行者！担任“红队队长”的顾顺章靠着本事，也杀了不少叛党分子，比如白鑫。

白鑫原本是黄埔四期学生，上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随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被提拔为政治部教导员。再后来此人返回上海，担任中国中央军委秘书。但是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令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头皮发麻！白鑫也是其中一个。白鑫的一个表弟终于忍不住了，叛变了革命。但是没想到被共产党员击毙了，这又给白鑫留下了阴影。之后白鑫终于想通了，就在他准备叛变革命之时，他还想了一件事，为自己的表弟报仇。于是他投靠了国民党，并且向特务范争波说出了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名共产党员的下落和身份，致使这四人最后惨遭杀害！得知白鑫叛变革命，周恩来便找来陈赓、顾顺章等人商量对策，决定消灭这个叛徒。

周恩来说：“白鑫这家伙叛变了革命，行动一定非常小心。据说范争波为他雇了四个保镖24小时守护，下手不容易啊！”

席间，顾顺章发话：“我去吧，我是上海本地人，对上海的地形地貌都比较熟悉！”

周恩来强调：“不要采取正面冲突，小心伤及无辜！”

顾顺章点点头，于是安排人去长乐路柯麟诊所附近做好埋伏。

顾顺章一连埋伏了好几天，白鑫也没有出来。原来白鑫也闻到了“死亡”的味道，于是决定买张船票离开上海，打算去外面避避风头。这就给顾顺章留下了机会。

顾顺章见白鑫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上下来后，四个保镖一前一后围得紧紧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下手，先是用飞刀解决了两个保镖，此时吓得白鑫抱头鼠窜。当他往范争波家的方向跑时，顾顺章连开三枪，击毙了

白鑫，立下大功。

不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就开始参与捕杀共产党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参与杀害恽代英和蔡和森的事件。

恽代英，黄埔军校四期政治教官，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性子烈是出了名的。恽代英也是这样一个汉子。1921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也是建党的功勋人物。1925年与蔡和森等人在上海发起“五卅运动”，也就在那个时候结识了顾顺章。可以说恽代英和蔡和森曾一度是顾顺章的革命伙伴、领导。清党期间，恽代英曾在“清党重灾区”广东发起过广州起义，但后来起义失败了，恽代英去香港躲了一阵子。

1929年，恽代英回来之后，与李立三曾经发生过摩擦，原因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让他接受不了。由于意见不合，恽代英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因此被下放至贫民窟，穿着工装继续领导革命。但不幸的是，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被捕，此时他为了掩护身份，化名王作霖。恽代英在监狱中宁死不屈，屡屡遭到国民党的严刑拷问。后来国民党拿他没有办法，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后来被转移到苏州监狱。1931年的2月，恽代英又被转移到南京的中央军人监狱。在监狱服刑期间，恽代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中统特务拿着监狱被关押人员的照片找到顾顺章，让顾顺章一个一个仔细辨认。当他看到恽代英化名王作霖竟然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役，便阴着脸向中统特务说：“这个人就是中共的高参恽代英！”

此话一出，让中统特务大为兴奋。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4月28日，时任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中将司长的王振南拿着黄埔军校时候的照片找到了监狱中的恽代英。

王振南：“你不叫王作霖，你到底是谁？”

恽代英见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也就不再继续隐藏了：“既然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了，蒋校长怎么没有亲自过来？”

王振南竟然被恽代英一下子堵住了嘴。恽代英在监狱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同样也赢得了国民党的尊重。劝降失败后，恽代英被关进监狱的单人房里。第二天，恽代英在南京就被枪杀了。

另外一个受害者就是蔡和森。蔡和森是湖南人，他与恽代英同龄，都是1895年生人。两个人同时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上海的“五卅运动”。1927年，蔡和森担任了中共中宣部部长一职，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物。在上海“五卅运动”时，作为顾顺章的领导和战友，他也遭到了出卖。可见顾顺章这个人是一个不念战友情的不折不扣的冷血分子！当然《特务教科书》中对一个特务的基本要求就是：冷血、残酷、心理素质好！1927年，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支持“农民运动”。1929年，蔡和森去了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年回国。但是不幸的是，当他刚刚踏上祖国的一刻，迎接他的竟然是国民党的中统便衣特务。出卖蔡和森的人正是中共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陈立夫的亲自指挥下，几名中统特务带着顾顺章一同南下香港，在香港秘密逮捕了蔡和森。

几日后，蔡和森被中统特务转移到广州的一个秘密监狱。在监狱

中，蔡和森也是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后来遭到了中统特务的非人的暴力殴打。他们将几乎生了锈的铁钉硬生生地钉进蔡和森的四肢，将其钉在木板上。由于伤口的剧烈疼痛，蔡和森几次休克昏迷。醒了之后又继续遭受新一轮非人的暴打。最后中统特务绝望了，用刺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顾顺章出卖了自己同生共死的两个战友后，觉得国民党或许该给他提升待遇了！但是他没想到，国民党同样瞧不起叛徒顾顺章。他第一次嚷着见蒋介石，想要提升自己身价的时候，就遭到了冷遇。

顾顺章看到蒋介石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说道："委员长，我手里有大量的共产党机密，只要我说出来，共产党就会完蛋！"

蒋介石依旧一副冰冷面孔，毕竟蒋介石也是令人敬畏的枭雄，他说："希望你归顺了党国，就好好干吧！"

蒋介石扔下这句话，竟然扭头走了！

当时的顾顺章似乎失落到了极点。

起初还在蔡孟坚面前耀武扬威的顾顺章，一下子无话可说。性格多变的顾顺章后来也不是特别配合中统特务，所以也是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3.徐恩曾眼里的顾顺章

听到打狗队长顾顺章第一时间在武汉投降，身在南京的徐恩曾就坐不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死对手竟然归顺了国民党，让他既兴奋又高兴。于是他提前两天就在南京等着顾顺章了。

两个人都是特工首领，一个曾是共产党的得意干将，一个则是国民党中统局的大特务头子。两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见面，也是历史性的。毕竟，拥有相对高度的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而且徐恩曾也是一个爱才的人，这一点也受到了蒋介石的影响。在南京，徐恩曾在一个很隐秘的办公室（南京中山路305号）与顾顺章见了面，进行了一番交谈。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擅长交际，说话很幽默，善于心理战，对人的态度很随和。无疑，这种人是难以对付的。如果不是叛变革命，顾顺章真是一个很难找到缺点的人。与这样一个人交谈，是很考验耐心的。但是徐恩曾也是一个厉害人物，也特别擅长心理战。

顾顺章来到徐恩曾面前，似乎像是久未见面的老熟人一般。两个人先是友好地握手，然后开诚布公地聊天。

徐恩曾是一副老熟人的腔调问候："一早就听到顾老弟要来南京做客，我事先也并未做多少准备，还请谅解！"

顾顺章："您客气了！这次来，我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徐恩曾："哦？顾老弟，其实我有一事不明，你当年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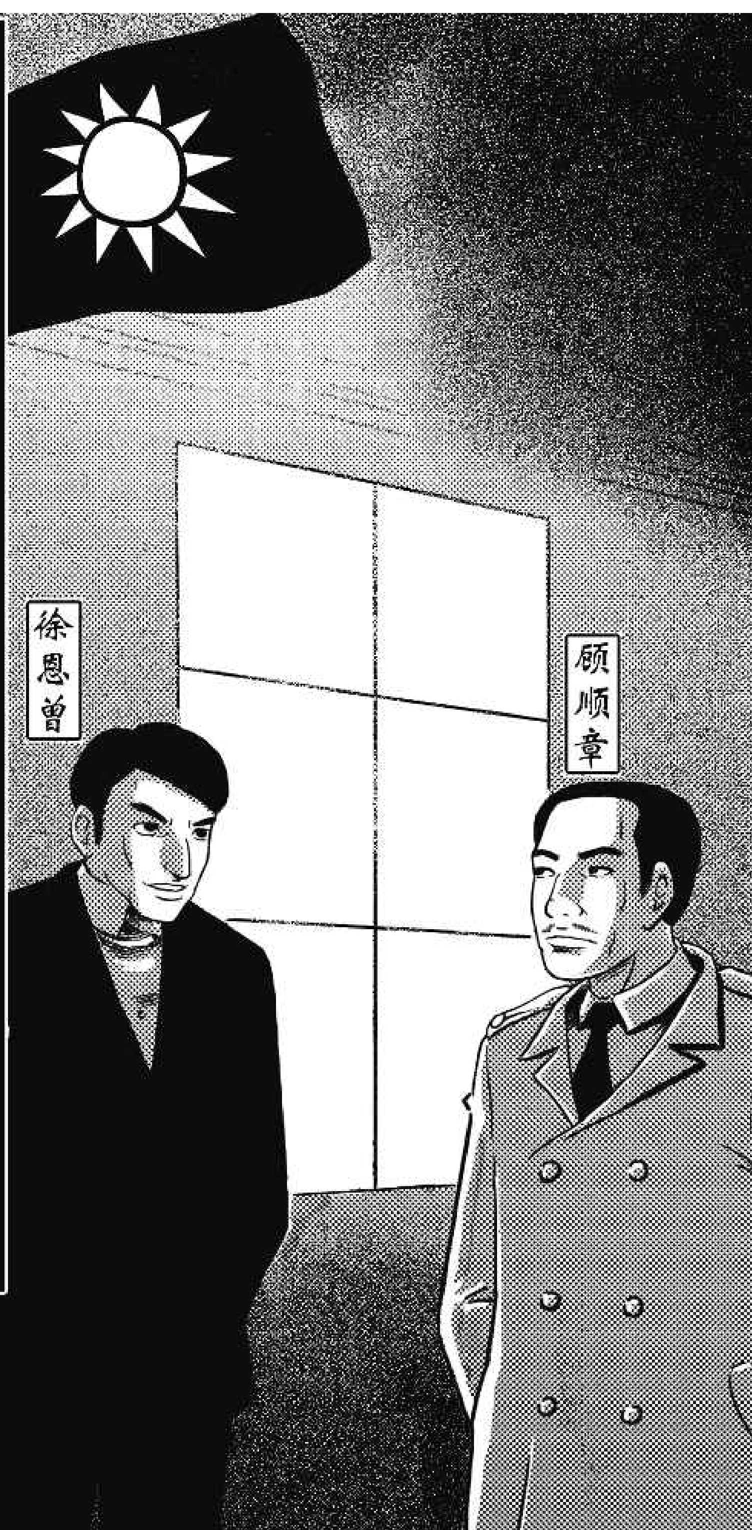
顾顺章用手理顺了一下头发："这话长了，当年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也是十分有声势的！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这个组织也是有理想的组织！至于国民党，我想老兄比我更有发言

权吧！”

顾顺章将话语权踢给徐恩曾，徐恩曾笑了笑说：“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信仰！与共产党相比，可能信仰不同，方针政策不同罢了！但是国民党是正统出身，是中山先生的遗产！”

顾顺章：“是啊，你说的不假，但是我这人对于政治并不热衷！共产党里一些纲领纪要我了解得不多……”

徐恩曾借机拉拢顾顺章：“呵呵，顾老弟没有必要刻意隐瞒。据我了解，共产党还是十分在意你的。因为你的身份足够特殊嘛！”



顾顺章也开始说出共产党的一些问题："我这个人是没有阶级仇恨

的，后来我发现自己上了当，但是却没有了退路！有几个人在里面从中作梗，无非是想引起混乱！徐老兄，国民党内是不是这样？”顾顺章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徐恩曾刚柔并济、软硬兼施：“顾老弟，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而且现在革命形势已经明朗了，共产党只不过是眼前的一片浮云罢了！而且国民党是非常欣赏和想要接纳你这样的人才的！至于共产党，当初企图分裂我党，就是想要引起混乱！如果你继续为共产党卖命，也是死路一条啊！”

徐恩曾见谈话有效果了，便给了顾顺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在徐恩曾的掌控之下。顾顺章虽然枪法了得，而且又懂得魔术表演，但是与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相比，他还是要甘拜下风。

两个时辰后，顾顺章开口说话了。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这个事令徐恩曾大吃一惊。徐恩曾仔细想了一下，钱壮飞已经于前一天提前离开了南京，这让他十分悔恨！自己信任的贴身秘书，竟然是共产党的卧底！

顾顺章终于叛变了，他的彻底叛变是徐恩曾的功劳。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地下交锋上一下子占据了优势，各个站点都活跃了起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捕的消息。

但是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只可利用，不可信任！顾顺章是一个顺风倒的人，哪里有所顾忌就倒向哪里。到了后期，顾顺章在共产党的施压下，竟然又与共产党联络到了一起。徐恩曾说：“此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必须要及时铲除掉！”不过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徐恩曾竭尽全力安排这个人给中统小特务们上课，手把手地传授特务技能！徐恩曾虽然是特务头头，但是对顾顺章的本领还是瞠目结舌、十分欣赏！

那段时间，顾顺章也是倾囊而出，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中统特务。其中顾顺章把他从苏联“克格勃”学来的本事变成教材，这些教材有《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行动工作》和《审查工作》，后来这六本书汇编整理成《特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后来顾顺章写书成瘾，与王一心合作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以及临死前还打算出的一本《“人”的研究》（最后不了了之），这些书不但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教科书，而且还得到了徐恩曾的极高赞誉。

曾经接受过顾顺章训练的特务回忆道：“此人简直是一人间奇货，天生为特务而生的！他懂得易容术，易容之后，难辨其人面目。此人还有一套培养特务的体系，且体系非常科学，行之有效。此人的攻心术也了得，而且还懂得枪法、格斗、擒拿等。”

顾顺章刚刚加入国民党阵营就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后来他还偷偷摸摸与戴笠勾结，帮军统训练特务，并且挑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关系，弄得徐恩曾跟戴笠老死不相往来。而他手中的特权也越来越多，私心逐渐膨胀！于是就有了以后他竟然还企图成立新共产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分庭抗争的举动！但是顾顺章的预谋还是被老奸巨猾的徐恩曾识破，最后将他除掉。

徐恩曾回忆：“我所引以为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

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的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从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是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过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有实施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选自《徐恩曾回忆录》）

可见徐恩曾对顾顺章是又爱又恨！爱他的才能，却恨他的“不安分”！而顾顺章也正因为自己的不安分而引来杀身之祸。

4.向忠发事件

顾顺章叛变革命后，挖出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官衔最大的，就属向忠发了。向忠发也是湖北人（湖北本产命硬的男人，不料也出软骨头），早期担任汉阳钢铁厂的公会副委员长，1922年加入共产党，以后便参加工人运动，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八七会议”上，向忠发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的中共六届政治局会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来他犯了李立三“左倾主义”路线错误，于是大权被王明和博古所剥夺了。直到1931年，顾顺章把他从共产党的阵营中“挖掘”出来，这个大人物又重见了天日。

向忠发看上去“牌儿”挺大的，其实他只是挂着一个头衔罢了。1928年他从苏联回到国内，当选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实则虚衔，而真正掌权的则是另外一个人：李立三！向忠发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物，能力水平并不高，只不过运气好，人脉厚而已。1930年，最后一点权力被剥夺之后，他日益消沉，开始逐渐追求安逸享受（他的堕落类似于顾顺章）。后来向忠发掉进了“女人”的怀抱，整日与风尘女子厮混，其中有个风尘女子名叫杨秀贞。顾顺章叛变革命之后，党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便通知向忠发转移。但是这个向忠发竟然是个“痴情汉”，非要和杨秀贞再见一面。当他与杨秀贞私会一夜准备乘车返回时，却被一个名叫叶荣生的车行会计发现了，于是叶荣生将他转告给中统局的人，早已埋伏好的特务蜂拥而上，将向忠发逮个正着。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就叛变了革命，他叛变的速度比汽车拉力赛中的赛车还要快。他首先向中统特务提供了任弼时老婆陈琮英的住址，于是特务们立刻搜捕了陈琮英的住宅，逮捕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

儿。向忠发此时还用湖北话劝降陈琮英："他们都知道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吧！"向忠发不仅提供了任弼时家的住址，还有周恩来等人的住址。

向忠发带着那个风尘女子一起来到周恩来隐居的地方，并且希望风尘女子能证明其叛变的决心。不料风尘女子结结实实给了向忠发一耳光，大骂道："原来共产党里也有你这类下三滥的货色，做人的基本道德如此拙劣，简直比我们这些风尘女子还差劲。我为了保护你，脸都被打肿了，你个大老爷们儿竟然毫无自尊心，稍微一吓唬就叛变了革命。你如果继续出卖革命同志，你自己去，不要拉我下水，我觉得丢人！"向忠发被骂得狗血淋头，一脸郁闷样。后来连周恩来都如此评价向忠发："他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婊子！"

向忠发叛变革命之后，被秘密押送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觉得向忠发来头不小，是条大鱼，立功心切，于是便发电报给蒋介石！不过蒋介石此时正在庐山开会，急忙中他电回"立即枪毙！"熊式辉并没有第一时间执行命令，而是刨根问底儿，让向忠发交代事情。此时的向忠发早已经是个堕落腐化的革命分子，在熊式辉的逼问下，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抖搂了出来。

向忠发首先供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今年多大了，家庭情况如何，以及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如何混到党内政治局主席的……他还交代了自己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的分歧和冲突，并且交代了自己只不过是个傀儡，手中没有多少权力。

后来他详细交代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成员名单以及这些人的住址，他交代的人有：国际共产党驻沪负责人俄国人米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去苏联）、卢福坦、徐锡根（在鄂西红区）、项英（在赣红区）、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关向应和刚刚叛变革命的顾顺章。他还详细交代了共产党特委会的成员名单：廖成云（总务）、陈云（第三科）、潘汉年（第二科）、杨森（第一科）、陈寿昌（第四科）。他还把各地区的负责人名单以及党组组成部分都详细地供述出来。甚至还有"共产党的经济来源都是由苏联共产党提供的"这一情况也供述出来。最后他还供述了几个人的详细住址，其中包括：居住在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交通主任喻泽时；居住在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的妇女部负责人周秀珠；住在古拨路横路3号的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信息，熊式辉兴奋得一宿没合眼。他又致电蒋介石，说向忠发全部交代了！于是蒋介石致电："暂缓处决！"熊式辉连忙派人到向忠发交代的地方去查，结果一个也没有查到。兴奋了一宿的熊式辉气急败坏，于是第二天就派人枪毙了向忠发。

如果说多数腐败分子的落马是因为女人，那么向忠发也是这种情况，他为了一个风尘女子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是令人惋惜。不过向忠发与顾顺章有相似的地方，向忠发参加革命之前也是赌命一条，据说有一次从赌场出来后，输了个精光，为了戒赌，他发狠剁去一截手指。向忠发被抓的时候，灰头土脸，口齿也不伶俐，似乎不太关心政治。

徐恩曾回忆："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屈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了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

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选自《徐恩曾回忆录》）可见当时徐恩曾并不打算杀死他，觉得他还会有点用处，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不过连续从共产党大营中挖出几个重要人物，顾顺章在中统特务里红得发紫，加上徐恩曾等人的欣赏，他的个人势力也逐渐建立起来。于是后来，他竟然想建立一个新共产党，立山为王！

5.野心膨胀的顾顺章

顾顺章虽然不懂政治，但却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与这人的性格有关。顾顺章早年加入青帮，也算是黑社会成员，在这样的组织里，很容易养成帮派和江湖习气，顾顺章就是这样一个江湖人物。

已经养成江湖习气的顾顺章参加工人运动的起因虽不得而知，但是他好勇斗狠的性格却显露无遗。“五卅运动”期间，他表现活跃，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加入了共产党。从入党后到叛变前的这段时间，顾顺章如同坐直升机一般疯狂晋升，几乎到了跟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步，说明其野心之大，能力之强！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顾顺章的老毛病就犯了，他开始居功至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吃喝嫖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周恩来等同志也三番五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只可惜他中毒太深，无法从花花世界中净化自己了。

顾顺章叛变后，他企图在国民党那边谋求个职位，在考虑了两个时辰后，终于向中统特务交代了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陈绍禹等人的住址，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室等秘密地点，想要借国民党的枪一举消灭共产党。在他的帮助下，国民党处处开花，几乎破坏掉所有的特科据点，使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顾顺章一副牛乎乎的样子对陈立夫说：“你太小看了共产党，论单兵作战、临场指挥，国民党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陈立夫疑惑：“为什么？”

顾顺章得意扬扬道：“因为共产党人的信仰！”

陈立夫依旧不解。

顾顺章说：“其实我也不懂，但是共产党是不怕死的，单纯靠屠杀、镇压是没有用的。”

陈立夫想要听听他的看法，于是问：“你的意思是？”

“攻心，一个人的心理起了变化，事情就差不多了！”

顾顺章的办法得到了陈立夫的赞同，他回想清党期间对蒋介石说过的话，攻心战比实战更重要，这一点顾顺章与陈立夫不谋而合。不过陈立夫对顾顺章并不放心，特意交代特务们要对顾顺章严加防范，防止他逃跑或者二次反叛。

1931年5月份，顾顺章被徐恩曾安排到南京南双塘巷居住，并且安

排了自己的亲信王思诚时刻监控。而陈立夫和徐恩曾也时常来这里与顾谈心，安抚他的情绪。自从顾顺章出卖了恽代英之后，顾顺章得到了陈立夫的表扬和许诺。

陈立夫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开篇点题："恽代英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对你十分欣赏，希望你好好干，为党国服务。"

顾顺章于是打听："他就没说点实际的？"

"顾老弟不要着急，凡事都要一步一步解决。既然委员长当面点名提出，一定会把他拿上日程的，这个你放心吧！"

为了站稳脚跟，顾顺章也只能按照陈立夫和徐恩曾的指示去做，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往上爬。通过自己的努力，顾顺章越来越受到重视，徐恩曾也开始让他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主抓特务训练。此时的顾顺章似乎抓住了一根黄金稻草，非常卖力地传授个人的特务经验，帮着徐恩曾培养特务。第一期训练班开展了三个月，地点设在瞻园的秒静寺内，参加第一期特务训练班的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三个月后，这四个人的本事大有长进，随后史济美被任命为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曾化名马邵武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地下破坏活动，密捕卢福坦，逮捕廖承志、罗登贤，公开绑架陈赓等，红极一时。徐恩曾尝到了甜头，又开设了第二期培训班。这一期学习人员猛增至20人，而且训练效果极好，甚至引来徐恩曾的"羡慕嫉妒恨"！

顾顺章一步一步得到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还安排他在南京跟张永琴结了婚，居住在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大展身手，利用其便利条件，身边逐渐聚拢了一些叛党分子。其中这些人有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才飞、陈连生等人。由于这些人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进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短时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此顾顺章逐渐成了陈立夫、徐恩曾手下的红人。但是顾顺章野心不断膨胀，所以他开始私下勾结军统的人，帮戴笠训练特务。而中统军统的矛盾自从成立那天就有了，如此一来，脚踩两只船的顾顺章必然遭到徐恩曾的冷遇。

顾顺章遭到冷遇后，慢慢对徐恩曾、陈立夫感到不满，他时常自言自语道：说白了，徐恩曾就是一个电机工，而陈立夫仅仅是个挖矿的！他不但恨他们，而且看不起他们。恰逢此时，他都得到了戴笠的挑唆："顾老弟，既然你能力强，为什么非要跟着他们混？如此一来，你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

顾顺章狐疑了一会儿，问："你到底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依你的能力和人脉，完全可以另立山头，与徐恩曾分庭抗争！"

喜欢蛮干的顾顺章一听，果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自己成立一个组织。1933年初，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顾顺章也像往常一样，背着手，在庭院里踱着步子。此时顾顺章的密友兼同学蒋云夫妇来访，于是他们开始谈论要事。

蒋云说："我觉得一个新的党派一定要有自己的势力、纲要和灵魂，否则这个组织就是孤魂野鬼！"

顾顺章提不出什么政治看法，只是点头。

"而且我们还要有一个计划……对阻碍我们的人，也要有个准备！"

蒋云的话刚刚说完，顾顺章便交代自己的贴身保镖林金生："最近你要准备一下，成立一个行动队，想办法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

顾顺章接纳了蒋云成立"新共产党"的意见，并交代他搞定党纲和计划。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云刚刚完成任务，就被顾顺章密谋杀害了。可见顾顺章是个心狠手辣、过河拆桥的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也开始动摇了。其一，他怕遭到顾顺章的报复；其二，他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以顾顺章现有人马，根本无法与中统局对抗，如此硬来，只是以卵击石。连续思考了N天，林金生果然背叛了顾顺章，偷偷将顾顺章的小秘密告诉了徐恩曾。

徐恩曾一听暴怒，便怒斥道："是不是这小子不想活了？"众人不敢应声。徐恩曾又说："把童国忠和张文农喊来，我有事情交代！"

童国忠和张文农哆哆嗦嗦来到徐恩曾面前。童国忠和张文农与顾顺章本是一路货色，同样也是共产党那边叛变过来的。既然已经变节，只有一条路可选了：乖乖地听徐恩曾的话，尽最大本事看住顾顺章。童国忠和张文农寸步不离顾顺章，他们也知道顾顺章会变魔术，而且又会什么催眠术、土遁术之类的，所以晚上连眼皮都不敢闭。如果顾顺章跑了，他们俩的人头不保。就是这样，顾顺章计划不但没有实行，反倒被徐恩曾控制起来。

有个特务提议，还是把顾顺章关押起来得了。徐恩曾考虑了半晌儿，决定逮捕顾顺章！于是顾顺章被关押起来，关进镇江看守所。为了防止"琵琶骨"顾顺章施展脱骨术逃生，所以他被中统特务里三层外三层拴上了锁链。

此时的陈立夫和徐恩曾觉得顾顺章这个人野心勃勃，制造矛盾，开始想办法除掉他。但是顾顺章毕竟不是一般人物，想要杀他，蒋介石必须同意。于是陈立夫找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据我们调查，顾顺章这个人私下一直与共党有联络，而且企图在国民党内部成立新的共产党，这个人非常危险啊！"

蒋介石有点吃惊："有证据吗？"

陈立夫把早早准备好的证据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一看大为恼火："顾竟然企图暗杀我？"

陈立夫趁热打铁："他岂止想谋害您一个啊……"

蒋介石一声令下："看来这个顾顺章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留下他只能带来隐患，你们看着办吧！"

蒋介石答应陈立夫和徐恩曾的要求，野心勃勃的顾顺章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6.顾顺章之死

有人说，一个人一旦做尽坏事，他也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说做人，还是要做好事，为自己积德。自从顾顺章走上叛变之路，就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但究其悲剧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其一，顾顺章的性格，性格决定其命运。

此人个子不高，但十分聪明，足智多谋，而且有些自大，目中无

人，有江湖习气，生活上比较散漫放荡，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完全会在“利诱”下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时顾顺章的党内地位十分尴尬，特科职位刚刚被康生取代，他有些不服气。而这人本身也是一个自大狂，目中无人，觉得谁都不如他。就算他叛变了革命，他也一直瞧不上蔡孟坚、徐恩曾和陈立夫这些大特务，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本事是高人一筹的！于是他在蔡孟坚的面前依旧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并且给蔡孟坚施加了不少压力。蔡孟坚相信了他的来头，于是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南京。此时的顾顺章又打起蒋介石的主意。他决定跟蒋介石谈谈，直接弄个官儿干干。但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不吃他这套！自从徐恩曾安排蒋介石和顾顺章见了面，顾顺章的气势完全让蒋介石给镇住了。毕竟蒋介石是个政治领袖，气场是相当足的。吃了蒋介石的下马威，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的眼里，他只不过就是叛变革命、加入阵营的小喽啰罢了，根本没有资格跟他谈条件。

但是顾顺章并没有气馁，通过背叛革命他逐渐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负责中统特务训练，从而在中统局里打下了根基。据考证，顾顺章身边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叛徒，这些人与顾顺章一样，亟需根基和土壤，于是抱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势力”。徐恩曾越发信任，反而得到的是野心越发膨胀的顾顺章。他不但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且开始跟军统那边勾肩搭背，与戴笠称兄道弟。他越不安分，事态也就越严重。他开始密谋起来，妄图除掉徐恩曾和陈立夫成立一个新党派。但事与愿违，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他练就一身功夫，但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中统局，那是妄想。

顾顺章还有一个特点，心狠手辣！虽然在“打狗”方面战功赫赫，但是背叛自己的战友，毒杀自己的朋友，就是典型的背信忘义、过河拆桥、心肠歹毒之人，这种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作孽不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也！既然他敢灭自己的师门、灭自己的同根，那这种人也就早早上了黑名单了！记得曾经一个特务说过：“叛变过来的人，是最不靠谱的！”而陈立夫、徐恩曾也深知这一点，对于顾顺章，徐恩曾也是早有防范，他的眼线从未离开过顾顺章，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的掌握之中。后来顾顺章背叛了徐恩曾，所以徐恩曾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早早将其控制起来，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枪毙了他。

其二，顾顺章的作风，作风决定其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跟自己的作风也息息相关。我们常说的作风，又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工作以及思想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也将从以下三方面对顾顺章进行分析。

所谓生活，顾顺章的生活糜烂、放荡、奢靡。青帮出身，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顾顺章一直都是如此，上海的顾公馆装修豪华，各种摆设、古董价值不菲。虽然他不是文化人，但却知道“贵的东西一定好”的道理。所以，他踏进革命风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让自己发财！而发财就是为享受，为了享受“人上人”的生活。如果说向忠发作风不检点、喜欢女人，那么顾顺章更是如此。他是上海青楼的回头客，是鸦片馆里的座上嘉宾。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顾顺章，是不会讲原则的。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干！谁能让他享受“生活”，他就

追随谁！很显然，共产党是不会纵容一个堕落分子的，所以他起了叛变之心。

所谓工作，顾顺章是中共特科“红队队长”，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工作属于高危工作。虽然他除掉很多叛徒，但是他也是国民党的重点“头颅悬赏者”之一。顾顺章的工作可谓危险加刺激，而骨子不安分的顾顺章，恰恰又喜欢这样一份工作，越是刺激，他越喜欢挑战。于是顾顺章有点剑走偏锋，更想去尝试不同风格的“刺激”。后来他叛变了，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一个过去专杀叛徒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叛徒，似乎也蛮符合他的“魔术师”身份。叛变之后，他参与谋害多名共产党，正是性格和高危工作督促的结果。不过也正是他这种工作，不能不让人提防。

所谓思想，顾顺章显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思想腐化的人。聂荣臻曾经回忆，顾顺章是一个大会上开小差、不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政治，他似乎并不关心。可见，顾顺章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旗帜，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徐恩曾也曾说，顾顺章对政治的看法相当肤浅，甚至不及一个小学生。顾顺章信奉的是享乐主义和拿来主义，有两个选择时，只选择利益更好的那个。思想上的堕落，加速了顾顺章的叛变，为了利，他可以出卖朋友、战友。可以说，后来他想成立新共产党，完全是一种占山为王的想法。一个思想腐化、堕落，唯利是图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其三，历史造就了顾顺章，环境决定其命运。

1931年，到底是个什么环境呢？国民党对共产党一直在渗透、打击，东北的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胀，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而共产党这一面，在夹缝中求生存，日子过得很艰难。大环境下，是一幅多灾多难、阴云密布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又能怎样？不就是保命、得利、混日子而已。决定着顾顺章走向的环境也有三个方面。

其一，共产党的环境。自从“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共产党就特别不受待见。怎么说呢？蒋介石说共产党是反动势力，应该剿灭才是。汪精卫也曾说“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狭窄，环境很恶劣。搞革命的，都是提着脑袋搞。为了革命，曾经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先烈啊！这些道理，顾顺章都懂。起初他没有叛变，是因为他在共产党内还担任要职。倘若说顾顺章仅仅是个小角色，恐怕他早已经叛变革命了。“打狗队长”的光环也是顾顺章暂时没有叛变的原因，环境不好，树敌太多，“横竖都是死”，于是他很郁闷，也想找个办法平衡。可是后来，他生活腐化，花钱大手大脚，党组织早看不下去了，找人替代了他！此时他大为光火，既然没有了栖身之所，为什么不想办法投入别人的怀抱呢？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他进了国民党的阵营。

其二，国民党的环境。国民党的环境比共产党好多了，尤其是南京政府，代表着政府。说白了，那时候投靠国民党算是招安、归顺朝廷，而共产党仅仅像是水浒里“方腊”叛军而已。国民党有钱有势，而且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大挫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的稳定也是顾顺章眼红的因素。在上海滩，每一次进出青楼、高档会馆，都是那些洋洋洒洒的国民党和青帮分子，共产党没有钱也没有地位。顾顺章为了“嫖娼”甚至都要

隐姓埋名，他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当他看到希望向他招手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国民党的阵营。而此时徐恩曾亦是求贤若渴，听到“打狗队长”愿意合作，他兴奋不已。为了满足顾顺章，他下了不少功夫。尝到甜头的顾顺章也越陷越深，最后出卖了许多共产党人。

其三，中国大环境。大环境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像顾顺章这样的叛变者。白色恐怖下，人人提心吊胆。那些怕死的人，往往为了保全性命，最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顾顺章就是这样一个人，起初他被捕，叛变革命也是为了保全性命。与那些大义凛然的革命者不同，顾顺章是个投机分子，他要活着，要享受一切！所以他可以不要“主义”，不要“道义”，他很现实。只不过顾顺章这个人掌握了共产党太多的机密，正因如此，他变得特殊、变得危险，变成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性格存在缺陷，环境不好，加之其作风也存在问题，投机主义思想严重，包夹之下，顾顺章选择了背信弃义！由于他的背叛，害死了众多忠烈的革命者，最后是死有余辜。但是顾顺章到底是谁杀的？似乎也是迷雾重重，归纳下来，也是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据老特务张国栋回忆，1935年的一天，在南京举办中央组织调查委员会的例会，除了各大特务头子外，其中也包括顾顺章。此时徐恩曾已经知道顾顺章“准备反水”，所以打算除掉他。也就是这几天，陈立夫和徐恩曾已经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既然没有利用价值，你们看着办吧！”于是徐恩曾把顾顺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另外一个大特务顾建中（中统对外活动负责人）。顾建中得到指令后，便去了会议现场。

顾建中看到顾顺章后便直接掏出枪：“上面有命令，跟我走一趟吧！”

顾顺章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似乎并不畏惧：“你先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起来，跟我走！”

顾建中身后的几个特务准备强行将其拉起，结果遭到了顾顺章的反抗。顾顺章大怒：“你们敢动我，我就不客气了！”

顾建中和几个特务们深知顾顺章的本事，为稳妥起见，顾建中干脆来了个直接的。于是扣动扳机，直接将顾顺章击毙。

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官方认可版本，顾顺章被击毙在上海，实施人也是顾建中。1934年顾顺章被徐恩曾软禁之后，便再也没能离开监狱。后来他被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某秘密监狱被枪决。击毙顾顺章后，徐恩曾还特别召开特务大会，会议上徐恩曾大发感慨：“认真做好自己的事，千万不要像顾顺章见异思迁，否则前途、性命都受影响！”

第三个版本来自蔡孟坚的《回忆录》，他说：“后来顾顺章妄图成立新共产党，于是通过眼线秘密与红区的共产党勾结，企图秘密逃亡红区。但这事被陈立夫和徐恩曾及时发现，故命令江苏保安司令部予以逮捕、关押。1937年，时任江苏省秘书长的罗时实将顾顺章击毙在镇江监狱中！”

不管哪个版本，大叛徒、大特务顾顺章都免不了一死！因为他作恶多端、陷害共产党人无数……最后竟然想杀陈立夫等人！这样的人，任何一个党派都用不得。

其实，在顾顺章叛变前期，1931年的3月份，周恩来曾去顾府做客，并且规劝他生活上要有节制。那时的顾顺章已经完全堕落腐化，对于周恩来的规劝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两个人客客气气谈完话后，周恩来离开顾府后，脸阴沉得厉害。

后来得知顾顺章在武汉被捉，两天后在南京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和陈赓一下子惊呆了。因为顾顺章掌握了太多机密，此人一旦和盘托出，中共会遭到灭顶之灾。陈赓曾经回忆：身着长衫的周恩来低垂双眼，惘然若失，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道：周恩来确实非常震惊。平时绝少抽烟的周恩来，破例地向陈养山要了支烟，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子……（选自陈赓传记《风流大将军》）

陈赓焦急地问周恩来："别抽烟了，你还是想想办法吧！"

周恩来此时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反问陈赓："这个事核实过没有？万一是敌人放出来的假信息呢？"

"既然是钱壮飞看到的密码电报，应该不会假。况且他并不知道此前顾顺章去过汉口！"

周恩来深吸一口烟，叹了口气说："我们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啊……"周恩来觉得事情紧急，抽完烟立刻起身去了上海市云南中路171号的福兴字庄（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机构）进行紧急磋商。

周恩来到了那里后，康生等人早等候。后来陈赓、陈云、卢福坦（后来叛变）、罗登贤、向忠发、博古等人也悉数到来。

周恩来向大家讲："顾顺章叛变了。此人掌握了我们很多信息，包括联络点在内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现在恐怕已经暴露！我们应该想办法撤离！"

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众人愕然。

此时向忠发看了一眼周恩来，说："哎，真是可惜啊！顾顺章以前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恩来，这个事情属实吗？"

"属实！所以大家千万小心，近期国民党会有大的动作。"

此时陈云发言："恩来，首要任务，我们要尽快通知各个有关同志撤离啊，顾顺章叛变后，势必要在这些同志身上下手！"

"对，我们现在就去通知。具体事情，由陈赓同志负责吧！"

陈赓点了点头。

此时陈赓问："恩来，顾顺章怎么办？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周恩来阴着脸，思考了一会儿，说："既然他叛变了，就让陈养山同志安排处置吧。"

第三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

1.徐恩曾其人

提起中统，最应该提一个人：徐恩曾。徐恩曾身在中统，执掌中统十多年，是整个中统帝国名正言顺的缔造者。可以说，没有徐恩曾，也就没有中统；没有中统，也就没有徐恩曾。许多人都会觉得，特务头子应该像顾顺章那般，不仅精通各种杀人技巧，而且善于乔装打扮，甚至是土遁之术。但是徐恩曾却完全颠覆了特务形象。他个子中等，大约一米七二，不胖也不瘦，外表文雅，一副书生气。而且其人十分文雅，待人接物有外交家的风范。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牌子美国归来的洋硕士（美国卡耐基工学院硕士），竟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头子。而且此人还是一个顶级无线电专家，与学工矿的陈立夫曾是同学。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特务，与军统魔王戴笠齐名。

徐恩曾出身名门，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现在的上海交大），留洋归来曾在上海做了一阵子机电工程师（与陈立夫有点类似）。不过就在此时，他竟然连续接到了同学陈立夫打来的电话。

“老徐，你最近在做什么？”陈立夫问。

“哎，在忙机电……现在咱们国家这方面极其落后，要花力气研发！”此时的徐恩曾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打算在无线电等方面有所成就。

陈立夫话题一转，模仿当年蒋介石的口吻，道：“研究什么机电啊？现在政局不稳，大环境糟糕得很，研发无线电，不如为国所用。你还是跟我干吧，单纯的技术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现在放弃，岂不是白学了？不行，这事我不能答应！”徐恩曾毅然拒绝了陈立夫。刚刚回国的徐恩曾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过陈立夫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哪怕是简单地问候一下，也会与徐恩曾保持联系。

1927年，陈立夫已经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而且对于刚刚成立的“CC”而言，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陈立夫同样是一个欣赏人才的人，所以他非常在意自己这个留洋同学。“四一二”之前，陈立夫跟随蒋介石来到上海，虽然他要事缠身，还是抽出时间与徐恩曾见了面。他约徐恩曾到一个极有名的饭店吃饭，顺便招揽他。但不管陈立夫如何劝慰，都没有取得效果。不过徐恩曾也非铁石心肠之人，他答应了陈立夫，如果是技术方面的，他可以参与，但绝不干涉政治。

1927年秋天，徐恩曾终于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在其留美前辈李范一（时任上海南洋大学校长，中国无线电行业奠基人）的推荐下，徐恩曾来到南京，参与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筹建的交通技术学校筹备工作，后来便加入了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CC”。此时徐恩曾凭借其能力担任交通技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在李范一的举荐下，进入蒋介石的法眼。陈果夫也十分欣赏徐恩曾，于是令其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徐恩曾踏足政治，逐渐在政治圈里尝到了甜头。徐恩曾发现自己喜欢上政治了，于是他越来越大胆，担任总务科科长时间不到一年，便完全赢得了二陈的欢心，成为CC系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徐恩曾担任总务科科长的时候可谓尽职尽责，并且建立了各项制

度，这些制度条例一度成为整个特务系统的关键条例。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徐恩曾帮助国民党中央总部安装了第一台500W的播音机。1928年这一年里，可以说徐恩曾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安装播音机上。他不畏惧夏天的炎热，能够吃苦，并且在这方面拥有极大的热情。安装电台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这让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那段留学经历。

1922年，徐恩曾像许多求学的莘莘学子一样，只身一人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求学生涯。在这三年里，他先后在美国西屋公司（也叫威斯汀豪斯公司，著名的发电、输电企业）学习，然后又去了卡耐基工学院学习，主攻管理专业。这三年里，他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技术和实业领域的专家。三年的留洋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生活方式是美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美式的，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拥有东方面孔的美国人。正是那段留洋生活，让徐恩曾变得与众不同。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以后他竟然选择当特务。正是因为徐恩曾在电台方面的热情，他一下子感染了陈果夫、陈立夫。1928年的8月1日这天，电台终于落成。而徐恩曾也名正言顺地当上电台台长。电台的揭幕仪式，来了诸多名流（其中也包括蒋介石、戴季陶等国民党巨头），徐恩曾忙前忙后，也时不时像导游那般详细介绍电台的来历。

徐恩曾越来越不安分，虽然当上了电台主任，但是他还想继续往前走。此时陈立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处长，而陈果夫则是时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两个人都是大权在握，作为他们的老乡、亲戚、同学，徐恩曾肯定是要挪挪窝的。所以古人说：树挪死，人挪活。想必徐恩曾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打算换个地方干干。此时CC派系里的“浙江社”（主要成员是蒋介石、二陈、戴季陶、陈其美、张静江、朱家骅、潘公展等）帮了他的大忙，他逐渐进入了“特务”行业。1929年党务调查科科长吴大钧被调至中央统计处任处长，叶秀峰掌管了调查科。但是叶秀峰后来与自己的同学陈立夫发生个分歧，便借故离职。此时的党务调查科已经向等待许久的徐恩曾招手了。于是陈立夫安排徐恩曾进入了党务调查科，从而让他走上了特务之路。

当上了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野心继续膨胀。调查科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科室，但是经过此地深造，都有着不错的发展前途。第一任科长陈立夫，已经成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长；张道藩发展也不错，被调到南京市政府干秘书长；吴大钧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已经是中央统计处处长了；至于叶秀峰，离开调查科后反而到南京政府做了组织部部长。初来乍到的徐恩曾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在这里镀镀金，早晚要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这一等就是很长时间，见别人都挪动了，自己却没有挪动，他开始着急了，一着急就开始瞎猜。他猜测是不是党国领导对他有意见？还是觉得他的本事不够，无法胜任？他越是瞎猜，越是失眠！不过此时陈立夫却用“钱”封住了他的嘴。徐恩曾的手下悄悄对他说：“徐先生，上面给咱们拨这么多款说明重视咱们，你不要多想了！”徐恩曾被自己的手下一语点开。他心想：是啊，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他一边摸索，一边着手组阁，扩大自己的队伍。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特工总司令部”！徐恩

曾这一干就是15年，直到1945年被叶秀峰重新取代，才结束了他的特务之路。

2.徐恩曾身边的三个女人

留洋三年的徐恩曾，不但是管理学硕士，而且还是个响当当的才子。正所谓才子风流，徐恩曾也是一个十分风流的人物，一辈子阅女无数，而且也结了三次婚。这三个女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一个比一个漂亮。三个女人有传统的，也有思想开放的，甚至还有共产党员。

先说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梅于琴。这个女人是徐恩曾的同乡，是通过媒人介绍的，算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形式其实对徐恩曾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仔细分析一下，有三个原因：其一，徐恩曾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怎么会忍受强加进来的爱情呢？更何况这个梅于琴无貌无才，又怎能引起徐恩曾的兴趣呢？其二，徐恩曾好歹也是留洋分子，大家都知道，留洋的人一定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徐恩曾是一个受西方影响很深的人。自从他回国后，经常听外国的歌剧，吃西餐，看英文报纸，甚至后来他连写回忆录都通篇用英文写。他的婚恋观应该也是西式的，恋爱是自由恋爱，包办婚姻是徐恩曾无法接受的。当然他与梅于琴的结合，更多是碍于母亲的意愿。其三，梅于琴本人是一个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女性，价值观、道德观与徐恩曾相差甚远。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这句话放在徐恩曾的耳旁，却成了“不思进取”。徐恩曾欣赏的是那种才貌双佳、思想开放的女性，而绝不是这种被封建色彩勾勒得满目疮痍的女性。梅于琴就是这样一个女性，无才无貌，甚至连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典型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婚姻。

起初，刚刚留学归来的徐恩曾与梅于琴的感情还可以，这一点更多源于女人的神秘对徐恩曾产生的吸引作用。毕竟他刚刚回国，涉世不深，勉强还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女人。随着徐恩曾进入CC系后，眼界大开，而且这些机构里的女人个个漂亮，而且都是一些思想开放有文化的女性，这让刚刚见了些世面的徐恩曾蠢蠢欲动，欲罢不能了。

徐恩曾慢慢开始厌倦梅于琴，觉得梅于琴要才无才，要貌没貌，整个一“三无”女性。他开始慢慢找借口不回家，哪怕花钱去青楼，也不愿意回家。后来梅于琴生气了，抓着徐恩曾的领子问他：“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女人了？”

徐恩曾推开梅于琴，一脸怒气道：“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这副模样，我怎么带你上街？更何况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

“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你心里清楚！”

徐恩曾对于自己这个包办婚姻的老婆，越来越不满意。他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给钱，而梅于琴也慢慢接受了徐恩曾的这种做法。她逐渐允许和默认他去跟其他女人鬼混，只要给足家用便可（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梅于琴也逐渐对自己的婚姻冷淡了，开始吃素念佛。不管是“南海观世音”还是什么掌管其他命门的菩萨，她都拜。念经，什

么大藏经、金刚经……只要是经她就念。既然凡世有难，不如将自己寄托给佛。她不再纠缠徐恩曾，而是放之任之。

徐恩曾逐渐摆脱“包办”婚姻带来的困扰，他便慢慢开始为自己物色一个有才有貌的女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走进他的法眼，这个女人叫王素元，虽然二人没有结婚，但对徐恩曾的影响非常大。王素元是东北人，高头大马、皮肤白皙，双乳高挺，而且长得十分漂亮，是典型的东北美女。加之东北人生性豪放，散发出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一下子勾起了徐恩曾的欲火。

王素元是个涉世不深的小职员，而徐恩曾却是王素元的上司，所以徐恩曾便以上司的身份经常与王素元接触、幽会。在徐恩曾的感情攻势下，王素元渐渐喜欢上了徐恩曾。徐恩曾是一个十分有才分的人，经常可以用“诗歌”和“外文”哄骗她。

有一天徐恩曾约王素元在一个饭店吃饭，便提出自己的想法：“素元啊，我打算开一家实业，名字都起好了！”

好奇的王素元便问：“什么名字啊？”

“正元实业，这个名字怎样？”徐恩曾一向在女人面前故弄玄虚，从而显摆他的学识和文采。

王素元一脸疑惑，摇头不解。

徐恩曾说：“素元啊，你知道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蒋委员长，一个是你！委员长叫蒋中正，而你叫素元，正元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觉得好听吗？”

“好听！”

王素元觉得徐恩曾既体贴又会心疼人，便投入了徐恩曾的怀抱。徐恩曾靠自己连哄带骗的伎俩将王素元搞到了手，心里美滋滋的。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女人，徐恩曾自然就不去青楼嫖娼了。他想：与其去青楼，不如找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女人。王素元与徐恩曾确立了恋人关系之后，徐恩曾确实安分了一段时间。

可是好景不长，徐恩曾的老毛病又犯了。几个月后，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个“局势”。有一次，王素卿来南京看望自己的妹妹王素元，因为长久不见，便相谈甚欢。就在此时，下班回来的徐恩曾见到了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

王素卿也是一个美人胚子，当好色的徐恩曾看到她后便起了歹心。他问：“素元，她是谁？你怎么从未向我提起过？”

王素元说：“她是我姐啊，怎么样，是不是我俩长得很像啊？”

徐恩曾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尤其在漂亮女人面前，他更是一套一套的。他先是同王素卿握手，而后又大献赞美之词。谈话中得知王素卿还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徐恩曾更是兴奋不已。他发现，这样的女人才是他想要找的。于是恶念在他心中闪过，他决定用手段把她搞到手。

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首先，王素卿本是有夫之妇，通过一番长谈，她的男人同样留学海外，竟与徐恩曾还是朋友，况且王素卿还是王素元的姐姐！但是这个徐恩曾才不管这些伦理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得到这个女人。后来徐恩曾得知王素卿的男人出国，心怀不轨的他便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偷偷在自己的徐公馆设下陷阱——布置了一场鸿门宴。

宴会开始了，表面看上去就像一场普普通通的家宴，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蒙在鼓里的二姐妹本以为徐恩曾一表人才，是个不可多得的谦谦君子，没想到酒过三巡，两个女人开始觉得大脑昏沉，不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根本没想到这酒杯中已被下了蒙汗药。见两个女人昏死过去，徐恩曾觉得机会来了，便把王素卿带进了私房，借其昏迷将其奸污。

当王素卿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徐恩曾的床上，便开始尖叫！但是这里毕竟是徐公馆，任其嘶喊求救，也是无人应答，她已经掉进徐恩曾的魔窟。慌乱中她厮打徐恩曾，而徐恩曾也任其扇耳光，但是扇过耳光后，徐恩曾变了脸色：“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就停手！”

王素卿一脸泪痕，脸上挂着恨：“你真是个畜生，占了我妹妹，今天又占了我……别忘了，朋友妻不可欺！你真是个畜生！”

“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应该是朋友妻不客气！再者说你老公出去留学，也没有心思照顾你。等他回来，我给他安排个好工作就是了！至于你，既然今天从了我，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如果你听任于我，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王素卿一脸迷茫，但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是国民党里的红人，根本无法得罪，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无奈之下王素卿只能试着接受这个男人。

王素元醒后，发现自己的姐姐竟然抢先一步上了徐恩曾的床，也大声责骂徐恩曾和王素卿。不过身在徐公馆，哪有她说话、吵闹的份儿。既然姐姐与自己的准老公生米煮成了熟饭，她也没辙儿了。但是徐恩曾念在曾经有过的旧情，给了她一些钱和地皮，和平与之分手，还算通人情。

王素卿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了徐恩曾的二任太太。事后，徐恩曾对王素卿也是百般疼爱，只要条件许可，徐恩曾都会尽可能地满足这个女人。后来他还在重庆给王素卿置办了实业和豪华别墅。但是王素卿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她十分贪财，而且不安于现状。后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大，让徐恩曾头疼不已。

徐恩曾的第三个女人名叫费侠，这个女人可是一个传奇女子，因为费侠曾经是共产党员。费侠，湖北钟祥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去苏联留学，深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归国后便加入共产党。因为费侠才貌动人，而且非常有才华，于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内部大展身手，参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关于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书籍，而且她还是一个外交高手，实属中共党内的一朵奇葩。后来费侠进入中共“特科”工作，并且参加了无线电学习班，转战地下。

与钱壮飞等人一样，接受完培训的费侠也顺利打入敌人内部，成为中统分子中的一员。在中统内部，费侠负责电台等工作。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费侠也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立过大功。不过顾顺章叛变之后，风云突变。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纷纷被特务们挖了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费侠。

其实徐恩曾对费侠早有耳闻，一个年轻漂亮且能力超凡的女特工经常在自己面前晃悠，他能不心动吗？不过当她被捕后，徐恩曾也曾大吃一惊。有一次他竟拍着大腿自言自语：“我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怎么连我身边的女人也是共产党？”他恨共产党，但又觉得共产党是令人敬畏的

对手。但是他舍不得费侠成为刀下魂，于是便托关系暗中保护费侠，希望通过洗脑，策反费侠，让其成为自己的人。

后来暗中保护费侠的事传到了陈立夫的耳朵里，陈立夫十分生气。于是他致电徐恩曾，要求跟他谈话。

“你明明知道她是中共叛徒，为什么还要护着她？难道你也是……”陈立夫脸色气成绿色的，怒拍桌子。

“立夫，我保护她，是因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屁话！谁不知道你徐恩曾见女人眼开！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陈立夫表情凝重，让他放弃费侠。

“我知道，我知道……”

“难道钱壮飞的教训，你还没记住？”陈立夫反问徐恩曾。

徐恩曾脸色有点难看，他说出实话：“立夫，咱们相识多年，况且咱们还是一个战壕的。我徐恩曾喜欢女人你们是知道的，但是费侠已经被捕了，况且她还是个女的，本事再大也是插翅难逃了。黄金易得，像她这么好的女人却难求啊。现在你让我跟她一刀两断，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你到底想要怎么做？你不担心自己的前途？”

“这个你尽管放心。我有自己的办法，绝不会让一个女人耽误了党国的大事！”徐恩曾信誓旦旦，陈立夫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无奈之下，陈立夫只能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听了之后也非常惊奇，便召见徐恩曾。

徐恩曾为了这个费侠，裤腰带上别着自己的人头，战战兢兢来到蒋介石的面前，像个小学生那样不敢抬头。

“听说你跟一个女共产党有一腿？”蒋介石开门见山。

“是，其实她已经不是共产党，她已经归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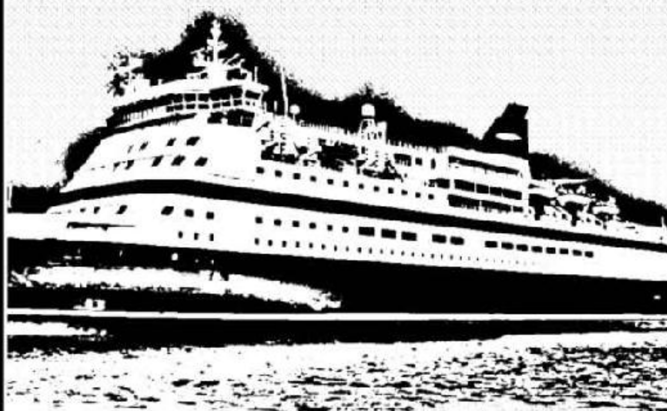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知道她归顺党国了？万一她把秘密卖了，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你能保证吗？”蒋介石十分严厉，盯着哆嗦着的徐恩曾，如同一只老虎盯着一只兔子。

徐恩曾考虑了考虑，为了这个女人还是豁出去了：“委员长，我以自己的性命担保，费侠绝不会出卖党国，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情！况且我对她萌情已久，我非费侠不娶，费侠也非我不嫁！你就答应了吧！”

蒋介石一听，竟然笑了。

“没想到你倒是一个痴情种啊。纵有良田万顷，也不敌这一个女人啊！既然你喜欢她，就好好珍惜！但是请你记住，你今天下的军令状！哪天这女人出了事，你就自行解决吧！”

徐恩曾与中共叛徒费侠武汉成婚







徐恩曾退下，但是心里却乐滋滋的。后来在徐恩曾的洗脑和感情攻

势下，这个曾经信奉“布尔什维克”的女人也为了一个中统头子叛变了革命，这令人惋惜。1938年，徐恩曾与费侠在武汉结婚。婚后，费侠给徐恩曾生了几个孩子，虽没正式进入中统，却一直为中统做事。后来蒋介石兵退台湾，费侠与徐恩曾也一起去了台湾。

徐恩曾好色、风流，喜欢女人，也甘愿为女人牺牲。在中统局纵横跋扈十多年，他跟十多个女人上过床，有过暧昧关系，以至于后来他教育自己的部下：“不要学我玩女人，要学我玩技术……”只可惜上梁不正下梁歪，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他的部下个个都是好色之徒，且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也是日后中统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拖家带口参加特务

过去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起义领袖打下朝野，成了一个土皇帝。等到行赏封爵的时候，他竟然封自己的弟弟为翼王，封自己的妹妹为公主，封自己的娘亲为太后……册封了一圈下来，发现朝野里当官的全是自己人。但是他觉得非常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此故事也非常适合徐恩曾。徐恩曾刚刚去党务调查科当科长的时候，就任人唯亲，将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八竿子搭不着的关系都统调了进来。这其中包括他的老婆、小姨子、哥哥、叔侄等，而且每一个进入中统的人，都有一定的职位。其中他的哥哥在党务调查科书记室干秘书，而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和小姨子王素元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担任职务。还有曾经是顾顺章贴身保镖的林金生，这个人竟然是徐恩曾的表弟；而顾顺章的学生林金萌则是徐恩曾的表妹。徐恩曾拖家带口，几乎把沾亲带故的人都拉进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大本营”，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放眼整个党，亦是如此。陈果夫让学矿的陈立夫加入国民党阵营，而蒋介石也是让接受过正统“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经国加入了国民党阵营。什么“夫妻店”、“兄弟行”、“父子档”、“家族村”等等五花八门。但仔细分析，“任人唯亲”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

其一，容易管理。因为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大可不必说客套话，往往一句顶一万句。徐恩曾之所以让自己的亲人加入“特务”阵营，主要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徐恩曾搞的这个类似于“家族式管理”，既可以“集约”，又可以“粗放”，不但灵活有效，而且更有凝聚力。这样的“制式”，虽然不太好看（容易被人说闲话），但是对徐恩曾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二，利益捆绑。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想必这样的组合很难出现。但是徐恩曾有权有势，自然就会吸纳这些亲戚前来高攀。虽然是为了钱，但也是自己的亲戚。既然徐恩曾不相信外人，那他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家人。况且这些家人，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捆绑在一起呢？俗话说：一条绳上的蚂蚱，通常也心齐。既然大家都往一处使劲儿，那么得到的合力总比一个人强。

其三，稳定江山。历朝历代，皇上打下天下，便把自己的兄妹册封为王或者公主，而那些卖过命的大臣则往往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亲人毕竟是亲人，关键时候护着你！以林金生为例，得知顾顺

章企图谋杀自己的表哥徐恩曾，便坐不住了，趁黑逃出顾宅向自己的表哥通风报信，说：顾顺章要对你下手！徐恩曾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既然是亲人，他们通常会维护你的“江山社稷”，而你也可高枕无忧。

不过徐恩曾可是一个虚伪的家伙，他并不承认自己“任人唯亲”，而是站出来解释：“特务这行，臭名昭著，本身就没有人愿意干！那些真正有权势的，都会做别的！”不过没有任何利益，还要提着脑袋当特务，想必也没有这么傻的！既然他的亲戚“组团”加入党务调查科，自然有一定的好处。虚伪的徐恩曾不承认也就罢了，但事实是明摆着的。特务界里，“史密斯夫妇”特别多，例如：大特务张彼得夫妇、叛徒王维理夫妇、叛徒郭乾辉夫妇以及陈玉堂夫妇等。这种关系有一定的好处，但也有一定的坏处。那些最后遭到“满门抄斩”的往往都是这种关系。只可惜一个人在有钱有势的时候，是不会过多考虑后果的。

其实盘点中国人的关系，大多离不开“任人唯亲”。一个社会学者曾说，按照关系学划分，通常也分为三类。这一点，想必国民党那些高官早已经谙熟。比如著名的CC系，这种“抱团”行为涵盖了兄弟、亲戚、老乡、同学等等……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裙带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复合体。看似非常复杂，其实则非常简单。

首先说到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连接点是政治利益。这个关系相对而言最为复杂，其中包括了阶级关系、党政关系、军政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等，而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政治地位。以徐恩曾为例，徐恩曾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这个官衔虽然不大，但是作用却很大，于是乎徐恩曾算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因为势而维系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而徐恩曾又依附于地位更高的二陈……但是这些人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大而言是党国利益，小而言是个人利益。

其次是经济关系。徐恩曾的亲戚不远千里从浙江跑到南京，其实也是为了钱。加之徐恩曾是个吝啬鬼，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所以他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戚搞到身边，弄出一个“特务集中营”来。

还有一种关系是裙带关系，这种关系是最常见的。裙带关系自古就有，在中国历史上越演越烈。徐恩曾的“家族式”特务营也被裙带关系所拖累。徐恩曾在中统职位上待了15年，他的二老婆王素卿借助他的关系疯狂敛财。徐恩曾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西南边陲走私鸦片、军火，大发国难财！正因如此，蒋介石多次点名批评他，但是他不但没引以为戒，反而越来越贪心，动作越来越大，遭到蒋介石冷遇也是必然的。直到1945年，忍无可忍的蒋介石终于让叶秀峰取代了他，这也是徐恩曾为“裙带”和“贪心”付出的代价。

4.扩编、改革特务阵营

徐恩曾其貌不扬，但学识一流，色胆包天，野心十足。说实话，工程师出身的他，有点瞧不起自己目前的位置，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说服蒋介石，于是立功心切的徐恩曾想到了扩编。

一个人想要干大事，必须笼络一批能干的人。徐恩曾刚到调查科时，手底下只有那么十来个人，连打酱油的人手都不够。所以他打算扩

编也是情理之中的，他提出由一个班扩编到一个排。于是他向陈立夫汇报：“现在调查科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如此下去，手头上这几个人不够用了！”

“你什么意思？”陈立夫明知故问。

“加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双手、多一双眼、多一个大脑！现在党国情报工作日益繁重，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抽空你给蒋委员长透露一下，看看他的意思？”徐恩曾鬼得很，头顶上有陈立夫，从来不做“越级”的事。

“好吧，我去问问看！你先写个申请报告吧。”

徐恩曾交了申请，没想到，批文很快就下来了，蒋介石同意调查科扩编一事。拿到批文，徐恩曾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接连请了好几桌，像办喜事那样热闹。随后，他从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政治警察训练班抽调了20人，这20人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人手到位后，徐恩曾又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调查科内部增加了两个组。一个组叫文言组，一个组叫特务组。文言组，不是“文言文”的文言，而是负责收集、整理各地市杂志报纸刊载的信息，以了解共产党的行动。至于特务组，听名字就一目了然，就是负责特务行动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破译共产党的情报、密谋策划阴谋、组织暗杀破坏等行动。一时间，调查科竟然成了拥有五十多人的大科室。

为了进一步做好“特务”工作，徐恩曾深刻地体会到仅仅一个“中心”是不够了，况且狡兔三窟，一个特务组织如果能够拥有其他的联络点，就不至于被一窝端掉。于是他再次找到陈立夫，与陈立夫商量。

“立夫，我要向你反映一件事情。”

“什么事？”

徐恩曾想了想，说：“调查科是一个特务单位，所干之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种不见光的事情还是越隐秘越好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仅仅一个司令部是不够的，狡兔还有三窟呢！”

陈立夫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清党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革命活动已经秘密转移至地下。要侦破这些秘密的革命活动，就要秘密作战，既然是秘密作战，就要设立秘密情报点。只不过这话被徐恩曾说了出来。

陈立夫叹了口气道：“你说得很对啊，一群特务进进出出，太过扎眼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徐恩曾琢磨了一会儿，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联络点。”

“行啊，你看着安排吧！”

取得了陈立夫的同意，第二天，徐恩曾便让自己的手下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紧邻中央饭店的地方，找了一个看上去不太起眼的二层小楼。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正元实业社”！也是徐恩曾后来跟王素元说起的那个地方。

正元实业社表面是个商业机构（主要卖通讯器材，类似现在的手机店），其实是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情报点。与其丁家桥总部而言，正元实业社更像人体的手脚，而丁家桥总部则像人体的大脑。后来中统所有的秘密情报几乎都来自这个正元实业社，而最初这个地方的负责人，就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钱壮飞。

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徐恩曾发挥其“无线电”方面的天赋，购买引进了大量的电台、电报设备，建立起庞大的“电台网络”。他要求特务们熟练运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提高发送情报的质量和速度，增强其秘密性、安全性、可靠性。他时常亲自上阵，给特务们上课，还请一些专家向特务们亲身传授无线电发报技术。后来，他在正元实业社的旁边建立起党务调查科的总电台，并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分电台。不过此时的徐恩曾也发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就是开一家“通讯器材”经营店，于是他又经营了一家类似当下“苹果直营店”一样的通讯器材专营店。

人员多了，职能机构也扩充了，秘密情报点也有了，还需要什么呢？聪明绝顶的徐恩曾又想到了一个主意：强强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务”是没有身份的人。这些人为了行动，通常隐姓埋名，时常变换身份，所以在执行调查、破坏、暗杀等行动时往往遭到宪兵或者警察的干扰。为了方便任务执行，他想到了“合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果能够和宪兵队、警察局合作，特务工作将会执行得更加到位，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特务们的作用。于是徐恩曾又找到了陈立夫！

“调查科被你搞得有声有势嘛，今天怎么又来了？”陈立夫恭维了徐恩曾一句后，接着问道，“此次大驾光临，是不是遇到了阻碍？”

徐恩曾难为情地挠挠头皮：“部门、联络点都到位了，就是任务执行这一点……”

“你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徐恩曾依旧吞吞吐吐：“搞特务行动就是要隐秘进行！看看大街小巷，全都是警察局、宪兵队的人！我们的人又不好表明身份，执行任务遭阻碍怎么办？况且共党转至了地下，没有警察局和宪兵队的配合，我们也不好动手啊！”

“这个事情我考虑过，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要向委员长通报才行！”

“那有劳你……”徐恩曾露出献媚的笑容。

陈立夫站起来拍了拍徐恩曾的肩膀：“你怎么突然变得客气了？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意见，你就尽管提。要放开手脚，大胆去做，出了事我给你顶着！”陈立夫的这句话让徐恩曾心情大悦。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陈果夫的保镖陈独真出任南京警察厅督察长。如此一来，徐恩曾和警察局的关系就顺畅了。徐恩曾又吩咐自己的手下：“一定要跟警察搞好关系，没有他们，你们的工作就难以开展！”于是随后中统特务们在警察的协助下，公开、放肆、大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假借查户口、调查之名进行疯狂的抓人、暗杀和破坏活动。

后来，徐恩曾又在陈立夫的疏通下，认识了“宪兵之父”谷正伦。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利益。

谷正伦绰号“谷屠夫”，贵州人，这人非常不简单，“宁汉合流”的时候，他曾经将宪兵营扩编为宪兵团，后来又亲自担任四十军师长，被称为“宪兵之父”。此人手段毒辣，杀人无数，因此绰号“谷屠夫”。自从与徐恩曾结识之后，宪兵队与中统就开始狼狈为奸，谷正伦作为宪兵司令，专门成立“特高组”，帮助中统特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杀人、破坏行

动。

正因为利益关系，谷正伦和徐恩曾成了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1930年秋，徐恩曾竟然成了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而大特务顾建中（字锡朋，1930年进入中统，是中统著名刽子手之一）也成了宪兵司令部调查科特务组组长。随着双方利益越来越紧密，调查科抓来的嫌犯甚至可以直接投进宪兵队的监狱中。后来，出于对调查科的“好意”，宪兵队竟然还单独拨款，又为调查科单独修建了监狱，而徐恩曾和顾建中还可以从宪兵司令部领取每月80块钱的工资。党务调查科和宪兵司令部的密切合作，使得特务活动更加畅通无阻了。

上任不久的徐恩曾，对党务调查科经过一番扩编、改革，党务调查科彻底变样，这就是后来“特工总部”的雏形。而徐恩曾一手开办的“正元实业社”，似乎从某种形式上脱离了国民党党部，从而变得更加神秘了。

5.钱壮飞案

说起“正元实业社”，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钱壮飞。他不仅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而且还是正元实业社的负责人。钱壮飞虽然只是徐恩曾身边的一个秘书，但是，他对徐恩曾而言却相当重要，就像陈立夫之于蒋介石一样重要。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浙江湖州人，是徐恩曾的浙江老乡。此人医科毕业，后来当过几年大夫。1926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28年，钱壮飞进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工作，第二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工作。钱壮飞机智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后来，他被徐恩曾调至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说到这里，还要说说徐恩曾的两个缺陷：第一个是文章写得差，第二个是书法写得烂。徐恩曾虽然是留洋硕士，但毕竟用的是洋墨水，学的是工科，工科出身的人鲜有书法和文笔过硬的，徐恩曾这两样都很差。倘若说玩无线电、玩女人，倒是他的强项。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徐恩曾录用了钱壮飞。钱壮飞进入调查科不久，便向徐恩曾推荐了李克农和胡底，在钱壮飞的举荐下，李克农和胡底分别打入天津和上海的情报系统担任要职，而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也被称为“龙潭三杰”。

虽然钱壮飞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但却不能完全得到他的信任。因为从事特务这行有一个规矩：不能轻信他人！徐恩曾也是如此，他交代：凡牵扯到密码破译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制度来操作。比如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去上海，他趁徐恩曾进妓院鬼混之际，偷偷掏出徐恩曾身上的密码本，但这一幕却被站在门外守候的特务们看到了，无奈之下钱壮飞只好将密码本又放回了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深知密码本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密码本，就无法解开国民党的机密。所以他陷入思考，如何才能得到并破译这个密码本？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龙潭三杰”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李克农。李克农，名泽田，人称中国“特工之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唯一一个没有上

过战场的将军。

“克农，国民党的所有情报都在徐老板的密码本上，只有得到他身上的密码本，就可以破译我们需要的资料！可是……”钱壮飞显得忧心忡忡。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密码本很难得到，怎么办？”钱壮飞十分着急，所以他想让李克农出个主意。

“你是徐恩曾的秘书，他的情况你比我熟悉！他平时有什么习惯？什么缺点？咱们分析一下。”

钱壮飞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喜欢玩女人！可能这就是他最大的喜好。”

此时李克农听钱壮飞一说，眼睛一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趁他嫖娼的时候，得到密码本呢？”

“你说说看！”

李克农怕隔墙有耳，就趴在钱壮飞的耳朵上说了说计划：“你应该设计让他往里跳！既然他喜欢女人，就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给他女人……然后再想方设法拿出密码本。”

钱壮飞一听十分高兴，他说：“好吧，这事我去安排！”

有了计划，就要找到实施的目标。去上海公干的时候，机会来了。来上海这几天，钱壮飞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帮徐恩曾物色倾国倾城的名妓。后来他得知上海中山路的龙门酒店来了一个这样的女人，便告知了徐恩曾。徐恩曾一听，兴奋不已。于是告诉钱壮飞，帮他订一个座儿。订好座儿后，钱壮飞便通知徐恩曾，而徐恩曾则让钱壮飞一同去龙门酒店潇洒！

“钱老弟，不妨同我一起赴宴吧！”

钱壮飞拒绝了：“刚才老板娘打来电话询问你，我要在这里应付她，赴宴之事还是您亲自去比较合适！再者说我还要处理一些文件，上级急等着用！”

“哦，这样啊！好吧，那我自己去了！”徐恩曾高高兴兴换上衣服，且在腋窝下喷了几下进口香水。

当他准备把密码本塞进衣服口袋时，钱壮飞急中生智道：“处长，那种场合人杂，随身携带密码本恐不安全啊！不如让我替你保存。”

此时徐恩曾的心早就跑到名妓的床上去了。他说：“好吧，你就把密码本锁进保险箱里吧，然后贴上张封条！”但是等徐恩曾准备提笔写封条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字实在难看，而赴宴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他回过头交代道：“算了，还是你替我保管吧，等我回来你再给我！”

密码本到手了，钱壮飞十分高兴，他感觉到怀里像是揣了一只小兔子，快要跳到嗓子眼了。送走徐恩曾，他迅速联系到李克农，两个人共同破译了密码本里的秘密。

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因为好色，竟然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真是令人不解。不过更令人不解的是，钱壮飞逃走后，他竟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一直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查实，或许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变”之事应该说是1931年的4月24日。得到密码本的钱壮飞突然截获一条电报。电报中说：“黎明被捕，并已自

首。”钱壮飞深知这个“黎明”就是中共特科的红队队长顾顺章。得到这样的惊天消息，钱壮飞也为之一惊。后来他又接二连三截获了武汉方面发来的电报。钱壮飞深知顾顺章叛变，将使党中央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因为顾顺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为了减少破坏，钱壮飞决定做一件重要的事。

1931年的4月25日晚上10点，钱壮飞送走刘杞夫（钱壮飞的女婿）后，已经夜深人静空无一人了。钱壮飞迅速给党的每个站点发了一份电报：“潮病危速归！”示意党内成员迅速撤离，潜伏起来。发完电报后，他还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并且警告徐恩曾：“如果对自己的家人动手，必将其一切丑闻公之于众。”而此时接到通知的各站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撤退了，就连周恩来同志也感慨道：“倘若不是钱壮飞的通告，整个共产党或许早已不复存在！”

4月26日，钱壮飞估摸着顾顺章马上就要到了，于是提前向徐恩曾请了一个假，然后急匆匆地离开潜伏了近三年的党务调查科，撇下自己的家庭坐火车离开了南京。得知钱壮飞是共党卧底，徐恩曾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他先是震惊，后来是发怒，再后来则是害怕、担心。他担心此事一旦惊动蒋介石，轻则革职，重则枪毙。于是他抢先一步托张道藩警告了蔡孟坚，让他保守秘密，否则要让蔡孟坚难堪。当时的蔡孟坚，年轻气盛，但在张道藩的几番指点下，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但是令蔡孟坚没想到的是，立功心切的徐恩曾竟然抢先一步将顾顺章带走了，以弥补钱壮飞带来的损失。后来蔡孟坚大发雷霆，他曾说道：“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慌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徐恩曾毕竟老奸巨猾，比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厉害多了。他夺下“顾顺章案”，并且隐瞒了“钱壮飞案”，同一时间竟演了两出好戏。后来徐恩曾靠顾顺章发了一笔血腥财，不仅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特工总部，真是因祸得福啊。

6.成立特工总部

徐恩曾碰到顾顺章这个“贵人”之后，不仅杀害了共产党人恽代英，而且还抓住了向忠发，在广东杀害了蔡和森，一下子成了蒋介石眼里的红人。蒋介石亲自接见、表扬了徐恩曾。

特工总部在瞻园成立





“果夫和立夫经常向我提起你，说你是个工作狂，好同志，屡屡为党

国立下奇功！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案子，你处理得非常好！只要你好好干，党国不会亏待你的！”蒋介石一改往日严肃作风，说起话竟然也和善起来。

“谢谢委员长，谢谢委员长！”

受到表扬的徐恩曾兴奋得两天两夜没睡觉。他在想，既然委员长夸奖我，到底奖励我什么呢？提干还是加薪？后来他从陈立夫的口中得知，蒋介石非常看重“特务调查”，有意继续扩大党务调查科的规模。此时的徐恩曾既激动，又幸福。没过几天，蒋介石的拨款到位了，二陈找到徐恩曾，研究一下如何打造、扩编新的特务部门。

“蒋公非常重视这件事！现在是敏感时期，共党阵营转至地下，所以地下战线很长，压力巨大，你如何看待扩编的事？”陈立夫征求徐恩曾的意见。

徐恩曾说：“我想应该单独成立一个特工部门！这个部门第一要享有特权，第二要有独立的门户，不得受其他部门的干扰。”

“你的意思是另外成立一个部门？”陈果夫也问。

“对！”

陈果夫和陈立夫陷入沉默。

徐恩曾解释道：“首先党务调查科仅仅是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能有多大的权限？区区一个排的人马，连‘挖坑儿’的人都不够。其次这个科室，头衔也不够响亮，干着牛的活儿，却喂驴的草料，肯定不行！再者说，既然蒋公重视，不可能仅仅拨点款，打发兄弟们吧？”

陈立夫说：“你说得有理，但是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部门一定要符合蒋公的思路！正元实业社太小了，成不了气候！现在要建，就重新建个规模大的！”

此时陈果夫插了一句话：“我觉得一个特务机构，也不能像那些常规机构那样有公开的编制、任务、人员……毕竟特务工作是隐秘的嘛，不能太‘光明正大’！你的想法倒是不错，但是想要堂而皇之挂着明晃晃的牌子，恐怕很难！就特务本质而言，就需要掩护！所以老弟，你还要再斟酌斟酌。”

陈果夫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一点徐恩曾早就想到了。于是他进一步解释：“其实这个部门完全可以是一个‘FREE’机构！”

“FREE？”陈立夫瞪着眼睛看着徐恩曾。

“我觉得自由一点好，这样既能够从需求的角度出发，人员、部门、组织也可以任意加！只不过还需要声明一下：要有自己的独立制度和体制！”言外之意，徐恩曾对这个“部门”早就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特工总部”的“新”在于三不沾、三无。所谓“三不沾”指的是：体制上不沾国民党党部的边儿，行动上不沾党务调查科的边儿，编制上不沾国民党组织部的边儿。所谓“三无”指的是：无挂靠单位，无公开门牌，无固定编制。这样一来，特工总部的名头不但响亮，而且又不拘泥于形式（一部分是为了向戴笠炫耀），非常适合“特务”工作。当徐恩曾把这个“想法”摆到桌面上，二陈听得有点蒙。

徐恩曾进一步解释道：“本着蒋公的精神和旨意，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大，而且还要做出声势。况且现在刚刚起了一个好头儿！再者说，手里没有一定的特权就无法处理事情，而且这个特权一定要秘密使用。其

次，这个部门还是调查科的下属部门，一切旨意还要听上面传达！只有你们授权，我们才去做！没有授权，我们绝不动手！”

“这样可以，但绝不能越权行事！”陈立夫补充道。

徐恩曾点点头。

几天后，徐恩曾出具的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当然这个特工总部的主任官衔还是由徐恩曾担任，对外仍称“党务调查科”。特工总部是对内称号，对外称号则用“华统”、“鲁犁”等化名代替。此时的徐恩曾不再是“徐科长”了，而摇身一变，成了“徐老板”！

徐恩曾真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他竟然把特工总部设在了南京道署街132号的瞻园里。瞻园是著名的古典园林群宅，名字是乾隆皇帝根据欧阳修这句“瞻望玉堂，如在天上”的诗而题的，此园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以及无锡的寄畅园俗称江南四大名园。这样一个风景幽雅、郁郁葱葱的风水宝地，即便是停留片刻，也是一种享受，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办公了。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入驻瞻园的部门并不是一个园林绿化的公益部门，而是一个冷血、见不得人的特务组织。

特工总部成立以后，许多特工组织的“点”如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后来还在南京、上海等“红区”专门设立了行动区。其中上海行动区的负责人是濮孟九（此人是特工总部的二号人物），南京行动区的负责人是徐恩曾。特工总部虽然没有固定编制，但是却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况且一个特务机构，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不安分的特务们便更加难以管理了。

特工总部按照职能划分：首先设立书记室，书记室又下分组织、指导、审理、行动四个科。此外还单独设立了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室。后来特工总部部门越分越细，慢慢又有了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总督察、行动队以及密电研究室等。在红区，特工总部还设有特务室和策反专科，主要目的是策反那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网络。

一、书记室

所谓书记室就是特工总部的“大脑”，所有的命令、指令都是从书记室里发出去的。书记室下设书记和副书记各一名，职位略高于特工总部的其他科室。其中书记室的书记是濮孟九（江苏松江人，留德学生），副书记王思诚（正元实业社仅次于钱壮飞的2号人物）。书记室下设四个科：指导科，科长是田昆生；行动科，科长马啸天；审理科，科长吴若萍；组织科，科长（无从查实）……

书记室主要负责特工总部的人事调动及工作安排，指导破坏共产党的情报机构，逮捕、暗杀共产党人士，并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洗脑、劝降、策反等工作。

二、情报科

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关键部门，主要负责侦破、搜集密电，并且将密电整理成文字，传达给上级。情报科设正负科长各一名，科长刘馥斋，副科长张国栋。情报科分别下设三个股一个室：指导股、编审股、译电股、密电研究室。科下还分别设立了三个情报站：北平站、上海站、天津站。而各站点都配有先进的电台设备，以便与南京总部联络。

指导股：股长王广来，干事有项本善、陈文昭（中共叛徒）、张庆

容、何允逸、刘求知、牛伯男、王荣生等。全国上下根据人员划分了六个片区（类似于大区域），而这些干事们就像大区域经理一般各自负责一个区域。指导股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各地区的特务室搜集、审查、分析情报，并且每日编辑情报一份，分别送徐恩曾、陈果夫、陈立夫、叶秀峰、何应钦、陈布雷等人参考。如情报特别重要，则由徐恩曾批审后直接交蒋介石过目。

编审股：股长杜品山，该股的主要任务是将收集的情报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审查，每个月编辑一本名叫《月报》的刊物。偶尔也会针对一些特殊问题整理出版一本名叫《专报》的刊物。这些刊物也是供党内一些高参参考之用。

译电股：股长薛敦平。译电股主要负责译电和编制密码两方面的工作。虽然这个科室负责译电，但是却不负责接收电报。接收电报的任务则由另外一个名叫“电讯总台”的科室负责。也就是说，负责译电的只负责译电，负责发电报的只负责发电报。这一点也是老奸巨猾的徐恩曾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保守秘密，防止两个部门勾结泄密。进入译电股的成员通常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主要是熟悉并牢记明密码，然后再把明密码转换成为密电码。编制密电码的人都是徐恩曾亲手挑选的，非常可靠。在编译密码方面，译电股讲究“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的说法，而且每年都会重新变换几次。

密电研究室：科室主任张华茂。张华茂被调走之后，由马懋文担任主任，副主任是陈文彬。该室共有职员三十余人，算是特工总部里比较大的一个科室，其主要负责搜集和破译情报。在搜集和侦破情报方面，以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居多，其次是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而山西阎锡山较少。至于共产党方面，密电研究室的收获微乎其微，也说明共产党在译电发送和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1937年，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又向徐恩曾推荐了李担任和武子明等十名精英，从而又组建了第二密电研究室。

至于三个情报站，也仅仅只是收集情报而已。其中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

三、训练科

训练科设有科长、副科长各一名，干事若干。其中科长王云亭，副科长薛秋泉，干事有王济汉、朱秋白、徐政等，助理干事是李士群（后来成为汪伪76号主要头目）。

训练科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第一，编制训练小组，开展特务技能培训。除了培训之外，还组织经验交流会。每次开会，除重拾口号外，着重解释、处理一些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纠正。第二，编辑《动力》和《群力》两本手册，均为半月刊。《动力》供特工人员阅读参考，《群力》则供特工之外的普通人员阅读参考。第三，负责研究撰写《特工用书》，其中就包括顾顺章编写的六本技能书。这些技能书几乎涵盖所有的特工技能，供党内特务学习使用。

训练科一共组织开展了三期特务训练班，每期时间为三个月。其中一期教练是顾顺章，二期、三期教练是大特务王杰夫。三期特训班，一共培养了60名特务，后来这些特务成为中统中的骨干力量，可见其训练水平之高，不亚于苏联克格勃。其中二、三期的训练班教练王杰夫就是

特务丛中的一朵奇葩。

王杰夫作为一名特务训练专家，对“杀人放火”之事非常精通。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枪毙共产党人瞿秋白一事。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县翟田镇水口村被地方反动保安钟绍葵抓获。后遭叛徒指认，瞿秋白的身份被识破，从而被关进长汀监狱。为了劝降瞿秋白，徐恩曾专门派了这个特务专家王杰夫审理。王杰夫同顾顺章一样，也是一个自大狂。刚刚来到长汀，便拍着胸脯向那些小特务们炫耀：“你们没有办法不要紧，我的办法有得是，不信他不开口！”信誓旦旦的王杰夫来到瞿秋白面前，软硬兼施，企图让瞿秋白开口。结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撬开瞿秋白的嘴，样子十分狼狈。后来王杰夫无奈之下打报告给上级，上级则通知李默庵和宋希濂杀害瞿秋白。也就是193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喊完“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后被一枪打死，年仅36岁。

四、总务科

总务科也是设科长、副科长各一名，其中科长是周伯良，1936年周伯良死后改由张祖模担任，副科长是仝道云。其中大特务陈庆斋、王国栋等也在该部门任干事。

总务科的主要职能是文书、会计、事务等工作，其中还设有一个保管股，类似于仓库保管性质的，主要保管特工人员所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主要以小口径手枪为主）。

五、电讯总台

电讯总台下设台长一名，分台长若干。其中台长是范本中，分台长有陈玉堂、袁更、吴世昌、王正鸿等。除一个电讯分台设立在徐恩曾家的大院里，其他分台分布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一张电台情报网。

电讯总台的主要任务是与所属情报机关以及临时派出的情报小组进行联络和沟通，主要负责接收和传播情报。而电讯台发出的情报也有两个特点：1.只管收电报，但不知其内容；2.所发电报电码不同于普通电台所发的电码，难以被侦破、破译。

六、设计委员会

设计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徐恩曾，其实设计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委员会里委员全部都是一些中统高级特务，其中包括张冲、顾建中、季源溥、郑伯豪、李熙元、徐兆麟、丁默邨等。

七、总督察

总督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督察机构，主要负责监督考核特务人员的忠诚度和“活动动向”。如果发现某特工有不好的倾向，便立刻对此人进行控制。其中王杰夫和刘不同先后担任特工总部的总督察。

八、其他机构

特工总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区”和“特务室”。其中“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城市，而“特务室”则设在一般省份和中小城市的铁路干线上。在“区”和“特务室”的基础上，又专门设置了“肃反专员”和“特派员”，主要负责各地区的肃反、劝降、破坏等具体工作。地方特务室下设主任、秘书各一名，按照职能部门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四个科，每个科各设科长一名。

特工总部成立后，南京瞻园便不是一个江南园林，而一下子变成了

一个神秘组织，平日黑色大门紧闭，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供人进出。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是却在周围埋伏着众多特务。当游人不慎入内，轻则被骂，重则挨打。有一年，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纪亮喝完酒路过瞻园，知瞻园乃太平天国杨秀清曾经住过的官邸，便好奇地踏入瞻园。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没等他左脚踏进瞻园，便被附近蹿出一些黑脸大汉痛殴一顿。挨了打的纪亮后来向国民党中央政要反映，没想到得到的回复是：党内重要机构，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听到这样的解释，纪亮发飙道："若是重地，为何不设个牌匾警示？肯定是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环境幽雅的地方，里面却设有"监狱"和审讯室，是名副其实的阎王宫殿。每一次秘密押送进瞻园里的人，很少有出来的。据一中统人员回忆，深夜时常能够听到"冤魂"的嘶鸣声，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内设的"审讯室"，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有老虎凳、皮鞭、杠子、烙铁以及各式刀具，地面上的血迹擦也擦不干净，如同杀猪的屠场一般，令人感到无比恐惧。虽然瞻园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地狱，但是徐恩曾却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工作很见成效。后来他还成立了南京实验区，专门控制当地的特务活动。

"留俄学生招待所"是专门针对"留俄"的共产党、学生设立的监狱，而"自新人招待所"则是专门收容中共叛徒的。最出名的是安品街38号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招待"手法特殊、另类，曾经有许多人物死在里面。

特工总部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大，几乎整个国内"无死角"，就连那些犄角旮旯、偏僻之地，也有徐恩曾安插的特务。这些个"特务室"有大有小，有的几个人，有的则几十、上百人，而且名字也是经常更换，诸如什么特训处、绥靖团等五花八门。若干个情报组织汇成一张特务网络，而网络里的特务、奸细又被称为"细胞"！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数以万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底细、行为都被徐恩曾自上而下控制着。如果哪一天做错了事，马上就会遭到惩处。1932年的12月至1933年的7月，短短的几个月期间，徐恩曾的特工总部的"成效"显著，劝降、策反、暗杀中共党员数百人。尤其是上海、北平等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然中统特工总部的敌人并非只有共产党，凡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一切党派都是敌人，这些敌人包括国民党左派、地方军阀、民主人士。正是因为徐恩曾竭尽全力为主子卖命的"精神"感染了蒋介石，一度成为蒋介石眼中的红人。

7.排挤对手

徐恩曾看似文质彬彬，实则心胸狭窄、手段卑劣。刚刚进入中统，便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对手叶秀峰。

张道藩离开党务调查科之后，叶秀峰便取代了张，负责党务调查科。其实叶秀峰能够进党务调查科也是陈立夫推荐的，因为他们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同学。与陈立夫不同的是，叶秀峰曾经在中学当过教员，而教书先生往往都十分清高，叶秀峰这个人也是如此。

虽然叶秀峰与陈立夫是老同学，但私交一般。两个人的交流更像

是“君子”间的交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陈立夫称叶秀峰其名，叶秀峰也是如此。在叶秀峰的眼里，既然是同学，当以同学相待，无高低辈分、职位之称，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不过后来，陈立夫上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干秘书长，成了叶秀峰的上司，此时两人的矛盾也就产生了。虽是同学关系，但也有上下级之分。因为生活中的交往并不多，陈立夫与叶秀峰的关系只有一种：上下级！既然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两人见面，叶秀峰向陈立夫打个招呼，说几句恭维的话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职位不同嘛，人家陈立夫是领导啊！

但是叶秀峰可不这么认为，他可不是那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主儿。时间一长，陈立夫觉得叶秀峰作为下级，连点规矩都不懂，于是会上点名说了叶秀峰几句。没想到这几句把叶秀峰惹火了，于是他跟陈立夫闹起了别扭。首先，叶秀峰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工作热情大减，后来干脆假装抱恙，到杭州一风景秀丽的地方疗养。此时叶秀峰认为，党务调查科虽然是个科室，但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和魄力，根本挑不起担子。叶秀峰没有辞职，反而跟陈立夫玩起了拉锯战。但是朝里可以一日无臣，不可以一日无君啊！叶秀峰沉得住气，陈立夫可沉不住气了！他认为应该及时挑选一个人来救救场。

觊觎已久的徐恩曾早早瞄上了这个位置。他想：无线电弄得再好也不算出息，但是搞调查就不一样，起码可以走走仕途。当陈立夫犯难的时候，徐恩曾竟然突然间冒了出来，他请陈立夫去茶楼喝茶。

“恭喜你啊立夫，秘书长可是令人羡慕的职位啊，许多人想混还混不上去呢！以后等你发达了，我也能跟你沾沾光！”徐恩曾一脸献媚，狂赞陈立夫不止。

“别提了……烂摊子还等着我收拾呢！”陈立夫发着牢骚。

“怎么了？是不是叶秀峰的事？”徐恩曾旁敲侧击，试探着问陈立夫。

陈立夫挠了挠头，叹气。

徐恩曾替陈立夫说话：“这个叶秀峰真不识抬举，脾气再大也不能消极怠工啊？明显是冲人不冲事嘛！”言外之意，徐恩曾想听听陈立夫的想法，并且借此机会毛遂自荐，同时也能起到挤兑叶秀峰的作用。

其实陈立夫早就知道徐恩曾有这种想法了。但是他却说：“你不行，你是学无线电的，对这一行根本不懂啊！”

没想到徐恩曾早就准备好了，他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叶秀峰还是学矿的呢？”

陈立夫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说：“你还是等等吧，我考虑考虑再说！”徐恩曾觉得此事靠谱了，于是又说了一通拍马屁的好话。

几天后，考虑成熟的陈立夫把党务调查科的职位交给了徐恩曾。听到此事，叶秀峰还不以为然，他在杭州某凉亭里，喝着雨前龙井，欣赏着美景。

“叶先生，陈立夫让徐恩曾顶替你的位置，难道你还有心情喝茶水？”一起喝茶的朋友问道。

叶秀峰不紧不慢掀了掀盖碗杯说：“急什么？你觉得徐恩曾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一个搞无线电的白皮书生，搞不出什么名堂，迟早陈立夫还得请我回去！”

“难道你不准备一下？万一这个徐恩曾有水平呢？”

“不要小瞧一个人，但是也不要高估一个人！徐是个什么水平，我一眼既知！陈立夫看准的不是他的真实本事，而是那副溜须拍马的嘴脸！再者说，科长一职我还没辞，徐恩曾顶多就是个兼任，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叶秀峰的冷静不同，徐恩曾则正在苦想办法彻底赶走叶秀峰。他先是找自己的人放风传话，让自己的秘书张国栋去看望叶，后来又伺机试探虚实。张国栋回来报告说，叶秀峰整日游山玩水，似乎对政治毫不关心。得到此消息，徐恩曾大悦，于是他马上致电陈立夫，将了叶秀峰一军。陈立夫大怒，于是上报总部，直接将叶秀峰赶出党务调查科！

得知自己被调走，叶秀峰才醒悟：自己完全疏忽大意了，让这个徐恩曾钻了空子。但是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卖。徐恩曾名正言顺地捡了个便宜，借陈立夫的手赶走了自己这个竞争对手。徐恩曾心机如此之重，颇有君子风度的叶秀峰哪是他的对手！

第二个遭到驱赶的是党务调查科的二号人物：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同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均为浙江老乡。老生常谈，江浙出文人。那段特殊的岁月，江浙也出了大量的政治人物。张冲不像徐恩曾等留洋派，他是通过“运动”选拔出来的。早期他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创办“醒华会”，1927年在组织策反张作霖的活动中被捕，后来得到自己母校校长（哈尔滨政法大学）雷殷的帮助，免于一死。再后来他南下投奔国民党政府，成了CC系一员，并且后来随陈立夫一同进入党务调查科工作。

张冲精通俄文，而且办事果断，做人又相当低调，党务调查科之所以发展得快，跟张冲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张冲才是党务调查科的灵魂，而初来乍到的徐恩曾只是挂着个虚职赚两声吆喝罢了。

按理儿说，自己手下有这样一张王牌，徐恩曾应该高兴才是。但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中国人有句老话：当官的都喜欢用那些水平一般、听话的属下。张冲虽然很低调，做事不张扬，但是这个人能力太强，徐恩曾怎能不嫉妒。徐恩曾私下里曾说过：“张这个人恃才傲物，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主任！好像这个调查科就是他的一样！课他也讲，情报他也搞，如此一来要我这个主任有什么用？”徐恩曾这样发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冲虽然能力强，但是他也瞧不起无线电出身的徐恩曾，一个搞实业的不继续搞实业，非要跑到“特务科”搞特务，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还有一件事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就是张冲的地位！张冲工作扎实，为人处世异常老到，徐恩曾进入调查科之前，张冲就是二陈眼里的红人。二陈欣赏张冲的才华和能力，而张冲与二陈的关系也十分妥帖。除此之外，调查科里的其他特务与张冲的关系也非常好，他们都十分欣赏张冲，认为张冲才是名副其实的一号人物，所以张冲在党务调查科地位稳固，这让徐恩曾心里颇为不安。于是徐恩曾等待机会，祈求老天爷能够显显灵，帮他挤走张冲！

就在这时，天上掉下了一个馅饼，这个馅饼就是大特务顾顺章。徐恩曾觉得顾顺章就是那个让自己“咸鱼翻身”的大宝贝，于是他捂着盖着，极力防范张冲，不让张冲插手！而张冲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

就让徐恩曾一个人折腾去。结果折腾了半天，徐恩曾终于折腾出名堂来了！随着特工总部的成立，谋划已久的徐恩曾竟然给张冲准备了一双相当挤脚的“小鞋”，那就是在设置特工总部的时候，仅仅给张冲安置了总干事一职！这个职位不痛不痒，没有权力，是个虚职。徐恩曾大权独揽，从此不用担心张冲威胁自己的地位了。

张冲被徐恩曾将了一军，觉得自己如果继续与之对抗，便上了徐恩曾的当。于是张冲直接找到陈果夫：“陈部长，我想离开党务调查科！”

“为什么？你不是干得好好的？”陈果夫有些不解，呆呆地看着张冲。

“我觉得现在工作不太适合我……”

“我先研究一下吧！”

陈果夫送走张冲之后，便打电话了解张冲现状。后来得知张冲是对自己这个“总干事”一职感到不满，所以才要求调离。陈果夫权衡再三，也是出于爱才的目的，于是决定将其调至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担任处长（因为陈果夫对电影事业着迷，打算成立一家电影厂）。后来陈果夫还是开导了张冲一番，希望他兼任特工总部的职位继续为党国的“特务事业”贡献力量，不过张冲仅仅嘴上答应了，但是对“特工总部”的事却不再过问。如此一来，徐恩曾凭借自己的本领，踢掉了一个厉害对手。

8.欲捉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便风声鹤唳，陷入一种白色恐怖之中。宪兵队的人在上海的街头来回巡逻，还有一群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礼帽、蹬着黑色皮鞋号称“三黑”的神秘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眼睛时不时地向四周探望着，这些人就是徐恩曾派来的特务。4月27日晚，徐恩曾带着张冲、顾建中等人来到上海，徐恩曾实在是兴奋不已，他在想：如果抓住了周恩来，他就发大财了！到了上海后，他同张冲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徐恩曾有些亢奋，但是他依旧努力掩饰自己的内心：“你们都知道，抓住周恩来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是共党的首脑级人物，只要抓住他，共党就会土崩瓦解！”

“既然是首脑，他一定狡猾得很哪！”张冲解释，“更何况狡兔还有三窟，恐怕他早就接到钱壮飞的通知转移了。”张冲暗讽徐恩曾，让徐恩曾直冒冷汗。

毕竟徐恩曾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岂能因为张冲的一句话而自乱阵脚？于是他竟然反问张冲：“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倒是说来听听啊？”

张冲不慌不忙列举了N种办法，其中也涉及钱壮飞的家人。张冲说：“既然是钱搞的鬼，我们还应该拿钱下手！”

“你说钱壮飞？”起初徐恩曾有些担心，毕竟钱壮飞临走前给他留了一封要挟信，如果徐恩曾敢下手，他就把徐恩曾的事抖搂出来。于是徐恩曾说：“既然他已经叛党，那就捉住他枪毙算了！”

张冲摇了摇头：“不能杀了他，他掌握了很多机密，要好好利用！”

徐恩曾无话可说。会议开至深夜，徐恩曾虽然有些兴奋，但是只要

张冲在身边，徐恩曾就感觉不踏实。于是他想：赶走张冲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功，活捉周恩来！于是他致电上海军警宪特机关，要求特务们加强巡逻，最好联合租界中的巡捕力量一起打击共产党。

第二天一早，徐恩曾带着大批人马开始对顾顺章提供的重点地区进行搜查，其中包括周恩来住址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的所在地。徐恩曾喊着口号："摧垮共产国际，活捉周恩来！"小特务也跟着兴奋地喊起来。特务们很疯狂，但是共产党人也不会轻易被捉。他们要么乔装打扮，要么隐姓埋名……一只只眼睛看着特务们开着车沿着各个街道鼠窜。早已转移的周恩来得知徐恩曾来上海的消息，感叹道："来得真快啊，要不是钱壮飞，可能我早就落入敌手了！"

此时另外一批人开着黑色轿车来到了上海法租界新兴路新兴顺里4号，这个地方是钱壮飞在上海的家。几个特务鬼鬼祟祟地上了楼，腰间别着枪。他们疯狂砸着门，开门的是钱壮飞的母亲。几个特务不分青红皂白，推开老人，便进去搜查。见房间里只有老人一个，便厉声问道："钱壮飞呢？"

老人不慌不忙地说："钱壮飞？我不认识他啊！你找他干什么？"

"老太婆，你就不要装了！快把钱壮飞给我找出来，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见特务们来者不善，老人想起钱壮飞临走时交代的话（你们放心，徐恩曾绝不会动手！）底气十足地说："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杀了我，我也不认识钱壮飞！"

硬的不成，便来软的。特务们开始利诱老太太："钱老太太，我们来的目的是因为一笔钱，只要钱壮飞在文件上签了字，我们立马就走！你意下如何？"

"你们觉得我愿意被你们为难吗？如果知道钱壮飞，我一早把他交出来了！问题是我真不知道！更何况你找的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你们还是走吧，去其他地方问问吧，为难一个老太太算什么男人？"特务们一看老太太骨头硬得很，但是徐恩曾交代过，如果老太太执意不说，那就算了！于是特务们狠狠地瞪了老太太一眼，摔门离开钱壮飞家。

没有找到钱壮飞，徐恩曾就拼命寻找共产党的电台设施，他把共产党苦心建立起来的电台网络全部捣毁，共产党的电台网络，就这样被徐恩曾一下子给撕破了。

由于顾顺章叛变，许多共产党人搬离了先前的地方。此时周恩来正躲藏在一个汽车行里，这个汽车行是顾顺章不知道的一个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聂荣臻曾回忆道："徐恩曾几乎搜查了我们所有的机关，唯独这个地方是顾顺章不曾知道的！我、恩来和富春同志，在紧急的情况下，都在这个联络点躲藏过。那段时间，为了避开危险，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都不敢上街。从那以后，组织上就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选自《聂荣臻回忆录》）徐恩曾指挥特务们，捣毁了一些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的组织单位，其中包括保卫组办公室、红旗报社等。后来周恩来想方设法将"顾"叛变的消息通告给上海的李克农和天津的胡底，他们两个人接到消息后顺利逃出敌人魔掌。

立功心切的徐恩曾还是不死心，他抓住并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妄

图觅到周恩来的踪迹。徐恩曾说：“掘地三尺，也要把周恩来挖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带着特务们不断搜索，甚至连基督教堂都不放过。

不过周恩来不但没有落入敌手，而且凭借其高超的指挥才能和大无畏精神，将深陷危险境地的诸多共产党人救出来，并且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方。其中“龙潭三杰”被安全转移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苏区。聂荣臻、陈赓和李强也顺利转移，周恩来自己也顺利脱身，去了江西。至此，徐恩曾活捉周恩来的计划彻底破产。

徐恩曾虽然没有捉住周恩来，但是在上海指挥“战斗”废寝忘食，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来蒋介石也被徐恩曾的这种精神所感染，见特务成果显著，一高兴便奖励了徐恩曾十万现大洋，支持他组建特工总部。

9.捏造“伍豪脱党事件”

前面提到过徐恩曾捏造“伍豪脱党事件”。伍豪是周恩来若干化名中的一个。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觉悟社》，他们用抓阄的方法起名，以代号相称。当时，邓颖超抓了一号，于是起名逸豪，而周恩来抓了五号，于是起名伍豪。周恩来非常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所以经常以笔名伍豪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伍豪这个名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官几乎都知道是谁。

故事还得从顾顺章叛变，徐恩曾妄图活捉周恩来开始。话说上海地下阵营遭到破坏，周恩来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离开上海，转移至红区根据地。徐恩曾对没能活捉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对于周恩来，徐恩曾恨之入骨，他知道“擒贼先擒王”，而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脑，所以在徐恩曾看来，只要能抓住周恩来，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但不幸的是，周恩来智慧非凡，而且有着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应变能力。周恩来一手创办的中共特科也是情报组织，也就是说，周恩来不仅是政治首脑，而且是共产党的情报组织的最高首脑。周恩来的个人才能和个人魅力，使得他不仅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人们一起前进，也感染了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后来，就连与徐恩曾一起制造“伍豪脱党事件”的大特务张冲，也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张冲死后，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刊出专页，以《悼张淮南先生》为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追悼张冲，以至于徐恩曾当时气得脸色发紫，说：“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周恩来无疑是国民党的一个劲敌，甚至有一次，蒋介石对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徐恩曾当然知道委员长的这块心病，如果能帮委员长治好心病，他徐恩曾加官晋爵，是明摆着的事儿。

徐恩曾妄图活捉周恩来的计划失败后，陈立夫找徐恩曾，问他最近的情况如何？徐恩曾叹了口气：“关键是这个伍豪啊，如果能整垮伍豪，共产党就完了！”

“是啊，他是共产党的首脑啊！”陈立夫叹了口气说，“可是想抓住他是不可能的了！”

“捉不住他，我们就想办法整垮他！”徐恩曾恶狠狠地说。

“整垮？”

“既然我们抓不住他，就想办法用别的手段对付他！”徐恩曾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能不能行，他自己也不确定。陈立夫倒希望徐恩曾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徐恩曾说出了自己想到的那个办法，那就是联合一个人，一起搞垮周恩来，这个人就是张冲！

在党务调查科成立初期，与其说徐恩曾是党务调查科的掌门人，不如说张冲是党务调查科的灵魂。由于从事多年特务工作，对于那些特务手段，张冲是最有发言权的。徐恩曾虽然嫉妒、排挤张冲，但遇到了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张冲。

徐恩曾找到张冲，把陈立夫布置给他的搞垮周恩来的任务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张冲，张冲明白徐恩曾的意思，就是让他给出出主意。

徐恩曾说：“为了配合扩大自首政策，治疗委员长的心病，伍豪可是重中之重啊！淮南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

“软的？”徐恩曾故意发问，想看看张冲的想法是否与自己一致！

张冲想了想，接着说：“我们不如制造一个新闻，让周伍豪脱党！”

“制造新闻？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报纸会不会刊登？”言外之意，徐恩曾想把这件事情全权委托给张冲。

徐恩曾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徐恩曾就“过河拆桥、独自邀功”；如果没有成功，这盆污水泼对了地方，周恩来也必然会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即便起不到“脱党”作用，也会令他现身，这样一来，特务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张冲则一心想为委员长做点事情，作为主要策划人，几天后，张冲动身去了上海，他扫清了一切障碍，开始悄悄谋划“伍豪事件”。

1932年2月16日，一篇题目为“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突然刊发在上海《时报》上，启事如下：

> 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于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此启事一经刊登，迅即引起一片哗然。而《时报》也因为这篇启事而大卖，平时三天卖不出去的报纸，当下一天就被抢光了。同样的启事接二连三被《时报》和《申报》再三刊登。共产党人看到这个启事后，知道是国民党搞的把戏，目的就是诋毁周恩来，妄图靠这样的手段搞垮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当然也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随即与《申

报》交涉，以委婉的笔法出来辟谣：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共产党非常聪明，给出这样一个“辟谣”，意思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此伍豪非彼伍豪，并向众人暗示《时报》等刊登的“伍豪启事”是捏造的。

徐恩曾和张冲看到《申报》的启事后，马上派特务去《申报》调查落实。他们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又被周恩来将了一军。

几天之后，一个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洋律师受理了周恩来案，并在《申报》上刊登出一则名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周恩来另一化名）紧急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中共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徐恩曾看到周恩来让洋律师为其声明并刊发在《申报》上，大为光火。为什么周恩来选了这么一位洋律师来为其发表声明呢？原来，路易斯巴和颇有来头，他不仅有法国律师执照，而且他居住在法租界，中统特务根本不敢动他。周恩来请这位律师，既可以确保特务们无从报复这位律师，还可以让公众意识到这则启事的权威性。此时，即便徐恩曾再发表声明也已经于事无补，他只能坐在板凳上拍桌子了！

后来，上海警察局的头头季源溥带着一队人马来到《申报》报社，企图报复社长史量才。史量才何许人也，他担任《申报》社长多年，根本不畏惧特务和黑恶势力，他本人对蒋介石的消极抵抗也颇有微词。他曾经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史量才还支持宋庆龄、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顶风与国民党作对。纵然后来蒋介石暴怒，当面斥责史量才：“我有百万军队，你有什么？”史量才也坦然应对：“我有百万读者！”当然，后来蒋介石还是对史量才下了黑手，让军统特务将其暗杀，这是后话。当时，史量才的确为拆穿徐恩曾捏造的“伍豪”事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来，周恩来面向全党也发表了一个声明：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

民党造谣诬陷的把戏！在“伍豪脱党事件”中，徐恩曾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发表启事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上海，前往苏区根据地，随后一直在江西瑞金工作。一个在苏区工作的人，怎么可能在上海“离党”呢？

10.残害共产党的N种方法

徐恩曾是“共党问题专家”，他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了解。他在电台搜集情报、破译电台密码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建立了庞大的电台网络，这更利于他更全面系统地搜集情报。徐恩曾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创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中统虽然名气不如军统，但其手段残忍、臭名昭著的程度是任何其他特务组织都无法匹敌的。对付共产党人，徐恩曾有以下几种办法：

其一，利用黑帮，对共产党进行渗透和破坏。不过这种方法，从党务调查科成立之前就有了。早在陈立夫策划的安庆、九江事件中，陈立夫就果断地利用了两个派别的黑道：一个是青帮，一个是洪帮。

青帮，也叫清帮。之所以也叫清帮，是因为它成立于清朝雍正四年，创始人是潘清、钱坚和翁岩。青帮也叫“粮船帮”，因为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对付朝廷，控制运载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船舶的水上运输。青帮与洪帮、白莲教的显著区别是：青帮新人入会通常会拜师，由师傅教你青帮的规矩。青帮实行的是禅宗制度，完全是一个有信仰、有组织的“黑道组织”。后来，青帮与洪帮和白莲教并列为“三教”，民间有“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说法。国有国法，帮有帮规，青帮的帮规是“十不准”，所谓“十不准”，即：“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扒灰倒拢，不准奸邪淫盗，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发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清朝末期，中国的海运兴起，内河运输逐渐衰落，大量青帮分子纷纷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上海是当时青帮分子的聚集地，据说当年每两个上海工人中就有一个是青帮分子，可见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许多年轻才俊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帮，其中包括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近代青帮三大首领也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后来，国民党意识到青帮帮派规模巨大、影响力非常，所以想方设法拉拢青帮，让青帮为“党国”卖命。尤其在上海，国民党发动的诸多事件都有青帮分子参与，比如“四一二政变”等。利用青帮分子搞破坏的也不仅仅只有徐恩曾一人，戴笠也曾利用青帮分子在上海租界搜集情报。徐恩曾与上海青帮的三个大佬私交甚密，在青帮里也能呼风唤雨。

洪帮，也称洪门，即天地会。这个帮派成立于明末清初，据说是陈近南创办的。洪帮与青帮的不同之处在于：洪帮总是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洪帮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之后，被迫转移到海外，但是后来的洪帮分子继续参加反清运动，有些还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曾这样说：“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

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唯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唯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个个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选自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而孙中山则如此评价洪门：“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兴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选自《孙文学说》）可以说洪帮为了搞革命，出钱又出人，国民党高官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都曾经加入洪门。就像多数帮派一样，洪门也有自己的帮风，这种帮风类似于黑社会的左派。这种帮派一旦被坏人利用，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徐恩曾就曾经利用“洪帮”大做文章，把洪帮分子作为特务的眼线、耳线，向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进行渗透，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据大特务黄凯回忆，在他出任武汉特派员期间，徐恩曾曾给他发过一道密令，命令他们参加洪帮，隐藏身份，并且拜下山头。后来黄凯还在洪帮内取得了一定的职位，而其他参加洪帮的特务也在洪帮内部抱成一团，成为洪帮中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一派。后来徐恩曾把黄凯调至上海，分配黄凯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拜见洪帮头子杨虎；第二件事，拜见上海三大亨；第三件事，加入青帮！后来黄凯拜青帮首领徐朗西为师，一跃成为青帮的头面人物。

洪帮与青帮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都属于秘密会党。这两个帮派没有公开的身份，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的，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党派。徐恩曾与这些帮派合作，既得不到蒋介石的经费支持，而且由于这些党派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与他们合作，比较容易暴露整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徐恩曾逐渐觉得“青洪帮”是根鸡肋，利用价值不大，甚至有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

其二，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前面已经说过，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时，发现特务碍于“身份”，有时很难进行搜查和抓捕的行动，当他看到宪兵队或者警察局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抓捕后，便向上级打报告，积极运作与宪兵队、警察局的“合作”事宜。

可以说，徐恩曾的这个方法非常行之有效，使得特务们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他们的破坏能力。特务们披上“警服”，摇身一变成了警察，这样的变化也使地下党们一度殚精竭虑、无法应对。可见徐恩曾做“特务”，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当然，在最初开始从事特务工作时，徐恩曾不仅没有“特务细胞”，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工作，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搞实业出身的工程师，去做特务简直太屈才了。不过后来，徐恩曾在特务行中尝到了甜头，就开始努力发掘自身的潜力。

其三，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电台是特务的重要设备，当时，很多军事组织都通过电台发报、破译密码来传递情报，所谓的“鸡毛信”和“飞鸽传书”，比起电台发报简直就是小儿科。徐恩曾是工程师，在电台方面是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安装、调试了第一台电台。在电台的开幕庆典上，蒋介石还竖起大拇指说：“这东西一发威，可以顶三个师！”言外之意，他非常关注并且重视电台情报工作。在党务调查科开展工作之后，发送情报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靠秘密交通关系传送情报（这需要人力和交通工具，不适于长距离传送）；第二种，就是通过无线电台发射无线电报。无疑，第二种方法更加安全，更加迅速。所以包括党务调查科在内的很多军事组织，都以无线电台发射电报为主要的情报传送方式。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对付共产党，就必须知晓共产党的重要信息，徐恩曾感受到蒋介石对于破解共产党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因此把建立无线电台放在了特务工作首位。后来，国民党的无线电台像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几无死角。在徐恩曾的领导下，特务们靠电台截获无数情报（截获的共产党的情报并不算多），其中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的情报。可以说，特务的情报多数是靠电台截获和破译的，而当时，发送情报，编制情报密码的工作也是由中统局负责，可见中统局对于国民党而言有多么重要。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共产党。这是徐恩曾最常用的，也最为快捷有效的一种对付共产党的方式。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往往就是在严刑拷打下背叛的。徐恩曾虽然是机电出身，但也精通心理学，他知道什么人吃软不吃硬，什么人吃硬不吃软。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一方面改造所谓政治犯的思想，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而位于南京瞻园中的几间监狱，曾经是徐恩曾的“刑讯室”，它令人闻风丧胆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那里放着各种刑具，专门用来“考验”那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徐恩曾特别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还推出了一系列瓦解共产党人意志的方法。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

徐恩曾为了对付共产党，在各地成立了“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诬陷共产党，如捏造著名的伍豪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中统正式成立后，徐恩曾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徐恩曾最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也就是搞无间道。徐恩曾在任时，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并加强内线细胞的培养和利用，凡是发现共产党内有不利于发展“细胞”的障碍，就想办法除掉障碍，当然一般是暗杀。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

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当时，共产党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由于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发展到一定的地位，所以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这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徐恩曾源源不断地向共产党内部注射“癌细胞”，他妄想有朝一日，共产党能够死在他的手下。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细胞”培养“细胞”，简而言之，就是让这些“细胞”利用谎言、利诱、威胁等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内奸”，也就是策反分子！这样的内奸不胜枚举，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共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敌人的“细胞”！

其六，徐恩曾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介，攻击共产党，诋毁共产党的形象。拿“喇叭”做武器的方法，虽然是陈立夫想出来的，但是徐恩曾却将其“发扬光大”。陈立夫认为，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好好利用，必然能够起到“蛊惑人心”的效果。徐恩曾进入党务调查科后，继承了陈立夫的衣钵，但是他与陈立夫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个“阴谋家”，而且还是一个技术专家。他不仅能够提出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技术性”建议，比如建设电台的规模、电台地址的选择以及采用的波段等等。党务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还控制了许多报社、媒体，最终利用这种手段发行散布了大量恶意中伤共产党的报纸和言论。

不可否认，徐恩曾还是一个有相当水准、相当能力的人，他也够资格成为“共党问题专家”，他参与迫害共产党的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他认为对付共产党，除了血腥镇压外，还要实施“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软硬兼施。他还告诫小特务们，凡事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后来他还要求下面的特务，每周写一篇总结报告，以便了解特务在基层工作的情况。通过“细胞”，他掌握了绝大多数中共要员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情况，可以说，徐恩曾比普查人口的官员都要认真，因为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摸清共产党的“底细”还是第一步，随后，他多次组织开展特务训练班，由高级特务顾顺章、王杰夫、张冲等担任教员，向年轻特务传授“特务”经验，提高他们的“特务”及“反特务”的业务水平，提高他们在对抗共产党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共产党人在徐恩曾的“扩大自首”政策面前低头了，最后背叛了革命。

其七，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经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发明的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打垮、斗破学生运动，才能让共产党无可乘之机。徐恩曾虽然是“共党问题专家”，但对付共产党也不是百战百胜。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陈立夫的观点与徐恩曾不同，他曾经说：“若说做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不见得总能赢……”徐恩曾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手里的王牌特务并不多，而这些王牌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共产党的王牌高，搞“特务”也是需要实力的，他也特别羡慕周恩来手下的那群“反特专家”，捏造“伍豪事件”也说明了徐恩曾的心态：那就是羡慕嫉妒恨！无奈之下，徐恩曾在共产党所擅长的“学生运动”上做起了文章。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消极抵抗，白白将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于是学生们公车上书，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也总是阴着脸抱怨：谁摊上这些学生，谁倒霉！尤其是9月28日，两千多名学生冒雨来到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给个说法。蒋介

石心虚，根本不出来见这些学生，更别提向学生们解释了。

蒋介石阴着脸问陈立夫："立夫啊，现在学生闹得厉害，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虽然没有对付过学生运动，但是对学生运动还算有所了解，他直言："我猜想肯定是共产党在后面搞鬼！要想平息学生运动，就要挖出幕后黑手！"

"你说说看！"

"东北事件，我党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舆论慢慢扭转百姓对我们的看法。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而是要想办法找到源头！我觉得我们可以派人加入学生运动，趁机摸摸他们的老底儿。"

蒋介石皱着眉头回答："不过近期学生闹得厉害，你先找几个人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别来闹腾！政府是个严肃的地方，岂能容忍这些学生胡搅蛮缠？对此事你一定要重视，处理好学生运动！"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对学生们也无可奈何。

陈立夫明白蒋介石的心思，为了打散学生运动，陈立夫采取了武装镇压的方式。陈立夫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后，便找到了徐恩曾商量对策。徐恩曾大概明白了陈立夫的意思，于是派几个特务打扮成学生，混到了学生运动的队伍里。后来，在徐恩曾的指挥下，顾顺章在上海还绑架了几名学生领袖。然而他们的镇压，不但没能控制住学生运动的迅猛势头，还激起了学生们更为激烈的愤怒情绪，连上海市市长张群也被学生们一顿群殴。后来蒋介石看到越演越烈的学生运动，拍桌子大骂："娘希匹！"

学生运动一波一波袭来，蒋介石为此闹心不已，感到脖子发凉，心口发紧，于是找来中医大夫给他拔罐祛风。与此同时，来自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的一群学生，仍然不远千里来到南京，继续向蒋介石施压，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向日本宣战；第二个要求，请蒋介石立刻开始抗日；第三个要求，要求武装学生，率领学生们奔赴前线抗日。迫于学生们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出来说话了。

蒋介石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拄着手杖，站在了学生们的面前："你们的意思是让国家出面抗日，我们是明白的，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的。但是你们都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用文化武装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建议你们多读书，至于外交、国防之类的事情，还是由我们去处理为好！"此时，徐恩曾安排的一名假冒大学生的特务突然蹦到了主席台上，说："蒋委员长说得太好了，他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台下的学生面面相觑，随着一声"散会"，这支来自蒋介石的家乡的学生队伍也算给了老蒋面子，终于散了伙。然而徐恩曾的小聪明，只管用了这么一次，随着蒋介石政府持续不作为，学生运动接连不断、持续高涨。蒋介石实在没招儿了，最后出了狠招：血腥镇压！

1931年12月5日，南京的天气很不错，刚刚入冬，阳光明媚，不算太冷。北京大学的300多名学生组成南下示威团，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其在抗日方面持续不作为给个说法。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声令下，一群特务便手持棍棒朝学生们的身上、头上打去。顷刻间，棍棒声、哭喊声、哀鸣声混成一片，路上躺倒

一片。这一次，有185名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被打伤。蒋介石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制学生们的抗日热情，哪想到一次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开始酝酿。

12月15日，在蒋介石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有浙江的、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以及北京的和上海的学生，一共3万多人。这些单纯的爱国者再次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门外，要求蒋介石出来解释他的种种行为。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还我国土，抗击日寇。蒋介石闭门不见，激愤的学生们便捣毁了国民党外交部的办公室。最后，出来解释原因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遭到学生们一阵痛殴，差点丢了性命。

12月17日，学生们来到南京珍珠桥，徐恩曾安排的特务再次对学生大打出手，这一次血腥镇压，竟然杀死了30多个学生，这就是有名的“珍珠桥惨案”！但是国民党不承认“珍珠桥惨案”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国民党将领孙元良站出来驳斥《香港文汇报》副社长周奕的如实报道，声称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孙元良还说：“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致使陈当即昏厥，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警卫救出他时，他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选自《孙元良回忆录》）

虽然镇压学生运动是蒋介石的旨意，但是派特务血腥镇压学生的指挥者却是徐恩曾。对于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这样为自己开脱：“那些学生被共产党洗脑、教唆，他们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捣毁国民党阵营。对于这些企图捣毁政府机关、殴打国民党要员的行径，绝不能姑息。”

徐恩曾没有想到，血腥镇压是消灭不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的。1935年的冬天，一群学生在上海举行了震惊全世界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次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毛泽东也说：“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直到后来，徐恩曾不得不承认：打掉他们的牙齿，但却挡不住他们的呐喊！

徐恩曾纵然有对付共产党的N种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太

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国民党不讲诚信，失去了民心，后来就连陈立夫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确实有过人之处，不得不服！”

11.拿下反省院

反省院是什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是一个类似有了错，去反省一下的地方。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反省院其实是国民党党部直接操纵的特殊监狱。但是这个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首先它关押的犯人不是普通犯人，通常都是一些高级政治犯；其次这个“监狱”条件不错，有一定的休息和活动时间；再就是管理理念方面，反省院的重点不在于劳教，而在于政治思想上的灌输和改造，思想改造合格者，便可以获释。既然反省院是关押政治犯的特殊监狱，那么这里关押的人一定都跟政治有关。最初提出建立反省院的是陈立夫。“四一二”之后，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陈立夫提出一个方案：仅仅以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思想教育，软化其“反动”思想。后来蒋介石非常认可这种建议，便下令陈立夫着手制订方案。1929年，一个名叫《反省院组织条例》通过了立法，这也就标志着“反省院”正式成立了。

反省院隶属地方高等法院管辖，是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对这些特殊犯人进行洗脑、改造、政治诱骗的场所。鉴于党务调查科的职能，徐恩曾上任不久便提出：反省院非常具有威慑力，尤其对于共产党而言，是非常奏效的。由于党务调查科的任务与反省院是一致的，两家应该有效地结合起来，要不然反省院的威力将会大减。与此同时，他还搞出一套劝降、诱骗的办法，让陈立夫、陈果夫过目。二陈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你的想法不错，我看行！”于是二陈列出一个方案，向司法院提出申请。司法院院长居正看过方案之后，对方案也十分满意。

方案通过后，徐恩曾再次找到陈立夫，他对陈立夫说：“立夫，既然司法院通过了方案，为何不让我们的人担任反省院院长呢？”

“……你说说看！”

徐恩曾继续解释：“我们抓来政治嫌犯投进反省院，如果我们的人不参与审理，功劳就被其他人抢走了！功劳被抢走不说，我也无法向下面的人交代啊！再者说，改造犯人思想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陈立夫点点头：“你说得对，抽空我再向居正提一提！”

没想到的是司法院接受了二陈的建议，允许中央组织部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各地区反省院的院长，这其中包括首都反省院院长游定一，江苏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健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黄宝实，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正如周恩来后来回忆：特务介入反省院后，有一些意志薄弱的革命工作者叛变了革命！也就是说，自从中统控制了反省院，效果显著。逐渐，中统控制住了反省院，而反省院成了中统局下属的一个监狱而已。

大权在握的徐恩曾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绞尽脑汁想出一些五花八门的“策反”、“劝降”、“软化”的手段。除了一些手段外，还有一些类似“企业文化”的宣传标语。其中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有三个：“第一个，以所谓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第二个，以阶级调和反对阶

级斗争；第三个，以被歪曲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三条“标语”基本概括了徐恩曾的“思想教育观念”。而“软化”思想的手段也有以下几种：第一，利诱。以卢福坦为例，徐恩曾采取的是金钱＋美女的方式诱惑共产主义赤贫者叛变革命。既然卢福坦这样的高官都经不起利诱，那些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徐恩曾以利为诱饵，致使一些共产党员叛变革命。徐恩曾屡试不爽，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二，政治欺骗。所谓政治欺骗就是大肆鼓吹本党利好，贬低对立党派。比如向政治犯灌输一些政治理念，使他们淡化自己的革命观念，其中政治欺骗的教科书有陈立夫的《唯生论》、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第三，软硬兼施。这个好理解，这是对那些“吃软不吃硬”或者“吃硬不吃软”的革命者采取的手段。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盛忠亮为例，盛忠亮被捕后，中统特务先严刑逼供，见盛忠亮死活不招，便采用“软”的办法对付盛忠亮。特务了解到盛忠亮与已被捕的秦曼英感情不一般，于是便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好生相待，提高生活条件，希望他能够有所转变，盛忠亮思考再三也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

政治犯进入反省院，通常有两种结果：一种是顽抗到底，最后被枪毙；另一种是叛变，“悔过自新”，考试及格，领取“准予自新”的合格证后被释放。而反省院也有其特别规定：凡是参加反省自新者，必须参加反省院组织的学习，学习每半年一期，学期结束后，举行“期末考试”，考试通过者便准予自新。如果考试没通过，便“留级”继续学习，连续三次未通过者，直接枪毙。但是通过自新考试的人员也不能立刻释放，而是要“留校察看”三年，并且组织他们参加由中统创办的“自新人员训练小组”。三年之后，自新人员被释放后，也将定期接受检查，不合格者继续抓回反省院“闭关修炼”，严重者则直接就地正法。不过许多共产党员进入反省院，大多选择“留级”，因而遭受了非人道的残酷对待。个别意志薄弱者，通过“学习”，彻底告别了共产党的怀抱，投靠了国民党。各个反省院都要定期将参加“自新”的人员情况向徐恩曾汇报，而徐恩曾也多次下“基层”亲身指导工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自新”的终归是少数，保持名节的共产党员还是多数，这让二陈、徐恩曾等人非常不解。

不过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包括利诱、劝降顾顺章、向忠发、徐锡根、李竹声等人，这些人叛变之后，交代了许多问题。徐恩曾借“反省院”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反省院”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撤销了。虽然“反省院”没有了，但是一些类似“反省院”的监狱却依旧存在，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12.贪财的徐恩曾

对于那些喜爱玩女人、时常出入高档会所的人而言，花钱如流水是必然的，毕竟“玩女人”和“赌博”都是高消费。徐恩曾生性放荡，玩女人是他的强项，偶尔他也会赌赌博。对于他这样一个讲排场，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来说，想办法捞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赚钱的渠道就那么几种，徐恩曾哪一种都用到了极

致。

其一，靠打工赚钱。简而言之，就是赚工资。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任职的时候，月薪是300块。300块现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块现大洋可以买3斤肉、50斤白面。换算一下，一块现大洋大约值现在的50元人民币，300块现大洋就是15000元人民币！加之现在通货膨胀，300块现大洋最起码比那些月收入2万以上的人过得舒坦。所以说徐恩曾的薪水已经很高，等同于现在的高级白领或者中产阶级。但是300块现大洋对于爱玩爱耍的徐恩曾而言，的确是不够的。不过日常的生活开销，徐恩曾基本花不着自己的工资。请客有活动补助，坐车有交通补助，旅行有差旅补助……甚至给姘妇王素元盖的三层小别墅也是从特务补助中支出的，所以徐恩曾吃喝拉撒几乎一文不掏。据他身边的人讲，徐恩曾每个月的娱乐消费数目惊人，300块大洋远远不够！于是乎，他必然要从别的地方敛财，否则无法支撑他的日常开支。怎么敛财呢？徐恩曾有了主意：别人赚钱少，自己就赚钱多。有了这种想法，徐恩曾便开始找机会下手。他发现，党务调查科的特务们大多五毒俱全，花钱如流水，于是他借机教育他们，要懂得节制，他控制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扣薪！如果谁违反了规定，就狠扣谁的钱！后来他又进行了一下改革，拿出10%的工资当作奖罚依据。但是大多数特务死性不改，10%的薪水就被徐恩曾白白扣掉了！这些钱去了哪？还不是进了徐恩曾的腰包。

其二，搞投资。投资是一种风险大、见效快的生钱办法，许多人都是靠投资发的家，比如炒股，比如前几年炒楼盘、炒地皮。这种见效快的投资方式徐恩曾当年就采用过。徐恩曾曾经在党务调查科搞过一个“联谊会”的组织，就是以联谊会为由头，建立一个“联谊存储银行”。这个银行，也算是党务调查科的“小金库”！徐恩曾许以高利息让特务们把钱存进银行，然后由他进行管理、投资、分红。特务们积极响应，纷纷把钱存在徐恩曾的“银行”里，日积月累，这笔款项非常之大。于是徐恩曾便开始利用这些钱投资，并且置办了各种实业。徐恩曾的一笔投资是南京中央商场，没想到这个投资非常不错，半年时间就赚回老本。徐恩曾还炒地皮，先后在江苏灌云、安徽屯溪、湖南株洲等地买了万亩荒地，开办农场，后来收益颇丰。这个“银行”一直开到抗日前夕，后来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停办！停办时，徐恩曾说：“此银行款额因为常年没有盘算，已经含混不清，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但是如果兄弟们经济上有困难，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兄弟们解决！”徐恩曾这话无非是一句空头支票，以他的地位和身份，哪个特务好意思张嘴问徐老板要钱？就当“花钱孝敬爷儿”算了！

其三，挪用公款。这种赚钱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徐恩曾不担心，只要能赚钱，什么招式他都敢尝试。由于党务调查科在顾顺章时期办了几起大案，蒋介石十分高兴。徐恩曾借机扩大机构，向上级申请建设资金。后来蒋介石同意了，便经常拨款给徐恩曾。但是这些钱可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被徐恩曾私吞了。虽然特工总部有个监察机构，但形同虚设。徐恩曾一人独权，想干什么干什么，贪污挪用之事便成了“喜闻乐见”的常事。

其四，卖官。买官卖官，自古就有。过去有人说，官衔越大，价格越高。过去朝廷里，曾有黄金万两换官衔的说法。为什么这么多人拿钱

买官？自然当官就有当官的好处。比如一个人身在基层，月收入2000元。后来花10000块钱（五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组长的职位。组长月收入2500元。虽然花10000元只买了一个组长，但是组长的薪水和职权带来的综合性效益远远超过10000元，而且官位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徐恩曾当然明白这一点，想当年，他往上爬的时候也没有少送礼，所以他要想尽办法捞回来！不过那时，特务身份特殊，根本没有做官的资格。拥有做官资格的只有那些登记在明处的在编人员。徐恩曾也曾瞧不起“特务”身份，经常发话：“特务的工作就是隐藏身份，默默无闻，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过后来特务们不愿意了，老特务刘不同牢骚最多，他常常说：“狗屁言论！别人生的孩子是孩子，我们生的就是私生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凭什么它是乌鸦，插上钗就装凤凰？既然我是婊子，我就不要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钱，简直是胡扯！如此一来孔祥熙也可以装大爷冒充孔夫子了！”刘不同一话在特务圈子里引起了共鸣。于是按不住的徐恩曾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同意给特务们安置官衔。此时徐恩曾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一边收钱，一边帮特务们安置官衔。特务们花钱买了官，还要感谢“卖官”收黑钱的徐恩曾，真是一举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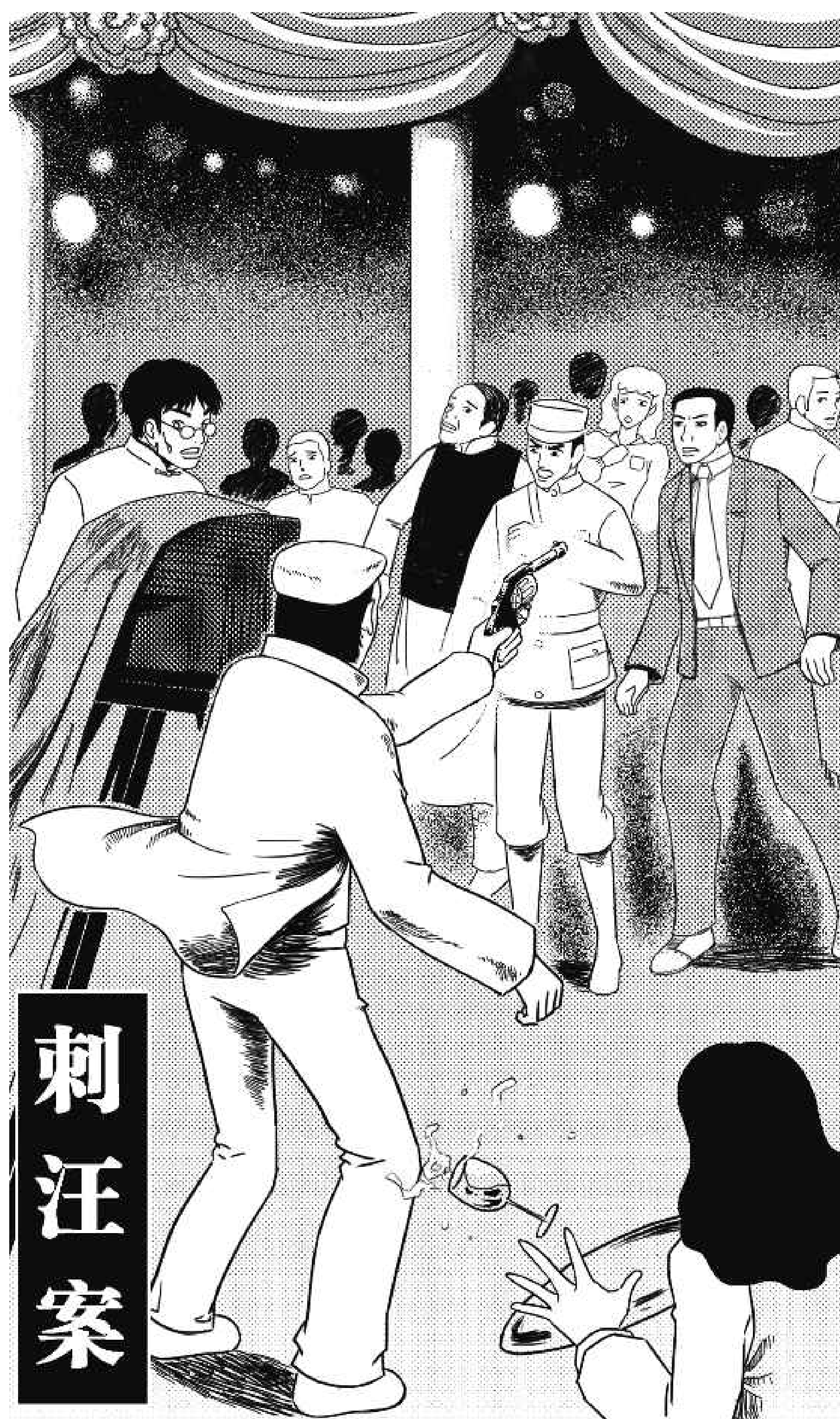
其五，走私贩卖。这是徐恩曾最大的收入来源。早期徐恩曾利用交通部的关系，在四川和云南等地区创办了“物流公司”，专门负责国民党的物资运输。后来发现境外的鸦片、武器价格低，拥有暴利空间，于是他以“物流运输”做掩护，偷偷进行走私贩卖鸦片和武器活动，赚了很多钱。

徐恩曾这样一个“能人”，后来跑到了台湾，人到老年，竟然因用脑过度得了脑萎缩和健忘症，1985年死在了台湾，享年89岁！

13.刺汪案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1935年刺杀汪精卫的案子。这个事看上去与徐恩曾没啥关系，但负责调查、破获这个案子的就是徐恩曾。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刺杀汪精卫的经过。

1935年的11月1日，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席就是汪精卫。按照惯例，在开会之前，所有与会人员都要拍一张集体照留念，与此同时允许媒体、报社等抢拍新闻图片进行常规的政治渲染。此时，司仪竟然把节目单搞乱了，弄错了顺序，唱完国歌之后，便直接邀请汪精卫上台讲话。没有准备的汪精卫哆哆嗦嗦拿着稿子上了讲台。结果他一开口说话，便紧张起来，吞吞吐吐的样子惹得下面议论纷纷。



当时，坐在台下的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开幕致辞颇为不满，便对旁边

的秘书说："兆铭（汪精卫）这个开幕词，真给党国丢人！"于是蒋介石起身往休息室走。此时，全体中央委员皆已到位，准备拍照，而蒋介石却觉得没有心情，拒绝拍照。致完开幕词的汪精卫觉得蒋介石有些失礼，便亲自请蒋介石回来拍照。

"与会委员都已到齐，咱们一去过去拍个照。既是惯例，也是对委员们的尊重！何况你是会议的重中之重，于情于理都应该过去一趟！"汪精卫好言相劝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嗅到危险的味道，扫了一眼混乱的现场道："兆铭，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你也不要去了！"

"这不太合适吧，你是不是太多心了？"

"要拍你自己拍，反正我是不拍！"蒋介石没给汪精卫面子，而是径直回了休息室。汪精卫也有点生气，自言自语道："你不去，我去！"

此时照相的人已经摆好造型，只等汪精卫了。据张学良回忆，当时拍照的人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继等，汪精卫后来站在前排中央与众人一起拍照。大概9点35分，闪光灯闪过之后，参加拍照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座位，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突然从照相机后站了出来，他掏出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汪精卫连开三枪。听到枪声，会议现场乱成一片，国民党委员们有的吓得抱头鼠窜，有的则扶着脑袋蹲在地上。此时的汪精卫，左眼下脸颊被击中，左臂也中了弹，最致命的则是胸脊柱中弹，他几乎失去了意识，倒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是血。据张学良后来回忆："我是坐山观景。关键是我在高处。我在第三层上，这层人都跑光了，只剩我一个人在那看怎么回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张继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凶手。那个凶手也不是太厉害，也就拿枪打人厉害，别的他不厉害。后来才知道，他拿的是一把左轮枪，他的枪里只装了三颗子弹，子弹是布朗宁的子弹，布朗宁子弹打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力量，他大概是买不到了，也许是以为布朗宁是钢弹，比铅弹有劲儿。但是布朗宁子弹不走来福线，不能转，它小而且松。我看见张继抱住了那个人，看得很清楚，那个人手里还拿着手枪。哎呀！这个张溥泉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多亏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大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热闹，然后下去帮张继的忙。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绊了凶手一脚。啪！凶手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选自《张学良回忆录》）

开枪射击汪精卫的到底是何许人也？后来经调查，是孙凤鸣。孙凤鸣，也叫孙凤海，江苏徐州人。孙凤鸣16岁随父亲闯关东，后来来到江南，加入学生会，并且认识了著名刺客华克之。其实孙凤鸣本打算开枪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不料蒋介石回了休息室，汪精卫替蒋介石挡了子弹。孙凤鸣做这样一件事，本来就没打算活。张学良将孙凤鸣绊倒以后，警卫员开枪打死了孙凤鸣。

事情发生之后，与会的晨光通讯社的记者逃跑了，而组织暗杀汪精卫的幕后人物到底是谁呢？当时谁也不知道。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一向不好，所以矛头便指向蒋介石。汪精卫受伤倒地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便哭丧着对蒋介石说："虽然你与兆铭不合，也没有必要下此毒手

啊！”蒋介石十分生气，他一肚子委屈，于是便吩咐人调查，到底是谁让这个孙凤鸣混进来的？

经现场工作人员查实，让孙凤鸣进入会场的是徐秘书。蒋介石暴怒，他猜想这个徐秘书应该是徐恩曾（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此时蒋介石想起过去陈立夫说过的话。陈立夫说：“汪精卫是党国的心患，此人不除，恐怕会后患无穷啊！”其实蒋介石不喜欢汪精卫，但是没有答应陈立夫去做这种事情。他猜想是不是陈立夫交代了徐恩曾，然后徐恩曾找了一个凶手刺杀汪精卫？

会议结束后，脸色十分难看的蒋介石把陈立夫喊进办公室：“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到了，这个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立夫也蒙了，他解释道：“委座，此人身份还需要落实，我会交代下面人去调查，请你放心！”

“人不是你派的？”蒋介石瞪着眼睛看着陈立夫。

陈立夫这个人从来没有撒过谎，他也觉得委屈：“委座，如果没有你的命令，立夫万万不敢！我想一定另有原因！”

“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否则我拿你是问！”

蒋介石训斥完陈立夫，陈立夫又把徐恩曾喊来问话。此时委屈的陈立夫也想找个人出出气，于是便逮住了徐恩曾。

“徐秘书……那个让凶手进来的徐秘书就是你吧？”陈立夫如法炮制，而此时的徐恩曾也是一肚子委屈。

“你们都搞错了，我是组织部的，又不是秘书处的。是秘书处的徐秘书！”徐恩曾似乎早有准备。

“我不管是谁！委座有令，给你五天时间破案，如果破不了，你自己看着办！”陈立夫甩下话，转身走人了。

徐恩曾稀里糊涂被冤枉了，他该怎么办？其实留给他的退路只有一条，他只能想方设法在五天之内破案，否则脑袋难保！于是他急忙喊来大特务顾建中商量，并且告知顾建中时间短任务重！顾建中得到指令，便从孙凤鸣的尸体下手。这个顾建中不愧是个特务专家，任何一点细节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后来顾建中得出答案：孙穿的衣服是当时香港等地最为流行的衣服布料，可以断定孙凤鸣从南方赶来；而且孙凤鸣枪法了得，身体还有枪伤，可以断定孙凤鸣当过兵，有军人背景；而疤痕处绑着一块红布，则说明其人是黑社会成员（斧头帮之类的）。有了这样的结论，事情就好办多了。会议现场逃跑的那个晨光通讯社的记者成为嫌疑最大的目标。于是顾建中带着特务们搜查了晨光通讯社，后来在社内发现烧掉的文件，从而证实嫌疑人应该与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贺波光有关。

得知这个信息，徐恩曾非常高兴，听说贺波光在上海有一点线索，于是马不停蹄跑到蒋介石面前借飞机。蒋介石对徐恩曾重申：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也要把这个案子破了！此时徐恩曾还是心里发毛，他看了看挂历，只有四天时间了。徐恩曾立马给顾建中打电话，将蒋介石的话重复一遍。顾建中连口茶水都没喝，坐上专机就飞往了上海。

顾建中到了上海后，马上吩咐特务和宪兵队，把贺波光有关的亲戚、朋友统统抓了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抓捕，竟然抓了二百多人。顾

建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采用最直接的审讯办法：大刑伺候！于是这二百多个人，不管男女老少，纷纷被铁链吊起来，什么鞭打、扎竹签、坐老虎凳、烙铁炮烙、电刑、扎阴部等等，手段极其残忍。有些人不堪凌辱虐打，昏死过去。但是顾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他继续交代特务们用酷刑“招待”这些无辜者，后来终于有人招架不住，便把贺波光藏匿的地方供了出来。

徐恩曾得到电报，立刻下令逮捕贺波光。一日之后，贺波光被捕，并且供述了案情。抓到贺波光，案件真相大白。徐恩曾汇报完工作，蒋介石“龙颜大悦”，当面表扬了徐恩曾。破了案的徐恩曾，如沐春风一般自在。他先是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作了报告，后来又在国民党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没想到徐恩曾竟然“因祸得福”，在“汪精卫”身上掘了一桶金！

14.策反老友邹韬奋

说到徐恩曾的特务工作，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友邹韬奋。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江西余江人。1919年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机电工程专业，与徐恩曾是大学同学。1926年，邹韬奋任《生活周刊》主编，“韬奋”一名是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用的笔名。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后，邹韬奋对《生活周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确定了《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即“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选自《邹韬奋同志资料》）在邹韬奋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主流刊物，发行量高达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由于邹韬奋的坚持和勇敢，《生活周刊》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敢于痛斥、指责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现象。久而久之，它渐渐变为“针砭时弊、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1932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成立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后，邹韬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生活书店扩展到56家，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成为传媒界的大亨。“九一八”之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说白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运动”是与蒋介石唱对台戏。陈立夫曾如此评价共产党：“搞舆论，是共产党的强项！想要打倒共产党，就要阻止他们办报纸！”从进入中统那天起，徐恩曾就知道“舆论宣传”是何等的重要！起初徐恩曾也是满怀信心，打算将国民党的思想散布于全国，然而，当他遇到自己的老朋友邹韬奋之后，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天，蒋介石的贴身秘书送来一本刊物，蒋介石看了几眼，便生气地将刊物拍在了桌子上。他问秘书：“到底谁这么大胆？为什么处处与党国作对？”

秘书支吾了几声：“是一个名叫邹韬奋的家伙……”

蒋介石拍着桌子继续问道："他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总是替共产党说话？你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蒋介石的秘书拿着《生活周刊》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就找来徐恩曾商量对策。

"共产党非常善于利用媒体蛊惑人心，这本《生活周刊》想必也是共产党人创办的吧！"陈立夫将杂志递给徐恩曾。

徐恩曾扫了一眼，看到邹韬奋的名字，心里一惊，这不是老同学邹韬奋吗？他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了？徐恩曾出于谨慎和自我保护的目的，委婉地说："这个邹韬奋我认识，他应该不是共产党！"

"什么？"陈立夫吃了一惊。

"他是我大学同学，您别着急！我这就派人去查，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立刻逮捕他！"

"如果不是呢？"陈立夫瞪了徐恩曾一眼。

徐恩曾连忙说："不是也要将他抓起来，谁叫他为共产党摇旗呐喊！"

此时的徐恩曾，想起了蒋介石发布的特务工作秘密办法中的那条"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密令（密令强调：凡是带有共产党色彩的文字一律要从文章中删除，凡是与共产党有相同倾向的报刊、杂志一律封闭！）。

不过从本心而言，徐恩曾还是有些纠结的。上学的时候，他与邹韬奋私交还算不错，邹韬奋不仅是他的同门，而且还是他的朋友。他真恨如今的邹韬奋热衷政治，这不是给他徐恩曾找麻烦吗？

徐恩曾翻开《生活周刊》仔细阅读，读到了邹韬奋《抗战》一文："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徐恩曾看着看着，脸色就青了，心里想：邹韬奋啊邹韬奋，你这是干什么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啥要跟党国作对呢？徐恩曾坐不住了，他要去找邹韬奋，亲自与邹韬奋谈谈。

徐恩曾出现在邹韬奋的家门前，颇令邹韬奋惊讶，惊讶之余，他意识到，作为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此次来者不善。当然，邹韬奋还是以朋友之仪招待了徐恩曾，迎进门来，沏了一壶热茶端上。

"老兄此次来我的府上，有何贵干？"邹韬奋问道。

徐恩曾单刀直入，拿出杂志摆在邹韬奋面前："老弟，我是为你这篇文章来的。现在国内形势不好，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被共产党利用啊！"

邹韬奋没有直接回答，绕了一个弯子陈述自己的理由："大难当前，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站出来！东北沦陷，蒋委员长作为领导人，更应站出来动员全民抵抗日寇！难道徐兄觉得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妥吗？"



“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应该为你的话负责！”徐恩曾拿着《生活周

刊》，一个字一个字指着对邹韬奋说："你后面讲的话都对，就是前面不对，偏偏是中共的宣言！共党一直利用舆论蛊惑民众，难道你还不懂这个道理吗？"

"我不在乎哪个党，我只在乎自己的良心！"邹韬奋义正词严。

"良心？韬奋，共产党出了多少钱，国民政府可以出更多的钱把所有的刊物收回来！需要钱，你尽管开价！"徐恩曾使出了金钱利诱的老伎俩，他要息事宁人，只要邹韬奋不再为共产党"摇旗呐喊"，蒋委员长就不会再怒气冲天拿着《生活周刊》骂人了。

可邹韬奋却不买账，接着说："如果人人都只认钱不认良心，那中国就彻底完蛋了！"徐恩曾见邹韬奋"不为财也不为利"，着实无计可施，只好起身走人！就在他即将出门的时候，邹韬奋在他身后说："统一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了！倒不如打电话劝一劝蒋委员长，让他站出来说句话！"徐恩曾"好心"劝老友，没想到竟然被老友邹韬奋教训了一顿！

徐恩曾不在乎什么"统一战线、解放全中国"，他认为，天下就是蒋委员长的，只有让蒋委员长高兴，自己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既然"老朋友"变成了他政治道路上的"阻碍"、自己上司的"眼中钉"，他只能牺牲友谊，帮自己的上司拔掉这枚"钉子"了。于是他派特务秘密监视老友邹韬奋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

1933年的6月18日，上海发生一起枪击案，民主人士杨杏佛驾车至上海亚尔培路时，被军统特务暗杀。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就此事奋笔疾书，徐恩曾看到邹韬奋为此事撰写的爱国文章，恼怒不已。正巧，陈立夫打来电话，要求徐恩曾列出与共党密切来往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就是所谓的中统黑名单。徐恩曾迅疾想到了邹韬奋，于是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邹韬奋"的大名。

与此同时，邹韬奋因"杨杏佛暗害"一事悲痛不已，在新周刊中又刊出一版关于国民党无耻行径的报道，希望能够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个时候，《生活周刊》的一名记者神色慌张、急匆匆地闯到邹韬奋的家里，对邹韬奋说："主编，大事不好了，你赶紧出去躲躲吧！"

"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

"中统局的特务们冲到报社来了，说您扰乱民心，要抓您！"

邹韬奋咬碎钢牙，一拳砸在桌子上："如果他们想要我的命，就让他们拿去好了！"

记者劝邹韬奋："主编，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如果您不在了，报社还指望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无奈之中，邹韬奋只得离开上海这个多事之地。

邹韬奋买了船票，乘坐一艘名叫"佛尔第号"的意大利油轮离开了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得知邹韬奋出国了，徐恩曾终于长出一口气，他自言自语道："表面看上去视死如归，其实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没想到吓唬一下，他就去国外避难了！"邹韬奋离开后，《生活周刊》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1933年年底，徐恩曾派特务查封了《生活周刊》。

邹韬奋虽然被迫离开故土，却心系祖国，他先后在意大利、瑞士、

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等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禁感慨万分：“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欧洲所谓的列强国家，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爬！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造束缚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选自邹韬奋《萍踪寄语》）随即，联想到自己的祖国，邹韬奋更加愤慨：“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

正当邹韬奋为国家和民族前途来回奔走寻求出路的时候，国内形势突变，日本侵略者的黑手已经探到了华北腹地。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竟然不顾“民声”强行封杀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震惊，决定回国。

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了美国，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满目疮痍，街头上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和灰蒙蒙的“亡国气息”，于是他决定重操旧业，继续发挥传媒宣传的威力。

1935年底，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为《大众生活》写的创刊词是：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大众生活》像当年的《生活周刊》一样，在邹韬奋的引领下，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大众生活》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销量再破杂志发行新纪录。

徐恩曾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邹韬奋的压力，他没有想到，邹韬奋又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徐恩曾拿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大众生活》，问自己的秘书：“邹韬奋真的回来了？”

“处长，他真的回来了。”

徐恩曾长叹一声，将刊物扔在桌面上，然后眼露凶光，对自己的手下们说：“谁也不准看这本杂志，谁看我扣谁的薪水！”

接下来，徐恩曾连续几天没睡好觉，他一直在琢磨：邹韬奋为什么处处与自己作对呢？像他这样的才干，如果加入党国，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徐恩曾对自己这样的“志不同道不合”的老朋友深表遗憾。而此时他似乎也有点后悔，他为当时没有派人暗杀邹韬奋感到后悔不已。

没过几天，陈立夫就带着蒋介石的“圣旨”来到了徐恩曾的家中，命令徐恩曾：不惜一切代价，斗垮邹韬奋。徐恩曾迫于压力，简单列了四个计划：一、捏造证据，把他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二、暗杀；三、强行封锁《大众生活》；四、拉拢。

徐恩曾把方案交给陈立夫后，陈立夫也陷入了深思，陈立夫说：“‘捏造证据’是难以实现的！所有人都知道邹韬奋没有加入共产党，我们根本无法以此为由对他下手！至于暗杀，显然不合时宜。而强行封锁刊物也是暂时的办法，封得了一时，却封不了一世！看来我们只有拉拢和劝诱！既然你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这个工作你一定要做好！”

徐恩曾无法推脱，又心生一计："只怕我这一张嘴，劝不了邹韬奋啊！"

"你什么意思？"陈立夫问道。

"我的意思是多找几个人一起去劝！"

徐恩曾似乎有推脱之嫌，但是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给陈立夫出了个难题。虽然陈立夫的官衔比徐恩曾大，但是心机却不如徐恩曾多。陈立夫想了想，无计可施，最终还是如实禀报给了蒋介石。而此时的蒋介石，早就因为这个"邹韬奋"而寝食不安了。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蒋介石再也不看那些心烦的报纸刊物，甚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听了陈立夫的汇报，蒋介石似呻吟状地叹了口气，然后致电复兴社总书记刘建群和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让他们再去劝邹韬奋。

1936年初的某一天，经过邵洵美（诗人、出版家）的介绍，刘建群和张道藩找到邹韬奋的住处，单独与邹韬奋谈话。张道藩与刘建群的"劝降"风格不太一样，张道藩想"以理服人"，而刘建群是军统局的特务，自然采取"恐吓"的方式。张道藩与刘建群一大一小，一软一硬，像两只苍蝇般"嗡嗡"地叫个不停。邹韬奋回忆："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刘建群）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Z（张道藩）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做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选自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邹韬奋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的态度与张道藩和刘建群见了面。

刘建群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喋喋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了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听了刘建群一番恐吓后，笑道："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

最后，刘建群和张道藩白白折腾了一天，他们觉得在邹韬奋身上下功夫简直是浪费时间，两个人无奈地互相看了一眼，灰头灰脸地离开邹韬奋宅，回南京汇报工作。

蒋介石听了这两个人的汇报后，难免有些失望，不过蒋介石没有死心，他琢磨，是不是徐恩曾、张道藩、刘建群的"腕儿"不够大，震慑不了这小子？难不成还要我亲自出马？

于是蒋介石拨通了上海滩的老大杜月笙的电话，让杜月笙出面邀请邹韬奋来南京面谈。得知蒋介石在南京设下"鸿门宴"亲自迎接他，邹韬奋有些吃惊，他知道自己如果不低头，肯定会有性命之忧，可他又怎肯低头，于是，那晚，他并没有乘飞机去南京，而是直接乘飞机去香港避难。后来，杜月笙告诉邹韬奋，那一次，蒋介石非常生气，亲自接站的戴笠也竟然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他们都因为邹韬奋没有赴宴而恼火万分。

在香港避难的那段时间，邹韬奋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当他得知

蒋介石依然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时，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又毅然返回了上海。

1936年的5月31日，邹韬奋与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

7月15日，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11月12日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在救国会上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救国会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本人。

后来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

于是11月23日上午这一天，忍无可忍的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这个事件，就是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后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为“七君子”被捕一事进行了罢课，派出五名代表赴南京请愿。

1936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这一天，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的口号，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邹韬奋在内的七个人。

按照国民党当局法律规定，侦讯时间是两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但是邹韬奋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能变相延长羁押时间。

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检察官竟然东拼西凑地搞出“十大罪状”，令邹韬奋非常生气。他怒斥国民党当局：“故意罗织，入人以罪。”“十大罪状”出笼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鉴于各方压力，只好释放邹韬奋等七名爱国志士。

邹韬奋出狱后，不但没有休息调整，而是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他一边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从政治上积极推动各派政治力量团结抗日；一边则通过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等，从舆论上进一步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全民抗战》三日刊的发行量再创新高。

邹韬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更加寝食难安。在蒋介石的反复交代和指示下，徐恩曾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老朋友邹韬奋谈话，为了营造温馨的谈话氛围，徐恩曾竟下请帖邀请邹韬奋来徐公馆做客。

那一日，邹韬奋刚刚踏进徐公馆，便看见早早在此迎接的徐恩曾。

徐恩曾寒暄道：“今日请韬奋前来，别无他事，只是叙叙旧而已。遥想同学一别已有二十多年了，昔日少年，今已不惑，真是时光如水，逝者如斯啊！”徐恩曾接着说：“今日韬奋在百忙之中抽空到鄙人寒舍做

客，我感激不尽——不过我尚有一事相求，于公于私，都请帮个小忙。”

邹韬奋知道徐恩曾还是为了“那件事”，便说：“你不必拐弯抹角，直接说就是了！”

徐恩曾沉默了一下：“虽然咱俩是同学，也是老朋友，但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替共产党摇旗呐喊了，共产党的那些主张未必可行，也未必适应当下国情。”

没想到邹韬奋不紧不慢地反问徐恩曾一句：“你掌握的材料比我多，你老实说，依你的判断，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徐恩曾闻言颇为尴尬：“我追踪了你七年，未能证明你是共产党……”

邹韬奋便理直气壮地反驳徐恩曾：“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对我说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话？”

徐恩曾一听，竟然“哑巴”了。无奈之下，徐恩曾只得亮出“杀手锏”威胁邹韬奋：“我是好心劝你，1936年的事你可是记忆犹新啊！到了现在，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根本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提起“七君子事件”，邹韬奋十分气愤，他怒斥徐恩曾：“我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几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无论出书还是写文章，都经过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审查，审查通过的事，总不能再归罪于我吧！”

徐恩曾驳斥邹韬奋，说：“你出书也好，写文章也罢，放着三民主义不讲，非要谈什么共产主义；放着国民党不谈，非要大谈共产党，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邹韬奋毫不示弱：“本人是一介书生，只得写书作文，对于主义、政党并无研究。至于我想说什么，那是我的自由。况且我只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会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

徐恩曾觉得秀才遇到秀才，偶尔也会有口无辩。他拿自己的老朋友一点办法都没有，琢磨了一下，还是转变“方针”，开始介绍起国民党的好处来。徐恩曾说：“国民党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而蒋先生才是中山先生的嫡系传人！为了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蒋先生也是倾尽所能啊！至于共产党，只不过是乱党，你倒不如转而研究‘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你的生活书店一同并入党办的正中书局，我帮你记上一功，蒋先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邹韬奋直言道：“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仅仅是在党国的高压下屈膝，未免有失人格！”

徐恩曾一听便生气了：“什么？你把加入国民党视为有失人格，你这是侮辱国民党！中宣部主张合并你的生活书店，是看得起你邹韬奋，你真该赶紧领情。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识抬举！”就这样，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后来，蒋介石致电徐恩曾，问邹韬奋的争取工作做得怎么样。徐恩曾说，邹韬奋乃一块顽石，油盐不进，无法做工作。蒋介石颇有些生气，命令徐恩曾：不管如何，也要拿下邹韬奋。

此后，徐恩曾又与邹韬奋谈过几次话，但是每一次都悻悻而归！不过令邹韬奋出乎意料的是，堂堂一个中统局局长，与他的每一次对话都

如同君子一般。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抗战以来》中这样描述徐恩曾："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所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合，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从邹韬奋的描述可以看出：徐恩曾真是一个"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的披着袈裟的恶魔啊！

15.抗日期间继续反共

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形容两面三刀的徐恩曾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不仅阴险毒辣，而且擅长见风使舵。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纷纷参与到抗日大潮中去。因为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准备再度联手，重拳出击。不过蒋介石"消极抵抗"的做法一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他明着抗日，暗中则寄希望于日本人在各个战线上拖垮共产党。蒋介石的心思，像徐恩曾这样聪明的下属怎么可能领悟不了呢？

与戴笠不同，戴笠虽然是间谍之王，但此人还是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抗日，戴笠在"抗日"里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戴笠极其反感日本人，他带领军统在抗日战线上做了不少好事，暗杀日本人、锄奸等等。曾经，在一次抗日动员会上，有个记者问戴笠："中国靠什么来打仗？"戴笠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但是徐恩曾就不同了，他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亡国者，他对抗日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按照主子原先给他设计好的程序继续对付共产党。尤其是1939年以后，中统局表面成立了一个"日伪调查科"，但只负责摘录、整理日伪公告，抗日八年，未曾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案。徐恩曾还曾对自己的属下说："抗日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付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统仍然把共产党当成主要敌人。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统特务中，做汉奸的人要远远超过军统。尤其是中统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竟然都成了汪伪76号特务的重要成员。"八一三事件"之后，徐恩曾不但消极抗日，还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

徐恩曾为什么这样做呢？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徐恩曾骨子里仇恨共产党！

徐恩曾对共产党的仇恨，应该是从龙潭三杰开始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曾经都是徐恩曾最信任的人，尤其是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两人可以说朝夕相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徐恩曾之于钱壮飞就如同蒋介石之于陈立夫一样重要。徐恩曾不仅信任钱壮飞，而且还把"正元实业社"的大权都交给了他。私底下，徐恩曾更是离不开这个帮手，甚至连"翻青楼女子的牌儿"这样私密的个人事情，都交给钱壮飞处理。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最信任的人竟然出卖了他，而且害得他差点为此掉了脑袋。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顾顺章"，徐恩曾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因为钱壮飞，徐恩曾的把柄一直被他的对手拿捏着。在国民党内部，他的政敌多次警告他：如果越过雷池半步，我就把"钱壮飞之事"转告给蒋介石。可见钱壮飞是徐恩曾心中永远的痛，想

必他也曾经在深夜的某个时刻低吟：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龙潭三杰，徐恩曾认为：共产党是天底下最坏的！所以他开始不停地报复报复再报复，造谣造谣再造谣……当他得知蒋介石也极其讨厌共产党时，他认定，于情于理自己都应该铲除共产党，而且是必须铲除共产党。

第二，共产党正在与日本人开战，应该趁机下手！说白了，徐恩曾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典型的小人做法。“七七事变”后不久，徐恩曾便找陈立夫聊天，屡屡试探陈立夫的口风。徐恩曾说：“现在我党积极抗日，情报战线有所疏忽！而共产党似乎想要借日本人的兵力消耗我党，如此一来，就给了他们发展壮大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大行动力度，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虽然陈立夫也坚持“一致抗日”，但他对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也不好表态。最后，他含糊其词地告诉徐恩曾：“抗日也要进行，情报工作也不能放松！现在一致抗日，抗日是主线，搜集情报是虚线！你自己看着办吧！”言外之意，陈立夫放权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徐恩曾想，既然领导都同意了，为什么不加强力量继续打击共产党呢？于是他下令，派高级特务范振中、刘桂、田崑生等人去陕甘宁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在那里打开缺口，共产党就岌岌可危了！

第三，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不管什么时候，蒋介石都认为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威胁，即便是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也没少提防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答应了抗日，共产党也暂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却施了一计，把杨虎城和张学良囚禁起来，借机成立了一个“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刚刚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就这样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可见蒋介石的深谋远虑，既可以撤掉两个不听话的属下，又可以跟共产党针锋相对。当然，毕竟国共合作已经成形，蒋介石不敢盲目翻脸，于是他转换思路，由“清剿”改为封锁。而此时，曾经的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竟然偷偷密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似乎想要借机谋求发展！张国焘就在那个时期，脱离了共产党，叛变了革命。作为蒋介石的下属，徐恩曾当然要替主子分忧解难，他深知，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机密国民党大都一清二楚，在中统档案室，甚至还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会议的会议记录。但抗战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延安，距离南京数千里之遥，中统特务很难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增派特务人员去陕甘宁边区。于是他在抗战后，依照蒋介石的思路，在陕甘宁边区做起了特务工作。

不过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就是说，在他的统治道路上，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于是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唯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

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选自《蒋介石传》）但是后来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才慢慢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对抗共产党。此时，中统局成立了“日伪情报科”，这个名字仅仅是一个幌子，中统局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

“日伪情报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竟然通过了一项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此后，国民党又陆陆续续通过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方案。得知蒋介石推出这一方案，毛泽东亦是震怒，他说：“此方案完全是针对共产党的，这样的做法不但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团结，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蒋介石如此回应毛泽东：“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搞割据，况且大战在即，显然共产党的队伍素质较低，目无军纪，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甚至开始向外扩张，壮大力量，企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一本正经，脸不红心不跳，淡定自若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徐恩曾也开始积极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于是国民党内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尤其在1939年的4月至1940年的3月份，逮捕杀害共产党数千人。其中1939年4月，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200余人；1939年6月，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部队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死八路军400余人；1939年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同年12月，阎锡山也响应蒋介石的反共大旗，制造了著名的“晋西事变”，阎军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千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16.中统力量的瓦解

一系列的反共事件也在刺激着徐恩曾，他有些坐不住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他开始眼红了。作为中统局的头头，他既没有胡宗南、阎锡山的兵权，也没有“军统”那样的特殊权力，他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层层渗透，东边点把火，西边放声枪。而此时徐恩曾觉得，既然“攘外”不重要，那就更加应该“安内”了。但是他考虑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搬至千里之遥的延安，而“中统”的力量在西北、西南地区是比较薄弱的，他只能调整“棋局”，将原来上海、汉口、江苏、天津、北平等地的特务（尤其是暴露过身份的）撤出一部分，补充到西南、西北战线上。

与此同时，他还将中统进行了一定的扩充和整编，着手对上海地区的特务机构进行改革。叶秀峰曾经的下属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郁闷了许多年后，竟然神奇地得到了徐恩曾的重用。其中徐兆麟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陈宝骅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徐恩曾最相信一样东西：电台。信息战离不开电台，所以他增派了一批玩电台的高手补充力量，加强特务的战斗力。这些通讯员分布在上海不同的角落，逐渐将上海布控成一

张电台网络。中统的各个通讯员在保密期间都各自为单位，从不横向联系，这也是徐恩曾建立中统特务帝国的一大特色。但是化整为零也有化整为零的风险，由于这些特务常年奢靡成性，早已不是特务训练班时候的特务了。为了一点银子，冒着生命去干活儿，他们觉得有些不值。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兼职”，想办法赚些外快。找来找去，这些特务找到了三个门路：第一个门路，重新加入帮派，跟着帮派老大混，比如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第二个门路，跟着日本人混当汉奸，当然这个活儿也不容易干，日本人一向比较残忍，而且擅长过河拆桥。第三个门路，加入汪伪政府76号。起初徐恩曾还十分自信，他认为依照过去的经验和人脉，想要在上海滩做出点成绩并不太难。然而机关算尽的徐恩曾没有想到，连李士群、丁默邨这样的大特务都纷纷转投汪精卫门下，其中周佛海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担任“特工总部”正副主任。这些人不但了解中统，甚至和徐恩曾私交甚密。在他们的招揽下，小鬼们纷纷前来投靠，大批中统特务投奔汪伪76号，其中：原上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成为汪伪76号的第四厅厅长，原中统局财政部的马啸天成为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原上海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奔汪伪76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统特务改换门庭，中统在上海的力量基本瓦解，所谓的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

而在其他地方，比如汉口，徐恩曾则按照“党特结合、广设网点、扩大电台范围、控制沦陷地区”的原则办事，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中统华中区和汉口调查统计室，有主任林景伊，总干事先大启和史希侠等二十多人。为了配合调查统计室的工作，还专门配备类似武装自卫队之类的组织护航，似乎为特务们穿上了“防弹背心”。不过即使再好的防弹背心，也抵挡不了金光闪闪的糖衣炮弹。出了名的吝啬鬼徐恩曾舍不得在特务身上花钱，导致特务们日后纷纷转投其他门下，以至于有的成为汪伪政府的特务，有的则成了日本鬼子的走狗。在北平，中统地下活动负责人后大椿，天津地下特务电台台长是周维祺，报务员彭汝云、王绍恩，这些徐恩曾精挑细选的人均当了汉奸，周维琪、王绍恩1943年返回重庆中统局，周被派充局本部交通处材料科科长，王被派往浙江任特务电台区台长。

一心想要“报复”共产党的徐恩曾折腾了半天，竟然把构思好的布局原封不动地免费转让给了汪精卫和日本人。但是徐恩曾似乎并没有放弃，虽然他经常犯“看走眼”的毛病，但是此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来他索性来了个将计就计，与汪伪、日本人相互勾结、利用，继续破坏共产党人的地下防线。

17.唐家沱乌托邦

徐恩曾手下的得力干将一个一个出逃，虽然原因很多、很杂，但是大致上只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缺钱”。有人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再去赚。”也有人说：“钱是毒药，不能贪婪。”还有人说：“钱是万金

油，生活不发愁！”总之关于钱的说法有很多种，但对于那些平日奢侈、开销极大的特务而言，钱真的很重要。所以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为了钱可以铤而走险，为了钱甘愿掉了脑袋！

其实特务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正常的需要，比如娶妻生子、兴趣爱好、物质追求等等，哪一样都需要钱。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务工作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煤矿工人，如此大的危险，薪水按理儿应该不低。但是中统特务的薪水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收入在当时的物价下能干些什么事呢？

中统成立初期，工资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中后期，一些特务就开始埋怨：薪水喂不饱全家人的肚子。加之特务们一个个嗜赌如命，有的还喜欢玩女人、吃大烟……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费银子的大项目，他们之前过着“恣意而富足”的生活，到中后期，却买不起烟卷，逛不起妓院，“毒瘾”和“花心”还不折腾死他们？虽然当时中统局隶属国民党党部，算是典型的政府机关，特务也算政府机关单位的在编员工，也称得上“公务员”，但那时候的中国确实很穷，穷到“一敲即响”的地步。徐恩曾自己是开办实业、开办银行、开办物流、购买地皮，他富得流油，可他的手下却因为徐恩曾把所有的钱都占为己有而穷困潦倒。

徐恩曾是一个“铁公鸡”，吝啬得很！他自己可以花一百大洋去青楼翻头牌，却不会可怜手下的特务，多给他们一文钱。而且中统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与一些正规的机要部门不同，中统局的前身是陈立夫创办的“党务调查科”，后来徐恩曾又把它改成“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成“军事调查统计局节一处”，一直到1938年中统局的正式创建，才改名中央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奇怪的组织，连续换名不说，而且对内一个名，对外一个名……这是这样一个组织机构，虽然挂名政府机关，却与正式的机要单位不同。这个部门没有明显的人员编制，也没有任何的参照条例加官封爵，要想升官就得掏钱向徐恩曾“买官”。而特务这个行当，本身就“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薪水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徐恩曾为了敛财，克扣特务们的薪水，他还说过：“如果没有信仰，是很难从事特务这一行的！”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敛财找借口。

那么当时，特务们一个月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这样说吧，抗战初期特务们的月工资是110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早期的特务而言，不仅够用够花，一个月下来手里还能有所剩余。但是在193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钱立刻变得不值钱了。110块钱几乎变成了废纸，过去三分钱一个鸡蛋，到了1939年就变成了一块钱一个！特务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戒嫖戒赌、戒烟戒酒！通货膨胀的时间一长，特务们就按捺不住了，大家的意见越来越大，暗地里开始怒骂徐恩曾：“这个吸血鬼，肥了自己，穷了别人！”后来，特务们不但怒骂徐恩曾，也开始鄙视自己的职业。他们开始厌恶这份工作，开始仇视自己所从事的勾当。1940年之后，物价还在狂飙，通货膨胀像一场威力巨大的龙卷风席卷重庆！此时，日本人的轰炸机也来了，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轰炸，许多特务不但没饭吃了，而且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过去风光的特务们一个个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抗战开始后，中统特务们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艰难，甚至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手头的那点薪水，买米都不够，中统局的普通军官们情

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吃的都是掺了沙子的糙米，衣服也是粗布旧衣，睡的是几人叠在一起的大通铺，加之日本人的轰炸，有时候还提心吊胆，恐怕不等醒来，便一命呜呼死在废墟里了。曾任徐恩曾秘书的高级特务赵毓麟也曾回忆："当时我担任中央调查统计局本部第三组第六科长，与我同住的还有局本部的秘书郭紫峻、专员刘象山、统计处处长马可福、人事室科长孙翼、第一处第一科科长李达三、局本部文书股副股长刘国刚，当时我们挤在一间不足四十平方的小楼里打通铺。至于吃饭，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我身边的这些人已经算是中央党部里的高干了，他们也时常抱怨……"（选自《赵毓麟回忆录》）

虽然大特务、小特务都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中统局里有一个人却依旧逍遥快活，这个人就是徐恩曾。徐恩曾早年搞特工总部赚了不少钱，而且通过投资、洗黑钱等等盘下了一大笔产业。可以说徐恩曾的钱根本花不完，而且身居一号特务，手里也有一定的特权，自然饿不着。

1940年，全国范围内通货膨胀，但是徐恩曾每天早上一碗香喷喷的鸡汤面，正餐顿顿"四菜一汤"，还时常带着老婆孩子下高档饭馆，偶尔还去交际舞会跳跳舞，跟一群有头有脸的洋人飙上几句英语。徐恩曾活得十分潇洒，但对自己的手下却不管不顾。在他心里，小特务们就是他养的一群小鬼，死活又有什么关系？纵观整个国民党的高干：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乃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也未必像徐恩曾那样铺张浪费。

就这样，徐恩曾的冷血无情让小特务们觉得十分心寒，于是他们纷纷开始寻找出路。有的进入黑社会，有的成了日伪军，有的跟着汪精卫混去了，还有一些比较逊的，去码头当起了扛包工……在兵荒马乱、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小特务们各谋出路。而随着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加入汪伪政府，徐恩曾才意识到：拆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必须为自己的抠门、吝啬付出代价！徐恩曾开始明白：饿肚子的人是不会听话的，除非你让他吃饱穿暖。



有一次家宴，徐恩曾对费侠说：“重庆的工作开展得不太顺利啊，政

府缺钱，也不给涨薪……如果这样维持下去，非垮台不可！”

费侠停下筷子，若有所思状：“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忘了什么了？”

“过去我去苏维埃学习时，苏联曾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在粮草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模式就是建立集体农庄，然后开展生产自救！这种社会模式最早还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完全可以让他们填饱肚子！”费侠竟然向徐恩曾推荐“共产国际”的做法。费侠的这个思路，与毛泽东、前苏联的生产自救的思路不谋而合。徐恩曾听费侠这么一说，茅塞顿开，高兴地拍着大腿说：“知我者，费侠也！”

而此时的重庆，连续遭到日军空袭，政府为了疏散人口，在一个名叫唐家沱的地方盖了许多房子。虽然这个唐家沱距离重庆市里还有几十公里，但是土地肥沃，房价便宜。听到这个消息后，费侠对徐恩曾说：“快点，先把这个地方弄下来！”徐恩曾接受费侠的建议，花钱租下唐家沱二十多座二层小洋房。有了地，有了房子，“集体生活”的试验场就开始了。费侠真是超前的游戏玩家，几十年前就发明了这个类似乌托邦性质的“快乐农场”。

费侠来到唐家沱，自封集体农庄主任，副主任由女特务胡淑宜担任。费侠决定：留下两座洋房办公，其他的用于安置特务及特务家属。在“生产经营，自给自足”方面，费侠更是费尽心思。她把所有的家庭主妇集合起来，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包括种地、畜牧，还负责育儿以及食堂。小孩送幼儿园有专门的妇女看护，清洁、做饭也有专人负责，至于吃饭，则明令要求特务及其家属不准在自家开小灶，全部来食堂就餐。至于厕所，也是如此。费侠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安排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根有据，非常妥帖。在人员安置上，也是意愿与特长相结合，充分发挥劳效。

此时，特务以及特务家属们似乎尝到了些许的甜头，突然觉得“徐老板真是对他们恩重如山”，于是积极参与这种新模式，唐家沱的乌托邦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起初就像集体过家家一样，唐家沱的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据一个特务回忆：“大多数都似乎开始憧憬这种新生活……最开始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举办的晚会，大家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孩子们上幼儿园，有人照看，洗衣、吃饭这等琐事也不用自己麻烦！还有一点，这里的管理是军事化的，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军人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

此时的费侠得意地看着自己一手构建起来的乌托邦，似乎有点飘飘然了。她几乎每天都向徐恩曾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忍不住夸奖自己一番。徐恩曾十分相信费侠，并且鼓励她：干好了，我便起草给中央党部，将“唐家沱乌托邦”推广开来。

但是令费侠没有想到的是，几周后，人们的情绪出现了变化，许多人开始不适应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那些自由惯了的特务们对定时起床、睡觉感到厌烦；而那些主妇们则对上厕所一事感到别扭，由于没有私人厕所，只能在“野外”解决，她们纷纷偷偷买痰盂回家用。特务们的微词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突出，而食堂的问题也慢慢浮现出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负责购买菜品的人员经常私扣费用、公饱私囊，伙食质量越来越差，而且伙食分量也越来越少。有些特务开始埋怨：“孩子暂且

能吃饱，但是大人却无法果腹。”后来私自开小灶的也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偷粮”现象。伙食有限，想要多分一杯羹，就要突出一个“抢”字。那些年轻力壮或者有些职务的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抢”了再说，剩下的残羹剩菜根本不够妇女跟孩子吃的。因“抢”而发生的摩擦、争执不断，后来那些特务索性不来食堂吃饭了，而是单独在外面解决。至于清洁工，她们多半出身富贵人家，长时间干粗活，早已牢骚满腹。尤其到了夏天，她们看到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就犯愁！当她们发现费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也纷纷开始偷懒，能不清洁则不清洁，最后公寓内臭气熏天。至于农耕、畜牧方面，那些“姑奶奶”们普遍缺乏农耕经验，种下去的庄稼多半减产、绝产，根本起不到“自给自足”的作用。最后，“唐家沱乌托邦”带着它的“乌托”只能关门大吉。

本来还要帮着费侠推广“快乐农场”的徐恩曾最后一次来“唐家沱乌托邦”视察时，竟然大吃一惊——这个乌托邦简直可以与猪圈相媲美！铩羽而归的徐恩曾对费侠无话可说，只能自认倒霉！徐恩曾的“美梦”破灭了，看着自己养大的“小鬼们”纷纷另谋出路，他又能怎么做呢？

第四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二

1.徐恩曾争官

徐恩曾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自从进入“调查科”后，他就开始编织自己的特务帝国了。先是立山为王成立了“特工总部”搞出一个土司令的角色，后来加冕“中统局”，徐恩曾由科长到局长真是呕心沥血啊！1942年，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犯了“官瘾儿”，以至于他深陷种种恶斗旋涡不能自拔，最后导致丢官。

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徐恩曾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觉得自己离飞黄腾达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但是蒋介石出于“保护”徐恩曾的目的，还是找他谈了次话。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对徐恩曾说：“安排你出任这一职务，是党国对你的支持和信任，希望你不要让党国失望，好好工作！”

徐恩曾有些激动：“谢谢委员长对我的期望，我不会令你失望的。”

蒋介石进一步补充道：“其实安排你这个职务，还是为了特工工作的需要，你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工作经验，在全国交通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特工工作，尤其是在共产党方面！”徐恩曾知道蒋介石的意思，还是让他继续“反共党”！此时他

想：恐怕这一辈子他都要跟共产党作对了。
得知徐恩曾升官的消息，许多人都发来贺电，有请客的、送礼的，各式各样溜须拍马的。徐恩曾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就在这个时候，陈果夫出现了。陈果夫不但没有恭维客套的话，似乎如一盆洗脚水泼在徐恩曾的脸上。陈果夫一脸严肃，他毫无保留直接告诫徐恩曾：“不要被眼前的一切所迷惑，你的主要工作是中统，脱离了中统，你什么都不是！更不要因为做了官就忘了本，如果那样，得不偿失！”
但是徐恩曾并没有因此而清醒，他的官梦如同失控的水龙头，表面上他点头认可，其实他已经完全“疯魔”。他觉得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官职太小，如果能够当上交通部部长，那就厉害了，也就能够演绎出从科长到部长的神话。为了腾出时间当官，他把顾建中提拔上来，从而分担了他一部分精力。但是徐恩曾对顾建中也不完全放心，他担心此人一旦掌权，便会利用手上的权力做文章。为了防止他大权独揽，徐恩曾把审核定夺权交给了另外一个大特务王思诚，以此制衡顾建中。
徐恩曾的升官计划中还有重要的一步：就是尽快找到一座靠山。过去徐恩曾的靠山是二陈，但是自从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他的政治企图已经表露无遗。他想迅速摆脱二陈的束缚，独立门户。二陈觉得此人已经当不了棋子了，于是故意疏远徐恩曾。当然这还不是关键之处，最关键的是徐恩曾早就开始觊觎经济部部长一职，而这个职位同样也是陈立夫想要竞争的。想要取代自己的“主子”，成为主子的主子，这就是徐恩曾“黄粱之梦”！当然促使他有如此之野心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中统局是个清水衙门。中统局自创办以来，主要资金来源是上级“拨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拨款”，中统局就会挨饿。负责拨款的人是朱家骅，但是朱家骅与徐恩曾的关系不好，所以他在“拨款”方面处处为难徐恩曾。徐恩曾虽然假借中统局的名字开办过实业，但是那些实业大多是个人实业，与中统局无关。徐恩曾明白一个道理：倘若一个人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没有资金保障是万万不可的。中统局受制于人，资金又不能自主，说白了就是“苦力”！尤其抗日初期，经济膨胀得厉害，基层特务为了谋生计叛变的叛变、退出的退出，徐恩曾感到十分痛心！他时常想，如果上级多拨些款，给特务们涨涨薪水，恐怕就没有这么麻烦了。经济部与中统局不同，经济部是掌管钱财的，这个部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只要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好说。
二、中统局的工作是“为人做嫁衣”。这个还应该从“党务调查科”说起。起初蒋介石让陈立夫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目的就是通过调查、破坏等手段打压异党，维护自己的统治。说白了这个中统局就是蒋介石的一只“黑手”！一只见不得人的“黑手”又怎能出人头地呢？徐恩曾常常把中统局比喻成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又常常不受待见！不是徐恩曾发牢骚，而是徐恩曾打小就瞧不起这个职业，想必穿越到过去，恐怕他也不会选择中统，还不如宣传部这类部门。中统局的特务们也时常发牢骚：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每当徐恩曾听到这些怨言，胸口也隐隐作痛。他不晓得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为何得不到同样的重视？但归根到底，还是这个部门的原因。为了安抚特务们

的情绪，徐恩曾也时常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当然这也是信仰所赋予我们的！如果牺牲小我换来大我，那也值得！"徐恩曾劝归劝，但是小特务们却没有高尚的思想，他们的想法更趋于大众。既然钱又少，又干不出什么名堂，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徐恩曾也想努力一把。

三、现实很骨感，想象很美好！接二连三的挫折也让徐恩曾有些力不从心。自从制造"南委"事件之后，中统局鲜有出色的战绩。这一点也有三个原因：1.款子不到位，特务工作积极性差；2.共产党加强了防御，没有可乘之机；3.抗日之后，蒋介石对中统的关注度下降。徐恩曾常常想：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到头来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他看到别的部门"生机勃勃"，他心里就更加难受了。有人说：绝望是站在悬崖上抱有的最后一丝期望。眼瞅着自己的生命过了一半，再不努力一把，恐怕就要抱憾终身了。1941年的某一天，徐恩曾在"特务座谈会"上亲口对张炎茂、谢永存说："我们不能专干保卫政权的特务工作，而让政学系的人去做大官发大财，我们也必须分享几分！"

综合以上三点，徐恩曾的"升官"梦就不那么意外了。说实话，有谁愿意一辈子屈尊他人之下？又有哪个人不喜欢当官？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那座靠山：吴铁城。吴铁城，九江人，外号国民党"铁老"。1928年此人任广东建设厅厅长时曾建议张学良易帜，后来他调至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1940年担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翌年当上了中央秘书长。此人与蒋介石等一同参加革命，颇受蒋介石重视。又因为吴铁城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万金油"，他既不拉帮，也不结派，有些崇尚中庸之道。至于"铁老"的来历，是因为他在"国民大会"上提出一条折中方案，这条方案称之为"吴铁城条文"。

吴铁城也是徐恩曾生命之中的"贵人"，为何这么说呢？早年吴铁城有意接管中统局，没想到朱家骅抢先一步当上了局长，这个事情也令吴铁城难以释怀。于是他瞅准了郁郁不得志的徐恩曾。徐恩曾之所以能够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就是吴铁城推荐的结果。其实徐恩曾十分明白吴铁城的用意，但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将计就计"！于是他脸带"感恩之意"，千方百计在吴铁城面前表现自己。

1941年，吴铁城授蒋介石的旨意协调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部和中统局的工作，以便达到"反共"目的。但是徐恩曾深知吴铁城不懂地下工作，所以竭尽全力帮助吴铁城。为了表示对吴铁城的尊重，他规定凡是内部刊印的情报资料，必须抄送一份给"铁老"审阅。后来徐恩曾还私下开了家"豆腐坊"专门为吴铁城送豆腐，吴铁城家里缺酱油了，徐恩曾也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为吴铁城"打酱油"！一来二去，吴铁城觉得徐恩曾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便为徐恩曾单独留一点"好处"。

抗战后期，蒋介石找到吴铁城、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和中央设计院秘书长熊式辉起草战后方案。由于熊式辉有事在身，于是将自己的"份额"交给吴铁城处理，此时的吴铁城便想到"天天送酱油"的徐恩曾。后来吴铁城给徐恩曾写了一张纸条："可均同志，总裁令我和张、熊二位秘书长拟战后复员方案，盼速代拟一份！"

徐恩曾接到这个任务后十分兴奋，于是找来几个专家研究方案的写法。几日之后，一份十分翔实的方案出笼了。吴铁城看了一遍方案后，

十分满意，而且还在蒋介石面前表扬了徐恩曾一番。

后来徐恩曾拉拢吴铁城一事被二陈看到了，吃了醋的陈立夫有些气愤不平，他对自己的兄长陈果夫说：“看来徐恩曾的翅膀真的硬了，离巢是早晚的事！”

陈果夫也叹了一口气道：“看来此人真的留不住了！”

“那怎么办？”

“让他继续折腾。”陈果夫似乎沉得住气，纵观他几十年的为官所得，凡是“背叛师门”者均没有好下场。后来陈果夫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验证。

陈果夫、陈立夫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任由徐恩曾“跑官”，而徐恩曾似乎也沿着这个轨迹“运行”着。后来徐恩曾发现“仅仅只有吴铁城这一座靠山是不够的”，还要多找一些贵人才行。为了完成“升官大业”，他竟然开始四处拉拢，拉拢的对象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CC系高级特务。徐恩曾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拉拢二陈的人，他时常打着为“领袖”办事的幌子，邀请CC系内的高级特务们开茶话会，并且在此灌输他个人的意识。其中这些高级特务有齐世英、田昆山、骆美奂、骆美仑、谢作民、祝平等。这些人最初认为徐恩曾是“爱国”，后来得到二陈的提醒，逐渐开始疏远徐恩曾。当然为了不得罪徐恩曾，他们大多以“演戏”的方式敷衍徐恩曾。

二、拉拢金融财政方面的人。电气专业出身的徐恩曾虽然在开办中统局的过程中成立了一些实业，赚过一些小钱，但是就专业角度而言，他还是个门外汉。为了晋升经济部部长，他身后必须有这方面的智囊团。于是徐恩曾拉拢四川川盐银行总经理刘行琛，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长许继庄等，让这几个人担任他的“经济靠山”。

三、拉拢立法院、行政院方面的人。立法院、行政院是国民党的重要部门，如果得到其中一个部门的支持，徐恩曾就算找到了一个政治靠山。徐恩曾经营中统局多年，但是政治人脉一直被二陈所控制，想要摆脱二陈，实属不易。所以徐恩曾拉拢立法院的时候，行事还是非常低调的。后来徐恩曾联络到孙中山先生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的前后二任秘书长梁寒操、吴尚鹰以及该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娄桐荪、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陈长蘅等。当然仅仅拉拢这些人是不够的，这些人在党内的分量还不够重，只不过是充数而已。

四、拉拢国民党元老。中国人总是“以老为尊”，所以那些元老们，不仅辈分高，而且手里的牌也足够好用。徐恩曾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他找到了张继和吴稚晖。张继和吴稚晖年龄都比蒋介石大，况且在革命初期，地位比蒋介石还要高。但是此二人没有政治野心，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徐恩曾想：如果能够得到二老的帮助，自己的“官梦”希望甚大。于是他时常提着礼品探望二老，与二老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其中张继的大儿子性格叛逆，时常不听他的话，于是张继把自己的大儿子交给徐恩曾看管。至于吴稚晖，徐恩曾见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时常抄一份情报让吴稚晖过目。吴稚晖觉得徐恩曾是个可造之材，时常当面夸奖他。

五、拉拢桂系白崇禧。白崇禧作为桂系掌门人，手掌百万兵权，其党内势力甚高。如果能把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拉拢过来，做官之梦就会加

速实现了。为了拉拢白崇禧，得知白崇禧在重庆郊区有块菜地，于是他也在其附近购买了一块菜地。

仅仅拉拢关系是不够的！想要当官，不仅要走动，而且还要学会为主子分忧解难。为了讨好蒋介石，徐恩曾除了继续积极反共外，还打算为蒋介石提供一些经济方面的建议。当他得知蒋介石对市场经济和飞涨的物价头疼，竟然破天荒地搞出两个经济方案：一个方案是“稳定经济紧急措施”，第二个方案是“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其实这两个方案并不是徐恩曾一个人的杰作，而是众多人参与的。在写这两个方案之前，徐恩曾搞了一个“小餐桌”计划，每一次“小餐桌”，徐恩曾都会邀请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参与研究讨论。）蒋介石看到徐恩曾写的方案，沉默不语。后来他致电徐恩曾面谈此事，徐恩曾既紧张又兴奋，不知如何是好。

徐恩曾来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见他来了便吩咐他坐下。蒋介石先是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可均啊，最近延安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委座，共产党狡猾得很啊，他们实施了信息封锁，所以我们的部署还在继续深入中，不过您放心，我想很快就会打开局面了！”徐恩曾回答这话时，手心已经冒汗了。

这样的话，蒋介石听得实在太多了，他都有点“审美疲劳”了。共产党确实难对付，徐恩曾倒是没说假话，蒋介石并没怎么介意。蒋介石步入正题，说：“你的方案我看了，还是比较符合现状的！物价飞升，老百姓对法币失去信心，一方面是假钞泛滥，另一方面是大环境造成的。发行物价证券可以缓和一下局面，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才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不会轻易决策一件事情。

徐恩曾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听到蒋介石的这句话时，紧张状况一下子就缓解了。徐恩曾解释道：“物价证券不是黄金白银，而是棉麻桑蚕，这些东西都是百姓所需，他们需要什么，便可以凭着物价证券去相关部门兑换，同时还能防止中间环节的炒作。”

蒋介石觉得有理，于是点点头。

徐恩曾继续说：“税务征收方面，我觉得还是以实物税代替法币税好一些！现在工农不景气，百姓手里没有钱，如果继续征收法币税，无疑是釜底抽薪！这样做，也是顺应民意啊！”

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徐恩曾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这几点举措还是不错的！希望你继续观察，多提有效意见。至于方案嘛，我还要再研究一下！好了，你先回去吧！”

徐恩曾从总裁办公室里出来后，似乎如沐春风一般，能够得到总裁的正面夸奖，这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啊！他轻快地拉开轿车门，高高兴兴地回徐公馆。回到徐公馆，没想到徐恩曾的家门外候着一大批人。这些人都是两个方案的参与者，他们也迫切希望得到答案。当见徐恩曾面露喜色，于是他们便纷纷向徐恩曾道贺：“恭喜恭喜啊！”

徐恩曾反而谦虚地说：“真是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总裁看了方案之后，十分认可，不过还要等详细研究后再说！”

顾建中也高兴道：“总裁毕竟是总裁，做什么都这么谨慎！不过咱们的方案本就是值得肯定的！”

而其他的特务则吆喝着让徐恩曾组织派对，庆祝一下。徐恩曾响应在场特务们的要求，于是安排了一桌豪华晚宴。

徐恩曾开始了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他做梦了，梦到自己的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而他也得到了蒋介石非常高的嘉奖。他还梦到自己在经济部部长的宝座上飘来飘去！只可惜随着一声鸡叫，徐恩曾的美梦结束了。徐恩曾一等就是一个月，期间那些特务们也向徐恩曾打听事情的进展，徐恩曾只能郁闷地搪塞几句："快了，快了，再等等吧！"一个月过去了，紧接着两个月，半年……一年都没有下文，徐恩曾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打听一下。

经过打听，徐恩曾才知道，自己那对"孪生兄弟"胎死腹中。这个施之以"流产手术"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吴鼎昌是何许人也？吴鼎昌，字达铨，浙江吴兴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937年至1944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45年之后，他又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人不仅是经济专家，而且还是蒋介石的老朋友。

故事"闪回"到一年前，送走徐恩曾之后，蒋介石立即致电吴鼎昌，让他过来研究一下徐恩曾写的两个"方案"。吴鼎昌来到之后，细细看了一遍方案，第一感觉不是这个方案的好坏，而是认为徐恩曾"作为中统特务"根本不该掺和经济方面的事！吴鼎昌严肃说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大事，不可这样草率决定！而征实物税表面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经济命脉的破坏，造成更大的混乱！"

蒋介石不解，他疑问："有这么夸张？"

吴鼎昌继续解释："如果持有实物证券的人兑换不到实物，就会给共产党留下把柄。他们就会趁机利用实物证券做文章，宣传党国做事不讲信用！稳妥起见，还是不要找这样的麻烦。"

蒋介石一听，非常震惊："如果不是你提醒，恐怕真让这个草案付之于实践了！"

吴鼎昌毕竟也是元老级的人物，他看问题还是比较毒辣的，他直言："我看问题不是出在草案，而是出在人身上！"

蒋介石愣了一下……

"徐恩曾不是搞特务的吗？怎么突然间关心国家经济了？分明是有想法嘛！我看他，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猎官！"

"猎官？"

"我不相信一个特务能写出经济论文来？一看就是东拼西凑的东西！委座，恕我直言，徐恩曾对经济感兴趣，恐怕是瞄准了经济部部长一职了吧？"

蒋介石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娘希匹！"

蒋介石没有立刻揭穿徐恩曾的"做官梦"，而是一直晾着他，让他自己"悟"……直到有一天，徐恩曾汇报完工作后，蒋介石便劈头盖脸地教训他道："以前我嘱咐过你，让你当交通部政务次长的目的是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搞好情报工作，尤其要注意共产党的破坏活动！你倒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偏偏研究什么经济！我告诉你，你以后还是干好本职工作，经济方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听到这些话，徐恩曾简直欲哭无泪！他心想：有谁不想当官？更何况我提的经济方案都是经过严密推敲的，绝无敷衍之事啊！徐恩曾垂着手臂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

其实徐恩曾“争官”无可厚非，只不过他过于高估自己的本领。而国民党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地质研究所创始人，深受蒋介石器重）也非等闲之辈，想要抢夺他的饭碗也要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以免浪费自己的青春。徐恩曾的梦彻底破碎了，从此之后他专注于自己的“私利”，能捞一笔就捞一笔，如此一来也为他的丢官埋下了伏笔！

2.打造中统帝国

中统，最初由陈立夫创办的党务调查科，慢慢过渡到徐恩曾时期的特工总部，再到1935年改名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直到1938年，中统才正式挂牌营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中统由创办到正式成立，整整走过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像他们的特务职能一样，组织本身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虚虚实实”就是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

“虚虚实实”的第一点，指的是中统有太多虚虚实实的部门。中统毕竟是特务组织，难道还能站在太阳底下给别人看吗？所以徐恩曾坚持了“虚虚实实”的原则。比如秘密联络点“正元实业社”，看店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点心铺子或者当铺之类的门面！而党务调查科和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与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等这些公开的机关，却都必须听从隐姓埋名的“特工总部”的指挥。这些看起来有头有脸的门面，其实只不过是“特工总部”的几张皮罢了，就像川剧变脸一样，用手一抹就是一张，谁也看不到“特工总部”的真实面目。

“虚虚实实”的第二点，就是指徐恩曾本人的称谓。早期，徐恩曾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本来大家都应该称呼他徐科长，可徐恩曾却觉得这个名头不够响亮，也不够文雅，于是建议特务们改口，称呼他为徐处长，随着这个称呼的盛行，党务调查科就变成了党务调查处。但是时间一长，徐恩曾就不满意自己的处长身份了，他总觉得处长听着不舒服，挺别扭，于是他又建议特务们称呼他徐先生，他觉得这个称呼比较文雅。特工总部成立后，他又要求大家称呼他徐主任，中统局正式成立后，他又建议大家改称他徐局长。从徐科长到徐局长，徐恩曾的名头、官衔越来越大。不过私底下，大家却喜欢称呼徐恩曾“徐老板”。为啥叫他“徐老板”？老板是干什么的？老板就是掌柜的，是对决策者的一种尊称，作为中统的决策者和实施者，称呼徐恩曾“徐老板”倒也一点不为过！

1938年之后，陈立夫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了国民党的教育事业上，而所谓的中统局的正职局长朱家骅也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朱家骅对特务这行并不太懂（注意，徐恩曾起初只是中统局的副局长）。朱家骅离任后，徐恩曾才荣升中统局的正局长，濮孟久担任中统局书记。不过濮孟久仅仅是党政班子的书记而已，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所以徐

恩曾与濮孟久的关系十分微妙。在特工总部，徐恩曾是主任，濮孟久是书记，徐恩曾管着濮孟久；而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濮孟久是处长，而徐恩曾只是秘书，濮孟久又管着徐恩曾。不管怎么说，中统这一块，真正的老板是徐恩曾，他是有一说一，一句顶万句。



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中统组织还有一个名字，叫“大本营第六

部第四组”，这就是虚虚实实第一点中提到的多种名头中的一种。徐恩曾当时担任第四组的中将组长。第四组成立不久，中统局便正式挂牌成立，首任中统局局长为朱家骅（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而且还是中德关系的奠基人。他曾经担任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其中还包括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当过教授，后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虽然是局长，但并没有实权，实权在副局长徐恩曾的手里。1943年到1944年间，中统局增加了顾建中和郭紫峻两位副局长。

1941年，在陈果夫的推荐下，徐恩曾还得到了国民党交通部政务次长的职位。后来徐恩曾野心膨胀，企图夺取经济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的职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到权力的竞争中，转移了大量精力，因此给中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召回了顾建中，把中统局的日常工作交给了顾。1941年冬，顾建中被安排到局长室办公，代徐恩曾批阅日常文件。1943年徐恩曾与陈果夫商量后，向蒋介石推荐顾建中，经批准，顾建中成为中统局副局长。

1938年中统局经过一番辗转，终于迁至重庆的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来一直到1945年才迁回南京。这八年是徐恩曾掌管中统局的八年，他由此获得了“中统掌门人”的封号。

3.中统局的人员组成

中统局的前身是陈立夫创办的“党务调查科”，而党务调查科的主要成员是CC系成员。随着“党务调查科”的发展，徐恩曾等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也录用了一些自己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部门，终归要维护蒋介石的统治，那么局内必然会有蒋介石的嫡系。因此中统局的主要头目由以下几种组成：

一、CC系成员

既然中统局的创建人是陈立夫，那么中统局的主要成员便来自与陈立夫相关的CC系。这些人中包括中统大魔头徐恩曾，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叶秀峰，党务调查科的早期负责人张道藩、朱家骅等人，他们均是CC系成员。只不过后来朱家骅另起炉灶，脱离了CC系，当上了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

二、共产党的叛徒

这些成员主要来自清党时期叛变的共产党员。由于这些人熟悉共产党的活动，所以被中统所利用，在中统中的主要工作就是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其中有大叛徒何畏、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

三、大学生

重视教育和人才的陈立夫非常相信一句话：大学生是未来党国发展之栋梁。于是他亲自去国民党中央党校以及各个大学挑选优秀学生，并且把他们送进特务阵营，比如中统等特务机构中。这其中包括王思诚、张志鹏、向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人。

四、黑帮流氓

中统的特务活动一直离不开青帮、洪门等黑帮组织成员的参与，其中一些黑帮头目在中统的拉拢下进入了中统局，有的还在中统局谋得了一官半职。比较出名的人物有陈庆斋、庆深庵等。

五、特务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务

国民党的特务培训班，是锻炼、培养高级特务的重要机构。通过特务培训班走上中统领导岗位的特务也很多。

六、私人介绍的

私人介绍，也就是走后门进入中统的，这一类成员也不算少，大多是与中统特务沾亲带故，从而走进特务阵营的。比如童世纲、胡祥林、邓纫等等，均是上级或者中统局内部高参推荐来的。

4.中统局的组织结构

中统局成立之后，由于特务活动的需要，中统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1942年，中统局的组织机构便已扩大为三组、三处、五室和四会。中统特务由最初的200人增加至700人之多，分工也更为细密。

第一组辖管原特工总部的第一科、第二科和译电室。第一组的组长最初是中统红人、深得徐恩曾赏识的大特务梁辅承，后来是中统时期著名的大特务张国栋，第一组还有向本善、陈积中、陈文昭等著名的大特务。

梁辅承深得徐恩曾赏识，但由于他既非出身“调查科”，也非“CC”系成员，是半路出家到中统局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们视为外人。不过梁辅承却处处以徐恩曾的亲信自居，因此与中统老特务们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被老特务们排挤出去，由张国栋接替了他的位置。

张国栋后来改名为张文，是广西人，日本留学生。此人个子矮小，看上去很像日本人，据说他的老婆也很像日本人，而且他们崇尚日本文化，夫妇俩谈话都用日语。张国栋对徐恩曾极为忠实，在梁辅承之后，颇得徐恩曾赏识。

向本善是安徽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是老牌的CC系成员。此人深藏不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在第一组中的地位仅次于张国栋。

第二组所辖单位为原特工总部第三、第四、第五等科和密电研究室。第二组组长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四川江津人王思诚，王思诚与中统局的老干事濮孟九，都是最早进入中统的老牌特务。

在中统局的历史上，第二组曾经“功勋卓著”。

原特工总部第三科主管研究共产党的理论和策略，并针对共产党的策略进行分析总结，编辑成专报供国民党内部参考。第三科的科长最初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先大启，后来中统局干事刘光煜和王惟理都担任过三科科长。

在国民党内部，曾经非常著名的以汇总共党情报为主的《党务调查周报》，就是由中统二组三科的特务陈文昭负责编辑的。“精神”类丛书《奋斗丛书》是由王惟理与李素心负责编辑。最为重要的国民党内部资料，直接抄送报给蒋介石的《政治通报》和《调查专报》，也是由中统

二组三科的大特务刘光煜负责编辑的。

第四科主管筹划针对共产党的调查破坏计划，并编辑《每日党派情报》给国民党高层以做参考，该科科长是黄九诚。这个科室的具体工作是指导东北、华北、华南、西南、西北以及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等特务活动，并且派遣专门特务对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和渗透。

第五科负责侦察共产党的各项行动，并根据国民党内部指令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干预和破坏。

密电研究室任务最为艰巨，负责侦听和研译共产党的密电。第五科科长最初是陈庆斋，后来胡大海接替陈庆斋担任科长。

第三组辖原特工总部第六、第七、第八等科，其中第六科负责“党员调查网”的筹建与管理；第七科负责党政经济调查；第八科则负责“民意调查”。

第三组负责编印《每日敌伪情报》、《每日党派情报》、《每日党政情报》，每日分别派送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的头目，比如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朱家骅、吴铁城、何应钦等作为参考，并抄送相关某党政机关。如遇重大情报，还可直接上报蒋介石，供其核批。

第三组组长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高春。高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留学意大利，接受过法西斯特务培训。高春之后，由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生谢永存接任第三组组长。谢永存负责特务训练、外围组织工作和经济调查，权力极大。后来，第三组的经济科扩充为特种经济调查处，首任处长是陈立夫的亲信陈介生，第二任处长是留学英国的李超英。

中统局的三处为：交通管理处、统计处、特种经济调查处。

交通管理处管辖电讯、运输、总务三个科和电讯总台。该处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经费由秘书处直接拨款，直到抗战时期，才交由中统局管理。该处处长一直由徐恩曾兼任，全处大约有360人。其中电讯科科长是徐恩曾的老同学、电讯专家范本中和徐恩曾的亲信吴世昌。该处在重庆本地设有总台，在全国其他地区设有大大小小120个电台。该处的运输科其实就是该处下属的物流公司，后来被徐恩曾据为己有，主要用来运输走私物资。

统计处主要负责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此处成立已久，处长是郑尧泮，后来此人开办统计人员训练班，主要任务是扩大档案工作，与特种经济调查处相呼应，调查研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人物，并将其重要人物的资料制成类似今天“三国杀”之类的名片，供国民党高参参考。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反共资料，比如《中共组织系统图》、《中共党员发展统计》和《中共活动大事年表》，都出自该处之手。

特种经济调查处成立于1940年，前身是中统局第三组的经济科，该处成立后，首任处长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前工作干部训练团团长陈介生。该处的全部经费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负担，不依靠中统局，因此该处人事安排完全由陈介生提出名单，再由中统局加以委任。该处的表面任务是获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实际是获取敌后解放区

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战区的活动情报，这些情报经中统局加盖信印后分别送交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由于经济独立，加之有CC系代表人物朱家骅撑腰，所以处长陈介生不受徐恩曾管制，故陈介生与徐恩曾素有恩怨。1941年，徐借口陈不服从命令，将其扣押，随后，徐恩曾与朱家骅协商后，委任李超英继任处长。

中统局的五室，分别是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

秘书室主要负责整理中统局内的各种档案文件，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

人事室归局长室所管辖，主要责任是中统局内的人事任免权。人事室后改名人事处，孙翼谋、章祖模、杨为等人先后担任该处处长。

专员室由徐恩曾一手掌管。这个专员室里的专员“虚虚实实”，不仅人员流动、变化大，而且专员室内的“专员”职位弹性大，人数也没有特定限制，不过通常都在30人左右。另设次专员室，次专员室就是“超级特务”的集中营。

机要室主要负责中统内各机要文件的整理和归纳，李宏基、袁木芬先后担任该办公室主任。

会计室，主任李光灼，下设出纳、审核职位等。会计室后升级为会计处，负责经营联益储蓄银行、湖南沅陵金矿和联益农场等。

此外，中统还有四个委员会，即训练委员会，主要负责加强中统人员的政治训练和技术训练；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后来，中统局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重庆实验区”，该“区”设在重庆市神仙洞的“德园”里。这个实验区，其实是徐恩曾在重庆搞的一块“试验田”，主要目的是“示范”。在这个试验区内，徐恩曾采取了大量新颖的特务方式，用来对抗日战线上的共产党，不断进行情报搜集和破坏等活动，并将这些新颖的特务方式作为“新式武器”加以推广。“重庆试验区”的区长先后由青帮头子陈庆斋、陈建中、周光亚等人担任，本部还下设总务、组训、情报和行动四个科，领导城区、沙磁、新市区、江北、南岸、巴县、北碚、南泉等八个分区以及青木关工作站。实验区根据徐恩曾的指示，一直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办事处进行秘密监视，每天向徐恩曾汇报。

除上述组织机构外，徐恩曾还亲自主持一个名叫“生庐”的机构。“生庐”由少数曾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的中统高级特务组成，专门负责秘密阴谋破坏和特务技术研究。

中统局本部内，还有“积极检查队”、“粮食调查队”等小组织，这些小组织的人数均在100人以上。

中统局成立之后，比原来的“调查科”和“特工总部”有了实质性的扩展，起初那个唯唯诺诺的徐科长也堂堂正正地当上了“局长”。

中统局的人员众多，细胞不断分裂繁殖，最终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有秩序的特务情报组织。中统局人事科科长孙翼谋曾这样说：“1941年的时候，中统局大概有13000名正式的调查人员。”拥有这么多成员，恐怕是陈立夫和徐恩曾最初都未曾想到的。后期的中统局，与起初只有几十人的党务调查科不能同日而语。据统计：当时中统局的本部有488

人，实验区有137人，各省市有9655人，各部单位有2000人，民众团体有300人，外围骨干有690人，共计13270人。直到1945年叶秀峰取代徐恩曾，中统局的在编特务也有13270余名。

5.中统局的人事制度

为了组建一个庞大的中统局，徐恩曾实施了以下五种“招聘”制度。

第一种，开办训练班，如綦江训练班、米亭子情报人员训练班、葫庐电讯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统计工作人员训练班等，通过这样的培训班，从国民党内部吸收骨干加入中统局。

第二种，公开招收，如外层粮食调查队的人员，就是借用粮食部的名义公开招考的，在该队的工作结束后，从其中挑选一部分，调入中统局工作。

第三种，国民党内部特务，在受到军统排挤后，到中统局任职。

第四种，原中统外围分子，提升为“调工”，吸收到中统局本部担任特务。

第五种，由中统其他部门官员或者中统特务私人介绍加入中统局。

数以万计的特务进入中统局之后，根据各自的特点又划分为五大类，这五大类包括调工、党员调查网、通讯员、外围分子和特情。

一、调工

所谓“调工”，就是调查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总部”时期的特工。凡是在“调工”人员登记表上登记并填报誓词，并交纳4张2寸免冠照片、写过自我介绍的，均可以称之为“调工”。可以说，“调工”是有名有姓有“身份”的工作人员。当然调工也分三类：专任专职、兼职、义务，这种划分方式基本按照现行的企事业公司的用人制度进行划分。

专任调工指现任的职业特务，这种特务也就是所谓的全职特务，所有的薪水由中统局支付。

兼任调工，后来大多转任财政、司法、党务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特务活动与专任调工而言相对较少，属于兼差。他们除了一份兼职薪水和车马费、劳务补贴等，还有另外一份主业。

义务调工，这种是纯粹义务贡献型的特务，而且不收分文薪水。此类调工多数抱有个人目的，从而倚靠中统局，比如靠出卖情报赚钱或者利用特务掩护从事一些非法勾当。

以上三种“调工”均要在“调工人员登记表”上填写个人简历和誓词，以作备案，凡是日后做了违反规定或者誓词的事情，均会遭到严厉惩罚。

二、党员调查网

党员调查网是由暗藏在国民党党政机关的中统特务组成的，中统局对这些“渗透细胞”非常重视，由徐恩曾直接调配。党员调查网一般分布在各省机关以及党政单位中，由所在地的“特务室”掌控、调用。党员调查网的发展方式类似于现在的“传销”，比如发展一个人，可以得到相应的人头费。后来，党员调查网越来越大，据相关资料统计，有10万人之巨，俨然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徐恩曾野心十足，为了在各地发展“渗

透细胞”，规定各省“特务室”每年至少发展500个“细胞”，以扩大党员调查网。

三、通讯员

通讯员分学生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两种。学生通讯员通常指的是在校学生，此类通讯员由中统局第二组第四科主管，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讲习会”，对这一类学生通讯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培训。特约通讯员则是最普通的基层通讯人员，这一类通讯员一般由省室第三科领导，人员广泛、数量极大，在全国有10万余人。

四、外围分子

外围分子指中统局的外围组织人员，比如有“三民主义革命青年社”和“学生生活社”等，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员统称为外围分子。

五、特情

所谓特情，是“特殊情报工作人员”的简称。这一类人通常暗藏在革命团体以及进步团体中，是特务中最机密的一类，一般由徐恩曾等人直接调配。这一类分子通常采用“隐身术”，打扮成“进步人士”，混入进步团体。比较出名的代表人物有后来担任中统特务处副处长的黄九成、王惟礼等。特情的工作方法，一般分为“打入”和“拉出”两种。所谓“打入”，就是潜伏在进步组织里面，破坏进步组织；所谓“拉出”，就是对某革命团体或者进步团体中的人员进行有目的的绑架、暗杀以及策反等工作，将其成员拉至中统特务阵营。

中统组织的人事管理制度与众不同，作为一个特务机关，首先，它依照的是军事编制，徐恩曾是中将组长，而其下属也是校、尉等军衔。但搬到重庆之后，中统局既不属于文机关，也不属于武机关，属于国民党的党务机关。但中统的工作人员却享受不到党务机关的待遇，每人每月仅有110元钱的生活费。蒋介石拨发的机密费，主要用于搞破坏活动；中央秘书处拨发的经费，主要用于支付中统特务的薪水；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等拨发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组织专项活动。中统局人员众多，又没有多少实业支撑，主要经济来源是政府拨款，所以中统局人员收入很低。

6.精心培训中统特务

徐恩曾对中统的打造，不仅仅是简单地扩大规模，更不是一个重量不重质，在对特务的培训方面，徐恩曾有自己独到的一套方法。

特工总部刚刚成立之时，徐恩曾曾经建立特务培训班对特务进行培训，主抓特务培训工作的有共产党叛变过来的大特务顾顺章、中统骨干分子王杰夫等人。中统局搬至重庆后，徐恩曾发觉，在隐蔽战线上，两党之间的较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所以培养年轻有为的特务的任务刻不容缓。徐恩曾在中统工作中，单独列出一系列培训计划，用心培训特务。主抓特务培训的是第三组，第三组按照徐恩曾的部署，定期组织特务上课，组织学习的内容大致有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徐恩曾采取了洗脑的训练策略。

徐恩曾用蒋介石的统治思想来改造特务们的政治思想，力求让所有

的特务都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认为，信仰是坚不可摧的武器，可以武装一个人，改造一个人。徐恩曾本人并没有多么坚定的信仰，但是他相信信仰的力量，相信要改造一个人，必须先改造他的信仰。而且，通过特务工作，徐恩曾还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想要在隐蔽的战线上取得成绩是绝不可能的。

徐恩曾开办了一个所谓的“读书会”，让特务们多读书、多看书，多了解国民党的历史，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来武装自己的灵魂。读书会所选用的教材，是徐恩曾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一些著作，也包括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和周佛海（原共产党创始人，后叛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以及陈立夫的《唯生论》。在这些书中，既有对人颇有教益的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也有意志不坚定、最后投奔汪伪政府的周佛海之流的误导之作。此外，徐恩曾还刊印了蒋介石语录，让特务们学习背诵，用委员长的言论武装他们。

与此同时，徐恩曾还筹办了一本名为《群力》的刊物，这本刊物强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着重加深特务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国民党的崇拜，从根本上教化特务，排斥共产党。

后来，徐恩曾还在特务中组织成立了“互助小组”。所谓互助小组，就是几个人为一组，建立“小课桌”，相互督促学习政治理论。

但是徐恩曾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多数特务的文化水平不高，他在一群“大字不识几个”的特务中组织学习沙龙，还希望他们读懂高深的理论书籍，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互助小组”成立不久后，便慢慢自动解散了。特务们怨声载道：饭都吃不饱，还学这些枯燥乏味、不知所云的理论！

徐恩曾还通过技术训练来武装手下的特务们。

早在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就委派大特务顾顺章开办了以传授特务技术为主的学习班，教授盯梢、易容、暗杀等特务技术，确确实实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特务。徐恩曾深知，要做好一项工作，必须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特务技术就是从事特务行业所必备的专业技术。为了培养高级特务，徐恩曾还安排人专门编辑了一本名叫《情报业务概要》的书。这本书50多万字，涵盖特务理论、法西斯统治言论、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摄影术和跟踪术等等。后来，徐恩曾还分科教授特务们专业技术，分门别类地印刷了许多专业性书籍，比如化装专册、跟踪专册、射击专册等，甚至还有帮会专册和特务内幕等专册，这些专册类似今天大学生们的必修课本和选修课本，有的是必须学习的，有的则是参考用书。至于教学方式，徐恩曾也倡导传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以自学为主。不过在南京沦陷期间，特务技术的授课一度停止，后来中统局转至重庆，学习班又重新开办起来。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当时比较有名的特务训练班。

一、华侨特务训练班

1937年南京沦陷后，蒋介石途经武汉，在武昌珞珈山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个团，据说当时有超过部队一个团的人数编制，简称“战干团”，教育长是黄埔出身的桂永清。桂永清曾经组建过一个名叫“三民主义研究社”的社团，后来与军统贺衷寒等人组织了复兴社，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桂永清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德国海军元帅

卡尔邓尼茨，另一位则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战将山本五十六，这两个人都是纯粹的纳粹分子，由此可见作为教育长的桂永清的教育倾向。

“战干团”成立之初，名气很大，因为从“战干团”毕业的学员，统统享受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毕业学员的待遇。后来“战干团”随中统局等一同迁到重庆，继续培养所谓的军事人才！当时加入“战干团”的青年，多数以海外回国的华侨为主，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和越南等地的青年人居多。随着“战干团”里华侨人数的增多以及“战干团”名气的增大，“战干团”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统局的一把手徐恩曾。徐恩曾打起了“战干团”的主意，他找到桂永清寻求合作。

那一天，徐恩曾邀桂永清到重庆一家老字号的茶楼喝茶，他东扯葫芦西扯瓢，采取迂回战术：“听说老弟来到重庆，我欣喜万分，终于又可以常与老弟举杯畅饮、把酒言欢了。只可惜当下正值战乱，喝酒误事，所以今日以茶代酒，请老弟一聚，尊请老弟谅解。”

“哪里哪里，徐兄客气了，徐兄有话敬请直言。”桂永清为人也算大方敞亮，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得知‘战干团’在委员长和老弟的管理下，越来越好，我着实羡慕不已！现在到处都缺人才，我中统局也是如此。如果能与老弟合作，实乃我徐恩曾之大幸也！”徐恩曾终于点破了话题。

桂永清倒没觉得徐恩曾的合作意愿有什么不妥，中统局向“战干团”伸出橄榄枝，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他举杯微笑说：“承蒙徐兄抬举，桂某愿与徐兄精诚合作。”

徐恩曾见合作有望，便继续刺探：“据说老弟的学校里都是华侨？”

“是啊，都是一些爱国志士，得知祖国四面受敌，回国抗战来了！都是热血青年啊，国家正需要这样的人。”桂永清感慨道。

“他们不仅爱国，而且还懂外语，这一点国内青年无法匹敌！如果好好驾驭，他们肯定能够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老弟，我有一个想法，不知老弟可否愿意？”

“什么想法，徐兄请讲。”

“我想从老弟的‘战干团’中借调一名英才，到中统来授课，如若可能，再借调一些精英充实到中统局来工作！”徐恩曾随即感叹，“现在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各个单位都缺少人手，委员长也非常重视隐蔽战线的工作，希望老弟能够多多支持！”徐恩曾把委员长都抬了出来，这事情还有不行的道理？桂永清痛快地答应了徐恩曾的“借人”请求，喝完茶便回去安排了。

桂永清先派了一名叫罗剑雄的新加坡华侨到中统局做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后不久，便根据中统局的情况，向桂永清提交了中统借调需求报告，桂永清从“战干团”的花名册里选了三十余人，将他们派往了中统局。徐恩曾非常高兴，迅速着手对这三十余位海外华侨进行特务培训。徐恩曾沿用了中统局的管理制度，对这些归国华侨，在起居饮食、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采用军事化管理，训练时间为半年，训练内容为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授课老师均为徐恩曾手下的高级特务。经过半年的培训后，这些华侨掌握了丰富而精湛的特务技术，绝大部分都走上了中统特务的岗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泰国华侨方博之，印尼华侨古秉文、陈锦江、卜哑夫，马来西亚华侨张介夫以及新加坡华侨刁林等。

这些“华侨特务”，由于懂外语，见识广，社会关系广泛，正式上岗后，有效地推动了中统局的特务工作。

二、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

何为三青团？三青团是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全称叫“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的决议。三青团团员人人信奉“三民主义”，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宣扬对蒋介石的忠诚。三青团最初由复兴社分子把持，后来成为特务组织。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国民党接二连三地败退，许多地区陷入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中，沦陷区的许多热血青年不愿沦为亡国奴，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国土沦陷，便积极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然而这些青年绝大多数身无分文、生活困顿，徐恩曾便将这些人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利用他们的救国热情，积极拉拢他们。徐恩曾授意三青团，创办了一个青年招待所，专门收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或者苦闷惆怅、力主抗日的青年男

女。这个青年招待所，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热血青年们提供免费的住处和食物，而且还提供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包分配”、“包安置”。这么好的事，让这些流离失所的爱国青年深受感动，于是不知不觉就上了徐恩曾的贼船。后来，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还派了一些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到青年招待所担任教员，对青年招待所收容的青年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最终被中统军事训练委员会收编。中统军事训练委员会将这些青年平均分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分配30个名额，挑选表现优秀、聪明敏捷的青年到中统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特务培训，培训完毕后，这批毕业生就正式转为中统局的新特务。

这些毕业生进入中统局后，还要通过严格的筛选，才能正式进入徐恩曾对内开办的“特务技术培训班”——这才是最关键的内部培训！只有那些天赋极好的年轻人，才能进入这个训练班。而甄别、检验“人才”的过程也极其复杂，除了体检之外，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只有那些心理素质过硬、聪慧过人、身体素质过硬的年轻人，才能最终进入“特务技术培训班”学习。

徐恩曾采用的这种甄别选才的方式，与过去CC派系的选才方式非常相似，他沿袭了陈立夫“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能滥”的原则。徐恩曾曾经对特务技术培训班的入班考官说：“一个孙猴子顶一百个猪八戒！”与CC不同的是，在“培养特务”方面用心良苦的徐恩曾，所采用的选才方式更加新颖，更加独特。

中统研究室主任杨为，曾把徐恩曾传授的选才方式作了详细的归纳，大体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挖根移植法。这个方法最方便最实用，就是把别人培养好的人才，想方设法挖过来，被挖的对象常常是拥有特务专长的“成品”。徐恩曾把这样的人才挖过来之后，将其移植到“中统”的土壤里，然后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让其为中统服务。

第二种，鸭卵鸡孵法。徐恩曾发明的“鸭卵鸡孵法”相当绝妙，比“挖根移植法”更上一层楼！徐恩曾授意老特务打入学校内部，然后在学校内部传播三民主义，拉拢爱国学生，直接替中统局孵化新生力量。这些“鸭蛋”一旦被孵化出壳，就能立刻加入到中统队伍中来。中统局后期的大多数少壮派知识分子，就是靠“鸭卵鸡孵”的方法拉拢来的。

第三种，换骨夺胎。徐恩曾的一招比一招狠，所谓“换骨夺胎”，就是利用已有的公开团体，“用其意而不抄其词，取其实而不究其本”，以利诱等手段控制该团体的主要领导人，然后对其加以改造，使这个团体最终为中统局服务。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等金融机构，甚至在邮电税务等部门以及文化传媒单位中，均有中统局培养的内线，这些内线采用多种手段控制胁迫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使这些单位为中统局所用。

后期的三青团，与军统、中统勾结在一起，设立青年劳动营，专门关押迫害进步青年。1947年9月，经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三青团正式并入国民党。

三、中央青年干部培训班

中央青年干部培训班是中统局打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旗号创办的，简称中央青干班。这个班是中统局在重庆开办的所有培训班中

最为著名的一个，也是中统局的各个培训班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该班的班主任是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副主任是徐恩曾，教官全部由中统局的老牌特务担任。与三青团青年训练班及海外特务训练班相比，中央青干班才是中统局名副其实的“亲儿子”！

中统局之所以成立中央青干班，就是为了响应蒋介石“排斥异党，防止异党活动”的号召。当时蒋介石这样说：“自抗战以来，党国部队有越战越勇的迹象，甚至连日本人都害怕了。但是在解放区内，共党的活动却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华北！”所以蒋介石打算派一些人去华北工作。蒋介石对派出华北的工作人员要求极高，首先要有信仰，其次要有一定的特务侦察能力，再次要有能力消灭共党分子。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找？蒋介石想到了中统局，想到了徐恩曾，他筛选了一些拔尖儿的国民党年轻军官送到了中统局，要求徐恩曾着力培养，中央青干班也就应运而生。

中央青干班的训练目的是：“采用组训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充实独立作战能力，以达到满足培育领导工作者的要求。”根据其训练目的，徐恩曾确立了中央青干班的训练课程，课程内容如下：

军事训练课程：要求破旧立新，采用综合化军事教学，强调军事的组织工作、侦察工作、指挥工作、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和游击战术等等。担任综合军事教程的教官是大特务何畏。

党派学习课程：主要讲述除国民党外的各个党派的历史和概况，当然这里的党外党派主要指共产党。担任党派课程的教官是大特务吴若萍。

反共理论课程：反共理论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中统第二组和中统研究室联合编写的“三民主义讲义”，这本书是一本宽泛且深入的反共理论书，它将“共产党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思想”正式列入课程，并将其一一与蒋介石的言论进行对照，从而使学员们“以情报业务为体，以共产党的理论为己用”。担任反共理论课程的教官是中统局秘书万大宏。

敌后经济调查课程：经济调查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科目内容，其实质教授内容是破坏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采取套购商品、吸收金银、贩卖毒品、印制假钞、散布谣言、刺激物价等方法，封锁解放区的物资，割断共产党的资金链条。担任该课程的教官是时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的李超英。

宣传工作课程：所谓宣传工作，就是口诛笔伐，利用各种舆论技巧，诋毁共产党的文化特务工作。这一工作与陈立夫创建党务调查科时，所提倡的“宣传”工作是一脉相传的。关于这项工作，陈立夫还曾经写过一篇“宣传工作刍议”，这个“刍议”就是中央青干班宣传工作课程的主要精髓。

陈立夫在“刍议”中传授了宣传工作的诀窍：

1.自吹自捧、正面骂人，有时恰好是帮助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一定会处处不吉，事事不宜。

2.要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给民众看，不必做大文章，也

不要多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万不可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的新闻笔法。

3.把自己装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要多研究心理学，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

4.如果程度不够，或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否则会弄巧成拙。

5.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或是在国民党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个人吃亏，组织也要遭受损害。

6.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时才可免忙乱。

7.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感觉到美，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8.宣传品不可滥发，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再求开花结果。即使是县以下油印的“民报”，都不可放松。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子打进去，即使是投稿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这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另起炉灶有时候会自找麻烦。

宣传工作课程最初由曾经中国旅欧支部书记的叶青（后叛变革命）讲授，后来改由万大宏讲授。

《政治学概论》课程：以教授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为基础，用“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和中国历史技术”分析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关系问题，并设有“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的科目。这项课程重点在于灌输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政治技术。讲授的提纲主要包括政治哲学的历史根源、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关系、政权问题、政治技术与群众心理、先秦政治思想选介、人体生物性的体察与政治运用、社会势力的诱导和运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与唯物主义、议会政治与布尔什维克的比较研究、三民主义的政治效用等。这门课程由大特务刘恭任教。

除讲授这些课程外，还有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的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青干班结业之际，徐恩曾以班主任的身份亲自授话，讲话的题目就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讲话中，对青干班的学员正式下达具体指示，告诉大家结业后的去向，即派往华北进行限共、反共工作，也告知大家要坚决服从中统局的直接领导，并详尽地为大家介绍了华北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青干班结业的第二天，徐恩曾为了巩固“战果”，邀请青干班的所有教员开了一个业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一些教员谈到了青干班学员的思想状况，有几位教员竟然同时反映：“当学员们得知自己被派到非委员长的管区工作后，大都心存芥蒂。”徐恩曾听后，大为感慨：“搞了那么久的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都训练成了情报专家，还坐在后方干啥？我们忽视了对大家的精神教育，这样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的，

完全靠纪律也是办不好事情的。在学员们奔赴工作岗位之前，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在结业后、分派前的几天里，天天都有中统局的高级特务来青干班，为学员们作“精神讲话”，为他们“打气”。连陈立夫都来了，他以亲切的态度，以“自家人”的腔调劝诫青干班的毕业生们：“我同你们讲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单位遇到了困难，吃了苦头，可能会得不到半点的支持和温暖，但在我们中统局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如此一来，陈立夫与徐恩曾在青干班里“夫妻”般一唱一和，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折腾了好一阵子，许多年轻人都为之动容。后来，这些学员一部分留在了中统局做特务，另一部分调至河北（当时称为中共苏区）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工作。不过事实上，到河北的那些毕业生，处境艰难，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非常糟糕。但是蒋介石对青干班的工作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陈立夫和徐恩曾。

7.制造“南委事件”

培训青干班受到嘉奖之后，徐恩曾自满起来，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开始大举“反共”。他提出一个“以组织对组织”的“救党救国大计”，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反共”。

积极方式如下：

1.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各界民众均加入一种团体。

2.这类团体限期半年成立，已成立而组织涣散的应切实整顿。

3.团体均应派进国民党人发挥领导作用。

4.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国民党人应进行撤换。

5.失学失业青年均应送战地服务团。

6.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机构均应派遣国民党人士进去工作。

7.各级地方党部均应大量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

8.地方政府应大量使用国民党党员担任保甲长职务。

9.建立保甲（旧社会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通讯网与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消极方式如下：

1.对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

2.对于未经批准的中共武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

3.对各种救亡社团，未经批准的一律取缔，已批准的要进行严格考查和限制，发现有异党分子渗入的要进行清理整顿。

4.各机关负责人监督考查不力要负渎职之责，禁止进行阶级斗争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5.不许中共办报刊杂志、书店和印刷所，强化邮电检查活动。

6.各级党政机关应于每星期进行会商并相互交换情报。

7.各地党政军机关应通过联席会报并将情况随时分别呈报中央等。

为了“防共、反共、清共”，徐恩曾还制订了严格的制裁共产党的措施：“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下面冲突；地方务必严密，中央可宽

大；政府秘密策动，借此缓冲……”

徐恩曾的“以组织对组织”的“救党救国大计”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蒋介石看上了徐恩曾至死不渝的“反共”决心，甚至在《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中着重提到：“查共产党在沦陷区之活动几较普通区为重视、为积极，以目前情势而论，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迅速之趋势。究其原因，一半由于日伪与本党之势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该党党政军在该区域内均能协同一致切实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入无人之境，致令其组织活动日益做大。”

蒋介石还专门为中统局的特务们制定了三点工作原则：

1.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3.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打破过去一般党员对共产党之放任态度。

在蒋介石的这三点工作原则的指示下，徐恩曾像焕发了第二春，他授意手下的特务们：“要充分发挥细胞的作用，通过内力分裂共党！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暴露目标！共产党的嗅觉很灵敏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出手……”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徐恩曾的中统局以及国民党的其他部队，相继投入“重兵”进行大规模的“反共”！

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第五纵队秦启荣所部在博山县杀害八路军及护送人员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

1939年6月，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制造了“深县惨案”，杀害共产党400余人。

1939年6月，国民党又在湖南制造了“平江惨案”，杀害6名共产党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在河南制造了“确山惨案”，杀害八路军及无辜百姓共计200余人。

就在这样疯狂的反共热潮中，1940年3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决定正式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联合徐恩曾手下的特务联合反共。徐恩曾推荐了老牌特务冯琦和大特务庄祖方，到江西省担任江西特务主任和总干事。

就是这一年，国民党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为顾全大局，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共计9000多人开始北移，当他们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顾祝同部的惨烈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大部分将士被国民党杀害，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令人发指，然而却刺激了远在重庆的徐恩曾。不甘寂寞的徐恩曾竟然也酝酿了一个阴谋，他决定与熊式辉合演另一版本的“皖南事变”，彻底击垮共产党。

1940年冬天，几个特务突然闯进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的办公室，二话没说就把张绍祖抓了起来。特务们把张绍祖带进了江西特委办公室，由冯琦与庄祖方“软硬兼施”轮番进行劝降。起初张绍祖还十分坚定，后来，冯琦与庄祖方用金钱、美女和各种物质利益加以诱惑，张绍祖就动摇了，他最终投降，供出了吉安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于是，万国英在吉安的家中被特务们抓捕。

与张绍祖一样，万国英最终也在特务们的刑讯逼供下，供出了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一个是赣西南特委秘书李贡珊。紧接着，李照贤被抓，李贡珊被抓，而李照贤又在特务们的万般残害下，丧失了斗志，供出了江西省委交通部的李铁拐……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员，被中统特务的秘密逮捕。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南方工委只好派在闽西和潮梅坚持斗争多年的谢育才顶替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与谢育才一同来江西的，还有他的妻子王勖。王勖有孕在身，由于产期将至，便留在吉安待产。特务们从李铁拐的嘴里得知此情况后，就报告给徐恩曾，徐恩曾听到这个消息，禁不住得意地笑起来，他决定，从谢育才入手，将南委的主要领导各个击破。

徐恩曾让特务们以李铁拐的名义致电谢育才，声称谢育才的妻子王勖在吉安生产了，生了一个胖儿子，谢育才信以为真，开心不已。恰好谢育才刚跟南委通过电报，商定到曲江某处与南委其他主要领导人见面，商讨如何收拾江西省的残局。于是，谢育才决定取道吉安去曲江，这样就可以顺便看望自己的妻子和新生的儿子。然而，他还没有到达吉安，就遇到了埋伏在路边荒林中的特务们，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抓到了新上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和与他同行的省委社会部部长骆奇勋。



谢育才的被捕，让徐恩曾兴奋不已，他下令特务们一定要对谢育才

严刑拷问，问出江西南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藏身之地。然而，谢育才坚贞不渝，死不开口，特务们只好把希望转向省委社会部部长骆奇勋。骆奇勋意志不坚定，经不住特务们的威逼利诱，最终供出谢育才“准备去曲江向南委其他重要领导人汇报”这一重要机密，特务们迅速前往曲江，逮捕了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民风夫妇，并在回到曲江后，抓捕了谢育才的妻子王勖。

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被中统特务抓捕，这令大特务冯琦得意不已。他打电话给徐恩曾邀功，徐恩曾接到冯琦打来的电话，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徐恩曾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喜悦，要求电话那头的冯琦乘胜追击，进一步加大对南委的打击力度。

冯琦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说道：“局长，狡猾的共党恐怕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反攻了，属下无才，请局长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徐恩曾略略停顿后回答：“乘胜追击，不给共党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封锁消息，一定交代大家，严格封锁消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放长线钓大鱼！”

冯琦挂断电话后，便向下逐级传达了徐恩曾的“指示”。后来，冯琦问庄祖方，如何才能封锁住消息？庄祖方说：“干脆把所有的相关人员统统抓起来，这个办法虽然笨，但是安全！”冯琦觉得庄祖方说得在理，便致电江西各地区“特务室”成员：对于共产党员，能够逮捕的尽量逮捕，拒捕的格杀勿论！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江西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投降，林云生的投降，标志着江西省唯一的一个共产党信息联络平台被中统特务彻底占领。冯琦为此开心地喝了一顿酒，他似乎已经感到成功在即了。

按照徐恩曾的指示，冯琦即令叛徒林云生用原来的呼号、波长、密码与南委电台联系。在南委询问谢育才的近况时，以“技术故障”之名中断联系。后来，冯琦命令特务们利用江西省委电台，向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电台发报，声称由于“机器故障”，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电台一直处于联系中断的状态，请南方局电台转告南委电台，主动联络江西省委电台。同时，冯琦又指挥特务们用原来的电台波段，伺机插入间断的电波，以表示急于要求与南委恢复联系。

中共南委在收到江西省委电台的电波后，普遍认为，江西省委电台中断半年有余，现突然急于恢复联系，可能已被国民党特务监控。为了安全起见，中共南委做出三个决定：一、查清电台波段来源，并要求其详细说明中断联系的原因；二、要求江西省委将中断联系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特务们以中共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向南委发出了许多“伪电”。在电台恢复联系后，特务们根据电波，开始寻找南委的真实联络地址，企图一举消灭南委。冯琦等特务，利用电波获取了两个重要的地址：第一个是南委在曲江的一个通讯地址，第二个是“全福处”。

1941年11月，中统特务经过接近一年的“电报联络”，终于赢得了中共南方工委的信任。

徐恩曾觉得时机成熟，到了“收网”的时候了。他召开特别研究会，讨论如何收网，将南委一举歼灭。但是会议刚开始，与会人员便吵了起来。大特务王思诚和张国栋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许多工作还没有突破

性进展，待全部工作展开后再收网也不迟。而大特务谢长存、张炎茂等人却觉得“时不待我”，再不收网，后悔晚矣。徐恩曾经过权衡，建议“收网”与“深入”兼顾，让江西特委的冯琦和庄祖方相互体谅，相互帮助，明确责任，减少分歧，尽快彻底瓦解中共江西省委以及南方工委。

庄祖方接到徐恩曾的通知后，立刻策划、布置了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为了取得更深一层的突破，他命令特务们加强对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的审讯力度。不过谢育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管是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他都咬紧牙关，只字不说。庄祖方没辙了，便让叛变革命的江西省委前任代书记颜福华做谢育才的工作，然而谢育才誓死也不开口。中统特务最终将谢育才关进了监狱。

就在这个时候，特务们抓获了南方工委干部部长郭潜，郭潜是个软骨头，被捕还不到三分钟，便招供了！他先后交代了中共曲江交通站的负责人欧阳丙鹤以及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部长饶卫华等人的藏身之处。庄祖方迅速就此致电徐恩曾，徐恩曾下令：“大鱼悉数落网，收网将其打尽！”

庄祖方根据叛变的南委干部部长郭潜的交代，在粤湘边境抓捕了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的儿子、“南委”领导人之一廖承志以及南委的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重要干部。后来，庄祖方又率领特务们连夜突袭了“南委”领导人方方的家乡，幸而当地的群众和老乡拼死掩护方方，方方才及时撤出，幸免于难。

1942年7月9日，庄祖方在大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再次袭击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逮捕了工委副书记苏曼、工委妇女秘书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制造了著名的“广西七九事件”。

至此，徐恩曾一手制造的“南委事件”落下了帷幕，徐恩曾指使大特务冯琦以及庄祖方，先后逮捕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进步青年300多人，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共计逮捕2000多名共产党员，管制了2000多名农村党员。这是徐恩曾在“反共”工作中，较为重大的一次胜利。

“南委事件”也是徐恩曾上任中统局副局长以来，最为得意的一次胜利。因为“南委事件”，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重赏。而庄祖方更是“居功至伟”，蒋介石提拔庄祖方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8.魔爪伸向延安

徐恩曾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非常邪恶。他的梦想就是彻底击败共产党，然后亲手抓住中共的要人。虽然在徐恩曾“不平凡”的人生中，错过了无数次抓捕共产党人的机会，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延安。

曾经有人说徐恩曾是蒋介石肚子里的一条蛔虫，事实的确如此。自抗日战争以来，中统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换名称、搬迁，甚至还多出了一个任务：抗日锄奸！中统局在“抗日锄奸”方面功绩甚微，在抑制共产党方面却始终做得十分到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徐恩曾深知蒋介

石想要的是什么！徐恩曾曾这样说："中统局是干什么的？抗日，不！抗日有军队！中统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溶共、限共、反共、清共'！这个工作虽然看上去有点不被理解，但是特务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徐恩曾的梦想从未发生过改变，即使在全国一致对外的时候，他也在想方设法地反对共产党。虽然这看上去似乎有点违背"历史潮流"。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徐恩曾可不怕"亡"，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亡"这个字。徐恩曾所谓的顺应形势，不过是根据形势，对"反共"方案进行了调整，那就是：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徐恩曾所说的"点"，就是"重庆"，重庆是中统局的大本营，同样也是整个国民党的战略要塞。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曾带领中统局的特务们创办了"重庆试验区"，可见重庆对国民党、中统局和徐恩曾，都是无比重要的。

首任重庆试验区的区长是陈庆斋，陈庆斋在位时间并不长，而后由大特务杨为担任。杨为是跟随徐恩曾多年的老特务了，此人比较忠心，可以说是徐恩曾的忠实走狗。1935年，杨为进入当时的国民党参谋总部承办的谍报训练班，后来被国民党派遣至苏联伯力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1938年，杨为绕道新疆返回重庆，进入徐恩曾的阵营里。徐恩曾看重的是杨为的"留洋经历"，而杨为则觉得徐恩曾是一棵大树，值得依靠，而在冥冥中，"重庆试验区"似乎就是给杨为准备的特别礼物。中统成立"重庆试验区"，不仅是为了立足，而且是为了发展。在杨为担任重庆试验区区长之后，为重庆试验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崭新的建议，这些都非常对徐恩曾的胃口，这让重庆试验区成为徐恩曾在南京区和上海区之后，又一成绩显著的中统实验区。

重庆试验区在杨为的带领下，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为此，徐恩曾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陈立夫这样汇报："该区与过去的南京、上海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实验'二字。第一个实验，是人的实验。所有中统局的新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在这个试验区里实习，在这里，对这些人进行素质培养以及素质考核（主要考核政治和业务）。只有考核成功者，才可正式录用，安排工作。第二个实验，是事的实验。中统局所创造的每一种方法、技能都要在试验区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方可推广使用（唐家沱的集体生活也是其中一个）。"

"重庆试验区"在刚刚成立之时，运行还算不错。随着中统局的不断纳新和扩充，特务人员的数量激增，有时一批人马就几十上百，甚至连吃住都成了问题。最后，"重庆试验区"因为消化不良，终于沦为了名副其实的"试验品"。

重庆是"点"，各地市的特务室是"面"。徐恩曾把重庆试验区的"合格产品"成批量分配至各个特务室，让其成为特务室的骨干。中国上下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特务室逐渐形成一张网，这张网就构成了这个"面"。当然网面上的所有"点"不尽相同，有的重要，有的不那么重要。但是徐恩曾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延安！延安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是"老巢"，只要将延安搞到手，"反共"大业也就算胜利完成了。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被迫在共同抗战协议上签了大名，但是他却十分嫉恨共产党。他认为，如果不是共产党从中作梗，蒋委员长

决不会在抗战期间狼狈不堪。徐恩曾再三致电给陕西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请他充分利用机会，在延安周边大力发展特务人员，以方便特务工作的全面开展。后来，徐恩曾还与陕西党部协商，将各县党部书记长换成了清一色的中统特务。可见徐恩曾为了把魔爪伸向延安，费尽了心机！

徐恩曾认为，仅仅开展特务工作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进出延安的各重要路口设卡，想方设法截获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徐恩曾命令特务们：宁可错抓千人，决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徐恩曾对共产党人的凶狠，和汪精卫“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漏网之鱼”有近似之处。

特务们又是如何搜查盘问并确认共产党的呢？“是人就抓”是不可能的，就算抓满了监狱，也未必抓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徐恩曾特别开会教育这些特务，徐恩曾认为：“共产党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往往会随身携带与共产党有关的证件；二、凡神色有异者，可以断定此人会与之相关；三、观察行人的一举一动，凡是持外地口音者需要查实！”特务们就按照徐恩曾传授的这些方法进行盘查，有时，也会采取非常凶残的刑讯手段。

当时，有人去延安，路过盘查地点，被特务们搜到了随身携带的八路军的相关证件，就会被特务们假以各种借口扣留，或秘密跟踪，待四下无人或夜深人静之时，便将其逮捕。更为残忍的是，如果被捕人员拒不交代自己的具体身份和行动方案，不是一顿暴打，就是惨遭杀害。

从1939年至1943年期间，徐恩曾指挥中统特务在陕西的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等路口设卡，扣留并逮捕了奔赴革命根据地的男女青年2100多人，这些人不是被特务们投入监狱，就是被关进“战干团”或“西北青年劳动营”进行劳动改造，遭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除了盘查抓人之外，徐恩曾还有一招，那就是通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向中共提出，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向延安派驻县长，这样便可以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派特务常驻延安，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这一招，其实是徐恩曾利用“肤施”（肤施县，当时延安的别称，归国民党管辖）之名，钻的一个空子。后来中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要求。得知此消息后，徐恩曾兴奋异常，他单方面认为自己的“成功”已经完成了一半。于是他找来了老牌特务马濯江，让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马濯江原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后来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进入中统后，被徐恩曾推荐到国民党财政部担任税务督察。马濯江上任“肤施”县长后，迅速按照徐恩曾的计划，精挑细选了10名特务进驻延安。

后来，毛主席曾对徐恩曾的这一计谋做这样的描述：“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毛主席曾在公开场合称呼马濯江是“我们抗日的马县长”，在其他场合则诙谐地说马濯江是“白皮裹红瓤”。毛主席的“火眼金睛”其实早已看透了徐恩曾的计谋，而徐恩曾交代给马濯江的三个任务，就是窥探中共内部情报；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物色对象，发展特工。

马濯江来到延安时，正好赶上风沙天气。面对漫天黄土，他缩着脖子陷入了深思，来到共产党的腹地，会不会被迎头痛击？令他没想到的

是，他抵达延安的当天，共产党人就热情地款待了他。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招待马濯江的则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这让马濯江小人得势起来，他以为共产党人害怕他，便趾高气扬地坐在自己的县衙内，指点起江山来。然而，延安的百姓根本不买马濯江的账，加之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根本不懂行政工作，县衙门成为无事可做的空衙门，特务工作也因延安密不透风的安保工作而毫无进展。马濯江为此十分痛苦，原本想象中的美差变成了苦差。

徐恩曾不了解马濯江所面对的僵局，心机颇重的他，担心马濯江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又派了老牌特务孟真到延安，暗中考查马濯江。孟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找到了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借了个“视察员”的身份，以视察全省民政设施为名暗中考查马濯江。

孟真来到延安，先拜访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而后才与马濯江碰头。马濯江一见孟真，看到亲人一样大倒苦水，说这里的工作难以开展，想要申请调回重庆。孟真只得鼓励他不要泄气，成功就在眼前。

随即，孟真就给徐恩曾写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当行到雅安，远远望见城墙时，已是暮霭时分，炊烟四起，山谷间忽然响起了一阵雄壮的歌声。顿时长途跋涉的旅客忘却疲劳，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但所见到的共产党人，莫不朝气蓬勃，人人都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和信心，中共未来的动向实不容忽视。”孟真还在结尾加上了一句，那就是：马濯江当下已是形同虚设。

不过马濯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他派出特务四处刺探共产党的内部情报，还抓捕了几个共产党员，并且在老百姓中散布谣言，造谣共产党共产共妻。延安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自发行动起来，展开了著名的“驱马事件”。最后，马濯江夹着尾巴仓皇回到西安。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听闻此事，立即给重庆发去急电，于是国民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让徐恩曾亲自去延安，找周恩来面谈此事。

徐恩曾亲自来到延安，见到周恩来，便气势汹汹地问：“贵党既然同意政府在延安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其安全，如今马县长被人赶走，贵党竟不闻不问，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倘若政府也以牙还牙、动员民众，将贵党人员逐出重庆，不知周副部长作何感想？周副部长，兄弟今天是代表政府来向你抗议的！若日后纠纷加剧，贵党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周恩来眉头紧锁，接过话头说：“今天既然是徐副局长亲自上门，我也有几句话要说。我刚刚从外地回渝不久，有关各地情形，你是否已经听说？”

“兄弟孤陋寡闻，未曾听说。”徐恩曾佯装不知。

“就在上个月，贵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残杀八路军将士400余人。这个月，中央军突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攻占栒邑县。在陕西，中央军驻虢镇部队砸抄八路军通讯处，拘捕八路军将领眷属，徐副局长可曾知晓？”

周恩来继续质问徐恩曾：“还有新四军驻温州的几名工作人员，无缘无故被贵党第三战区逮捕，并被分别判以8年到14年徒刑，他们何罪之

有？平心而论，徐副局长以为，摩擦加剧，谁当负首要责任？”

徐恩曾无言以对，支支吾吾地解释：“这些事情，待兄弟回去核实后再议。”

周恩来继续加强攻势，接着质问徐恩曾：“当地民众之所以不欢迎马县长，恐与马县长的身份和作为有关。别人不知道，难道您徐先生还不知道吗？延安百姓最讨厌密谋不轨的特务，贵党陕西省政府本来就不该派这种人来，这样存心挑衅的官员，边区民众怎会欢迎？”

徐恩曾难以应对，在周恩来面前，他只能甘拜下风。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起身告辞。回到重庆后，无奈的他，撤了马濯江的县长职务，调他回到重庆。

9.“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事件

1943年初，美、英等国记者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准备去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考察，国民党当局不好断然拒绝，只好以各种理由搪塞延迟。

1944，国民党当局企图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掩盖中共抗日详情以及延安根据地的实况。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得此消息后，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进行采访，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勉强答应。

几天后，国民党组织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徐恩曾全权负责组团之事。徐恩曾则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借此机会搜集共党信息。于是他找来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和中统局专员杨家勇一起蓄谋策划。徐恩曾提醒杨家勇：“你去延安后，打着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的名义去见毛泽东，顺便向他提议建立中央通讯社延安分社……”

一个月之后，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立，主要成员有：

国民党党员2人，分别是参观团的领队——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领队——邓友德。

外国记者6人，分别是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缄言报》、《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斯坦因，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代表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父以及代表苏联塔斯社的记者普金科。

中国记者9人，分别是《中央日报》记者张方伯，《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渊，《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商务日报》记者金东平， 《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中央社记者徐兆镛和伪装为中央通讯社记者的中统局专员杨家勇。

另外还有4名随员。

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5人，在一名中统特务的带领下，按照徐恩曾设计好的既定路线，从重庆出发，第一站，抵达西安。

在西安度过一个又一个“良宵”后，一路东进，进入潼关。在潼关，“偶遇”国民党胡宗南部先头部队蒋纬国，然后由潼关进入山西，在晋西南，集体“采访”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恩曾如此安排，就是让记者们充分接受所谓的“反共宣传”，从而干扰记者们对中共的判断。折腾了半个多月，记者团才于6月9日抵达延安，此时，外国记者们舟车劳顿，似乎已经没有采访的心情了。

令记者团没有想到的是，6月12日当天，中共一号人物毛泽东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于是中外记者一拥而上，进行采访。毛泽东尽量翔实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将近期所发生的事情逐一陈述。此次来访的记者们都是有备而来的，特别是国外的记者，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早有耳闻，令他们吃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与热心。记者参观团被精心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旁刚刚挖好的窑洞里，就连伙食也是精心准备的。记者们看到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记者团却吃面包喝咖啡，心情都十分沉重。

在外国记者眼里，毛泽东很健谈，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次会面：“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蒋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毛则相反，他极擅长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记者团在延安一住就是一个月，他们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等等。受徐恩曾委托的杨家勇，可没有参观的心情。作为一名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翔实地掌握中共的机密。在一次文艺演出中，杨家勇终于找到机会单独接触毛泽东，他坐在了毛泽东身边，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

杨家勇眯着眼说：“毛先生，我是肖社长派来的中央社记者，他特意委托我转达对您的问候！”

“谢谢问候，请你也带我转达对他的问候！最近肖社长身体可好？”

杨家勇觉得机会已到，便趁机说：“社长身体很好，请您放心！不过此次来延安，我还带了社长的口信……”

“哦，你说！”

“社长想在延安设立一个中央社分社，以扩大国共两党之间的交流，不知您意下如何？”

杨家勇没想到，毛泽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站起身来，十分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也要事先告诉他，在延安建立分社是有很大风险的！”

“什么风险？”

毛主席大声说道：“因为我们这里没人看《中央日报》！”

周围的人都侧目朝这边张望，杨家勇也赶紧起身，尴尬万分。

外国记者们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收获非常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且

严重扭曲了的延安，终于真实地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记者们满载而归，正面报道如同雪花一般飘落到中国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外国记者眼中，延安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后来，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迈克尔沙勒回国后，这样报道：“共产党人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值得特别的关注！不幸的是，之前，国民党新闻检查系统封锁了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他们拒绝任何消息传出封锁线之外。”

杨家勇碰了一鼻子灰，迅速报告徐恩曾，徐恩曾命令他取消参观团进一步参观晋绥根据地的计划。然而，中统特务和杨家勇等人，却无法阻止中外记者的脚步。记者团没有返回重庆，而是直接去了晋绥根据地参观访问。记者们到了晋绥根据地后，不仅写了大量真实的报道，还与当地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全世界广泛铺开。其中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广泛关注；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连续发表了《红色中国之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反响出奇地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后来加入中国籍，成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也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并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事件，不仅没有让徐恩曾的阴谋得逞，反而让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徐恩曾“偷鸡不成蚀把米”！

后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一次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从而进一步撕碎了国民党的阴谋。

杨家勇回到重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之徐恩曾。他不得不在徐恩曾面前承认：共产党人平易近人，无官僚架子，从上到下都十分简朴，为了招待客人，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客人吃上最好的口粮！杨家勇的这个回忆与众多外国记者的报道是一致的。

10.亲手操刀海外间谍

徐恩曾曾经亲手操刀海外，他这样做，并不指望国外的间谍能做多少工作，而是为了“攀比”。徐恩曾的海外间谍非常“鸡肋”，甚至连他本人都觉得“弃之可惜，嚼之无味”。不过徐恩曾叱咤“中统”十多年，还是应该将他的那些“海外间谍”搬出来讲讲。这件事还应该从太平洋战争开始说起。

1941年冬天，太平洋海战爆发。英美法等国卷入二战无法脱身，这就给了野心膨胀的日本人以可乘之机。1942年，英国为了收复东南亚失地派驻重庆大使与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协商，决议让中国方面征募东南亚流亡华侨，经过专门培训后潜送至吕宋岛、马来亚、缅甸等地区进行谍报活动。由于吴铁城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对英国情况非常熟悉，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双方商议决定：英国出钱，中国出人。英国每月提供活动经费71000卢比，约合法币10000元，并提供通讯器材及少量武器。吴铁城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点头同意，并让中统局全

权负责这一事宜。

当时，军统已经布置好了海外特务网，徐恩曾看得心里痒痒，在得到蒋介石的“手谕”后非常激动，他说：“委员长还是非常公平的，既然军统把业务发展到海外了，也就应该让中统放手一搏！好处总不能让戴笠一个人占了去。”于是他急忙把中统局的侨务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并商量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首先要解决人手的问题！不过这时候会有人问：中统局不是号称全天下20万大军吗？为什么连几个人都挑不出来？其实有以下几个原因：一、驻扎海外的特务一定要有语言基础，纵观整个中统局，除徐恩曾等几个高官外，大多学问平平，绝大多数特务是文盲，根本无法胜任这一角色。二、熟悉海外环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总不能给一个外地特务随随便便画个地形图，让他搞演习吧？特务工作是隐蔽的、严肃的，不能出差池。三、与洋人打交道必须要认真、细致。虽然徐恩曾手下有一个华侨特务培训班，但是人员不多，而且都已委以重任。既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徐恩曾决定，办一个速成班，迅速培训海外特务。

几日后，在徐恩曾的安排下，一个打着“海外人员招募处”幌子的团伙儿在福建、广东一带行动起来。折腾了接近一个月，一个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海外小组才算成形。这20人被中统特务秘密送至重庆，参加侨务小组组长陈宗周开办的速成班。速成班开设了政治、特务技能等几门课程，分别由老特务陈庆斋、朱凌云、杜衡、李九林等教授。

速成班培训结束后，中统局还搞了一个欢送会。席间，徐恩曾讲话道：“同志们，你们从事的这个任务无比崇高无上光荣！希望你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贡献，克服困难，团结一致，信心十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中统局不会忘记你们的，委员长不会忘记你们的，全国也会关心你们的！好好干，争取超过军统局！”

欢送会结束后，徐恩曾对速成班的学员们进行分工，除少数几人安排至吕宋岛，其他大多数被安排去了缅甸。后来国民党在缅甸成立了一个缅甸情报区，对外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驻缅甸总支部”，区长由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推荐的李竹瞻担任。

李竹瞻在出任区长之前在缅甸仰光传授基督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牧师，曾经著有《总理基督教的信仰》一书。30年代，吴铁城出任海外部部长时出访缅甸，李竹瞻曾为吴铁城举办过盛大的迎接仪式，吴铁城深受感动。吴铁城回国之后，一直对李竹瞻念念不忘，他知道与英国人合作一事后，便想起这个基督教牧师李竹瞻，于是将其推荐给徐恩曾。

起初，徐恩曾并不欣赏李竹瞻，他私下抱怨：“我们是搞特务工作，李铁成偏偏塞给我一个传教士，简直驴头不对马嘴嘛！”牢骚归牢骚，但是徐恩曾怎敢得罪吴铁城，毕竟吴铁城是国民党元老，还是蒋介石的幕僚，他只能对李竹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徐恩曾还是有自己的打算，他不信任李竹瞻，派了自己的三位亲信去辅佐李竹瞻，一个是老牌特务陈蔚如，一个是无线电台下关总台的吴世昌，再一个是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后来还抽调李九林去担任缅甸情报区书记。

这里说一件有趣的小事，在学员们准备起身去吕宋和缅甸之前，徐恩曾又张罗了一桌酒席为他们送行。送行期间，徐恩曾还是老生常谈，不过在海吃海喝一顿之后，徐恩曾竟然把为首的几个学员喊进了自己的

办公室，找来半仙朱景熹为他们算卦。

这位朱半仙，当时也算名人，他一副仙风道骨，极具迷惑性。徐恩曾十分推崇他，说他卦象准，虽无炼丹之术，却有卜算之能。

只见这个朱半仙捋着胡须，看了老特务陈蔚如一眼，说：“陈先生鼻直口阔，天庭饱满，乃忠贞率直之士。可惜的是，你过于率直，小心祸从口出，得罪小人。请你务必注意同僚之间的口舌之争，能忍则忍！”

后来朱半仙又走到李竹瞻面前，扫了一眼，说道：“李牧师虽然与耶稣结缘，但却是一副官人相，从事商业可一路亨通……只不过你也应该注意同僚之间的口舌之争！”

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笑谈，叱咤风云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竟然如此迷信，颇为搞笑。

1943年初，李竹瞻一行二十多人，先是包了一架飞机来到昆明，抵达昆明后，陈蔚如找来云南调统室的主任查宗藩，商讨入缅之事。陈蔚如说：“入缅一事，需慎重安排。我们一行人，除区长李竹瞻外，其他均是外地人，希望能够提供一名懂缅甸语的华侨来带队。”查宗藩欣然应允。

几天后，查宗藩带着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个子来到陈蔚如的面前，这个人叫李品伟，云南保山人，此人非常熟悉云南边境以及缅甸的地形地貌，通晓缅甸语。陈蔚如见到此人后非常高兴，为此还致电徐恩曾，请求给李品伟一个名头，徐恩曾答应了陈蔚如的请求，给了李品伟一个“中央党部战时边地视察员”的官职，由他负责带领李竹瞻等二十多人进入缅甸。

1943年1月中旬，李竹瞻等二十余人兵分两路进入缅甸，其中一路从下关经滇缅公路进入缅甸滚弄；另一路则经滇越铁路进入景栋地区。

1月下旬，陈蔚如分队率先抵达下关。他们在下关找到了清雍正五年在缅甸修建的文昌宫，将文昌宫当作办公室和宿舍驻扎下来。将无线电总台设在了下关逶小井巷18号，对外通讯地址为云南下关邮政信箱48号，代号“灵光”。陈蔚如随后将缅甸敌后区分为六个分区，即仰光分区、曼德勒分区、景栋分区、腊戍分区、八莫分区、密支那分区等，每个分区各派一人负责。

陈蔚如的分支一待就是半年多，在这半年里，除了充分享受了“热带”温室气候以外，陈蔚如及其手下没有搜到有价值的信息，这也难怪，在中国人罕见，酷热难当的缅甸，能有什么情报可以供这些中统特务拿去向徐恩曾邀功？陈蔚如及其手下，天天与吸血虫、巨蟒打交道，闲下来还得修理那两台落后的手摇式发报机，实在没有什么功绩可言。最后，陈蔚如只好让李品伟找了一些无关大局的信息搪塞给徐恩曾和英国领事馆的相关人等，敷衍汇报。

而在这半年时间里，陈蔚如始终没有见到李竹瞻，无奈中，他致电徐恩曾，然而徐恩曾也迟迟没有答复。陈蔚如就在热带雨林里，煎熬了半年，如此半原始的生活状态，让他心烦意乱。

终于，在七个月后的某一天，李竹瞻在消失了半年之后，终于出现在下关的文昌宫门前。然而，令陈蔚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竹瞻虽然带来了七个黑皮箱，却没有他想要的通讯设备，全部是传教用的一些器材和《圣经》。而李竹瞻的第一句话便是：“人手一本《圣经》，每天都

要朗诵圣经，每天都要忏悔……”等了半年之久的陈蔚如气得眼睛瞪得溜圆，众人也被李竹瞻的这些举动雷得差点当场晕倒。

区长李竹瞻只顾着念经，无心管理这些特务，陈蔚如在过了半年多的半原始生活之后，也没有心情管理了。而特务们大多又都是一些年轻人，没人管理自然就会放任自由。特务们开始频频出入缅甸的妓院、赌场，不仅嫖娼、赌博，还在“金三角”染上了毒瘾。最后，陈蔚如气急败坏地找到李竹瞻，想请他出面整顿队伍，没想到李竹瞻一本正经地端着《圣经》对他说：“希望上帝饶恕你的罪恶！”陈蔚如崩溃了，他觉得李竹瞻来下关绝对是个错误，他甚至觉得自己来下关都是一个错误。

1943年10月份，心情郁闷的陈蔚如回到重庆，将文昌宫的真实情况如实汇报给徐恩曾，并表示不愿再回下关，徐恩曾无奈，派朱凌云替代陈蔚如，去下关“辅佐”李竹瞻。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传教士李竹瞻同样觉得朱凌云需要得到“上帝的宽恕”。

一段时间之后，朱凌云没有回来，李竹瞻倒回到了重庆。徐恩曾一见李竹瞻，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质问李竹瞻：“你觉得陈蔚如不好，我就换了朱凌云，现在你自己跑回来，难道朱凌云也做不了你的副手吗？”没想到，李竹瞻竟然当着徐恩曾的面大哭起来……

原来，朱凌云不像陈蔚如，他才不买李竹瞻和他的上帝的账，到了下关，就大张旗鼓地管理特务们，逼着李竹瞻放下《圣经》，开始工作。李竹瞻欲哭无泪，只得跑回了重庆。

就在“文昌宫”里乱成一团的时候，日本人却来了，他们占领了缅甸的首都仰光。英国人因此大呼不满，指责中统缅甸特务无能，最终停止了活动经费。没有了经费，这个特务机构也就无法运行了，徐恩曾只能原地解散队伍，让那些特务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然而，中统中还是有让徐恩曾为之感叹的“忠贞”特务的。陈蔚如曾经领导的分区主任，在日军占领自己的分区后，吸收当地人李生芬为侦察员，继续侦探日本人的情报。后来，李生芬和当地电台台长程志安在侦察途中被日军俘获，李生芬惨死在敌人手中，而程志安则偷偷逃走。

正是“程志安事件”，让徐恩曾重新看到了海外间谍网的希望，他将此事呈报蒋委员长，以示海外特务们的忠心。于是，英国人决定再相信国民党一次，提出第二次合作。徐恩曾听后兴奋不已，如同打鸡血一般迅速组织了一个名为“留印华籍海员工作队”的组织，进行第二次海外特务工作。

“留印华籍海员工作队”一行二十几人，同样是徐恩曾采用“速成班”的办法培训出来的。这二十几个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后，将数千名的印度华侨海员编为若干中队和小队，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海员总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又分设中队、小队，采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进行管理。

这一次，英国人不再放任中统全权组建特务队伍，他们派了英国军人前来监督中统的工作。然而“中华海员总会”的“海员”们太不争气，他们多半安逸惯了，对于海上的残酷训练极不适应。英国军人看到这些懒散的“海员”后非常生气，要求中统局招募一些懂马来语的华侨，直接交英方进行训练。徐恩曾因此热情锐减，甚至抱怨英国佬太难伺候。但是蒋委员长却答应了英国佬的要求，不得已，徐恩曾将“招募侨民”一事交

由中统局侨务委员会的主任李鸿鸣代办。

李鸿鸣得到通知后，先后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大范围张贴招募信息，折腾了半个月，终于招募到十几名马来西亚侨民。李鸿鸣将这十几个侨民交给英方，英方则将侨民送至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地进行爆炸、射击、照相、化装、游泳等技术的专项训练。训练结束后，英国人又将这些侨民送至马来西亚的丛林，从事游击活动。直到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这些侨民才被悉数送回中统局。

徐恩曾的海外计划，最终惨淡结束，这使得他不仅失信于英国人，也失信于蒋介石。不过徐恩曾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栽了跟头，但在破获日本人的情报方面，还算立下过大功，这也算是为他挽回了一点颜面！

11.破获改变历史的重要情报

前面说过了，徐恩曾在电台方面的造诣可谓炉火纯青。如果说此人一生放浪形骸、诡计多端、毫无建树，未免有些过于极端。徐恩曾在构建电台系统方面，独具专业本领。

徐恩曾自从来到“中统”后，就大力推广自己的“专业”，希望自己的“专业”能够在中统局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所以他开设电台培训班，建立指导股、编审股、译电股，专门从事情报的发布以及破译的工作。

所谓情报，就是运用一定的媒体将某种知识或事实，越过时间和空间传递给特定用户，从而解决用户的问题。情报有三个特点：知识性、传递性、效用性。徐恩曾传递、截获、破译的情报大多是军事情报，他创办电台，皆以截获、破译情报为主。他想通过截获、破译情报，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一、敌方的军事思想、战略方针和作战意图；

二、敌方的编制、装备和部署；

三、敌方重要军事人物；

四、敌方的兵要地志和军事目标；

五、敌方的训练素质和作战特点；

六、敌方的战场装备、战争保障等。

截获并破译敌方的军事情报，就可以掌握以上六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如果双方作战，其中一方掌握了以上信息，无疑就会给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曾经有军事专家这样说：“谁能在战前掌握敌情，谁就有取胜的把握！”徐恩曾就特别重视截获、破译敌人军事情报的工作。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全面开始。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人走上了抗战前线，所以能否破获日本军事情报，则成了能否获胜的关键。此时，徐恩曾的中统局和他的情报小组便成了大家关注的目标。

徐恩曾虽然是情报专家，但手下有此技能的特务却少之又少，很多特务虽然经过此类专项培训，但是技艺不精，难担重任。眼看国民党军队被日本人打得接连后退，而敌方军情又难以截获，徐恩曾非常焦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向徐恩曾推荐了一个译电专家，这个人曾经在阎锡山的电务处从事过密电研究工作，后来还曾担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这个人就是李直锋。他其实是中共地下党

员，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曾译出蒋方的许多密电送往延安，这一次，是奉周恩来之命，打入中统局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

也就在此时，蒋介石因为担心阎锡山投靠日本人，下令徐恩曾加强对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的电报的侦察和破译工作。

于是徐恩曾迅速成立密电研究室，任命李直锋为主任，武子明为副主任。后来李直锋又招收了日本留学生池步洲等人，专门负责侦察、破获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军事情报。

在这里，不得不花些笔墨写写池步洲这个年轻人。正是因为他，最终改变了历史。

池步洲，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1937年7月25日回国后，经由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校友陈固亭推荐进入中统局。

当时，陈固亭找到池步洲，对他说：“蒋委员长说，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谁就是前方几十万大军的福音。”池步洲心系国家，听陈固亭这么一说，热血沸腾，二话没说就踏进了中央调查统计局，被徐恩曾编入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侦收日军密电码。当时，池步洲是中统局内唯一的一名留日学生。

破译日本人密码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那个年代，传讯手段无非就是电话、电报、广播和无线电四种。当时，无线电波的波段也只有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四种。当时，长波专为海上轮船使用，主要作用是导航、求救；中波则用于地方电台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短波的波段宽传播距离较远，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短波是国际上无线电通讯的主要方式，但是利用此波段发送军事情报的军事组织有上千家，从这么多的“短波”中筛选出日本人的情报，犹如海底捞针，工作任务异常艰巨。而大多数情报员由于经验不足，在“大海捞针”的筛选工作中迷失了方向，一连几个月都在做无用功。

1938年，前线吃紧，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致电军统和中统，要求加强破译日本军事情报的工作，还特别指派军委会机要主任毛庆祥负责领导密电研究工作。除了毛庆祥外，直接参与领导的还有徐恩曾、李直锋，军统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以及交通部的霍实子、温毓庆等人。毛庆祥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的组织，他自己担任组长，由副组长霍实子和李直锋负责破译军事情报的具体技术问题，徐恩曾担任技术顾问。为了配合密电组，徐恩曾还将李直锋、池步洲等人拨给毛庆祥管理，而自己则挑选了得力干将陈方彬、武子明等人，协同进行密电破译工作。

1938年年底，中统局从南京迁至重庆，徐恩曾迫于多方压力，重新构建了“密电研究室”。而受徐恩曾的影响，军统头子戴笠和毛庆祥等人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密电研究室”。一时间，三个密电研究室的成立成三足鼎立之势，展开了密电破译的竞争。

徐恩曾不愧是留美硕士，他发现日本人使用的电码与普通传递军情用的电码不同，想要破译这个新式电码，必须要从三个方面下手：

一、研究，也就是从密电码中找出破译规律；

二、研译，找出破译规律后，将电文翻译成日文；

三、翻译，将日文情报翻译成中文情报。

后来，中统局的密电研究室截获了大量的日本军事情报，出人意料

的是，日本人传递的这些密电中中文和日文都较少，多数是英文、数字甚至是阿拉伯文。后来经过徐恩曾等人认真揣摩，终于发现，那些英文字母并非英文情报，而是日本人将英文字母打乱后重新编排的日语电密码。徐恩曾这才长出一口气，嘱咐“密电研究室”的成员们按照这种规则，加紧破译日军情报。

与此同时，戴笠和毛庆祥这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国民党在破译情报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后来，重庆方面为了加快“侦破”速度，派人去延安与共产党交涉。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将自己截获的日电密码交给了李直锋，由李直锋带回重庆，进行破译。终于，在多方的参与和配合下，破译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重大的两项破译工作是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和破获日本轰炸英军太平洋主力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的密电。

破获“珍珠港事件”，还要从1940年8月1日说起。

这一天，美国正式宣布对日禁运，并且冻结日本在美银行的存款。日本因此狗急跳墙，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亚”的决策，以“抢夺石油资源”来报复美国。后来日本人发现，要想打开“石油通道”，必须搬掉“美国太平洋舰队”这块顽石。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外务省频频给西南太平洋各国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电码（指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因为通常都以LA开头，所以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与此同时，还颁布了许多“隐语”，比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等等，并规定这些“隐语”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收听。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41年5月之后，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也掺杂其中，这一点变化被国民党的“密电研究室”成员池步洲捕获，因此，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

后来，池步洲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详问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之后，池步洲再接再厉，于1941年12月3日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这份密电这样写道：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池步洲破获珍珠港密码

偷袭珍珠港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大胆推测：

一、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

二、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

得知日本人要对美国珍珠港下手，徐恩曾坐不住了。他立刻致电毛庆祥和戴笠，一起磋商如何应对。为了邀功，徐恩曾还将破获“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一事迅速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十分高兴。他马上吩咐徐恩曾，致电给美国盟友总统罗斯福，徐恩曾即刻将电报发给了盟方。没想到，罗斯福质疑中统电报的“真实性”，竟然没当回事。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的第一波战机，总共183架战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气势汹汹地直奔美国珍珠港而来。7时53分，第一波战机突袭成功，剩余的168架战机，又发动了第二波猛攻。

惊慌失措的美国人乱成一锅粥，有的逃命，有的则仓促应战。

最终，美国4艘战列舰被击沉，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而日本却只损失了29架战机、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潜艇。

“珍珠港事件”，成为美国在二战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失利。

“珍珠港事件”本应引起欧美国家的重视，但是英国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对此事却不怎么在意，甚至称之为日本人的小伎俩。

后来，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指挥下，“无敌”号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开赴远东。

12月2日，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普斯率“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浩浩荡荡驶抵英军在远东的大本营——新加坡，开始向日本人挑衅。

威尔士亲王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列舰之一，该舰1937年动工建造，1939年下水，1940年开始服役，满载排水量43780吨，舰长230米，活脱脱一艘超级巨轮。威尔士亲王号舰体分为23个主水密隔舱，享有“永不沉没的战舰”的美誉；舰上安装有威力巨大的火炮100多门，每分钟发射炮弹万余发，特别是10门360毫米口径的巨炮，威力极大。威尔士亲王号的动力在1万马力以上，舰体厚实坚固。

威尔士亲王号虽然服役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了一连串的光辉业绩。最值得一提的是此舰参加了围歼法西斯德国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并且为击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战舰，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舰艇，被日本人觊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日本人信奉的观念是：得不到它，就毁灭它！于是日本人开始酝酿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击沉威尔士亲王号！

1941年12月，美国的破译密码中心“黑室”向中国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开始加速争取太平洋海上战事，希望国民党配合侦破日本军情部署。应美国人的请求，徐恩曾、戴笠以及毛庆祥等人在重庆神仙洞公馆成立了一个情报中心，中心主任是大特务陈祖舜（后来担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情报中心的情报员利用数学上的“排列、组合”原则判断日本战机的起飞和降落是训练还是出击。

1941年12月10日，情报中心突然截获日本情报，情报显示，日本

人准备对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下手。于是陈祖训迅速致电重庆总部，由重庆总部转而通知停靠在新加坡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只可惜当时通讯器材落后，等到消息抵达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早已经“香消玉殒”了。后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为此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虽然以上两项重大事件中的密码都不是徐恩曾亲自破译的，但筹建、成立“密电室”的他，也为破获日本人的重要情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2.与朱家骅的争斗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中统局成立后，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中统局局长。有人说，凡是兼任，往往只是挂着虚职虚名而已，朱家骅也是如此，真正掌权的，还是副局长徐恩曾。然而虽然是兼职，朱家骅却并非不闻不问，毕竟权力越多越好，谁不贪恋手上的权力啊？然而徐恩曾又怎肯放权？徐恩曾虽然只是个副局长，但中统可是他一手打造的，中统之于徐恩曾，如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孩子一般，他怎可容忍朱家骅替他抱孩子当“奶爸”？不过由于经费问题，徐恩曾还不得不让着朱家骅。

中统局的经费大多来自中央秘书处，如果没有朱家骅，徐恩曾恐怕也撑不起中统局。也就是说，朱家骅是徐恩曾的财神爷，如果没有这个财神爷，也就没有中统帝国。朱家骅其实是靠着自己的财神身份强行空降中统局的，顺便在中统局发展扩大点儿个人实力。所以徐恩曾也是有“难言之隐”的。如果赶走了财神爷朱家骅，中统连活动经费都没有了，就不要谈发展，不要谈“反共”了！无奈之下，徐恩曾只能选择“忍”！中统局成立初期，朱家骅在中统局内部安插了许多自己的人手。这些人有陈介生、胡祥麟、刘次萧、李光灼等，而且这些人分居秘书处、会计室等重要位置，让徐恩曾感到非常难受。

不过最初，朱家骅与徐恩曾的关系还算凑合，虽然均是为了个人私利，但是相互还能够理解对方的做法。比如说，朱家骅安插自己的人手扩充势力范围，徐恩曾便借口问朱家骅要钱，继续完善自己的“中统帝国”！两个人相互利用，在中统搬至重庆，资金十分匮乏之时，徐恩曾为了稳住朱家骅，还时常找朱家骅谈心、打网球。

有一次，徐恩曾找朱家骅打网球，两个人便聊起当前的形势来。徐恩曾借故大发感慨，试探朱家骅：“中统局刚刚搬过来，却遭到日本人的轰炸，下一步的建设非常难！资金非常紧张啊！”

“抗战期间，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前几天委员长说：困难时期就要做好困难时期的准备，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

朱家骅故意卖关子：“要不然就功亏一篑了！”



言外之意，朱家骅告诉徐恩曾，自己口袋里的银两有限，让他自己

想办法！徐恩曾没有得到正面回复，便使出第二招：“共产党现在猖狂得很哪！没有钱不要紧，就让共产党继续闹吧，反正还有日本人呢！”

朱家骅一听，立刻拉长了脸。

“局长，您是中统局的一把手，目前的情况您比我了解！前不久委员长打电话问起重庆方面的事，当时您不在重庆，便让我转告您！重庆这个地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人、共产党都死盯不放。重庆一旦失守，恐怕不利于党国前途！”徐恩增因势利导。

“是啊！”朱家骅无奈地叹了口气，“历史上，重庆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既然委员长也提议了，那我就向上面打个报告，看看上面什么意思吧！”

网球打了几个回合，最后徐恩曾获胜。朱家骅回到自己的宅邸，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朱家骅虽然是CC派系的头目之一，在政治圈里洗礼多年，城府却还是不及徐恩曾。在特务圈里，论诡计、论手段，朱家骅确实不是徐恩曾的对手。在徐恩曾眼里，朱家骅是个文人，虽然有学问，但这些学问管不了特务。在徐恩曾看来，朱家骅当中统局局长，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后来，朱家骅为中统申请到一笔不菲的经费，徐恩曾心满意足。

然而，1941年，却发生了一件令朱家骅和徐恩曾都颇为不满的事情，正是这件事，导致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朱家骅的得力干将陈介生。

陈介生时任中统局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有一次，徐恩曾致电陈介生，要他汇报一下当下的工作，结果却遭到了陈介生的反对。陈介生说：“我只向局长汇报工作，不用向副局长您汇报。”自此，徐恩曾怀恨在心，决定找个机会拿下陈介生。

时过不久，陈介生再次拒绝服从徐恩曾的命令，彻底激怒了徐恩曾。徐恩曾当下果断决定，控制陈介生，撤掉他经济调查处处长的职位。后来朱家骅得知此事，陈介生已被徐恩曾撤职。朱家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认为徐恩曾拿自己的人开刀，简直是以下犯上、胆大妄为！朱家骅非常生气，连拍几下桌子。没等朱家骅消气，徐恩曾的电话竟然打了过来。

在电话里，徐恩曾恶人先告状：“朱局长，陈介生这小子拒不听命，违反规章制度，我把他撤了，以儆效尤！朱局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谁让你把陈介生撤了？”

“我也没有办法啊。如果不撤掉他，其他人就会效仿他，拒不服从命令！如果那样，中统局就无法管理了！现在是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就要严格一点！这样对全局、对个人都好！”徐恩曾早就想好了对策，不怕朱家骅翻脸。

朱家骅知道徐恩曾早有准备，所以也不打算与他硬碰硬。于是朱家骅问徐恩曾：“那撤掉了陈介生，拿谁补上这个职位？你是不是有中意的人了？”

“局长，李超英不错，工作扎实，而且您对此人也非常熟悉！”徐恩曾借机推荐。

“哦，他还行吧！”

“那就他吧！”徐恩曾替朱家骅做了主，朱家骅似乎也无话可说，考虑到李超英也是自己的手下，朱家骅也便忍了这口恶气！

那么这个李超英到底是何许人也？李超英，又名德吉，1920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1年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便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1936年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受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委员兼秘书。1939年，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委员，提出“对敌经济作战计划”，主持沦陷区经济调查事宜。徐恩曾为什么推选李超英？因为李超英不仅是朱家骅的人，而且也与徐恩曾的私交深厚。比起“台湾铁板烧”一般的陈介生，李超英显然让徐恩曾更为放心，用起来也更为舒心。但是徐恩曾撤掉陈介生这等“先斩后奏”的行为，已经严重挑衅了作为中统一把手的朱家骅的权威。不过朱家骅心里明白，中统局局长仅仅是个兼职而已，自己的工作重心还要放在秘书处，中统局还要靠徐恩曾管理。况且，徐恩曾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他的身后还有陈立夫、陈果夫。

1943年，与徐恩曾一起奋斗多年的顾建中终于得到了徐恩曾的推荐。徐恩曾向陈立夫提议，中统局应再设一个副局长的职位，于是他推荐顾建中担任中统局副局长一职。秘书处的机要秘书、大野心家郭紫峻听到这个消息竟也“寂寞难耐”起来。其实郭紫峻早就想取代徐恩曾成为中统的统治者，为了这个梦，他不惜辞掉山西党部委员的职务，到中央秘书处做机要秘书。对于徐恩曾的推荐，他非常不满。他不明白徐恩曾为什么要提拔顾建中，而不是提拔他。

当然，他也明白，徐恩曾并没有把他当作“自家人”。于是郭紫峻盯上了兼职局长朱家骅，开始千方百计地讨好朱家骅，希望朱家骅能够提拔他，从而与徐恩曾抗衡！朱家骅与徐恩曾芥蒂颇深，于是答应郭紫峻的请求，借机报复徐恩曾，并向蒋介石推荐郭紫峻。

1944年，朱家骅向蒋介石提议：“抗日已至末期，中统的所有任务应该回归到反共上来！如今中统局发展态势良好，分工越来越细，所以在下想提个建议，不知委座能否答应？”

“什么事？”

“我想中统局还应该再设一个副局长的职务，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充分细化责任，分担其他人的工作压力！”

当时蒋介石早已对中统局的徐恩曾颇有微词，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下手。朱家骅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于是蒋介石说：“只要对工作有利，你就放手去做！”得到蒋介石的口谕，朱家骅觉得自己“报仇”的机会到了！

得知郭紫峻竞争副局长一职的消息后，徐恩曾颇感奇怪。谁会知道中统局要再设一个副局长的消息？是不是有人搞鬼啊？于是徐恩曾安排特务跟踪郭紫峻，发现郭紫峻与朱家骅关系密切，徐恩曾才恍然大悟。这件事使得徐恩曾和朱家骅的矛盾不断升级，二者大有将矛盾摆上台面、直接对立的态势。得到“某些信息”后，郭紫峻也准备对徐恩曾落井下石。

1945年的一天，郭紫峻来到局长办公室，大言不惭地对徐恩曾说：“徐局长，为了您，为了中统局，为了党国利益，我恳请您辞去中统

局局长的职位，这段时间就由我负责过渡，希望您能够成全！”

“什么？”徐恩曾一听，火冒三丈，瞪大眼睛看着郭紫峻。

郭紫峻毫不客气地说道：“您把别人当亲儿子，我想当您的干儿子您都不要，您到底想要什么呢？”郭紫峻借机把心里话统统说了出来，“中统局被您搞得一塌糊涂，难道您就不愧疚吗？”

徐恩曾气急败坏，赤裸裸地骂娘。郭紫峻仗着朱家骅的后台，有恃无恐，厉声与徐恩曾对峙。徐恩曾忍无可忍，直问郭紫峻：“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不是被谁指使了？”此时的徐恩曾还蒙在鼓里，他没有想到，郭紫峻不过是朱家骅的“炮”而已，目的就是吃掉徐恩曾这个“将”。

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无法再容忍徐恩曾的所作所为，他直接发布命令，撤掉徐恩曾“中统局一把手”的职位，并且将其一撸到底，直接贬为庶民。徐恩曾苦心经营中统这么多年，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朱家骅在得知徐恩曾被“老板”炒鱿鱼的消息后，兴奋异常，连续几宿合不上眼，他认定自己的好日子到了，他觉得徐恩曾苦心经营的中统，如今就是自己的天下了。朱家骅高兴得太早了，自己的炮郭紫峻，在吃掉徐恩曾之后，便成了“炮灰”，顶替徐恩曾的人不是郭紫峻，而是CC系成员叶秀峰。

叶秀峰顶替徐恩曾，成为中统局一把手之后，对朱家骅大为不屑，他不但没有提拔郭紫峻，反而对朱家骅百般嘲讽，说朱家骅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对中统局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朱家骅见叶秀峰来势汹汹，且身后有陈立夫和陈果夫撑腰，最后选择了全身而退，直接脱去了身上那层兼职中统局局长的外衣。于是叶秀峰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统局的正局长！

其实，并不是叶秀峰水平高，要说“搞特务”、玩手段、耍阴谋，叶秀峰与朱家骅都比不上徐恩曾，只是徐恩曾太贪心了，后来把中统局弄得太张扬，成了蒋介石心中的隐患。叶秀峰是典型的“鹬蚌相争”后的得利渔翁。时隔15年之后，叶秀峰再次当上中统局局长，也算是一吐“前朝之恨”吧！

上任中统局局长之后，叶秀峰的“门庭”也开始热闹起来。人就是这么现实，趋炎附势、攀龙附凤，虽然叶秀峰不是龙、也不是凤，但手中有了权力，大家就都来攀附了。叶秀峰进行了一番大范围的改革，将徐恩曾的老部将悉数撤下，换成自己的心腹。不过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全面开始，蒋介石的阵营节节败退，中统局逐渐沦为空架子！叶秀峰虽然掌权，但此时的中统局，已经破败不堪了！

13.踉跄下台

徐恩曾为官许多年，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好事”，也算是个“人物”了。虽然他杀过人、放过火、夺过官、清过党……但是纵观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蒋介石手下的一个小卒而已。随着政局变化，蒋介石对这个小卒越来越不当回事。

一个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塞牙！1944年，徐恩曾的好运彻底结

束了！

1944年，豫湘桂战役打响。在这场战役中，拥有40万精兵的国民党，竟然被十几万的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仅仅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丢掉了146座城市，丢失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面对民众的一片咒骂，蒋介石干骂“娘希匹”却无可奈何！

为了分析局面，蒋介石召开了一个甲种汇报会议。

与会期间，与会人员纷纷向蒋介石汇报工作。轮到戴笠发言时，戴笠沉着冷静、有理有据、声情并茂地将军统的情报工作阐述了一遍。蒋介石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戴笠：“雨农的工作非常扎实、认真，在座的各位要像雨农同志学习啊！”蒋介石的表扬声落在徐恩曾的心坎里，似乎就变成了雷声。军统与中统势不两立，此时蒋介石表扬军统，无疑是在向徐恩曾施压。

蒋介石随后看了一眼徐恩曾，开口问道：“可均啊，延安那边有什么进展？”

徐恩曾毫无准备，只得匆匆搪塞：“中共戒备森严，中统局还在坚守战线，想必不久就会打开局面，请总裁耐心等待！”

蒋介石一听立马变了脸，“迟迟打不开局面，是你徐恩曾的问题，还是我蒋中正的问题？是不是等到共党剿了我们的老巢，你才能打开局面？看来你比雨农差远了！”

汇报会上，除了徐恩曾，其他人的汇报工作都做得十分到位。“豫湘桂战役”的大败，让蒋介石心情颇为糟糕，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十分小心，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掉以轻心。只有徐恩曾的汇报，让蒋介石怒不可遏。徐恩曾自己也清楚，这一次，是的的确确触了霉头。

回到家中，费侠见徐恩曾脸色不好，问道：“可均，发生什么事了？”

徐恩曾不愿多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回答：“没事儿，最近压力有点大！”

费侠越看徐恩曾越觉得他神色黯然，便接着问道：“是不是总裁批评你了？”

“没有啊，大家分析了一下战事……战事不利啊！”徐恩曾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的郁闷。

第二天，来到中统局，徐恩曾也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点名批评了几名特务，说他们办事不力，借此发泄发泄自己的情绪。

不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竟然发生了“倒蒋风波”。

那段时间，蒋介石也走霉运，绯闻和风波不断。中国百姓反对蒋介石的呼声愈演愈烈，最后竟然还有人贴出了标语：“总裁独裁，中正不正”，气得蒋介石咬牙切齿，迅速致电徐恩曾，令其限时抓捕贴标语的反动人员。

徐恩曾得到这个指令后，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沮丧才好。当然，他非常高兴总裁给了他表现的机会，如果能迅速破获，自己就能将功补过了；沮丧的是，时下的中统局已如一盘散沙，如果案子不能及时告破，自己就要更倒霉了！

接下来，徐恩曾紧蹙眉头，发出动员令，责任落实到人。中统局倾巢而出，昼夜不停四处巡捕。徐恩曾为此三天三夜没合眼，脑子里全

是“呜哇呜哇”的警笛声。

折腾了三天，徐恩曾竟然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找到。蒋介石打来电话询问，徐恩曾无言以对，蒋介石恼怒地指责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没有加以防范，现在又迟迟不能破案，失职、失职啊！”

倒蒋风波还没结束，报纸上登出了两则令人啼笑皆非的蒋介石的花边绯闻。

这两则花边绯闻令大家啼笑皆非，第一则是这样的：

“蒋介石与美国归来的前妻陈洁如和好了，为什么和好了呢？陈洁如为了赢回蒋介石的芳心，竟然扮演性感小护士，以致蒋介石旧情复燃……后被宋美龄捉奸在床！”

第二则是这样的：

“蒋介石‘老牛吃嫩草’，喜欢上姚琮（前南京市警察局局长）之女，时常与其携手至秘密官邸共度良宵！”

这两则新闻让蒋介石脸面尽失，他无处撒气，就将一肚子怨气撒到了徐恩曾身上。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与会人员的面怒骂徐恩曾：“娘希匹！共产党大造我的绯闻，破坏我的威信，毁坏我的清誉！你身为中统局局长，竟然纵容此类事件一再出现，你们中统局是干什么吃的？”

徐恩曾低头挨训，像个受委屈的小学生。

蒋介石继续怒斥：“共党的《新华日报》天天刊发诋毁党国的言论，你为何置之不理，任其言论四处传播？这是你的无能，还是中统局的无能？”蒋介石的训斥，就像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落在了徐恩曾的头上。

这一次，徐恩曾不仅郁闷，而且不解起来，为什么同为特务机构，中统却得不到和军统一样的待遇？难道是他徐恩曾不够忠心？还是戴笠抓住了蒋介石的什么把柄，所以蒋介石只能迁就于他？

徐恩曾不服气，为了“重振雄风”，他在中统局内部提出了一个新口号：争取时间，追求效果！

然后，徐恩曾对中统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项目有三：

一、要求行动一致，上下不脱节；



二、责任落实到人，人人都有任务；

三、增加办公时间，将原有8小时工作日改为10小时工作日。

徐恩曾自己也下了狠心，以身作则，每天一大早就到中统局上班，先是巡查工作，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中统局内定期举行会议，每个人都要汇报工作进展，徐恩曾每次都按时主持会议。

然而，徐恩曾没能坚持很久，他懒散惯了，加上家里还有美女费侠做伴，所以不到一个月，他就开始“迟到早退”。而中统局各科室的特务人员，见徐恩曾放松了下来，也就逐渐恢复了老样子，开始像某些处于半倒闭性质的“国企员工”一样，不再忙于侦察业务，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水、看看报纸、斗斗地主。时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张国栋眼看中统局又成了一盘散沙，心中焦灼，提醒徐恩曾是否应该再强调一下纪律？徐恩曾颇为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们都积重难返，难以改变啊！”

中统局之所以“破落”至此，关键在于徐恩曾不善管理。

首先，徐恩曾不重视基层特务的生活质量。徐恩曾早晨总要吃一碗香喷喷的鸡汤面，中午是精心搭配的营养餐，晚上则常常参加高档宴会。而中统的基层特务们在中统局的机关食堂里，却只能吃到掺沙子的大米饭。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务们能不离心离德、涣散懒散、消极怠工吗？

其次，闲差太多。徐恩曾盲目扩大中统局的阵容，最后的结果就是中统局成为了一支臃肿的足球队，除了场上的11名队员，其他替补皆是“打酱油”的货色。当时中统局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组长人人求。这样一个臃肿不堪、充斥了大量闲职的机构，怎么能够令行禁止，怎么能够行动迅速？与戴笠的军统相比，中统就是一个巨大的肥胖症患者！

第三，队伍纪律涣散。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徐恩曾生性懒散，虽然心机重重，却很难带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统局的各个科室内，常常出现男的聊天，女的打毛衣的场景。觊觎中统局宝座的郭紫峻向朱家骅打小报告的时候，就这样说：徐恩曾经常旷班。

不过，真正导致徐恩曾下台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管理不善，而是假钞案和王素卿走私案。

14.贩运假钞案

说起假钞案，还要“闪回”到抗战前期。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匆忙撤离南京，将印刷10元版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后来香港沦陷，印币铜版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于是日本人开始利用这块铜版做起了文章。

时任上海邮政储金会副局长的程士范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头目渊上交情甚厚。当时，渊上印刷了大量10元伪钞，推销给程士范。渊上以4张10元的伪钞换程士范1元储币，贪财的程士范自作主张，以办事处的名义，用5万元储币兑换了200万元法币伪钞。程士范原本打算将这批伪钞推向市场，可他后来却发现，上海管制极严，这批伪钞根本无法在上海流通。程士范心急如火，致电中统局的名义局长朱家骅，询问可否用200万法币在重庆购买一些桐油和水银。

这事不知怎地就传到了徐恩曾的耳朵里，他不知道这200万法币是伪钞，只觉得押运钞票是件肥差，岂能让朱家骅拦了去，于是他致电上海，指定好了运钞时间、地点和路线，决定亲自接收这批钞票。

徐恩曾的这些部署，竟然又被郭紫峻探听到，郭紫峻心中大喜，暗自庆幸整垮徐恩曾的机会终于来了。

郭紫峻偷偷来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家，借口商讨要回被军统误抓的中统特派员刘云亭，故意将徐恩曾押送钞票一事泄露给了魏大铭。郭紫峻之所以要透漏给魏大铭，就是因为魏大铭是戴笠的心腹，他得知此事，必会通报给戴笠。郭紫峻阴险毒辣，他想借戴笠的手除掉徐恩曾，令鹬蚌相争，以便渔翁得利。

事情果不出郭紫峻所料，魏大铭很快就把押运钞票一事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也非常高兴，他觉得扳倒徐恩曾的机会到了。

1944年4月，戴笠亲自出马，在安徽屯溪设下埋伏。当一艘满载钞票的船驶到屯溪时，随着一阵枪响，军统人员当场逮捕了押运钞票的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等人，并立刻押回重庆审问。

这三个无辜的家伙无缘无故被带进审讯室，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之后，就交代出了幕后的指使人徐恩曾。戴笠又请来中国银行的官员对钞票进行检验，竟然发现这些钞票都是伪钞。这下，戴笠彻底乐翻了，私运伪钞是杀头之罪，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扳倒徐恩曾，让他永无出头之日了！

戴笠立刻拨通了蒋介石的电话，他故意沉重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私运伪钞案！”

“好啊，案件主犯服法了没有？”

戴笠故作沉痛地回答：“总裁，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是可均指使的！他与日本特务相勾结，贩运伪钞，扰乱金融市场，他怎么这么糊涂啊！”戴笠看似同情徐恩曾，实则每一句里都带着刀子，大有彻底整垮徐恩曾之意。

蒋介石听戴笠说假钞案是徐恩曾指使的，一时还不太相信，他深知中统、军统之间矛盾重重。为了稳妥起见，蒋介石安抚戴笠说：“好了，我知道了！”

蒋介石虽然对徐恩曾办事不力，对军统纪律涣散颇为不满，但是他深知徐恩曾的忠心，他认定徐恩曾还不至于做出贩运假钞这样出格的事情，他认为，徐恩曾被人利用了。

当徐恩曾得知运钞船被戴笠劫去，钞票皆是伪钞时，差点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些钞票竟然是伪钞！他想起了当年自己推崇的那位朱半仙，不仅哀叹，难道老天爷有意惩罚自己？

徐恩曾也非等闲之辈，他绝不肯坐以待毙，军统局怎么会知道押运钞票一事，到底是谁在作祟？他派出特务四处侦察，终于打听出来，出卖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副局长郭紫峻。于是，他迅速找到自己的靠山陈立夫和陈果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上报。

陈果夫先是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徐恩曾一顿：“你这个局长，连自己的人都看不住，真丢人！如果总裁怪罪下来，不仅会撤了你的官，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

“是是是！”徐恩曾点头如啄米，“您教训得对，您教训得对！”

“押运伪钞的事情，我们暂且按被日本人利用的说法去向总裁解释！以后你要千万小心，你走错一步棋，就可能连累我们所有的人！”

陈立夫、陈果夫为徐恩曾贩运假钞案，找到了蒋介石，毕竟这件事关乎中统局的地位以及徐恩曾的去留。蒋介石见到二陈，自然也知道他们是来为徐恩曾求情的，所以彼此心照不宣，最终达成共识：徐恩曾贩运假钞案，系中统局被日本人利用所致，不再处置徐恩曾。毕竟，蒋介石也不希望军统打垮中统，军统和中统，就像自己的手心手背，哪一面受伤，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在二陈面见蒋介石后，贩运假钞案就此搁下，一拖就是半年。

半年后，眼瞅着蒋介石还没有对徐恩曾做任何处理，戴笠坐不住了，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徐恩曾。

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让吴铁城、陈立夫以及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督办此案。因为这三人都与徐恩曾私交甚密，所以蒋介石借此法为徐恩曾开脱。

几日之后，吴铁城、陈立夫和何成浚就达成了贩运假钞案的处理方案，方案如下：

中统局与贩运伪钞案无关，查出来的伪钞系中统局杨闻斌、高子文，在搬运物资时，操作失误，夹带进去的。

高子文、夏伯良实属奉命抢购物资，程士范帮助中统工作，纯属于义务性质。

中统局正局长朱家骅，始终未参与贩运假钞案。

副局长徐恩曾知道此事，虽然重庆与上海距离较远，但也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对徐恩曾、曾养甫、朱家骅等人给予免职处分。

对于程士范等四人，给予判处主犯程士范有期徒刑8年；判处从犯高子文有期徒刑3年；夏伯良和程憾均为教唆所致，可取保候审。

蒋介石看到此方案后，认为对朱家骅、曾养甫、徐恩曾做免职处理未免有些过火，暂缓执行，至于程士范等四人，蒋介石则同意按照方案建议，交军法处处理。

得知此判决结果后，戴笠十分郁闷。而徐恩曾却喜出望外，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连免职处理也被总裁“暂缓执行”了，他连连请了几桌大宴，感谢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帮助。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戴笠没有扳倒自己，他自己却“绊倒”了自己，他没能安抚好自己的二老婆王素卿，最终栽在了王素卿的手里。

15.王素卿走私案

前面说过，徐恩曾身边曾经有三个女人，这第二个老婆，就是王素卿。

自从徐恩曾与费侠结婚后，王素卿便觉得自己与徐恩曾的缘分走到了头。与其像鸡婆那样大闹一场，不如想方设法利用徐恩曾的名头赚点钱。于是王素卿来到成都，跟徐恩曾要了钱，注册了一家运输公司，搞起了运输，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物流业务。

在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王素卿便打着“交通部政务次长”的旗号，承揽了成渝、宝成、滇缅等黄金线路的交通运输，专门从事药品、布匹、五金等物资的物流生意，同时还开始走私物资，牟取暴利。除此之外，王素卿还以中统为靠山，四处发放高利贷。王素卿曾因催债，指使中统特务将一无辜的借债人活活打死。这件事后来还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为此，徐恩曾还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

这个王素卿也不安分，虽然去了成都，与徐恩曾分居了，但是她的生活一点都不寂寞。她结识了小白脸李子友，并与李子友成宿成宿地在成都的高档宾馆里鬼混。徐恩曾得知此事后，也未进行干涉，他的沉默，让王素卿更加猖狂，她的胆子越来越大，再不避讳，与李子友以“夫妻”之名开始同居。

小白脸李子友给徐恩曾戴绿帽子一事，令中统成都调统室的赵伯谦和葛炳生非常生气。

这一日，赵伯谦跟葛炳生唠叨了起来：“徐老板真能忍，换作我，早就宰了李子友了！”

“是啊，这两人真是奸夫淫妇，天天打着徐老板的旗号，作奸犯科，无恶不作！干脆咱们除掉这个李子友，也算给徐老板清理门户！”葛炳生眼露杀机。

“好，我们帮徐老板清理门户，徐老板一定会奖赏我们！”

于是，为了维护徐恩曾的形象，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李子友。

可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没动手，消息就传到了李子友的耳朵里。李子友本来就担心自己与王素卿的奸情败露，徐恩曾对自己痛下杀手，听到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自己的消息，更是胆战心惊。

想到中统势力巨大，逃是无路可逃的，李子友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戴笠！在李子友看来，能够救他一命的，只有军统局的戴老板了。于是，这个小白脸背叛了王素卿，偷偷跑到军统局，把王素卿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统统抖搂了出来。

戴笠听完李子友的陈述，开心极了，他兴奋地拍着大腿叫道："真是天助我也！"

随即，根据李子友的供述，戴笠给徐恩曾和王素卿列出了四大罪状，每一条都可置徐恩曾和王素卿于死地。这四条是：滥用职权、走私战略物资、纵容手下杀人、扰乱市场秩序。

翌日，戴笠带着写有这四大罪状的文件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看完文件后大为光火，拍着桌子怒斥："娘希匹，我看这个徐恩曾是不想活了！"

1945年1月30日，徐恩曾得到了一个此生最大的噩耗：蒋总裁宣布，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听到这个消息后，徐恩曾仰天长叹。

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经营了数年的政途，就这样被一个女人毁掉了！

1945年2月1日，徐恩曾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的信谊堂和叶秀峰举行局长交接仪式。

徐恩曾向众特务宣布："从今日起，由秀峰担任你们的领导，我就此做一个圆满的结束。"

此话说完，徐恩曾脸色惨白，手指不停地颤抖。回忆自己走过的20年，回忆自己无怨无悔为党国奉献了20年，与共党辛辛苦苦斗争了20年，徐恩曾暗自惆怅，在这20年里，我徐恩曾青春已逝，白发早生，这20年，纵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官虽然丢了，总算还没有丢掉自己的老命。

1945年1月30日，徐恩曾被蒋介石一撸到底之后，情绪非常消沉。吃嘛嘛不香，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偶尔去戏台听戏，也总是打瞌睡。失魂落魄的徐恩曾感到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委员长的一颗棋子而已，"我像是一颗棋子，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

与那些失宠的后宫妃子一样，失宠后的徐恩曾也曾想过"力争"，但碍于戴笠的威严，碍于蒋介石的决绝，没人再帮得了他，"复辟升官"也就成了徐恩曾的痴人妄想。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5年的5月5日，徐恩曾西装革履地参加了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党国大会——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作为480名与会人员的一分子，他是唯一一个落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此时的他，在政途上已日暮西山了，他只好决定，将此生余下的精力转向生意场，去做一个商人。

16.商人徐恩曾

下台之后的徐恩曾，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商上。他寻思：既然当官不成，那就经商发财。

别看徐恩曾是电机工程师出身，其实他也颇具经济头脑。为官这些年，徐恩曾也没少经商发财。

早期，他曾入股中央商场，掘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又开办农场，种粮食。

1938年，徐恩曾在去湘西的途中，发现了一块廉价的荒地，便以很少的钱买了下来。后来特务詹连吾在徐恩曾购买的荒地下面发现了金矿，徐恩曾喜出望外，找来工矿专家进行勘探，并吩咐詹连吾进行采挖，虽然这个金矿并不像徐恩曾想象的那么富饶，产量不大，金矿石的含金量也不是很高，但徐恩曾依旧获利不少。

徐恩曾还当过“棉农”，当时正值战争年代，政府大量采购棉花等农用物资，徐恩曾就让特务们在江苏灌云为他种了很大一片棉花。他间接拉高了棉花的收购价格，把棉花直接卖给了政府，发了一笔小财。

抗战期间，徐恩曾一边反共，一边谋求发财的机会。他路过江西南昌时，发现“酿造”生意不错，就吩咐南昌的特务们开办了一家酿造公司。所谓酿造，无非就是利用大豆、高粱等粮食酿造酱油和白酒，但由于酱油和白酒属于老百姓的日常必备品，只要质量不算太差，就不用发愁销售，所以徐恩曾的酿造公司生意也非常不错。

中统局搬到重庆以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沦陷区越来越多，沦陷区的许多逃荒者都跑到了重庆，使得重庆人口暴增，时常出现断粮情况。于是，在费侠的建议下，徐恩曾开始关注“碾米生意”。经过多次考察之后，徐恩曾决定投资开办一个“碾米厂”。不过开办碾米厂可没那么容易，不仅需要粮仓，还需要一整套的碾米设备。这个项目置办下来，比在唐家沱买一块地还要贵。如果赶上日本人空袭，设备被炸，钱就白花了。所以碾米厂所处的地点一定要安全。碾米厂的选址并没有难倒徐恩曾，他灵机一动，找来一艘大木船，把碾米设备都搬到了大木船上。等碾米设备在大木船上安装完毕，他又在江边买了几栋房子当作粮仓。就这样，一个流动的“碾米公司”诞生了！徐恩曾的这一做法不仅避免了空袭挨炸，而且还省下一大笔运粮的费用，可谓“一箭双雕”！在那段非常时期，徐恩曾的“碾米公司”为他赚足了银子，这是徐恩曾自己都非常得意的一桩“买卖”。

徐恩曾在被削职为民之后，还真去做了“商人”，不过雷人的是，他既没有做以前在当官的时候做过的碾米生意，也没有做曾经做过的酿造生意，而是做了豆腐生意。徐恩曾摇身一变，成了豆腐店老板，而他的老婆费侠，则成了豆腐西施。

当然，徐恩曾开豆腐店也是一件阴差阳错的买卖。“下岗”最初，徐恩曾看准的不是豆腐，而是大豆。徐恩曾觉得大豆是实物，而且不容易坏，可以囤积起来，等物价上涨，便高价抛出。没想到丢了官的徐恩曾真是时运不济，看走了眼，第二年，大豆不但没涨价，反而落了不少。

眼瞅着豆子就要砸在手里了，再加上虫蛀、鼠咬、霉变，徐恩曾的豆子生意眼看就要泡汤。此时费侠给他出了个主意：“干脆咱们置办个豆腐坊做豆腐吧。”无奈之下，徐恩曾只得接受费侠的建议，在自己家里大张旗鼓地开了一家豆腐厂。豆腐生产出来之后，徐恩曾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国民党各机关食堂、各餐厅大量供应豆腐。

后来，徐恩曾又发愁了，自己囤积的豆子太多，就是天天磨豆腐，豆子也用不完！无奈之下，他卖了一段时间豆腐，就将豆子全部卖掉了。徐恩曾在豆腐上没赚着钱，转而又将目光投向了皮鞋生意。

徐恩曾把目光转向皮鞋生意，还是费侠的点子。

那一日，费侠与几个女伴一起逛街，偶然间发现，重庆女孩不但爱打扮，而且为了装扮不惜钱财，出手极其大方。费侠还发现，有一种高级的花纹皮鞋非常受女孩们的欢迎，销量奇大，供不应求。回家后，费侠就跟徐恩曾唠叨了自己的这些发现。徐恩曾一听，眼前一亮，想到自己早年在十里洋场看到过的场景，那个时候，女人们总喜欢穿旗袍，她们不惜花上百块大洋排队买旗袍。徐恩曾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女人的钱好赚！

于是徐恩曾带着费侠考察了皮鞋市场，并且走访了“中华”、“求精”、“光华”等著名的皮鞋厂家。然而，皮鞋之梦还是破产了，因为花纹皮鞋太难做。皮鞋倒是好做，可纹皮鞋上的“花纹”，需要用一种罕见的进口化学原料。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连盘尼西林都是奇货，更别提这种化学原料了。徐恩曾奔波了很久，也没弄到这种化学原料的进口份额，最终，徐恩曾只好放弃了皮鞋生意。

后来，为了寻找商机，他决定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一说要搬到上海，竟然就有人提出，送他徐恩曾一套上海的花园洋房。这送房子的人，是徐恩曾的老友吴任沧。时值国民党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的吴任沧，当时刚刚收缴了位于上海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的几栋日伪资产的洋房，由于徐恩曾曾经有恩于他，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给“走投无路”的徐恩曾提供了一套房子。徐恩曾得此赠送，自然非常高兴，他将自己的妻子、孩子、司机、厨师、秘书、保姆、保镖等一行17人都安顿在这套花园洋房里，还专门装修出一个大房间供娱乐消遣。由此可见，这个花园洋房有多么宽敞，多么气派！

也许徐恩曾的前半生太过顺利，以至于将后半生的福气都消耗殆尽了。徐恩曾的房子刚刚装修好，他刚刚带着家人住进去，协助他办理住房手续的中统上海办事处主任吴星伯嗝屁了。吴星伯死后，大特务季源溥接替吴星伯出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此人曾在徐恩曾手下干了多年，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徐恩曾的重视，所以怀恨在心。当他看到下台后的徐恩曾依然悠闲自得地住在花园洋房享受惬意生活，各种羡慕、嫉妒、恨便一起涌上心头。季源溥决定，想办法把徐恩曾居住的花园洋房收回来，逼徐恩曾滚出这栋洋房。

于是他派手下特务通知徐恩曾：“此处房产乃日伪资产，上级有命令，要求立刻充公。请你于一周之内搬出洋房，谢谢合作！”

徐恩曾接到通知，腾地就火了，他在特务面前大骂季源溥：“季源溥，你个猥琐小人！如今你小子翅膀硬了，就想把你的老上司斩尽杀绝！我徐恩曾绝对不可能搬出去，这是党国政府送我养老的洋房！”

在得知徐恩曾“不仅不搬，而且还言之凿凿、理由充分”之后，季源溥恶狠狠地说：“我倒要看看，今天你徐恩曾的胳膊，还能不能拧过大腿！”于是他找来一群地痞流氓，抄了家伙气势汹汹地去了徐恩曾的花园洋房。

徐恩曾见来了一群流氓地痞，料到是季源溥指使的。然而此时的徐恩曾，早已不是当年大权在握的徐恩曾了，他无权无势，不管他怎么怒斥、怎么恐吓，那些流氓地痞就是不买他的账。为了赶走徐恩曾，这些流氓把花园洋房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洋房里进进出出，在徐恩曾家里大吃大喝。后来，他们逼着徐恩曾、费侠夫妇住进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在那段时间，徐恩曾、费侠夫妇也算受尽了委屈。

然而，徐恩曾并没有真的被大家遗忘，没多久，他的救星就来了，这个人还是陈立夫！陈立夫是徐恩曾从头至尾的贵人。

陈立夫在得知徐恩曾的花园洋房事件后，马上找到季源溥，请季源溥收手，不要再为难徐恩曾。季源溥是陈立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出于感恩，他答应了陈立夫的要求，叫回了那些流氓地痞，将花园洋房还给了徐恩曾。

花园洋房风波就此结束。事后，徐恩曾致电陈立夫：“立夫，真是太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们一家真的要流浪街头了！”

“不用客气！你曾经为党国卖过命，这套房子也是你该得的！”陈立夫是个仗义之人，徐恩曾为蒋介石、为他忠心耿耿工作了20年，真的是没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对徐恩曾说：“以后有处理不了的事，尽管对我开口！我能帮上的，定将鼎力相助！”

有陈立夫这席话，徐恩曾心里痛快了一些。

在上海立足后，徐恩曾决定继续做生意。此时，徐恩曾想起过去假借中统局之名，曾经购买过一大片土地，于是他决定去开垦那块地皮。不过那块地皮非常之大，足足有上千亩。雇人耕种肯定是不行的，这么大一块土地，要开垦，必然要用现代化的耕种设备。想到这里，徐恩曾眼前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开一家农垦机械公司应该也不错！

想法既已成形，下一步就是在上海找一个经营场所。徐恩曾在上海滩边的麦加利银行里租了一间房子，挂了一个响亮的门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当然，开办公司并不仅仅需要挂一个门匾，还需要有实业和流动资金。徐恩曾不想花自己的养老钱，便去找银行贷款。他找到了时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的陈果夫和总经理吴任沧。陈果夫和吴任沧见徐恩曾可怜，念及旧情，为他贷了一大笔钱。

没想到巨款到手后，徐恩曾又改变了主意。他寻思：中国技术薄弱，像那些播种机之类的大型机械中国人是造不出来的，只能从国外进口，进口渠道环节众多，不如拿这笔钱做其他生意算了。

那晚，徐恩曾站在黄浦江边举棋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生意好。他看到江面上有许多忙忙碌碌的船只在打捞东西，忍不住好奇地问一位打捞船的船长：“老伙计，你在打捞什么？”

船长指着江面说道：“黄浦江是黄金航道，来来往往的船只非常多，航道紧张，船只常常会因为相互争抢航道发生碰撞，所以经常有船只沉

没！我就负责打捞沉船和尸体……”说完，船长眯着眼睛看了徐恩曾一眼，补充了一句，“如果碰巧捞到黄金，那可就发财喽！”

徐恩曾听了这位船长的话，又动了心思，既然农垦设备搞不了，就干脆把牌子换一换，成立一家“打捞公司”算了。

这一次，徐恩曾的主意是真的定了下来，第二天，他立刻着手筹建打捞公司。为了发大财，徐恩曾这一次是真下了血本，他认定投资越大，收入越高！

徐恩曾花大价钱聘来一群资深潜水员，而后又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探测仪和打捞工具。万事俱备，只等沉船！徐恩曾信心满满地站在自己的打捞船上，憧憬着未来，他似乎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金灿灿的金山正在向他着手！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盼望着盼望着，一艘艘的沉船终于被打捞上来。只可惜黄金变成了破桌烂椅，木乃伊变成了腐尸，一艘艘沉船里，竟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徐恩曾不信邪，继续固执地打捞。可徐恩曾的好运始终没有到来，最后，他只得“望江兴叹”，遣散了打捞公司。

徐恩曾在上海的生意一直不好，他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挣钱的门道。

有一次，一个船务大亨请徐恩曾吃饭，徐恩曾见船务大亨出手阔绰，就询问他如何“发了大财”，于是船务大亨向徐恩曾介绍起“船运”的买卖来。船务公司大亨的介绍，又一次点燃了徐恩曾的发财梦。

那晚，徐恩曾回家之后，征求费侠的意见：“战争期间，铁路、公路被破坏得厉害，唯有水路畅通。许多从事船运的人，都发了家！你看……我们……”

费侠明白徐恩曾的意思，但眼看着徐恩曾一次次生意失败，她真不想多说，于是回答：“你自己决定吧！”

徐恩曾见费侠不反对，就动手编织自己的“船运”梦。

徐恩曾斥巨资购买了一艘货轮，在码头与码头之间搞起了“船运”生意。

这一次，徐恩曾还真的选对了行当。

徐恩曾多少还有些朋友，虽然帮不了他太多忙，但用他的船运点东西，这种利人又利己的事情，还都是愿意帮的。战争毁掉了许多的铁路和公路，水路成了唯一通畅的交通方式，反正用谁的船都是用，徐恩曾的船又是最新最好的，所以朋友们都来捧场，都来用他的船，徐恩曾的船运生意，就这样一天天红火了起来。一年下来，这艘船竟为徐恩曾赚了个盆满钵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艘货船竟然成了他的财神。

做船运生意久了，徐恩曾就渐渐了解到，战争期间许多铁路被毁，各地政府都急需木材修缮铁路。有一次，徐恩曾的老朋友，浙赣铁路管理局的局长雍家源在用徐恩曾的船运输铁路物资的时候提到，需要大量木材修缮铁路，徐恩曾就迅速接茬，说自己手头上有一批木材，非常适合做铁路枕木用。雍家源随即决定购买徐恩曾的木材。

其实，徐恩曾手里根本就没有木材，可他能找到木材。第二天，徐恩曾联系了自己的老部下——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冯琦，请冯琦迅速采购一批适合做铁路枕木的木材。冯琦对徐恩曾非常敬重，想当

年，要不是徐恩曾派自己去南委，自己怎么会有今天。于是冯琦亲自出马，帮徐恩曾采购木材。这笔生意，就这样做成了。事成之后，徐恩曾分给冯琦一大笔好处费，冯琦也非常满意。

徐恩曾的生意越来越多了，他终于觉得，这个内战打得太好了，如果不打内战，就没有这么多发财的机会。后来，徐恩曾还借助中统电台的信息，了解市场的需求。市场上缺什么，徐恩曾就卖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徐恩曾就变成了名震上海滩的大富豪。

手里的银票多了，徐恩曾的“政治野心”又开始萌动。

1947年，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徐恩曾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从政的商人也不计其数，为什么自己不行呢？于是，他靠着自己的“中国工程师协会理事会副会长”的角色参加了国民大会。他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当选为“国大代表”。

成为国大代表之后，徐恩曾开始了自己“曲线救国”的策略。他决定先为妻子费侠谋求一个政治地位，然后利用这个政治地位，赚更多的钱，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当他听说“凡是竞选立法委员者，只要获得原籍提名就可以当选”的消息后，亲自奔赴湖北，为费侠竞选立法委员而奔走。他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方觉慧和中统华中区总督熊东皋，请这二人帮忙提名。这两个人过去都得到过徐恩曾的恩惠，于是奋力帮其走动，最终促成了费侠的提名，使得费侠当上了立法委员。

费侠当上了立法委员，徐恩曾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距离“回归”已经不远了。

然而，1948年，国内战局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个时候，国民党已呈现出颓势，在国内战场上连连败退，党内政局也分裂声不断。徐恩曾折腾了一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形势——国民党大势已去，即便自己“回归”，也没啥用了！

1949年1月，前机要秘书张国栋来到上海，单独拜见了自己的老上司徐恩曾。张国栋对徐恩曾说：“现在形势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恐怕再也守不住了！您有什么打算？”徐恩曾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斗来斗去，共产党竟然赢了！我能怎么办？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

一朝拜别张国栋，徐恩曾就开始将自己的资产一点一点向海外转移。此时的十里洋场，已经插满了共产党的红旗，徐恩曾只有一条退路，那就是与蒋介石等人一起去台湾。

1949年秋，徐恩曾带着费侠离开了上海，在海峡对面的台北安了家。此时的徐恩曾早已看透政治，早已无心从政。他继续经商，赚钱无数。后来，徐恩曾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以这种方式忘掉了前半生所做下的所有罪孽。1985年，徐恩曾寿终正寝，享年87岁！

第五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

1.中统上位

徐恩曾下台后，接替他的人是叶秀峰。论资历，叶秀峰也算深厚；论能力，他也算超群。不过可惜，如今的中统局已经今非昔比，虽然叶秀峰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局长的宝座，但是国民党最风光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而中统局的辉煌也已然不再了。

1945年2月1日晨，南京的上空阴沉而冷峻，然而中统局的门外，却沸沸扬扬宛若集会。大小特务都来了，大家都要看看，在中统局叱咤风云十几年的徐恩曾，将如何在众人面前尴尬落幕。大家更关心的是，徐恩曾退任之后，继任者究竟是谁？其实，谁来继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的职位会不会变动，特务们的薪水会不会调整？当然，很多特务还是舍不得老领导徐恩曾的，毕竟他曾经带领大家叱咤风云过，他也曾经让大家吃饱喝足过。

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张国栋，就对老领导徐恩曾被贬下台极为不满，他在徐恩曾耳边不住地唠叨："唉，党国真是好坏不分、过河拆桥！党国这样对您，以后我们谁还敢再为党国卖命？"

徐恩曾长叹一口气，对张国栋说："愿赌服输吧，你也少说话吧，小心隔墙有耳啊！"

"有耳又怎样？您为中统局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您，怎么能有中统局的今天？您辛辛苦苦为中统局操劳了半辈子，党国怎么能就这样说换就换嘛！在这件事上，如果不是党国昏庸，那就是小人作祟！"徐恩曾心里明白，张国栋明指郭紫峻，暗指叶秀峰。但如今大势已去，徐恩曾已回天无力，只好听天由命了。

1945年2月1日上午9点，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即将走上主席台，徐恩曾的内心悲怆不已，百感交集，而旁边的叶秀峰却意气风发，趾高气扬。

参加交接仪式的一共有488人，其中男467名，女21名。这488名人员皆是中统局的在职特务，他们有的悲伤，有的沮丧，有的窃喜，有的无所谓。有个别特务是叶秀峰和郭紫峻的亲信，他们对徐恩曾的下台颇为高兴，这次交接仪式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凯旋"的笛声。

主席台上一切从简，除了话筒，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盖碗杯都没有。徐恩曾慢慢地走上台前，落座，然后双手微微地颤抖着，扶正了话筒。虽然他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怆。随后，他微微抬起眼皮，语调低沉地开始了自己在军统的最后的一次发言。

"一转身就是十多年，这十多年来，大家与我生死与共，我与大家的感情，已无法用言语表达……"

徐恩曾断断续续地说着，眼中有泪，声音哽咽。

"最后，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秀峰的领导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场的许多特务都流下了眼泪，尤以大特务顾建中更为悲痛。顾建中是徐恩曾带进中统的，这么多年来，徐恩曾一直重用顾建中。顾建中一哭，身边的一群特务们忍不住也悲从中来，都哭了起来。

主席台上，徐恩曾旁边的叶秀峰皱起了眉头，这不明摆着给自己拆台吗？他狠狠地盯着台下，脸色有些难看。

徐恩曾抹了一把眼泪，最后终于做了个总结，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发言："秀峰是我们中统局的老熟人了，大家对他也很熟悉，他也非常熟悉大家。秀峰担任局长，是我局之荣幸！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支持秀峰的工作，现在，请秀峰讲话。"

叶秀峰憋了半天了，终于轮到自己开口了！可面对话筒，叶秀峰却不知从何说起，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了这么几句："总裁知道可均身体不好，积劳成疾，希望他休息一下，所以我暂时接替他处理日常工作。我才疏学浅，本不该接替此职，还请局内的老同志以协助可均的态度来协助我，望大家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叶秀峰就此低调接手中统局，成为中统局历史上的第二任局长。

叶秀峰担任局长后，先进行了一些改革，然后以中统局局长身份出席了一些重要会议。

上任伊始，叶秀峰就出了洋相。

国民党有一个惯例，所有部门，几乎每次会议前，都要首先纪念孙中山先生。即由会议主管带领全职人员向孙中山遗像鞠躬，同时还要带领大家恭读总理遗嘱。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仪式，还多次亲自主持这样的纪念活动。叶秀峰刚刚上任中统局，还不太熟悉这种纪念方式。

叶秀峰上任后，第一次参加中统全体会议，他按照惯例先带领全体职员纪念孙中山先生。他先是对孙总理遗像鞠了三躬，而后，他率先背诵了总理遗嘱。叶秀峰以为自己对中山先生的遗嘱已经烂记于心，于是连本子都没拿，昂首挺胸开始背诵总理遗嘱。

然而，正如文人"提笔忘字"一样，叶秀峰背诵完前几句之后，竟然忘词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面的特务们足足等了5分钟，叶秀峰才终于张口："是所至嘱！"

此时，后面的人已经小声议论起来。

有的特务说："没想到局长功课不到家，若是总裁检查起来，他麻烦就大了。"

还有的说："幸亏我早就背会了，要不然跟着局长背错了，就麻烦了！"

叶秀峰听到议论声，涨红了脸，解散了纪念活动。

其实，中山先生的遗嘱仅仅只有一百来个字，叶秀峰平日里都能背得出来，偏偏做了局长，在这么多特务面前，一紧张，就忘了个精光。



中山先生遗嘱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

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丢人之后，叶秀峰回去“恶补”，然后让自己的妻子、儿子等定时检查他的背诵情况，以备不时之需。

与其他新上任的头头一样，叶秀峰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叶秀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人员！“调员”之事，是历代帝王、官宦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个道理。叶秀峰在上任初期，把中统局的领导班子重新布置了一遍，拿下了徐恩曾的许多老亲信，换上了自己的人，然后是逐渐培养“新人”为己所用，以实现自己的统治。当然，某些特务不仅与徐恩曾有瓜葛，与陈立夫等高层也有瓜葛，对这类特务，叶秀峰自然不敢下手，毕竟叶秀峰想要在中统局站稳脚跟，还要和陈立夫处好关系。而且叶秀峰一直是CC系成员，怎样都逃不出陈立夫的手心。

在调员之后，叶秀峰开始改革管理模式。他一改徐恩曾那种宽松的管理模式，身先士卒，紧抓纪律，从自己做起，树立典范。

叶秀峰从以下几个方面紧抓纪律：

一、整顿上下班纪律

每天早晨，叶秀峰总是第一个来“公司”上班的人。他来了之后，先是仔细打扫个人办公室的卫生，然后才打开文件开始办公。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中统局的特务们有些不习惯，他们懒散惯了，可后来，他们看到叶秀峰天天如此，就不好意思迟到了。叶秀峰“身先士卒”的办法很奏效，而且他并没有像徐恩曾一样只有三分钟热度，也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没多久，徐恩曾时代留下的懒散的“顽疾”就被彻底根治了。

二、提高劳动效率

徐恩曾在任时，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叶秀峰上任后，采取了“抽查”的方式定期检查特务们的工作状况，如果特务对工作进展的回答不能令叶秀峰满意，他便采取降级、扣薪等方式惩罚他们。后来，那些特务们个个对叶秀峰毕恭毕敬，再也不敢在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了。

三、树立绝对权威

叶秀峰深知，徐恩曾留给他的这个摊子是个烂摊子。当下的中统局人浮于事、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虽说这里藏龙卧虎，可不管是龙还是虎，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在这种情况下，树立绝对权威非常必要。

要树立绝对权威，就要臣服元老级的特务，比如郭紫峻和顾建中。

郭紫峻野心极大，一直觊觎中统宝座。

顾建中虽无野心，但自恃能力突出，不服管束。

于是叶秀峰想了两个办法对付这两个人。

第一，收回大权，不管大小事宜，均须上报，而且只有他的亲笔签字才算文件有效。

第二，高悬任命书，表明自己的局长身份，如有不服，降职或者降

薪。

如此策略，果真有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叶秀峰为“叶局长”了，连郭紫峻和顾建中也对他恭敬起来。

四、加强业务管理

徐恩曾之所以丢官，主要是因为他在后期，“业务能力”屡遭总裁蒋介石质疑。所以叶秀峰认为，要想博得总裁的好感，必须提高业务能力，侦破一些大案、要案。

于是他上任伊始，就把侦破案件当成首要任务来抓。

也算天助叶秀峰，他上任不到一周，竟然就破获了一宗“伪造法币案”。此案乃蒋介石亲自督办的大案，于是叶秀峰得到了蒋介石的点名表扬。蒋介石是这样表扬叶秀峰的：“接事伊始，立建勋功，殊堪嘉式！”

然而，叶秀峰上任后，大权独揽，管理甚严，特务有一会儿不见踪迹，他都要过问，让特务们觉得连上厕所这等小事都要被局长监督过问，颇为不满。而副局长郭紫峻、顾建中手里的权力也被全部没收，副局长的名头一下子就成了摆设。

终于，一直觊觎中统宝座的郭紫峻坐不住了，他致电朱家骅，询问自己期盼的“局长”一职是否还有希望？朱家骅回说：“此次聘任乃总裁亲自批示，不好改变！”朱家骅的回电，给郭紫峻的“中统局长梦”判了死刑。于是他私下找了找关系，终于远离了叶秀峰的看管，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做了个山高皇帝远的主任了事。

至于顾建中，亦是如此。按理说，徐恩曾下任后，这个座儿应该是他的。顾建中还做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美梦。没想到叶秀峰的到来还是让他继续当媳妇，不让他做婆婆。眼瞅着半辈子一晃而过，他如今却成了个挂名的副局长，他着实不甘。于是托关系，跳出了中统局，到两淮盐务管理局去做了局长。

眼看两个副局长都相继离开了中统总部，小特务们也不安分起来，他们都想为自己找点出路，逃离中统局，无奈关系不够，只能待在中统听任叶秀峰使唤。而郭紫峻和顾建中的逃离，让叶秀峰也安心了许多，他终于觉得位置稳固，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局长了。

抗战胜利后，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而这个呼吁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迫于压力，蒋介石只能“屈从”，不过靠“特务”发家的蒋介石是无法放下中统和军统的，于是他找来二陈，希望二陈能够出个主意。

蒋介石一脸严肃，问：“近期的舆论重点，你们可知？”

“您是不是说训政（特务政治）一事？”陈立夫试探地回答。

蒋介石点点头，然后愤愤地说：“简直胡闹！如果不搞情报，党国不就成了瞎子、聋子了？百姓根本不懂政治。”

陈果夫劝蒋介石：“总裁别生气，办法总会有的！过去咱们对付媒体，往往采用一个办法：换包装，这次不妨也试试换换包装如何？”

“换包装？”蒋介石一头雾水。

陈立夫迅速明白了哥哥的意思，向蒋介石解释道：“总裁，换包装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我们的有关部门换换名字！”

蒋介石领悟了二陈的意思，慢慢露出一丝笑容：“嗯，换个名字也是可以的！这样也容易向外界交代！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处理吧，希

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二陈点头，立刻着手办理。

随后，中统局和军统局迅速更换了名字。

中统局改名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叶秀峰，其所有班底成员、部门均不变。

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继任。

中统局改名之后，仍旧从事自己驾轻就熟的特务工作。虽然工作性质没变，但是各种经费却比徐恩曾时期减了不少。本来中统局就是一清水衙门，如此一来，更加成了穷衙门。叶秀峰着急起来，他深知，没有经费是绝对搞不好工作的。眼下，徐恩曾时期的“特别补加费”没有了，中统赖以揩油的“走私”活动也因为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大幅缩水，如此一来，叶秀峰囊中羞涩，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中统局的经费问题了。

叶秀峰没有徐恩曾的商业头脑，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裁员”，用“裁员”的办法达到减少开支的目的。

当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裁员也无可厚非，但是仅仅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约资金，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比如出现消极怠工、不再团结、工作积极性不高等状况。但是叶秀峰只有此法，所以他心意已决，任何人都劝不动他。

裁员前，叶秀峰这样号召大家：“当前，国共对立，前线军队花钱如流水，党国只能节衣缩食。本着从大局出发，根据我局的实际情况，允许职员跳槽，只要有关系者，随时可以离开！”叶秀峰的这番话，无疑在为自己的裁员埋伏笔。

有亲信问叶秀峰：“局长，难道除了裁员，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叶秀峰无奈地叹了口气：“暂时只能这样！如果大家没地方可去，我倒可以帮助大家介绍其他的工作岗位！如果大家去其他部门任职，我们也将发放一部分遣散费！”

局长既然都开口了，大家还赖在这里干什么，纷纷开始自谋出路。有些特务也乐得就此跑路，毕竟特务名声太臭，做小贩也比做特务强，而且形势变了，特务不吃香了，与其继续从事这份赚钱少，一不小心还会搭上性命的特务工作，不如拿着遣散费回家做小生意去！当然，想要离开中统局的特务大多是低级别的特务，这些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随即，以人事代理主任孙翼谋、专员陈文昭等为代表，共计三十余人，向叶秀峰提出离职申请。叶秀峰丝毫不予阻拦，大开绿灯，放行离职。

叶秀峰的做法让曾经的元老级特务们坐不住了，顾建中、季源溥等人听闻中统局的特务们纷纷离职跑路，开始为中统局担忧起来。过去中统局再难，也没有出现过大批特务离职跑路的现象，更何况是局长号召大家“跑路”，如此下去，中统局岂不要解散了？于是，顾建中和季源溥分别致电叶秀峰。

顾建中在电文中这样说：“如果仅仅是因为资金匮乏而放人跑路，会被外人看作不耻！钱没了还可以继续赚，但是人走了，就很难再拉回来了！”

季源溥在电文中如是说：“中统人员随随便便离开中统局，与誓词精

神相违背。长此以往，中统精神成为摆设，中统局也将慢慢消灭！”

这两个元老级特务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在徐恩曾时代，每一个特务进入中统局都要进行一番庄严宣誓，其中的一句誓词为：保守组织秘密，绝不自动求去。而中统局的规章制度则写明：特务工作是终身的选择，一旦背叛组织，将接受严厉的处罚。

此时的叶秀峰，终于清醒过来，他也回过神来：是啊，倘若这些人去了别的部门，把党国的秘密透露出去怎么办？倘若真有人泄密，中统局岂不成了泄密局？看来，裁员不是可行的做法啊！叶秀峰为此非常苦恼，夜不能寐。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留住个别重要人物，如果失去这些重要特务，中统就失去了骨架，中统局必将垮台。于是他致电季源溥和顾建中，感谢他们的提醒，请他们帮助规劝特务们留在中统局。

可是，“跑路”的意见是叶秀峰亲自提出来的，而且徐恩曾的下台，随着战事的变化，国民党日趋没落，中统特务的心也都逐渐凉了。人心涣散、拆台走人已成大势所趋！叶秀峰即便是强弩，也势不能穿鲁缟了。叶秀峰自己拆了自己的台，眼看着中统局如溃堤一般，特务们纷纷离去，他欲哭无泪。

为了离开中统，特务们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谎话。

有一个特务填写的离职理由是：家父病重需回家照顾，特申请离职！

这个特务刚刚填完辞职书，另外一个特务便效仿这个“版本”，复制了一篇：家母病重需回家照顾，特申请离职。

结果第三个特务也照法效仿。

结果，叶秀峰收到的十几份离职申请书中，有一半以上都源自“同一版本”，这回轮到他回天无力，只能仰天长叹了。

小特务们刚走，大特务们就坐不住了。连叶秀峰一手栽培起来的心腹杨博清也写了离职申请，杨博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曾混入延安抗大，是叶秀峰的心腹特务。尽管叶秀峰一再挽留，但杨博清还是不肯留下，最后，辞职而去，远渡印尼，当起了华商。

眼看连自己最亲密的特务都弃自己而去，叶秀峰怅然泪下。原以为替代了徐恩曾，就可以稳坐中统宝座，没想到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还没烧完，自己就快成光杆司令了。

杨博清走后，中统局刮起一阵“辞职风”！特务们纷纷填写辞职书辞职，有的甚至连辞职书都没填，便偷偷离开中统局跑路去了。那些曾经的中统精神、中统誓言，终于变成了废话、屁话，徐恩曾时代的中统，已然樯橹灰飞烟灭。

特务们离开中统局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改朝换代”。

说起叶秀峰其人，着实没有太多号召力，他狭隘贪财，缺乏凝聚力。与叶秀峰相比，徐恩曾虽然财迷，但徐恩曾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头脑”，让大家都得到一些实惠，哪怕在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依然能够让大家住进唐家沱。而叶秀峰虽然也做了不少生意，开发了自己的“商业头脑”，但是他只是妄图通过搜刮中统局内的“民脂民膏”发家致富！小特务们本来赚钱就不多，徐恩曾走后，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叶秀峰是发财了，可大家手里没钱，谁还愿意为叶秀峰卖命啊？干脆都拿着遣

散费走人吧。而且到了后来，离职的小特务连遣散费都拿不到了，叶秀峰竟然鲸吞了上级下拨的“遣散款”！

叶秀峰不仅贪财，而且吝啬，他的吝啬是出了名的。当然，叶秀峰对自己非常大方，天天酒席不断，但是对自己的下属，却出奇的吝啬。叶秀峰极少宴请中统局内的老特务，反倒总是蹭老特务们的饭局。私下里，特务们还给叶秀峰起了个外号，叫他“打捞局”局长。

当然，在叶秀峰做局长的日子里，中统局还是有些举动的，特别是在改名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之后，这在后面的节里都会详述。但总体来说，叶秀峰的局长做得并不成功。然而，他做了几年中统局局长，却给自己敛了2700根金条。

俗话说：不是你的，你永远也得不到。吝啬的叶秀峰，即便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上了中统局局长，拿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老天爷也终究会让他“吐”个干净。

在1948年，解放军连连胜利，准备渡江之时，叶秀峰开始心慌。他慌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这几年聚敛的钱财。为了防止被共产党清缴，他让自己的儿子带着钱财乘上海招商局的太平号轮船先行奔赴台湾。但他没有想到，当船行驶到台湾海峡时，竟然触碰了暗礁！叶秀峰的儿子，连同叶秀峰在中统搜刮的2700根金条，一起沉入了大海。在中统局的特务们因为吃不饱穿不暖纷纷跑路之后，叶秀峰竟然还私藏了2700根金条，可见其贪婪之至。当儿子和金条均沉入大海的噩耗传来，叶秀峰两眼一黑，晕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就是这个道理。

1949年4月，身无分文的叶秀峰跟随其他国民党成员，一同去了台湾。

2.改名换装的中央党员通讯局

中央党员通讯局，就是二陈给中统局取的另一个名字。徐恩曾曾这样叮嘱过手下的特务：“做特务不要做猪八戒，而要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中统局也是如此，变来变去是中统局的一贯特色，换个名字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在政协会议上，民众强烈要求蒋介石做出承诺，取消特务机关。于是乎，蒋介石按照事先与二陈商量好的办法冷静发言，做出了四个承诺。

所谓四个承诺，就是：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再次找到二陈，并嘱咐二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否则他实在不好在公众面前交代。

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字，也并不是信手拈来的。

1946年，蒋介石下达指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李士珍等人组成一个七人研究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探讨中统和军统的“换装”一事。

这七人小组再三讨论，提出了方案一，即将中统改为类似美国FBI一样的立法机构，隶属司法部。这个方案一经推出，就得到了蒋介石的

好评。但是当时国民党司法部部长却以“舆论”为借口，坚决反对将中统归属司法部。这让七人小组非常挠头，二陈非常着急，他们急于给中统一个落脚之地。随后，他们提出了方案二，即将中统划归内政部。为了确定该方案的可行性，二陈先行找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征求意见，张厉生本是CC系成员，所以痛痛快快答应了二陈的请求，同意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二陈这才放心地提交了方案二，可没想到，此方案送到立法院后，竟然又遭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说中统跟内政毫无关系，于是方案二迫不得已也搁浅了。二陈十分沮丧，没想到给中统局找个落脚之处这么难。万般无奈之下，二陈又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挂在党务部门名下，改名“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一次，中统局的“换包装”方案终于得到一致认可，中统局终于旧酒装在了新瓶里。

新中统局成立以后，主要任务还是“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陈立夫在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十年后，终于再次接手“中央党员通讯局”，局内的一切人事全由陈立夫统一安排。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叶秀峰虽然还是局长，但是真正垂帘听政的，却是陈立夫。

“党通局”的大骨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砍掉了不少闲杂人员，以体现国民党党务部门“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宗旨。和上节我们所提到的叶秀峰的裁员行动近似，叶秀峰在党通局成立后，提出了建议：党通局的首脑、通讯以及党务调查处必须保留，其他部门可根据任务情况进行有目的的删减。叶秀峰的提议得到了陈立夫的认可，于是所谓的“重组”拉开了帷幕！

重组后的局长是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泮；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叶秀峰直接领导。

重组后的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根据实际情况改为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之后，党通局又建立了三个外延单位。所谓外延单位，就是延伸在各个机关中的科室。这些科室表面看似隶属所在机关，其实受“党通局”的控制。这三个外延单位分别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特种经济调查处。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该局是“党通局”最早成立的一个外延单位。该局局长是吴大钧，主计长是陈立夫的叔叔陈其采。主计处原有五个科室，后来为了工作需要，又增设两个科室，即第六科、第七科。所有的人员均由陈立夫和叶秀峰安排。其中原第三处处长王秀春担任统计局帮办，主要负责领导第六科、第七科；王宗梧担任第六科科长，张义成担任第七科科长。另外还安置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四十余人。但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六科、第七科虽然隶属主计处统计局，但该局却不能干涉两个科室的

工作，简直就是一个“怪胎”！第六科主要负责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主要负责施政成绩统计。为了提高第六科、第七科的业务能力，叶秀峰也效仿徐恩曾开设学习班的方式办起了统计讲习班。为此，他还专门请主计处统计局的副局长朱君毅进行讲课。

除此之外，党通局也开始向其他机构渗透。经陈立夫和叶秀峰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统计室内增设一个科，这个科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科、第七科的统计工作。后来叶秀峰还要求统计局划出四分之一的人员为党通局提供后备支援。如此一来党通局的外延单位从中央到地方就形成了一张“统计”网络，叶秀峰感到十分高兴。

二、人口局第四处

该部门是党通局成立的第二个外延单位。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原本打算将原来中统局全部接手过来，没想到遭到立法院的一致反对。为了给陈立夫、叶秀峰一个人情，张厉生决定在内政部开设一个外延部门帮助党通局，于是这个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就诞生了。

该处处长是前任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张国栋。该处下设三个科，其中三个科科长分别是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该处共计29人，都是原中统局派过去的特务。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任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是党派人事登记，并对党派重要人物（主要指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等）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之用。

1949年夏天，由于内政部和社会部合并，该处并入内政部户政司，而原本的处室单位也下调为科室单位。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蒋介石兵撤台湾，这个部门便就地遣散了。

三、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陈启天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找到陈启天：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陈启天知道陈立夫在党内的地位，于是巴结陈立夫，同意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而这个特种经济调查处就是党通局的第三个外延单位。后来叶秀峰按照陈立夫的要求，让本局统计处处长郑尧泮出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一职，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设四个科和一个室，其中一科、二科、四科是党通局派来的陈伯中、郑铸、余中瑜。而三科、一室则是青年党派的人。

特种经济调查处与老中统局的特种经济调查处有所不同，新组建的特种经济调查处工作范围更大，并且在各个经济中心以及交通枢纽设立了经济调查站，类似于中统局在各地的“特务室”，形成一张“经济调查网络”，可见陈立夫和叶秀峰还是非常有野心的。各地区经济调查站设主任一名，调查员若干，这些人员大多是原中统局地方调统室“转业”的特务。比较出名的几个经济调查站有：重庆站、天津站、武汉站、广州站、兰州站、太原站、济南站、青岛站等等。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叶秀峰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性，则专门成立了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比地方站点级别高）。无论是办事处还是调查站，都是一个类似于区域分公司性质的挂牌的行政单位，并且可以对外向各单位行文。

当然这些分站点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此处

设在上海劳尔东路1号（原日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的住宅）。这里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简直如同疗养院一般。后来叶秀峰委任赵毓麟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赵毓麟还兼任经济部驻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一职。

以上三个外延单位虽然各自披着不同的“外延”皮囊，但实际上由党通局、叶秀峰一手把持。叶秀峰不但有外延单位的人事任免权，同时每年还将定期对外延单位人员进行考核、登记。在薪金发放方面，叶秀峰充分考虑到调动外延单位人员的动作积极性，除固定薪金外，他还增发年终奖、各种福利以及优抚费、婚丧补助等等。仔细算一算，外延单位的员工薪水似乎比党通局内在编员工的薪水还要高。叶秀峰就是采用这种“施之以小惠”的办法从而达到统治、笼络的目的。

党通局虽然成立了，但是难掩其颓势。

在种种情况下，叶秀峰不得不亲自主持局内各个工作，并制定出一份“工作改进意见”，其意见如下：

甲、关于机构方面者：本局现有机构未臻紧凑，各部配合，亦欠灵活，故效能亦鲜。症结所在：一为机构庞杂，骈枝多于实务；二为分工尚欠合理，职责不专；三为若干单位有人无事或有事无人，不能发挥实效；四为中心业务部门受编制拘束，拓展迟缓；五为临时会组设置太多，会商耗时，计划多于执行。改进意见如下：

一、似可裁并之单位

1.训委会机构庞大，内容空洞，人力缺乏，成绩甚少，如能予充实，似即可并入四处；

2.研究室经常工作闲散，所有工作意见，因缺少对实际业务之了解，与实务单位每多出入，若不能有所更张，不若依照性质，分别并入各处；

3.资料室原分党派、敌伪、党政三部，各归主管科直辖，嗣为统一管理，特合并或单独成立，然两年以来，所有资料均未能及时整理，需要时实法调用，形同虚设，此种脱节现象，亟须立加改进；

4.特经处业务在外颇多毁誉，今敌寇投降，该处业务亦无继续必要，似可即予撤销。

二、应予充实之单位

1.秘二科；

2.秘三科；

3.交通处电讯科管理松懈，效率甚低，各地电讯人员，缺乏政治训练，以技术人员自居，不受拘束，自称系统，不听各地调统室指挥，常有怠工情事影响工作匪浅，应即拟订整个计划，训练新人改善待遇，淘汰怠顽，力使充实，运输科有名无实，亦需即加调整；

4.密电组过去分设两处，力量不能集中，应予合并。

三、临时委员会及小组希能减少

本局过去组设各种问题临时委员会及小组甚多，开会频繁，事权不专，影响各部门主管业务之推进，不如加强处科之责职，尚有成效，会及该项组设非必要者似可予以减少。

四、省室机构之调整

1.现行之督导区制度，不仅未能发挥积极作用，抑且影响省室工作

情绪，增加人事纷争，牵制甚多，似应予以取消；

2.提高各省室之地位；

3.对于省室之权限，似应予以扩大；

4.省市机构中似有增设交通科之必要；

5.各省政府增设统计处，由各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兼任一案，中央业经通令实施，本局应即积极进行，争取成立；

6.由本局成立视察团之组织，团长以高级同志交任，团员选拔熟悉各种业务人员担任，予以较大之权力，出发各地视察，就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7.目前各省室缺乏下层基础，工作多属蹈空，在党调合作之原则下，各县党部委员或书记长至少应由各省室推荐派充，或由省党部指定担任调查工作。

乙、关于人事方面者

本局人才缺乏，基本干部健全者尤少，人员配备调动不够灵活机动，命令之执行，亦未能贯彻，同志之精神，不能蓬发，此种严重现象之形成，一由人事制度迄未能完全确立，取才进士犹未配合实际工作之需要；二为现有及外派同志之管理及训练，不够严格积极，未来干部之培植尤少通盘计划；三为本局负特殊任务而无特殊之待遇及保障，所有各级同志之待遇有时反较一般党务工作同志为低，而未来出路如何，亦未见有适切之部署。具体意见如下：

一、建立适合本局特殊性质之单行人事制度，给予工作同志生活及未来出路以保障；二、嗣后录用新同志，必须经过严密外围关系及一定之训练，取才之标准须品德才干兼重；三、同志之待遇应较一般机关为高；四、内外同志待遇一致，机会均等，并实现内外互调办法；五、提高训练内容，改进训练方法；六、规定工作同志之最低服务年限，期满后按其成绩予以较优之介绍外派机会，使其新陈代谢，干部源之补充不绝；七、现有工作人员应立即进行严格之检查，淘汰各部门冗员及不堪造就之人员；八、外派同志必须是有工作上之必要及规定服务之年限届满后为之，然后指定其任务，严密联系、管理；九、纪律之执行必须严格、经常、平等，始能辅佐命令之贯彻；十、随时注意同志之意见，务求组织之利益与各同志之利益密切相关；十一、考绩及升迁，必须公开；十二、解决人事问题应规定一定之程序及手续，避免殉情偏私，做私人路线之活动；十三、为保障同志生活，似可规定退休养老金、储金、人寿保险、调差家属补助、按期给予休息或旅行假期等办法；十四、人事登记工作，目前尚未达理想境地，似应积极改进，向办理有成绩之机关多加观摩借鉴，俾便于检查考核，扩大其用途。（以上资料选自《国民党党史资料》）

虽然叶秀峰千方百计想要做出点文章，但是党通局自成立之后便向着它的“悲剧”命运靠拢了。叶秀峰在短短几年的宝座上，是不可能留下诸如“破获刺汪案”、“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以及“制造南委事件”等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了。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搞搞破坏、制造一点动静罢了。

3.收缴日伪资产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宣言指出：盟国对日作战将继续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投降。公告还规定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即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惩办战争罪犯；禁止军需工业等等。几日后，也就是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携带着原子弹的美国战斗机分别飞抵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下迄今为止人类用于战争的唯一两枚原子弹。遭受原子弹重创的日本，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投降。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非常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桃子便是胜利的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就要问桃树是谁栽的，又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不挑，现在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毛主席知道蒋介石将要下山摘桃子了，蒋介石得知日本投降的那一刻，立刻响应毛主席的"讲话"从峨眉山上下来，准备摘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他致电南京的何应钦，委其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打算收缴所有的日伪资产。

日本人盘踞中国几十年，开矿、修建铁路、创办银行等等留下了大量的资产。据统计，日本投降后留下约有4万亿的日伪资产，这个数字是个天文数字，恐怕比中国当时的GDP还要多。4万亿资产啊，哪个人不眼红啊。几天后，蒋介石下令"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实际上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一时间各种接收机关林立，仅平、津、沪、杭四地就有此类部门175个。这些接收大员们趁机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纷纷占房子、抢车子、夺金子、捞票子，接收已经沦为劫收。如此一来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

当时的"混乱"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抢"。

"天上掉馅饼"哪有不抢的道理？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日伪房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房产中就有5000多幢被抢占。

第二个是"占"。

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贴上封条化公为私，其中南京2000多幢日伪房产几乎被国民党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

第三个就是"偷"。

这里的"偷"，其实是监守自盗，比如汉口宝安大楼收缴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珠宝、古董，等到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

第四个就是"漏"。

指的是日本人为了讨收缴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那些资产直接进入收缴人员的口袋。而在移交物资的过程中，又经过层层"剥皮"，加之伪造清册，又有许多日伪资产被截留。据悉，周佛海在上海共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根，法币现款

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这些“资产”大多数落入了收缴官员的口袋里。

收缴日伪资产对于中统局也是个好消息。由于中统局的资金日趋紧张，特务们时常发牢骚。为了迅速掌握各大城市的“日伪资产”，叶秀峰便组织特务们进行劫收，他先是找有关人员谈话，组织召开座谈会，而后又认真研究了蒋介石下发的“接收日伪资产”的相关文件。各地调统室将各地市情况汇总给叶秀峰，他总结道：“时间短任务重啊！如果我们下手慢了，东西恐怕就是别人的了。所以你们下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抢好的，抢贵的，抢有价值的！抢得越多，咱们局的日子也就更加好过！当然谁抢得多，谁的成绩就大，谁就是中统局的功臣！”听叶秀峰一说，那些穷疯了的小特务立刻吹着口哨响应起来。

后来叶秀峰听说军统局也开始下手了，所以他发出动员令：抢就抢在军统局前头。为了提前抵达日伪资产相对集中的上海，叶秀峰可谓用尽了浑身解数。按照过去的交通方式，从重庆到南京，走水路要一周时间，坐汽车也要三天三夜，但是如果乘坐飞机，或许几个小时就到了。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提前摘到“大桃子”，叶秀峰便开始打起飞机的主意。

当然能够掌管飞机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除了蒋介石之外，也就是二号人物何应钦了。叶秀峰掰着手指一算，自己的中统局里竟然有这么一号人物与何应钦关系密切，此人就是重庆区区长徐兆麟。叶秀峰马上致电徐兆麟：“兆麟啊，现在正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但是偏偏咱们缺少一架飞机，那就劳驾你找一找何公，事成之后必然会有你的好处。”

徐兆麟觉得既然有好处，那就试一试：“局长，我去试试！”徐兆麟挂断电话，便去了何应钦的家里。徐兆麟是何应钦的老部下，自然关系不错。徐兆麟来访，心情不错的何应钦自然接纳了他。

徐兆麟开门见山：“何公，这次来，我有求于你！”

“什么事还用得着这么客气？”何应钦让徐兆麟上座，并吩咐侍奉倒茶，“先喝茶，慢慢说……”

“为了响应总裁和您的号召，这次是去南京收缴日伪财产！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担心资产被共党占为己有，所以想借你的飞机一用！”徐兆麟非常紧张，但是局长交代的事也不得不办。

没想到何应钦倒是十分痛快，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党国打下来的天下当然要党国自己收！现在我手头上正有一架飞机，我就借你一用吧！但是千万要记住，共党狡猾得很，千万不要让他们抢夺了胜利果实！”

“谢谢何公！”

拿到何应钦的飞机，徐兆麟便高高兴兴地给叶秀峰打了个电话。叶秀峰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任命徐兆麟为中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而后他们一干人马坐着何应钦的豪华客机空降南京，马上进入“清缴日伪资产”的备战状态。几个小时候后，叶秀峰又让飞机折回重庆，接副局长郭紫峻等人马去北平抢劫日伪资产。后来他又任命郭紫峻为中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劫收日伪资产的工作。

除了南京、北平之外，上海似乎更重要些。上海作为日伪活动的重要地区，遗产似乎更多，于是叶秀峰派自己的亲信吴星伯去上海收缴日

伪资产。吴星伯，中统局“九大太保”之一，其他八位是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季源溥、谢永存、徐兆麟、张国栋、王保身等。此人虽然拥有一身本事，但是过去没有得到徐恩曾的重视。叶秀峰上台后，他又逐渐回到人们视野，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5年11月，吴星伯授叶秀峰旨意带着大特务陈庆斋、王汇百等乘飞机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他们在上海劳尔登路1号挂牌成立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劫收上海及华东地区的日伪资产。不过当时上海办事处的管理范围很大，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

吴星伯来到上海时，戴笠的人已经开始下手了。吴星伯有些着急，于是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决议与军统局分庭抗争，在上海分一杯羹。中统局的到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有的人为了立功，厚着脸皮跑到吴星伯的面前说：“吴主任，我知道哪里有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车子、钞票……甚至是女人！”

吴星伯一听非常高兴，他拍拍那个人的肩膀：“只要你好好干，党国不会亏待你的！”吴星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劫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后来他还收缴了曾经是汪伪政府第一杀手吴世宝的防弹汽车等等。

吴星伯来到上海后，大权独揽，为了发泄曾经的郁闷（以前不受重视），天天找小姐陪酒。只可惜“兽性大发”的吴星伯换来的竟然是“梅毒”，没有享受几天快活，便一命呜呼了。叶秀峰得知吴星伯因“病”去世的消息，既生气又无奈！后来他调CC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季源溥（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顶替吴星伯继续接收日伪资产。

上海的日伪资产里，哪些资产最值钱？答案只有一个：房子！叶秀峰当然知道房子最值钱，于是致电季源溥，让他多抢房子。季源溥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建了一个收房小分队。小分队成员皆是拿着棍棒、斧头的地痞流氓，季源溥抢房子就是靠这些流氓挥舞大棒暴力争夺来的。

季源溥的这一小分队果然很有本事，几天工夫便抢下十几栋花园别墅。这些别墅位于上海市中心繁华区，交通便利、环境优雅、视野开阔，绝不比现在的豪华大宅差！

“抢楼深陷窝里斗”，军统和中统为了抢楼，竟然打了起来。季源溥的小分队为了一栋楼，与前来收缴的军统局的人打了起来。双方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了这座坐落在钜鹿路的一栋房子大打出手，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竟然为此开了枪！

枪声惊动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制止事件的发生，司令部直接派部队进行干预。后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钱大钧出面当和事佬，劝双方各退一步，为此伤了和气实在没有必要。除了当和事佬的钱大钧，国民党高官李宗仁也是深有感慨。他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

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节选《李宗仁回忆录》）

事情总算平息了，房子最终归中统局所有。但是叶秀峰听到此事后还是有些生气，他紧急致电季源溥：“抢房子是好的，但是不要因为抢而伤了和气！”叶秀峰的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是点名批评季源溥野心太大，一手遮天；另一点则说明中统局的地位，确实比军统差一些，他不想为此得罪军统的人！

除了劫收日伪资产外，中统局还要有个目的，接管日伪政府留下来的特务。叶秀峰曾说：“既然这些人大多曾是中统人员，现在日本人被打跑了，自然应该回到中统局的队伍中来。”

起初，叶秀峰的这一观点遭到季源溥的反对。季源溥致电叶秀峰：“咱们中统局不缺人，为什么还要找一些汉奸回来做事？”

叶秀峰解释道：“这些人盘踞上海许多年，必然熟悉上海的各个情报组织及各种情况。既然日本人被打掉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替我们卖命，找共产党呢？”

“可是这样会坏了中统局的名声啊……”季源溥有些担心。

叶秀峰继续解释道：“想要对付共产党，就一定要让这些人为我所用！现在是特殊时期，只能从权！还有一点，抗战期间，咱们在上海的力量已经基本被瓦解，这也是重新组建的好时候！既然是上级交代你的事情，你尽管做，别的就不要问了！”季源溥见叶秀峰有些生气，便不再追问，低着头办事去了。

叶秀峰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上海的中统力量在抗战期间确实已经支离破碎。要么归顺了日本人，要么成为汪精卫的特务，要么重新回到青洪帮的流氓组织里继续当流氓。原本的中统上海总部，除徐兆麟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一百多人均被归化或者击毙。日本人被打跑之后，上海又回到了国民党的手里，之前“叛逃”的中统特务此时非常害怕，担心中统局的人找他们的麻烦，于是四处拉关系，想方设法回到中统队伍中来。恰恰“心慈手软”的叶秀峰给了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继续为中统局服务。

不过叶秀峰也部分采纳了季源溥的提议，担心这群人“污染”了中统局名声，于是他想起一个办法，开设“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这下子，就让这些“汉奸”变成了中统局的地下人员，不遗余力地继续进行反共工作。为此叶秀峰又公开站出来说话：“参加研讨会的同志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活都不容易。过去为了生存被迫加入汪伪的，应予同情。今天你们亲自投效，自当接纳。为了避免他人之误解，消除参加人员之精神负担，安心为本局工作，才开办此研讨会。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同德，完成总裁之嘱愿！”

叶秀峰公开站出来喊口号，给他人以机会，其实也是为了“钱财”！为什么呢？态度好的日伪特务为了把握住这次机会肯定会不遗余力巴结、讨好叶秀峰，不惜将值钱的东西送给叶秀峰。叶秀峰看准这一点，才亲自跑到上海公开招募喊话。

当然能够进检讨会也非容易之事，进检讨会，是收门票的。所谓的“门票”，就是钱。不少人为了重回中统局不惜以黄金、洋房、美女等等贿赂中统的高级官员。其中副局长顾建中、季源溥，高级督察苏恕

诚，南京办事处主任徐兆麟等等均得到高级别墅一套。而局长叶秀峰得到的别墅自然比那些人还要好了——一栋位于玄武门昆仑路的花园别墅。

叶秀峰为了办好“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同样也是为了“发财”，他把检讨会的地点设在了苏州市观前街张家巷29号的一栋私人住宅（原汪伪政府苏州法院院长的住宅）里。这个住宅分上下两层，下面是招募办公的场所，上面是特务宿舍。为了“敛财”，叶秀峰派自己的心腹王保身担任检讨会主任，吴若萍担任副主任。

检讨会一共开设两期：第一期招募学员20余人，时间是在1946年5月至6月期间；第二期招募学员42人，时间是在1946年9月至10月期间。参加检讨会的学员每8～10人编为一学习小组，几个地位较高的学员被指定为教导员。为了保证其“学习”质量，叶秀峰还亲自制订学习内容，其内容如下：

阅读：主要阅读《中国之命运》、《总裁言行录》以及蒋介石所著的《行为哲学》等，每天阅读完后写阅读心得，并交由指导员打分。叶秀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帮其“二次洗脑”，以为中统局所需。

写日记：要求学员每天写日记，日记内容仍旧为学习心得。日记相当于“家庭作业”，每天由主任王保身、吴若萍审核。如不认真写者，便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教育。

小组会：每周召开1～2次，小组会由各小组长负责。小组会期间，每个学员轮流发言，不发言者将被扣分记过处理。绝大多数学员都会尽其所能站起来发言，不论言论深浅与否，都不敢大意。

纪念周：每周举行一次，类似于“中山先生纪念会”。纪念周上，一般由主任王保身亲自召开。如检讨会来了高级官员，则由高级官员组织开会、演讲。

精神讲话：所谓精神讲话，是蒋介石经常在党内搞的一套。是为了传达总裁精神，消除他人思想。可以说叶秀峰的这一举动是受蒋介石的影响。精神讲话是检讨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往往是由叶秀峰、顾建中、季源溥等亲自讲话。讲话完毕后，要求学员进行大讨论，并且写讨论心得。

辩论会：每期举行一次，一共举行了两次。其中第二期辩论会的辩论题目为：周佛海是忠还是奸。此题目是主任王保身所出，他要求正反两方要以事实为依据清晰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正方认为：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一直为日本人卖命，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反方认为：周佛海为了保护上海的“民族经济”立下汗马功劳，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行为。正反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充满了火药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辩论，王保身宣布反方获胜。

文娱活动和游览：每周留出两个晚上供学员娱乐。至于游览，每期组织举行一次。为了丰富学员生活，检讨会还举办过一次灯谜会。

如此看来，叶秀峰举办的检讨会还是蛮正规、蛮讲人性的。不过这个检讨会表面看似“轻松”，实则非常严格。检讨会规定：凡是有事者必须写请假条上报签字，凡认为“假事”不合理者，一律不准签字。看来想要休息，也要练就一身“造谣”的本领才行。而且凡是进检讨会学习的学员，一律进行编号洗牌，不准以真实名字进行互相称谓，用以隐藏其个

人身份。

学员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中统局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可自行安排。其中有一批“专长”学员后来又成了中统局的骨干，得到了叶秀峰的重视。还有一些死不悔改的死硬分子，比如汪伪76号大特务苏成德、丁默邨等则以汉奸罪直接枪毙。研讨会结束后，叶秀峰让所有学员以自愿形式为中统事业基金会捐款。据说此项捐款数额巨大，实为叶秀峰假借名义聚众敛财。那些学员深知其缘由，就当成是“破财消灾”吧！

如果说叶秀峰等人的“劫收”还可以从个人贪财来辩解的话，那么政府规定的兑换率（法币兑换成伪币，比价是一法币兑二百伪币），却是国民党高官对上亿沦陷区人民的一场大洗劫。那些带着法币的军政官员们借此发了大财，这种“杀贫济富”抢劫式的经济政策，自然激起了潮水般的民愤。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短短几年后，国民党因“劫收日伪资产”遭到了覆舟之报。后来李宗仁回忆道：“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4.为中统局敛财

叶秀峰劫收日伪资产除了中饱私囊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帮中统局敛财，扩充经济实力。抗战结束后，中统局迫于舆论压力，不仅改名“党通局”，而且还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瘦身。削减，主要指的是财政方面。原本中统局就是个清水衙门，叶秀峰接手之后反倒成了揭不开锅的穷衙门。叶秀峰深知：没有钱是笼络不住人心的。于是他开始注意上海的日伪资产，是不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帮助中统局缓解资金紧张局面。抵达上海之后，叶秀峰告之忙于劫收日伪资产的特务们应特别留意一下日伪留下的实业公司，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有竞争力的外资公司。如果能够劫收，就全部劫收过来。不能劫收的，则想办法参加管理，对外挂上中统招牌。

就在此时，一家大公司进入中统特务的视野。这个公司名叫三河集团。此公司是朝鲜人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在上海开办的企业。这个公司规模很大，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而且经营业务很广，非常引人注意。日本投降后，失去靠山的朝鲜人一下子慌了神儿，无奈之下只能寻求其他势力保护。

后来该公司老板联络上中统局的特务周英才。周英才一听非常兴奋，但是苦于自己的地位不高，他也不敢妄吞，所以将这事上交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吴星伯处理。其实吴星伯一早就知道这个三河公司，这个公司在上海滩算是赫赫有名的外资企业，如果能把它收缴上来，岂不是为中统局开了一家银行。事关紧急，他又不敢一人做主，于是致电叶秀峰。叶秀峰得知此事，立刻命令吴星伯：“此公司乃日伪留下的宝贵财富，一旦接手，必然缓解中统局之紧张财务。既然该公司已经送上门来，那就想办法接手！如果接手不成，就想办法参与管理！”吴星伯奉命

去三河集团进行谈判。

事情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美好，三河公司的管理者不同意中统局入主三河公司，并且声称自己与吴星伯的谈判目的主要是寻求“势力保护”！吴星伯见软的不成，只好来硬的。吴星伯说：“如果你们全权管理，那我手下的兄弟可就会闹事的！”三河公司的管理者见中统局的人来势汹汹，只好答应将半数资产送给中统。作为回报，吴星伯同意将三河公司的管理者安全送回朝鲜。不过没过几天，因嫖妓感染梅毒的吴星伯竟然暴毙身亡，朝鲜人慌了神儿，怕协议不作数，于是撕毁了先前的承诺。

顶替吴星伯谈判的季源溥继续与朝鲜人进行谈判，但是见朝鲜人“反悔”了，于是放出狠话：“你们三河集团是日伪资产，明天我就派人查封，所有资产归我党国所有，你们一个子也捞不着！”朝鲜人一听更加慌神儿，不得不重新与凶狠的季源溥进行谈判。

季源溥的“恐吓”战术很奏效，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以三河公司出资、中统进行管理的模式筹办了一家名为“建新企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得知此消息，叶秀峰十分高兴，但是仍旧叮嘱季源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查清三河公司的全部家底儿，以免上当受骗！”

于是季源溥组织特务人员对三河公司进行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除了设在上海的德昌卷烟厂和三河铁厂外，其他分设在各地的分公司早就被国民党其他单位哄抢一空。

德昌卷烟厂其实还是不错的，设施完备，只要备好烟叶、插上电源，即可开工赚钱。不过这些烟叶没有存放在烟厂仓库中，而是被宋子文的部下劫收，囤放在青岛银行的货栈里。季源溥深知这批烟叶的重要性，此时正是“等米下锅”之际，岂能干烧火不做饭？于是他致电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归还烟叶。但是季源溥的官衔太小，根本吆喝不了宋子文。季源溥眼瞅着没有了下文，只好将此事交予叶秀峰处理。

叶秀峰知道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舅子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如此大的官衔岂能在意一个小小的中统局局长？于是叶秀峰致电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让陈果夫出面帮忙。陈果夫不仅地位高，道行也比叶秀峰深。他出了一计，要叶秀峰遵照这一计谋进行安排。

于是叶秀峰致电三河公司的管理者，要求他们先在上海成立一家“韩国人民党”协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并将三河公司下属的工厂全权交由人民党，然后再假以人民党之名将半数资产赠送给中国国民党。人们都知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国民党的“党”是二陈说了算的。财产归属国民党党部，陈果夫自然就有权力分配三河公司的半数资产。陈果夫利用此计谋，将三河公司的半数资产移交给了中统局。

得知陈果夫打自己的主意，宋子文非常生气。于是让人放风出来：宋子文不是好惹的，德昌卷烟厂之烟叶绝不白白送人。

陈果夫见宋子文跟自己干上了，于是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宋子文：“现在党费紧张，这批烟叶拨给中央财务委员会，以免将来党费不足时，还要由国库拨付。”

见陈果夫玩硬的，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宋子文只好作罢，将烟叶拨给了中央财务委员会。后来陈果夫让中央财务委员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指定拨给季源溥，以便让德昌卷烟厂恢复生产，帮资金紧张的中统局“造

血”。

除了这个三河公司外，叶秀峰还命令各地的中统特务接手企业、公司、酒店、商场若干，并且兴办了不少工厂，其中最令叶秀峰感到满意的还是永业盐业公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统局介入盐务行业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徐恩曾执掌中统局时期，大特务顾建中就在两淮盐务管理局担任局长。盐务管理不仅是个肥差，而且“淮盐”更是有着“煮海之利，两淮为最”的说法。淮盐以巨大的课税财源备受历代朝廷和政府的关注。在奴隶社会，淮盐是奴隶献给奴隶主的贡品之一；在封建社会，淮盐又是国家的重要财源，在唐宋时期，盐税常占国家整个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收入之首；在清顺治年代，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民国时期，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收入三分之一以上；解放战争时期，两淮盐业曾是革命军队的重要经济支柱，两淮盐场曾有“华东金库”之称。后来顾建中虽然离开两淮盐务管理局，但是他对“淮盐”有了充分的认识，他强烈建议叶秀峰筹建盐场。

顾建中为了打动叶秀峰，先从“淮盐”历史说起：“叶局长，盐自古以来就是好东西啊，早在吴王阖闾时代，两淮地区就开始煮海为盐。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刈草供煎，燃热盘铁，煮海为盐，昼夜可产千斤。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到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成熟。可以说‘煮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盐是百味之王，更是能量之源。人可以一日不吃东西，但是不可以一日不进盐！”

“有这么厉害？”叶秀峰将信将疑。

顾建中继续解释道：“你想想看，中国4亿人口，每天人均至少一勺盐！4亿勺盐是个什么概念？恐怕就是一座高如五岳的盐山啊！更何况，两淮的盐务，共党也一直盯着不放！如果干，就要赶在共党前头！”顾建中见叶秀峰仍不为所动，便继续说：“全国上下，从事晒盐的公司有很多。大大小小数万家是有。但是这些盐场还不足以满足日常之需。从市场角度分析，开盐场是非常有市场空间的！但是晒盐的成本非常低，可以说除了人力，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如果我们想赚钱，干脆去两淮开盐场！”

“可是你已经离开两淮盐务管理局多年，盐业部门的情况你可否了解？”叶秀峰小心起见，还是持怀疑态度。

不过顾建中早有准备，他继续为叶秀峰答疑解惑：“虽然我离开盐务局多年，但是我对那里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首先，在各地盐业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多数都是当年我开班培养的人。他们不念恩情也会念旧情，一定会帮我们打掩护的！况且咱们中统局一直跟盐打交道，各方面的势力还是有的！”

“可是从事盐业工作，是不是还要跟这些势力合作？”叶秀峰问。

顾建中胸有成竹地说：“当然不行。凭什么让那些人分我们的羹？况且晾晒淮盐没什么技术，只要咱们出人便是！”

叶秀峰一听非常高兴，于是把开办盐业公司的事情交代给顾建中办理。顾建中写了一个“策划书”，然后把策划书交给叶秀峰。叶秀峰拿着策划书找到陈果夫、陈立夫。二陈看了一眼策划书，觉得此想法不错，

于是让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下拨5亿法币，作为中统局经营盐业的资本，当然此项目只能以国民党党营事业开办，后来便成立了这家永业盐业公司。

该公司位于上海南京东路51号三楼，表面看上去像是一家私营公司，其实是隶属国民党党部、全权由中统局经营的盐务公司。公司开张那天，鞭炮齐鸣，当地政要悉数前来。此公司董事长由叶秀峰担任，副董事长则是顾建中，公司总经理则是原上海盐务局局长汪天行。

为了扩展业务，提高销售量，叶秀峰在武汉、长沙、南昌、南京等地设销售分公司，所有分公司的领导也是由叶秀峰精挑细选的。由于早年中统局在盐务方面打下的关系网络，所以公司一开业，淮盐销售十分火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狂赚5亿法币，顺利回本。叶秀峰绝对是个见钱眼开的家伙，见“淮盐”真乃暴利行业，于是倾心倾力，又在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开设销售点、经销部等。这些销售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属汉口分公司。

汉口分公司的总经理名叫顾别林，这个名字拗口的总经理也是叶秀峰选中的。此人是江苏昆山人，原来是盐务缉私督察员，与叶秀峰私交不错。叶非常信任此人，而此人也确实有些经营头脑。汉口分公司开业之后，顾别林又在汉口的各个街道开设类似于连锁店性质的门市档口，以“价廉质优”为原则，与其他盐商展开竞争。由于其经营灵活，少数零售，多数批发，根据实际情况把利润大头让给零售商以占据市场份额，从而击垮其他竞争对手。

后来叶秀峰从政治角度提醒他：不但要做好市场，而且还要与税务部门搞好关系，这样才能有序发展。顾别林接受叶秀峰的建议，想尽一切办法与税务部门搞好关系，比如请客、送礼、红包之类。后来税务部门有盐税变动消息，便会第一时间通知给顾别林，顾别林在盐市上更加得心应手了。

顾别林根据盐税上下波动的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增税的时候，他就大量调拨食盐给门市部，按照新税后的盐价进行销售，从而赚取大量额外利润；减税的时候，他则大量出售库存，从而避免税差造成的影响。

不过生意好了，不免招惹他人“红眼”。汉口分公司的某业务员名叫卢姚，原来曾参加顾建中的盐务缉私督察训练班，后来与顾别林一样担任盐务缉私督察员。此人负责襄阳片区的销售业务时，利用职务之便，鲸吞盐款。后来此事被中统局发现，后立案进行调查。叶秀峰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并怒斥此人为“盐仓里的老鼠”，于是开除了他。

叶秀峰的“生意经”本想一直念下去，结果被一件事打断了，这件事就是1949年解放军的渡江战役。眼看“白区”变成“红区”，无奈之下叶秀峰只能将永业盐业公司迁至广州。失去多年打下的关系网，销售量迅速减少，最后盐业公司被迫遣散各地销售人员，叶秀峰的发财梦就此结束。

5.建立徐州临时工作站

在老局长徐恩曾看来，徐州、连云港、蚌埠地处要塞，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是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一样。这些地方不仅是共党活动频繁的地区，而且还有丰富的物产。其中徐州拥有亿吨存量的煤田，而煤有“黑金”之称，非常值钱；连云港以南则是重要的“淮盐”产地，而“淮盐”有着“白金”之称；至于蚌埠，乃黄淮地区交通要道，北上是徐州，东南方向则是南京。如此看来，徐海蚌地区绝对是经济、军事战略要塞，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立分区，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就把徐海蚌地区划为搜集特务情报、吸纳财产的要地。

叶秀峰上任后，也发现了这个“金三角”！为了与徐恩曾时代的特务区分，他竟然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临时工作站”！其他地区的工作站要么叫分区，要么叫地方调统室，而这个“临时工作站”在中统局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看出，叶秀峰对于“徐海蚌”地区抱有一种投机心理。

当然成立“临时工作站”并不是叶秀峰一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他的上司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意图。蒋介石曾经在一次甲种汇报会上分析：日本人和共党之所以看中这些地区，除资源外，主要还是交通。徐州乃全国之重要交通枢纽，蚌埠也是如此。越是“要塞”，越容易遭到共党分子的觊觎和破坏。而陈立夫也讲道：过去中统局在“徐海蚌”的收获还是挺多的，于是建议重新成立一个工作站，及时向党国提供情报。

1945年9月，徐州临时工作站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原徐州崇文路17号的老调统室内，而叶秀峰制定的徐州调统室、连云港调统室（海州）、津浦铁路特别党部调统室徐州段室和陇海铁路特别党部调统室徐州段室统统归徐州临时工作站管辖。这个工作站虽然是“临时”的，但管辖范围还是相当大的。

徐州临时工作站成立后，先是由朱敦杰担任工作站站长，后来改由周懋轩担任。临时工作站下设情报、组训、行动三个组，而其主要成员有：孙仲遐、吴振芝、夏自由、单兆宽、朱太庭、谭光中、王建藩、张为振、单作勤等。周懋轩上任之后，进一步完善“临时工作站”，增设人事，其中周建业为秘书，单作勤为组训干事，肖增耀为情报干事，封涛为行动队长。

重组后，徐州调统室迁至徐州市南门内艺波巷四号，主任吴振芝，助理李继芳、助理干事是孟广琛和解春圃。抗战胜利之后，铜山农村已经成为解放区，于是铜山县调统室也迁至徐州某木材厂内，主任是单兴玉，内务干事是张为振和王建藩。

徐州临时工作站行动队有四个分支：其中南关一队由刘昌汉担任队长，西关二队队长是夏自由，东关三队队长是王朴，北关四队队长是杜文彬。此行动队成立后，主要“行动”内容是劫收日伪资产。但是不幸的是，叶秀峰的算盘还没准备好，就被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制止了。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打了起来，此时徐州临时工作站也有较大的人员变动。陈蔚如顶替周懋轩担任徐州临时工作站站长，站员王玉如负责情报编列工作。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工作站”对外与徐州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联络，对内则指导徐州区域内各调统室。其中，叶秀峰指定周建业为徐州“工作团”团长（隶属临时工作站），前往江苏的丰县和沛县、山东的鱼台县等地进行共产党情报调查，直到后来解放军主力北撤到山东胶东地区后，“工作团”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解散掉了。

与此同时，徐州临时工作站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入鲁工作团”，总团长是陈蔚如。工作团还下设三个分团，其中：第一分团进驻临沂，团长是王仲常；第二分团进驻兖州，团长是王天生；第三分团进驻鲁西南，团长是周建业。当然“入鲁工作团”的主要目的是搜集山东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开展“策反”工作，侦察共产党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情况。后来第一团进驻临沂后，由于该地区没有中统局调统室，只能与临沂专员王洪久联系，工作几无进展。第二团进驻兖州后，由于兖州分区主任郑培琦将泗水等县的还乡团介绍给第二团，第二团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由于后期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许多情报没有派上用场。第三分团始终没有进入金乡、鱼台、嘉祥等地区，所以几乎没有掌握任何的情报！内战开始后，解放军的火力很猛，山东、苏北地区很快就成了解放区。徐州与连云港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徐州临时工作站看上去确实有些“临时”的意味了。那个本来辖管多个区域的徐州临时工作站，此时却被解放军“砍掉”了一条腿，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而徐州城外到处都是共产党的人，中统特务们几乎无机可乘，搜寻情报一事变得更加艰难了。

后来这些特务们为了搜集情报，竟然想出一招：抄报纸！他们将目光转移到由山东地区的共产党创刊、发行量甚大、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众日报》。于是陈蔚如下令，让特务们想尽办法搜集《大众日报》，然后择取“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情报进行整理。当然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如果让叶秀峰知道，肯定喷血不可。

更可笑的是，特务们搜集来的《大众日报》皆为过期报纸，且报纸上涉及“共产党党政军”的真实面貌少之又少，总不能抄一篇臧克家的诗歌给叶秀峰看吧？于是那些被摘下来的所谓“情报”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工艺”，抛光、喷漆、打蜡等……最后乍一看，果真像刚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新鲜情报。他们哆哆嗦嗦地将情报呈给叶秀峰，叶秀峰一看，竟然大悦。后来叶秀峰经常看到徐州临时站发来的情报，竟然还多次在丙种会上表扬他们，说：“以徐州分区为榜样，各个区要好好学习！”更加荒唐的是，叶秀峰还将这“大众日报的剪贴版”呈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也没发现其中的问题。

当然陈蔚如的“抄报纸”的行为也是短期行为，时间一长便会露出破绽。于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让小特务们冒死深入共产党腹地，采一些真实的情报回来。于是，那个“入鲁工作团”就出现了。进鲁的特务们先是乔装打扮一番，披着假名，扮成老农形象进入解放区。

不过这些特务“演技”实在拙劣，况且大多数特务都是外地人，经常被老百姓或者共产党拆穿。于是之，这些特务们便像老鼠过街一般，躲也躲不起，逃也逃不了，无奈之下只能全身而退。还有一些特务，干脆装成外来乞丐，佯装进解放区要饭。后来个别特务得到了共产党的恩惠，竟然撕掉“特务”外衣，在解放区过起老百姓的生活来。还有一些装聋卖傻的在津浦铁路滕州段进行活动，他们发现铁路沿途到处都是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他们染上了“心理毛病”，看到有怀疑目光，便远远跑开，后来索性沿着津浦铁路回到徐州。除此之外，在收复砀山县的时候，特务们在当地抓了一名乡镇干部进行问话。乡镇干部说，解放军早已撤离砀山，地方共产党员早已隐藏起来，难以抓捕。于是砀山县一下

子变成了“死城”，而情报工作也无从进行了。

迟迟打不开局面，情报又不能不报，进退两难之下，陈蔚如还是让特务们继续抄报纸。报纸不够抄了，于是就把“小道消息”当成情报也抄下来。后来“小道消息”也没有了，只好闷着脑袋胡编乱造！即便如此，陈蔚如还是要求按日电报给叶秀峰，骗取其信任并领取“特情”人员的津贴费。

1946年，特务吴植涛发现了一个秘密，于是他向陈蔚如汇报道：“共军物资大都由海上供应，我们有小火轮，可以在海上进行拦截，断掉共军粮草！”

“你说的句句属实？”

“我是海州（连云港）人嘛，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按照‘以组织对抗组织’的传统办法，我们还要成立一个海上工作团才行！”吴植涛信心满满，似乎早就幻想着自己的海上作战团缴获了共产党的粮草。

“好吧，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陈蔚如立刻致电叶秀峰，叶秀峰非常赞同这个想法，但是鉴于上海区已经成立了海上工作团，于是电复：建议很好，不过长江口已经有这方面的团队，海州就不必重复建了！陈蔚如看到电报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暗暗骂了一句：“叶秀峰把好的统统留给了季源溥，连点渣都不剩！”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徐州“贾汪煤矿”的共产党案件。徐州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尤其以煤炭储量最大。而徐州大大小小的矿点中，又唯独这个“贾汪煤矿”最大。可以说贾汪煤矿是徐州市的一颗明珠，甚至在全国煤矿中也赫赫有名。

留学美国，学的又是工矿专业的叶秀峰自然就把徐州与煤矿联系到了一起。贾汪煤矿的矿主徐季植也与叶秀峰、陈立夫同为留美同学。归国后，叶秀峰进入党务调查科当科长，走的从政之路，而徐季植则当了煤矿主多年，算是实业派代表。两个人虽然不在同一个行业，但是私交一直不错。后来徐季植无意中得知贾汪煤矿有共产党活动，于是致电叶秀峰，并要求叶秀峰前来贾汪煤矿调查。得知此事，叶秀峰派党政调查处的刘震来贾汪煤矿调查取证。当然“此事”叶秀峰并未告之徐州临时工作站，而是偷偷进行的。

1946年的12月，徐季植似乎觉得：区区一个刘震是不可能找到共产党的，于是他悄悄派贾汪煤矿总务主任王慕山找到中统徐州临时工作站的站长陈蔚如。其实当年担任盐务督察的陈蔚如与早年担任盐务局税警科长的王慕山是老熟人，两个久未见面，如今却因为“贾汪煤矿共党一事”碰到了一起。陈蔚如见故人来访，于是在工作站附近安排了一桌席。

两个人先是嘘寒问暖一番，然后切入正题。王慕山说出来意：“最近有人向我报告，贾汪煤矿有一个名叫邢旭东的人非常可疑。此人是从山东来的，既不下井挖煤，也不是矿工家属，整天在矿上鬼鬼祟祟转来转去。此人说话很和气，总能跟矿工们打成一片，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一听此话，陈蔚如笑了，陈蔚如道：“既然你觉得他是共产党，手里有何证据证明？”

“唉，只是凭感觉！反正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

“既然这样，回去之后你就找人盯紧他，掌握他的一举一动，尽可能

全面地搜集证据！如果真的是共产党，那就立刻逮捕！”陈蔚如还是将信将疑，但是既然老朋友造访，自然就以诚相待，酒满心诚了。

两个人喝着喝着酒，心胸也渐渐打开了。

王慕山压着陈蔚如的脖子道：“你知道吗？这次来徐州城，如果不是我老板的旨意，我才不会来哩！我老板哪，跟你们叶老板关系不错……”

“什么？”陈蔚如一听，惊讶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是装糊涂呢，还是真的不知道？”王慕山也十分惊讶，“他们是留学美国、学习工矿的老同学，私交好着哩！”

“真的？”

“这还有假？我骗你干什么？”王慕山端起酒杯又是一口，喝完这口酒，王慕山竟然神神秘秘道：“小陈，还有你不知道的哩！”

陈蔚如也压低脖子，小声问：“还有什么秘密？”

“其实邢旭东一事，你们叶老板早就知道了。他还偷偷派一个叫刘震的家伙来矿上调查。那个邢旭东，就是他挖出来的。”

陈蔚如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大的事情，叶秀峰竟然隐瞒不说，而是派自己的亲信来矿上调查，简直没把他们这群特务放在眼里。陈蔚如没有急着骂娘，而是偷偷对王慕山说：“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千万不要传出去，这样影响不好！我会暗中帮你查实，放心吧！”

送走王慕山，陈蔚如陷入深思。他原本以为叶秀峰十分相信徐州临时工作站，没想到却留着一手。他有些愤愤不平，自言自语道：“不愧是个老狐狸，要不然怎么身居高位？”陈蔚如有些进退维谷，但想想自己已经答应了王慕山，只好暗中委派津浦铁路调统室的赵振声去贾汪煤矿暗中调查。

几天后，陈蔚如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南京汇报工作。但是令其出乎意料的是，叶秀峰将其喊至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交代给他，叶秀峰道：“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代你做。前不久，贾汪煤矿徐矿长致电，他们发现矿上有共党分子活动，我已经派人去了，你回去之后抓紧与贾汪煤矿的工作人员联络，争取将其分子抓获归案！”

陈蔚如心里一惊：“局长，我如何处理？去了找谁？”

叶秀峰保密起见，写了一张纸条塞到陈蔚如的手里，然后叮嘱陈蔚如：“到了贾汪煤矿，你将此条交给刘震，然后逮捕邢旭东。”

于是陈蔚如正式接受叶秀峰交予的任务。

陈蔚如从南京回到徐州，匆匆从贾汪煤矿赶回来的赵振声便急着向其汇报：“果然不出你所料，那个邢旭东真是一个共党分子。此人来到贾汪煤矿后，就开始对矿工进行赤化，煤矿因为此事驱逐过他，但是却纷纷遭到矿工的掩护。如不立即逮捕，恐怕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陈蔚如一听，便点头道：“你说得有道理，看来此人非抓不可了！”

于是陈蔚如立即向叶秀峰请示抓捕工作，叶秀峰同意后，陈蔚如通知田康、李剑华、周懋轩、赵振声等人密谋抓捕邢旭东。陈蔚如考虑到如公开抓捕邢旭东，或许会引发矿工骚动，于是采取秘密逮捕的方式。随后，陈蔚如下令给徐州调统室和津浦铁路徐州段调统室共同执行抓捕任务。

两天后，赵振声带着一群特务坐着大卡车摇摇晃晃来到贾汪煤矿矿区，而后将邢旭东骗至一偏僻处，突然间冲上来一群特务将邢旭东摁进

卡车，押回徐州。

到了徐州后，受叶秀峰的指令，陈蔚如立即对邢旭东进行了严讯逼供。没想到的是，邢旭东真是一个硬汉，打死也不肯交代。特务们连续审问五天五夜，也没有从邢旭东嘴里得到口实。无奈之下，陈蔚如只好将邢旭东放了。

后来，王慕山邀请陈蔚如参观贾汪煤矿，期间并送陈蔚如100万新法币当作“辛苦费”。陈蔚如虽然没有从邢旭东嘴里得到丁点儿“共党信息”，却在这徐州煤田上捞了不少好处，他还是十分高兴的。

1947年6月，叶秀峰亲自来徐州临时工作站视察。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陈蔚如等特务们真是一阵忙活儿。先是单独腾出一间房屋将新买的大床安置好，随后又花大价钱雇了徐州市最好的大厨，至于什么情报资料等统统准备好，用于摘抄情报的《大众日报》则统统销毁，以免露馅。陈蔚如恐有照顾不周之处，同张春帆、田康、李剑华等亲自去徐州火车站迎接。叶秀峰一下车，陈蔚如便跑前跑后，又是提包，又是端水。

但是叶秀峰并没领陈蔚如的情，他一早就让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安排好了落脚之处，地点是徐州的凤祥银楼。凤祥银楼其实是类似于“正元实业社”的地下特务组织，这个组织甚至连某些特务都不知晓。而叶秀峰此次来徐州的目的就是与“凤祥银楼”里的特务进行一番谈心。临走之前，叶秀峰听了徐州临时工作站的工作汇报，听完之后也未进行详细评价。

其实叶秀峰此次“视察工作”的重点还是在凤祥银楼里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这些人曾经是中统局特务，抗日时期曾经短暂加入了汪伪政府。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又想尽办法托各种关系回到了中统局的队伍中，而叶秀峰来此地的目的还是为了“钱”！

叶秀峰是个贪财之人，他知道徐州临时工作站成立时间太短，特务身上没有多少油水可刮取，但是凤祥银楼里的地下工作人员便不同，这些人盘踞徐州多年，抗战胜利后也截获不少日伪资产，叶秀峰就看准这个。这些地下工作人员不敢得罪叶秀峰，只好将准备好的金条揣到叶秀峰的怀里。叶秀峰的徐州“三日游”可谓收获颇丰，如果按每人两根金条计算，叶秀峰一趟徐州行至少也有百十根金条进账。

叶秀峰走了之后，特务们终于明白了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无不大骂道：“什么狗屁局长，原来也是贪财的货色！”

“是啊是啊，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

不过骂归骂，叶秀峰也听不到。他回到南京后，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其中将大特务田康调至昆明任禁烟总署滇黔区督察员，而陈蔚如和李剑华则调回南京总部。一年后，淮海战役打响，徐州临时工作站也随之解散了。

6.较场口血案

叶秀峰自上任以来，总摆脱不了与前任徐恩曾的比较。与徐恩曾相比，叶秀峰在反共方面的成绩可谓乏善可陈。叶秀峰深知：想要打开局

面，必须要在反共方面做点文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战后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他派遣张治中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地点设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办，时间为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计38人。

本来政协会议与叶秀峰等人无关，但是此时的他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像一只饿狼般盯着各民主党派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共产党。叶秀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特工组织”，在“重庆实验区”内进行大范围调查、搜集共产党人的情报。为此他还将其情报汇编成册，每日呈报给陈立夫和蒋介石批阅。与此同时，国民党极右分子对中共谈判抱着悲观态度，作为极右分子中的一员，叶秀峰也不希望国民党在共产党面前妥协。于是他对局内特务强调：“即使政协会议谈判成功，我们也要破坏共产党的行动。”叶秀峰与陈立夫“珠联璧合”，在与会期间便制造了著名的“沧白堂事件”。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重庆各进步人士为了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自发成立了政协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自1946年1月12日至27日间，连续八次召开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便在重庆沧白堂进行。由于与会民众众多，每一次开会都会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叶秀峰见此状况，非常烦恼。他问陈立夫：“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这样下去非闹出事情来不可！”

“是啊，重庆人已经疯了，唯独棍棒才可解决！你尽快安排一下，千万不能让这群人闹出乱子！我担心的是，共产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陈立夫目露凶光，他见不得民主分子在他眼前“跳舞”。

叶秀峰非常重视此事，于是连续派中统特务在会场里进行捣乱、打杂。其中1月14日，协进会恰逢郭沫若讲话，当郭沫若激情澎湃地讲到“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成为党军”时，混在人群中的特务便开始捣乱起来。特务们时而大呼小叫，时而挥舞着棍棒，现场一度陷入混乱，此次会议不得不被迫终止。

1月17日，协进会刚刚开始没多久，一群特务拿着喇叭在民众间狂吠：“打倒共产党，拥护国民党。国民党万岁！总裁万岁！”特务们一边喊，一边趁机捣乱，如此一闹又令会议终止。

1月18日，叶秀峰安置的特务变本加厉，他们一边捣乱，一边向会议主席台投掷石块。本来政协代表王若飞要发言的，见此场景只好作罢。

1月19日，捣乱已经演变为赤裸裸的恐怖事件，其中许多政协代表、媒体工作者遭到了特务们的谩骂和殴打，许多人被特务打伤。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沧白堂事件”！得知协进会无法召开，叶秀峰非常高兴。他表扬自己的手下一番：“你们做得不错！他们散了会，共产党就无法做文章了！”虽然叶秀峰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却无法控制政治协商会议的走向。

由于与会人员代表着中国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中共以及民主力量，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复杂、激烈的讨论。

中共代表顺应民意，团结各党派民主分子与国民党极右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最后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和人民的决议。关于军队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原则，并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方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关于政权问题，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从而确保国家的和平发展。纲领还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一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关于改组后的政府，三方协商认为，从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政府，负有召集国民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确立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行政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但是立法院对行政院内阁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有权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历经22天，最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蒋介石非常生气。

会议刚刚结束，陈立夫和叶秀峰去总裁办公室向蒋介石汇报近期工作。蒋介石听完汇报后颇为无奈：“我对宪章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能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叶秀峰还在纳闷蒋介石怎么突然妥协了，没想到蒋介石马上就变了脸，他怒斥道：“这都是共产党的诡计。对于这次政协会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所谓“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的意思就是让叶秀峰放开手脚，用武力对付共产党。叶秀峰非常了解蒋介石，知道他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政协会议令其难堪，他必然会采取手段进行报复。

但是对于这种大事，陈立夫和叶秀峰都不敢做主，于是向蒋介石请示具体行动方案。蒋介石心情不好，陈立夫也不敢多说，只是简单说了几句。陈立夫说完，等蒋介石开口指示，没想到蒋介石一句话也没说。如此一来，反倒令陈立夫、叶秀峰乱了方寸。两个人见蒋介石脸色阴沉，不敢再说，退出了总裁室。

随后，叶秀峰对陈立夫说：“总裁心情不好，咱们要想个权宜之计才好！”

陈立夫叹了口气：“是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难对付，民盟的人竟然也帮他们！事已至此，看来我们只好尽快动手，替总裁分忧解难才是！政协会议结束后，共产党、民盟一定会庆祝一番，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下手吧！”

随即，陈立夫与叶秀峰制订了计划，决定以重庆的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2月10日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为目标，从扰乱会议入手，阻止会议的顺利召开。

最后，陈立夫再三叮嘱叶秀峰：“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细，不能给共党反咬的机会！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才行。他迅速召集本局的大特务们一起研究“破

坏活动”的具体做法。破坏方案制订出来后，叶秀峰立即致电国民党重庆党部协调任务部，最终与党部协调任务部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力求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举中统特务刘野樵为大会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党员参加演讲辩论，以控制局面；

二、把握会场秩序，发动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及社会服务队等600余人参加大会（主要是搞破坏），其中市党部组织科负责200人，干事长陈介生负责200人，委员徐鸣亚负责200人；

三、派警察局人员进行现场维护，对“捣乱者”进行抓捕工作；

四、遴选有能力的人员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等，参加大会的600余人应予开会前一小时提前抵达会场，以保护主席团的安全。此主席团由叶秀峰安排，一共9人，这9个人是中统特务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理事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和市党部科长庞仪山。与此同时，叶秀峰还提前准备了一百多个“打手”，准备伺机破坏会议现场。

2月10日上午8点，叶秀峰安排的9人主席团在中统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党员等600多人的护送下早早来到会议现场。这些人按照叶秀峰事先规定好的，按照每组成员20人，分成30组悉数围在主席台周围，形成“阵势”。为了掩盖破坏活动，叶秀峰还组织了一个“军乐团”伺机制造混乱。

大概9点左右，与会代表李公朴、沈钧儒、郭沫若和马寅初等人来到会议现场，李公朴是此次大会的发起人。刘野樵见李公朴到来，便上前讯问：“会议还没开始，我们趁这个时间先定一下主席团的人选吧！”

李公朴知道刘野樵是中统特务，便委婉拒绝道：“虽然我是大会发起者之一，但大会却不是我李公朴一个人说了算的！周恩来、邵力子等人还未到，大家到齐了，再商量主席团人选的问题吧！”

“等所有人员都到位，你不觉得太耽误大家的时间吗？与会人员个个都有公务在身，请您不要因为个人想法而耽误了大家！”

李公朴看了刘野樵一眼，冷冷地回答：“凡事都要按照原则办事！”

刘野樵见李公朴油盐不进，便怂恿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发言，只见周德侯突然站起来说道：“我们推举刘野樵当会长，大家都有事，会议必须马上开，请刘会长讲话！”

青年活动家施复亮见状，站起来怒斥刘野樵和周德侯：“请你放尊重点，先让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

就在李公朴准备站起讲话之时，突然就被身旁的特务包围了起来。特务们拿着棍子、铁尺朝李公朴身上打去，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赶上前去阻止，李公朴就已经被特务们打倒在地。眼瞅着李公朴被打，郭沫若连忙上前阻止，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走上前来的郭沫若就是一顿暴打。就这样，李公朴被特务们打得浑身流血，身负重伤，随后冲上来的郭沫若、马寅初、沈钧儒等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



就在特务们疯狂打人之际，周恩来、冯玉祥等人也赶到了现场。周

恩来见此惨状，大声怒斥中统特务：“这是什么国家？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允许这种暴行，简直无法无天了！”

刘野樵等特务们，碍于周恩来和冯玉祥的威名，终于收起了凶器，逃离了会场。

现场一片狼藉，血迹遍地、伤员众多。周恩来迅速拨通了医院的电话，请医院派救护车来救助，并亲自护送李公朴等人去医院就诊。

此次“较场口事件”，共有60余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以李公朴伤势最为严重。

后来，李公朴等人以“刘野樵殴打伤害罪”向重庆地方法院提出控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野樵竟以诈伤为由反咬一口，向法院提起控诉，说李公朴等人诬陷自己。

3月15日，重庆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事，庭长龚某只是走了走过场，最后竟然说：双方既是被告又都是原告，况且大家均是社会知名人士，建议双方采取政治途径调节，化干戈为玉帛。就这样，这场震惊全中国的“较场口血案”不了了之。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然而国民党中央社却对事件进行了歪曲，处处为打人特务进行辩护。后来郭沫若发表言论抨击中央社：“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盐田。”（选自《郭沫若传》）

7.“一二·一”惨案

作为学生运动（以西南联大为主）的发源地之一，云南地区一直是国民党非常关注的省份。尤其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一些重要工厂、教育机构等陆陆续续迁至昆明，云南省的战略位置便凸现了出来。尤其当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大”设址昆明后，昆明便一下子成了“学生运动”的热闹地区。一些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也随之来到昆明，其中就有闻一多、李公朴等。

昆明的学生运动，也引起了中统特务孔秉礼的注意，他向二陈汇报工作说：“昆明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温床，现在昆明学生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二陈于是下令给当时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吩咐其监视“西南联大”的一举一动。徐恩曾根据这种情况，在云南设置了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分别是：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简称“云南省调统室”；

滇川、滇越铁路国民党两路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简称“两路室”；

第四区公路总局国民党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简称“路室”。

可是陈立夫还是不放心，为了更多地了解昆明的状况，他还向蒋介石请示，自己以“视察教育”为名，带领着中统、社会部、教育部的一帮人亲自到昆明视察。陈立夫在察看了几所大学、中学，听了一些汇报后，感觉云南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陈立夫回到重庆之后，便上报蒋介石：“如果再不加大控制力度，恐怕云南会沦为红区！”随后，陈立夫

找到云南的中统头子查宗藩和刘介鲁，让他们在监督“学生运动”的同时，留意一下支持学生运动的“云南王”龙云的活动。

“云南王”龙云，字志舟，彝族，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他主政云南17年，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有“云南王”之称。

徐恩曾下台后，叶秀峰接管了昆明方面的任务。云南调统室、“两路室”、“路室”为了在新主子叶秀峰面前展现自己的本事，竟然争相抢功。令人搞笑的是，这三个组织为了获得同一个情报，不惜互相掐架！叶秀峰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将三个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昆明区调统室。叶秀峰的这个做法显然是换汤不换药，合并后的三部门依然我行我素、各扫门前雪。折腾了半天，叶秀峰见“效率”不佳，无奈又将昆明区调统室遣散，再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三个组织分开后，各自发展壮大。于是这些组织就不那么安分了，做了很多坏事。他们的恶行遭到昆明学生的强烈反对，就连“云南王”龙云都看不下去了，于是他派人抓了两个闹事的中统特务，决定给中统局点颜色看看。叶秀峰知道龙云是厉害角色，就连蒋介石都礼让他三分，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向龙云负荆请罪。

叶秀峰故作惭愧状：“龙司令，本人手下在云南地区犯下罪过实在是我叶某人教育不够造成的，还请龙司令您原谅！”

龙云也非得理不饶人之人，况且中统局也不能完全得罪，于是便说：“叶局长言重了！人难免都会犯错误，只要态度端正就可以了！这个请你放心，我马上打电话放人便是！”

龙云放人之后，叶秀峰却久久不能释怀。他觉得这个组织如果继续“无事生非”，必然影响反共大业。于是他决定缩小云南省调统室的编制，减少特务活动。此时叶秀峰也深深感觉到，要想在云南搞出一点名堂，必须要绕开龙云这座大山。后来叶秀峰在二陈面前无意间说起此事，结果陈果夫也说：“龙云势力太大，总裁有意将其拿下！”于是没多久，著名的“驱龙事件”就发生了。

1945年9月，日本人刚刚投降，蒋介石就认定“驱龙”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采用“调虎离山计”将龙云的主要部队，即卢汉的第一方面军第六十和九十三军调往越南北部，再将中央军调入滇南，以防卢汉回师援龙。后来蒋介石又将杜聿明部调往昆明，使龙云成为手无兵权的光杆司令。

1945年9月27日，蒋致信给杜聿明，信中写道：“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五华山。”

10月2日，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紧急磋商研究解决云南的问题。会上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由李宗黄任省民政厅厅长；卢汉未回到云南时，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当天下午，蒋介石将手令交给杜聿明，让杜聿明按照此手令办事。

蒋介石手令内容是：

第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前，由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第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第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10月3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兵包围了龙云公馆及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强迫龙云辞职去重庆。

10月4日，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由于其身边已无一兵一卒，迫于无奈只好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为安抚龙云，假意将杜聿明“撤职查办”，并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头衔，将其软禁起来。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被蒋介石调至越南驻兵，一时难以返回昆明。如此一来，云南省管治大权就落在李宗黄的手里。

李宗黄，字伯英，云南鹤庆人。1915年在云南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担任云南护国军都督府驻沪代表，后升任云南都督府参谋处长；1921年此人任军政府交通部次长；1923年，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四一二”之后，李宗黄回滇参加“清党”运动，得到蒋介石和二陈的嘉奖。1935年5月出任国民党监察委员。李宗黄同样是CC分子，由于其当选云南省政府代主席的职务，那么也就为CC和叶秀峰的特务们大开绿灯。

叶秀峰见李宗黄“登基”了，第一时间跑去云南会见了李宗黄。叶秀峰先是客套了一番，说：“得知李老上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我代中统局向你祝贺，祝你大展宏图，事事顺心！”

“多谢叶局长！李某能够上任，还要感谢大家抬爱啊！”

叶秀峰托人给李宗黄带来了昂贵的礼物，李宗黄看了之后非常欣喜，“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真是让你破费了。”

“呵呵，我也是有事相求啊！”叶秀峰终于说出自己的目的，“李老，你是云南人，你应该比我熟悉云南的状况。总裁开会点出，昆明的学生运动很是令人担忧，所以我这次来……”

“来之前立夫、果夫都向我交代了，这个事情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只要是有利于党国的，一律不设卡！如果缺少经费，省政府可以下拨，你尽管放心就是！”李宗黄是个明白人，作为CC系一份子，帮助CC，就是帮助自己！后来他还特别交代：“西南联大早有共党分子渗透，你们应该详查一下！”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等学校学生准备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此事经“眼线”传入李宗黄的耳朵里，李宗黄认定此事是共产党所为，于是上报给陈立夫。陈立夫回复李宗黄：“此事必然由共产党所为，必须尽快遣散学生，找出幕后真凶！”于是，李宗黄按照陈立夫的指示致电云南大学校长熊迪之，要求他马上制止学生的这种“疯狂举动”！为了防止事态发展，李宗黄还找来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让其调来大量警察，后来学生们见致公堂被封锁，只好选择在联大图书馆的草坪上进行反内战时事晚会。

1945年11月25日下午7点，六千多名四校师生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拥向联大，反内战时事晚会如期举行。晚会开始后，几个大学教授开始进行爱国演讲。第一个演讲的是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党员钱端

升。钱端升说：“对我们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让我们的国家从国共对峙的局面上缓和下来，我非常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一谈。”

钱端升的演讲还未完，校门外就响起了枪声。显然，早有准备的特务们想以枪声吓散集会的学生和市民。后来，由于特务们包围了联大，校门紧闭，参加晚会的学生们不能自由出入。

钱端升讲完后，联大经济系教授伍启元接着讲了“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伍启元说：“国家已经打了多年的仗，人民痛苦不堪，非常渴望和平。要使全国的财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一定不能打内战。内战一旦爆发，国家的元气就会大伤，经济就要崩溃，人民就要遭受更大的苦难。”

然而几分钟后，联大的电线就被特务割断了，晚会现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为了将时事晚会进行下去，师生们点起了蜡烛和煤油灯。

就在这时，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冒充学生，蹦到主席台上发言。他一开口就诬陷共产党：“共产党企图篡取国家政权，他们才是破坏政协、发动内战的元凶。”查宗藩没说几句，台下就有师生戳穿了他的特务身份。在场的师生们非常气愤，冲上主席台强行将其拖了下来。

第三个演讲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他演讲的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费孝通讲得非常好，台下师生听得非常认真，中间有特务屡次捣乱，然而也没能阻止费孝通和师生们的热情。费孝通刚刚讲完，院墙外又响起了枪声。最后，在场的六千多师生冒着生命危险，坚毅、乐观、有信心地举手通过了《制止内战及邀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最后上台演讲的是潘大远教授，潘大远话说得并不多，鉴于情况危急，为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他提议提前结束时事晚会。于是，时事晚会在雄壮嘹亮、整齐划一的歌声中结束。

当晚，得知学生们的“时事晚会”举行得很成功，叶秀峰十分郁闷。他拍着桌子怒骂道：“连几个学生都搞不定，还张口闭口大谈党国革命大业，简直是丢死人了！”于是他致电李宗黄，要求云南省政府和云南调统室的特务们拿出点真本事，做出点实际成绩来！

11月26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专等9所学校的学生举行了联合罢课。学校里贴满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标语，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追究时事晚会期间开枪人的责任。11月28日，罢课学校竟有31所之多，后来罢课学校师生联合发表了《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其内容如下：

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

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

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

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

而后他们又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内容如下：

第一，追究射击联大校园的责任人；

第二，立即撤销24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法令；

第三，保障学生的身体自由；

第四，要求国民党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学生运动的荒谬言论，并向参加时事晚会的学生道歉。

然而，李宗黄不但没有接受学生们的条件，反而决定以武装镇压的方式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后来陈立夫、叶秀峰纷纷致电，要求李宗黄下手要果断，不能心慈手软，出了问题中统局顶着。于是李宗黄与关麟征密谋：采用“组织对组织”的老办法，收买一群地痞流氓，然后让其成立组织，然后将“组织”交由中统局指挥，争取一举打掉“学生团老窝”！

李宗黄按照陈立夫的要求马上拟定了一份密电，密电如下：“各大中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倘再演变，难免有集会游行暴动等情势发生，为加强防备起见，本市党国当局已开会决定，发动召集党团员以实际组织宣传行动相机对付，已经分别进行办理。除分函各工厂机关查照外，兹指定该党部应召党员250人，以10人为一组，设组长1人，并由该党部负责人为领队，旋即就所有党员中选择优秀干练者编足人数，造具名册，并由领队人于明日下午2时亲自呈送来会，以便编组并参加本会召集的会议。切速勿延为要！”

为了搞好这次行动，李宗黄从省里拨款200万元用以雇佣流氓、打手以及购买棍棒、铁尺等武器，而后按照“组织对组织”的要求成立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的组织，先后在市区街道、学校附近张贴标语，并对爱国学生进行恐吓、围殴等，阻止学生进行宣传活动。

11月29日，昆明市再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除学校学生外，还有许多市民也加入游行运动中。

11月30日，也就是“一二·一”惨案的前一天，其中一群学生遭到了“反罢课委员会”的流氓特务的袭击，其中造成两人重伤，多人轻伤。

12月1日上午11点，昆明三青团支团秘书兼宣传组长周冲接到李宗黄的指令后，带着大批武装分子开始对昆明的大中学校进行冲击。

首先遭到冲击的是云南大学，一群手持棍棒的流氓、特务冲进校门，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

紧接着，另外一群武装警察则拿着棍棒、钢管等武器冲击西南联大的校门。学生们抵挡了一会儿，便被这些流氓冲开了。

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后来回忆道：“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到吴晗匆匆地从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吴晗同我所住的西仓坡联大家属宿舍，也有许多戴着歪帽子、流氓打扮的人进进出出，显然是特务来威胁。后来又有人来说，新校舍墙内落了手榴弹，炸死了4个学生。事态更加扩大了！”（选自《冯友兰回忆录》）惨案就这样发生了，无辜的学生遭到武装歹徒的残忍殴打，最终导致4人死亡、29人重伤。其中无辜死去的4名师生依次是张华昌、李鲁连、潘琰和年轻教员于再。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引发各界强烈关注，过去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大学教授也纷纷站出来谴责国民党的无耻行径。12月2日下午，联大举行校务会议。其中联大教授叶企孙、查良钊、袁复礼等分别在会议上讲话，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及对受害者的处理意见。后来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

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炳权参加受害者的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人致吊，并代表同人向受伤者致以慰问。

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

进行。

三、建议学校拨校园地以安葬本校死难两位同学。

四、接受助教28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堂等人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两人充任之。

五、罢教问题延缓讨论。

“罢教”是著名学者闻一多提出来的，惨案发生当晚，中共联大党组织和民青负责人洪季凯向闻一多、吴晗等人介绍了坚持、扩大斗争的方针和民青、罢联的部署，后来几个人表示赞同。但是“罢教”不是小事情，一度在联大校内引起争论。于是围绕“罢教”，联大内部再次举行讨论会，后来决定以投票的方式决定。经过最后投票表决，其中赞成停课者61人，赞成罢教者19人。

讨论会又通过了七项决议，决议如下：

一、法律委员会委员除上次会议推定之人外，再加请蔡枢衡、章剑、李士彤及助教丁则良参加工作；

二、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

三、电请三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务；

四、委托法律委员会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

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表示抗议；

六、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

七、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

这次议会虽然没有达成“罢教”，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停课”也是联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后来昆明罢课委员会为殉难烈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将烈士的遗体摆放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图书馆变为灵堂，四壁挂着各界爱国人士题送的上千件挽联。

从12月4日起，“灵堂”举行公祭，在一个半月内，竟然又有一半以上的昆明人前来祭奠，并收到公祭费用3000万法币。

与此同时，12月4日，昆明市400余名大中学老师公开声明：无限期停课，直到学生复课为止。

“停课”风潮迅速席卷整个中国，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也纷纷采取这种方式谴责国民党政府，以实际行动声援昆明学生运动。除此之外，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对此发表声明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苏联、美国、英国等外长发表公报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因为此次“镇压事件”，国民党政府可谓四面楚歌，逼迫蒋介石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挽回其政治影响。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昆明惨案》，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声援、支持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

与此同时，以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院校共同发表《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并提出：

一、严惩12月1日的主谋李宗黄、关麟征等人；

二、当局应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医药费；

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对于昆明师生提出的要求，云南省主席卢汉只是答应了部分承诺，能拖则拖，反而恐吓“停课”的师生：“若再不复课，听其酝酿演变，倘至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之时，其后果宁复忍言！”卢汉的这种态度再次将矛盾激化。

12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控诉国民党特务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周恩来、吴玉章等领导人还发表了演说。重庆各界三千多人也在同一天举行了追悼大会，郭沫若、沈钧儒等在追悼会上怒斥国民党及其军警、特务杀害无辜学生的罪行，要求惩办制造这起大惨案的凶手。

国民党为了劝学生“复课”，也是费了“一番苦心”！尤其是傅斯年（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曾一度支持清党，政治上反共），此人为劝学生复课，可谓“苦口婆心”一番。他先是以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站在昆明师生一边讨伐关麟征，而后又为自己摆出“贞节牌坊”，说自己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最后傅斯年脸色一变，说出实话：“赶紧开课，否则蒋介石发火了，一怒之下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

许多教授还是信了傅斯年的话，为避免以上情况发生，遂再次做出六项决议：

一、用本会名义函朱经农次长，请教育部转达政府：本会认为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有负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

二、本会应竭力求上列议案中之办法尽早实现；

三、本会应即劝告学生复课；

四、接受法律委员会所草拟之呈检察院文；

五、其余各项呈文授权法律委员会全权办理；

六、招待新闻记者之书面说明改用书面分送各报馆。

此次决议似乎是一语双关的，既表明严惩凶手的态度，也表态尽力复课。

傅斯年又借题发挥，借主持学校常委会抛出一决定：联大从17日起一律照常上课！但是这个决定立刻遭到学生们的反对。

傅斯年费尽心思，没想到17日一到，课堂上依旧十分安静，一个上课的学生也没有。此事令蒋介石非常生气，蒋介石怒道：“娘希匹，连几个学生都搞不定，简直辜负了党国的精心培养！”

傅斯年挨了骂，于是迫切需要在“复课”方面找到尊严。于是他继续声嘶力竭呼吁并威胁学生：如果再不复课，西南联大教授集体下岗。随后西南联大召开第五次教授会议，以“教授以辞职相要挟逼迫学生复课”为题，再次进行了一百八十回合的大讨论。其中一半支持傅斯年的“复课”，一半支持闻一多的“停课”，傅斯年与闻一多只能再度华山论剑。

闻一多质问傅斯年：“学生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换来的局面，怎么能说拉倒就拉倒？”

傅斯年竟然撕破脸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此种局面，完全被某些特殊党派利用！有些人声嘶力竭以学生当政治堡垒，不如滚出去！”

闻一多见傅斯年已经歇斯底里、不可救药，于是怒斥傅斯年：“家长

送孩子来学校学习，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却被人杀死在学校里。你一学生的老师怎能撒手不管？简直惨无人道！”

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只好做出“妥协”建议，建议有三条：

一、本会代表于明天上午9时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意见；

二、明日下午3时，请各系分别召集本系全体学生，由本系全体教授出席与学生对话；

三、劝导学生时与其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

“矛盾”在西南联大教授群里越来越尖锐，在学生里面也是如此。有的学生坚持“罢课”，并且流露出一种“一罢到底”的情绪。而另外一群学生在纷纷扰扰中渴望上课，如此情形令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十分纠结。后来梅贻琦与闻一多等人恳谈多时，学生不再坚持“罢课”，表态愿意与国民政府进一步交涉。翌日，梅贻琦带着学生的“说法”致电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在四面压力下做出了退步，同意对李宗黄、关麟征等进行撤职处罚。

12月27日，停课已久的昆明各大学校终于复课！

1946年的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为四名烈士进行“出殡”大游行。这一次游行，共有3万余名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参加，他们佩戴挽纱，庄严、悲伤地走过昆明各大街头，并沿街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等，后来著名学者闻一多、吴晗等人做了悲愤、感人的讲话，可以说“一二·一”运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生运动。

“一二·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昆明罢课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惩凶手，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等要求后，云南省政府被迫公开接受。惨案制造者李宗黄和关麟征被国民党政府调离云南。后来又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政府当局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了“一二·一”惨案的发生经过。

后来得知此消息，叶秀峰先是震惊，而后又是失落。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于是他致电陈立夫，问：“记者招待会的事情你知道了吧？这群学生简直无法无天了！”

“这足够说明背后有共产党为之撑腰啊！你不要灰心，革命工作是漫长的，不要在乎这一步棋的得失！”陈立夫出奇地冷静，他鼓励叶秀峰：“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已经起到了震慑作用，下一步就要挖出教唆学生对抗政府的共党分子！”

被“撤职的”李宗黄回到重庆后，也得到了陈立夫的正面评价：“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回来休息一阵也好。等事态平息下去了，我再在总裁面前建议重新给你安排工作。”果然，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李宗黄上任国民党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而关麟征也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还亲自给他颁授一枚勋章。

8.下关惨案

“一二·一”还未落下帷幕，没想到叶秀峰又把精力转移到了“南京”。有句话说得好：学会在老板眼前做事，是升职的关键秘诀！叶秀峰就是这么想的，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要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表现。在此之前，他在重庆的两个杰作“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反响都不错，所以这一次，他决定继续以“暴力”的方式给共产党人提个醒：我叶秀峰可不是好惹的！

说起下关惨案，还要从1946年的春天说起。

1946年春，南京下关等地涌入了大量难民，叶秀峰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于是致电大特务张国栋去调查一下。张国栋经过一番调查，发现那些“难民”绝非真正的“难民”，而是苏北解放区的地主们。

“那些人不缺吃、不缺穿，为什么偏偏跑到中央政府讨饭吃？”叶秀峰百思不得其解。

张国栋说：“您有所不知，这些人不是自己愿意跑出来的，而是被迫的！”

“什么？”叶秀峰觉得此事非常重要，于是与张国栋一同去了陈立夫家，希望得到陈立夫的指点。

路上，叶秀峰叮嘱张国栋：“一定要把事情真相说出来，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容易开展了！”

两个人来到陈立夫家，叶秀峰还没等坐稳，便开口说道：“今天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这件事关系着党国的伟业！”

“什么事？这么严重？”陈立夫皱起了眉头。

叶秀峰给张国栋使了一个眼色，张国栋接过话茬说：“哦，是下关来了一群难民！”

“难民？”陈立夫笑了，“刚刚打完仗，难民有什么稀奇的？”

“不不不，这些人根本不是难民，都是一些乡绅、富农，平日里根本不缺吃穿。”叶秀峰解释道，“关键是他们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都是共产党干的好事！”张国栋恶狠狠地说。

“立夫兄，记得当年共产党搞的阶级斗争吗？现在他们又在解放区搞斗争，把那些富农的房子、地、粮食统统共产了！那些穷瘪三整日里好吃懒做，现在却明目张胆地劫富济贫。简直荒唐至极！”叶秀峰有些气急败坏！

“他们都在下关？一共来了多少？”陈立夫问。

“一部分还在浦口，另一部分在下关。人不在少数，足有几百人！”叶秀峰补充道。

“是啊，这些人蓬头垢面，看上去十分可怜。有的人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情况十分严重啊！”张国栋也在旁敲侧击！

陈立夫一听，就变了脸：“共产党真好啊！人家富裕，你就眼红，你就揭竿闹起义，简直无法无天了！这样吧，既然他们来了，作为政府，我们就不能不管！”

“是啊，这些人滞留时间越长，麻烦就越多！万一抢东西、闹事，就麻烦大了！”张国栋接过话茬。

“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主，所以还得听您安排！”叶秀峰趁机溜须拍马，把定夺权交给陈立夫。

陈立夫叹了一口气道：“那就尽量动员他们离开南京，实在走不了

的，你们就先垫出一部分钱，将其安顿好！但是一定要派人妥善安排，千万不要出乱子！”

“难民人数太多了！”叶秀峰提出。

“难道我们不管，拱手推给共产党？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我知道安顿难民有难度，但是也要迎难而上，如果需要人手、需要钱，你尽管打报告，我帮你处理！”陈立夫话说到这里，叶秀峰就只好照办了。

于是叶秀峰硬着头皮接下了安顿“难民”的工作。他回到中统局，立刻召开会议，研究妥善安置“难民”的事。开完会，叶秀峰突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叔平。陈叔平何许人也？此人是江苏盐城人，抗战前，此人在中统局津浦铁路特务室担任干事（其兄陈中柱担任主任），抗战期间逃到重庆，后得到叶秀峰的赏识，于是便担任津浦铁路调查室主任。由于他是苏北人，对苏北情况比较熟悉。

叶秀峰随即找到陈叔平，对他说：“既然你是苏北人，目前滞留在下关和浦口的一部分难民就是苏北的，你去妥善处理一下，给他们分分类！”

陈叔平挠挠头皮：“处理这事并不难，关键在于资金。没有钱，难办事啊！”

“钱的问题你不要担心，我写个条子，你直接去财务领！”叶秀峰为陈叔平大开绿灯，不过他一再提醒陈叔平：“一定要把事情做扎实，不要出什么纰漏，更要留意一下共党的举动！”陈叔平领了钱，带上命令就上路了。

他来到下关、浦口一带，先是找了一些小喽啰，让这些小喽啰按照叶秀峰的嘱咐，将那些苏北“难民”按照县市清点了一番，然后进行分类登记造册。随即，陈叔平深入难民，由于他也是苏北人，于是迅速与那些难民打成了一片。

接下来，陈叔平给这些难民分类划组，分组后，陈叔平按人头每人发了两块大洋，帮助解决难民的吃饭住宿问题。当然，这些钱仅仅是领取金额的冰山一角，大部分都让陈叔平鲸吞了。

这些难民被安置好后，由于无事可做，整日游手好闲。就在这时，他们的“大恩人”叶秀峰出现了。他允诺：既然没有工作，我就帮你们找份工作吧！于是“难民”们欣然前往。后来这些难民成了中统局手下的打手和特务，被叶秀峰派至火车站阻止上海和平请愿团的上访！

上海和平请愿团，是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国共谈判之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人民团体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共谈判的进展。这个团共有九名请愿代表，分别是：马叙伦、篑延芳、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吴耀宗、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后来又决议加上了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和陈震中，其中马叙伦为团长，另有两名秘书：罗叔章、胡子婴。

此团刚刚成立，就被中统上海办事处的主任季源溥盯上了。他迅速致电叶秀峰，说中共组织了上海请愿团来南京请愿！叶秀峰一听，深感问题严重，马上向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汇报。吴铁城命令叶秀峰，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请愿团造访南京。叶秀峰接到吴铁城的指令后，马上函复上海的季源溥，要求季源溥对“和平请愿团”进行严密监视，如有反常举

动，及时汇报。这个时候，叶秀峰想到了那些苏北难民，于是他安排这些难民去阻止请愿团。

几天后，叶秀峰参加了国民党丙种汇报。所谓“丙种汇报”，就是一种不列编制、不定期组织举办的反共情报交流会（甲种汇报是决策性汇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乙种汇报是指导性汇报，由秘书长吴铁城主持召开）。出席“丙种汇报”的人员有保密局（前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党通局（中统局）南京区区长田纯玉、军统南京站站长黄逸公以及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当在座之人得知请愿团代表均是一些有名望的党派人士，纷纷叹息难以处理。但叶秀峰却异常冷静，他见众人一言不发，便详细地说了一遍“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叶秀峰马上致电上海的季源溥，让他做好准备工作，并召见陈叔平，再三强调事情的重要性。后来他还通知了无锡的季璞，随时准备行动。各个相关人员安置到位后，一场政治阴谋便悄悄开始了。

6月21日，也就是距离蒋介石宣布“和平停战”的最后八天，和平请愿团认为眼前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于是决定6月23日启程去南京。

得知和平请愿团去南京“请愿”的消息，上海各个团体自发组织“庞大”的粉丝团去上海闸北火车站送行。

于是6月23日一大早，参加欢送大会的上海市民像潮水一样涌向闸北火车站。此时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只有个别特务混迹当中，后来人越来越多，特务们只得伫立场外。

据说当天参加欢送大会的有10万人之多（150多个上海民体组织的），标语、横幅、漫画、青天白日旗、各校校旗、各职业团体和工会的旗帜以及各式各样的彩旗，把闸北火车站广场变成了五彩斑斓的海洋。“争取和平，实现民主”、“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欢送晋京请愿代表”、“内战若不停止，全国同归于尽”、“内战不停，电话不灵”等标语也引起了各国媒体记者的注意，他们纷纷举起相机抢拍新闻热点。

请愿团团长马叙伦等提前来到闸北火车站广场，马叙伦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们受全国人民委托，此次南京之行就是把人民反对内战的意志传达过去，坚决要求停止内战。”

9时40分，随着音乐响起，欢送大会开始了。欢送大会主席王绍鏊首先致辞：“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能成功，接着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这时，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并且跟着喊口号，响应王绍鏊的致辞。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名流也出席了欢送大会，其中有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等。

请愿团代表篑延芳见如此宏大的“欢送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为了下一代，中国一定要和平！如果再这样打下去，中国就亡了！”

此时陶行知接过篑延芳手里的话筒，说：“八天的和平不够，我们要永久和平！和平与民主不可分。要十分的和平，也要十分的民主！中国再打下去就要亡国了！不愿做亡国奴的联合起来！”

著名教育家林汉达也忍不住要说几句：“九位代表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他们此次南京之行就是传达人民心愿的！我们要的是和平，不是战

争！假如这次不能成功，我们还要继续去，非达目的不可！”

最后一位讲话的学者是吴晗，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却非常令人提士气，他说：“今天是民众出头的日子。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谁敢再打内战，一定被人民唾弃。这次民众代表晋京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此时台下群众也纷纷喊起口号：“停止内战，还我和平！主张和平，还我民主！”临行前，欢送大会宣读了《欢送上海代表团赴京请愿宣言》。带着人们的嘱托和心愿，上海和平请愿团的代表们上了116号快速火车。乐队奏起了欢送曲，人们挥舞着小旗目送代表们驶向南京。欢送会结束后，数万名群众便举行万人和平运动大游行。王绍鏊、周建人、陶行知、林汉达、许广平、沙千里、吴晗、严景耀等与圣约翰大学生们一起打头阵，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列。队伍越来越大，反内战口号越来越响。季源溥手下的特务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甭提有多窝火了。

火车刚刚驶出站台，季源溥的电话就打来了。季源溥说：“请愿团刚刚走，上海就闹起了乱子！我们现在怎么办？”

“就让他们嘚瑟吧！你就不要管了，南京这边我早已经安排妥善！”叶秀峰表面淡定，内心也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请愿团竟然如此轻松地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卫圈。

火车抵达常州站时，一群穿便衣、戴毡帽的特务上了车。他们先是跟列车员交代了几句，然后将他们换下。当他们看到“反内战、盼和平”的标语时，便一下撕扯了下来。这些特务分工明确，有的人负责撕标语，贴新标语，有的人伺机打探请愿团的情况。

火车到了镇江，大特务季璞安排的一群“苏北难民”蜂拥上车，企图将请愿代表从火车上拉下来。面对这种局面，请愿团代表也进行了简单分工，一部分负责保护团长马叙伦，另外几个则到各车厢向旅客宣传请愿团的请愿事情，希望得到旅客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招果然奏效，旅客们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请愿团，并将“苏北难民”轰下火车。叶秀峰的第二道防线就这样又被突破了！

叶秀峰听闻，急电陈叔平：“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千万不能让请愿团来到南京！实在不行就动手打，再不行就开枪！”

6月23日晚，请愿团的火车抵达南京下关。就这这时，一群特务打扮的家伙（苏北难民）早已经等待多时了。他们见代表团人员一下火车，便冲了上去。他们按照事先分工，先是采取包围分割办法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以及几个记者推进候车室，而盛丕华、篑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推进西餐厅。马叙伦见此等情况便质问宪兵：“你们凭什么扣住我们？我们犯了什么法？”

而外面的“难民”则一起发难，他们扯着嗓子喊叫着：“让姓马的出来，我们要跟周恩来谈！”

后来特务、“难民”越聚越多，宪兵却越来越少，形势完全失控。这群人一下子从门口冲了进来，手持木棍、铁尺、汽水瓶等向代表们砸了过去。“难民”们甚至按住了阎宝航，逼其下跪。马叙伦大吼着站了出来：“我就是马叙伦，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马叙伦大义凛然不畏强敌。但是疯狂的棍棒和铁尺却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顷刻间棍棒乱

舞、鲜血遍地。阎宝航多处受伤，面部受伤严重；雷洁琼的胸部被暴徒的皮靴踢伤，口吐鲜血，眼睛被玻璃扎破；马叙伦的头部、胸部多处受伤严重；陈震中伤势最重，当场被打得昏迷不醒。就连到车站采访的新闻记者也被打了；还有民盟派去接站的叶笃义也被“难民”打成重伤。

“难民”变身暴民，恐怕只有叶秀峰才能导演出这样的戏目来！而现场维护秩序的宪兵则无动于衷，他们叼着烟卷走来走去。“难民”们对手无寸铁的请愿团的成员们持续暴打，直到把请愿团的成员全部打倒在地才散去。

事件发生后，中共和民盟代表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等积极呼吁，让其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直到12点，政府当局才派了一辆车来到下关站。然而宪兵们却像押犯人似的把大家装上一辆大卡车。经过半个小时，卡车把请愿团的成员载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当发现这里是司令部不是医院时，大家纷纷表示抗议，拒绝下车。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几个坐着吉普车跟踪而来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也纷纷提出抗议，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先送大家去医院，当局才勉强同意把大家送往医院。

24日凌晨两点，此时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团的人纷纷来到医院看望受伤的代表，他们一一与受伤的代表握手。其中周恩来坚定地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也赶了过来。周恩来见该医院医疗环境太差，于是与院方交涉起来。在他不断的交涉下，又争取了三等病房的5张病床，让受伤较重的马叙伦、陈震中、阎宝航、叶笃义和雷洁琼住。

但是事件发生当晚，南京所有报社均接到威胁通知：不得刊登此事，国民党当局企图用封杀舆论媒体的方式阻止众人了解真相！

然而天刚刚亮，《大公报》、《新民报》和《益世报》等媒体因自己的记者被打，所以义愤填膺，不畏当局威胁，报道了此事件。一直关注和支持“和平请愿团”的上海各界也纷纷致电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了强烈抗议。阳翰笙等25人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堂堂首都演此丑剧，足证谁在发动内战》的文章，毫不留情地质问国民党当局：“国格何在？法纪何在？人民之自由权利何在？”并说这“足以证明谁在发动内战，谁在破坏和平”。《唯民周刊》主编邓初民也怒斥道：“只有民贼国贼，始忍出此无赖手段！”而民盟政协代表则“至函”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肇事者，“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之各项权利”。后来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还向全世界刊发了电讯，一时轰动了国内外。

此时国民党当局有些害怕了，蒋介石看了报纸、听过广播之后十分生气，他怒骂：“娘希匹，谁让你们动手的？”于是他找来秘书长吴铁城，让其用最短的时间收拾残局。吴铁城把此事告诉陈立夫，陈立夫也非常生气。于是吴铁城立即致电叶秀峰，让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一趟。

叶秀峰刚一进门，就遭到了吴铁城的黑脸：“你看你做的好事！报纸、传媒闹得沸沸扬扬，恐怕现在连聋子、瞎子都知道你做的事了！”

“是啊，你也太不小心了！以前强调过多次：一定要低调！你可好，人抓起来就得了，非要动手！”陈立夫也埋怨叶秀峰。

叶秀峰只好低头认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不对！”

“认错有什么用？问题是共党让我们拿出诚意，严惩凶手，我们总不能把你推出去顶罪吧？”吴铁城说。

此时叶秀峰琢磨了一下：“把事情交给我吧，我去处理！”

“千万别出娄子了，国民党的脸可让你们中统局给丢尽了！”

“下关惨案”的发起者，其实是吴铁城和陈立夫，叶秀峰只不过是个执行者。虽然吴铁城、陈立夫批评叶秀峰办事不周，但却没有惩罚他的意思。叶秀峰深知这是“主子与奴才的打情骂俏”，实在不算什么，于是他回去之后便找到了陈叔平，指示陈叔平找两个替死鬼把罪顶了，以便交差。于是陈叔平物色了两个“替死鬼”，这两个替死鬼一个是陈叔平的堂弟，另一个是青洪帮分子。在陈叔平的指示下，这两个人歪戴着毡帽、一副难民形象晃晃悠悠来到警察局自首。

后来二人交代，自己就是制造“下关”惨案的凶手！打人仅仅只是个人情绪，背后无人指使。后来大特务张国栋竟然伪装成记者以媒体人的身份采访两个替死鬼，让两个替死鬼作伪证。

两个替死鬼如此交代：“老家农民受共党之名揭竿造反，占了我们的地，分了我们的粮，后来还打了我们的人，无奈之下，我们来到南京。来到南京之后，我们举目无亲，生活没有着落，时常饥一顿饱一顿。后来听说上海什么和平请愿代表来南京请愿，他们张口闭口就是共党的好话，其实就是不让我们回家，所以我们气愤至极，动手打了人！”

这场戏前前后后演了两个月，见风声一过。叶秀峰立马要求警察局将两个替死鬼无罪释放。这二人领了大把赏金，非常得意，而“下关惨案”也就没有了下文。

由于叶秀峰阻止了请愿团的请愿，便给蒋介石伺机发动内战创造了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下关惨案”真是叶秀峰的“得意之作”。

9.“二九惨案”

为了向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叶秀峰屡屡举起屠刀！其中以上海制造的“二九惨案”最为震惊全国。

日本投降之后，国内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和平稳定、没有硝烟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不断与美国进行勾结，置全国人民意愿于不顾，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且还是民族工业集中地，其受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表面看似平等，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的远洋运输及生产技术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按照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一句话说：“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签了此条约之后，美国货排山倒海般进入中国，什么花旗蜜橘、克宁奶粉、玻璃丝袜、牛肉罐头、美国服装等消费品真是琳琅满目。

美国货大批量涌入上海，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崩溃。美货成了“美祸”，而中国的剩余物资也无人问津，成了大量的“剩余灾祸”。据统计，1946年8月至12月期间，整个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失业人口有20万之多。以制袜业为例，上海原有制袜公司500余家，自美国丝袜大批

涌入上海之后，由于美国丝袜质量好、价格低、款式新挤垮了上海的民族丝袜行业。上海的制袜厂最初每天只能开工2～3个小时维持，到了后来索性通过歇业来减少损失。以罐头业为例，当时上海的各大商店、市场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国罐头，而上海本地工厂生产的罐头却大量积压，以致变质、发霉。原本170余家罐头厂到1947年2月之前，只剩下50余家，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堆着过去当作“奇货”的美国货。美国货如同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中国的市场，当时上海的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国货五大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缩水，已经濒临破产。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迫切希望成立了一个组织，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此之前，上海工人与日本人以及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多次抗争。

“七七事变”刚刚发生后，上海百货业职工曾经发起组织过战时服务团，参与了战地救援、灾民救济、广播抗战新闻等工作；1939年，上海百货职工还曾经因“改善生活待遇”与汪伪政府进行过对抗；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上海百货业职工进行了第五次“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通过历次斗争的磨炼和经验积累，上海百货业职工已经摸索出一种“保护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法。

1947年2月，上海百货工会提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口号，此口号恰逢中国国货公司成立14周年，颇有纪念意义。2月5日，上海百货工会召开了百货业职工积极分子座谈会。座谈会上，积极分子们纷纷发表意见、看法，与此同时便成立了一个“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

2月6日，“爱抵会”发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宣言，并说明抵制范围仅限于奢侈品、消费品以及国内厂商所生产的产品替代品。

2月7日，“爱抵会”向全上海的公会和工商单位发来请柬，邀请他们于2月9日在新都剧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

2月8日，“爱抵会”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书”，号召大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拯救自己的命运。就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时，新都剧场的老板遭到中统特务威胁，竟然打来电话说剧场另有他用，不再外借！无奈之下，只能临时将会议地点改为南京路劝工大楼三楼的一个会议室里。

2月9日一大早，许多爱国群众早早就向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发了。早晨9点，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一些有名望的社会名流也来到劝工大楼参加大会，其中就有郭沫若、邓初民等。会场气氛庄严热烈，五百多名百货业代表开始齐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和《美国货，害人精》等歌曲。歌声落下，郭沫若、邓初民便应邀上台讲话。

远在南京瞻园里办公的叶秀峰接到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发来的电报，电报称：数百人百货业代表图谋不轨，借机闹事！叶秀峰感到事态不妙，于是致电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大会召开。叶秀峰担心季源溥工作出现纰漏，还专门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他互换了意见。

当郭沫若等人刚刚放下话筒，三楼会场大门突然被一群手持棍棒、铁尺的流氓、特务撞开。会议招待为了维持秩序，于是走过去劝他们道：“会场已经挤满了人，不好意思！”此时暴徒们瞪圆眼睛，如同疯狗般狂吠道：“为什么他们能进，却不让我们进？你真是狗眼看人低

啊？”伴随着一声“打”，暴徒们不分青红皂白举起凶器便向无辜群众身上打去。此时许多人联起手来一边反抗，一边掩护女同志撤退。

永安百货的员工梁仁达愤怒地质问暴徒：“我们爱用国货，你们为什么打我们？”

当梁仁达刚刚说出这句话，便被暴徒拖出来，从三楼追打到二楼，又从二楼追打至一楼。梁仁达抵不过暴徒的棍棒和铁尺，脑袋被打出一个大洞，最后气绝倒地。

郭沫若和邓初民在众人的掩护下，翻墙进入劝工银行避凶。而在场的其他人则联合起来，握紧拳头开始向暴徒们反击。棍棒、桌子腿、烟灰缸等等统统成了随手可得的武器。最后暴徒们控制不住局面了，随着“一声枪响”，特务们开始纷纷撤退。挨打的人们乘胜追击，他们高呼：“下楼抓特务了！”人们从会议室里冲出来，结果又遇到早早埋伏的大量的特务和打手。有人回忆道：“当时真是惨不忍睹，许多员工被暴徒们拖到街道上继续围殴，地板上、楼梯上、墙上、门扶手上到处都是血迹！”新新公司一名职工被暴徒拖至劝工银行门口进行暴打，几个暴徒还跳到他的身上猛踩。中国国货公司的年轻职员高宗耀被暴徒打得脸部浮肿，满嘴是血。后来街头上的路人也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暴徒们的无耻行径。

整个暴力事件大概进行了40分钟，除了暴打无辜职员和街边群众外，他们还抢劫了与会职员的财物，其中包括大衣、皮鞋、西装、腰带、金戒指、手表、钞票等等。街头巡逻警察见此场景，不但没有逮捕他们，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走开了（很显然他们是一伙的）。后来暴徒们丢下木棍、铁尺等纷纷上了吉普车逃逸。街上到处都是受伤倒地的职员，哀号声连成一片。

暴徒刚刚离开，被叶秀峰安排好的河南路黄埔分局的警察出动了。警车来到劝工大楼门口，目的竟是为了抓人。他们把那些受伤的职员强行带上警车，有的职员伤势严重，也没有得到“特殊对待”。后来警察局还致电上海各大医院，声称这些职员统统都是政治犯，禁止给予治疗。

被捕的21名职员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候审室里，由三个特务进行轮班看守。这21名职员彼此并不熟悉，却因为“一致抵制美货”而被关押于此，真是有点难兄难弟的味道。一个职员叹了口气道：“没想到爱国也要遭此劫难，这个政府完蛋了！”另外一个职员则说：“这些无耻浑蛋只能欺负自己人，算什么本事？”

审讯的问题也不外乎那么几个，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参加演讲会？”“唱反美歌曲是谁指使的？”“爱抵会的发起者是谁？”等等。由于被捕的职员坚强不屈，审了大半天也没审出个名堂来。警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无罪释放被捕的百货职员。此次“劝工大楼事件”共导致一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

事件发生后，上海百货业的职员们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许多爱国人士联合起来，进一步抵制美国货。他们张贴爱国宣传语，并且以焚烧美国国旗的方式发泄每一个爱国人士心中的怒火。此种情形下，叶秀峰致电上海区主任季源溥，让他出动特务进行大面积的“防御”工作。于是上海的许多商场里，每天都有巡逻的特务和警察。与此同时，三区百货业职业大会则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和“梁仁达烈士治丧

委员会”。其中“二九惨案后援会”向全国的爱国志士发出宣言：“惨案完全暴露了反动政治的黑幕。它不但是对上海市民的严重迫害，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大胆挑战。如果没有反动派的阴谋策划与罪恶布置，没有预定的谋害方略与特务组织，暴徒们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施展大规模的虐杀与暴行？从铁一般的事实来看，国民党的党政当局所发表的类乎‘强盗有功、事主有罪’的荒谬论调，把惨案歪曲为‘互殴事件’，只能暴露他们‘欲盖弥彰’与‘弄巧成拙’的狼狈相，却骗不了任何一个稍明事理的人。这次‘血案’从法律上来说，是反动派打击爱国民主运动摧残人民力量的暴行，也是国内法西斯施展全国政治恐怖的信号。昨天，他们可以在上海、重庆打死职工、学生，明天，当然可以在全国各地杀害、凶殴、逮捕、刑罚千万爱国同胞与民主人士。因此上海职工与重庆学生的血都是为全国人民而流的，他们的受难是全国人民的受难，他们的冤仇是全国人民的冤仇。”（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为了纪念牺牲的梁仁达，全上海百货业员工举行了“吃素”运动。梁仁达所在的永安百货公司则在大饭厅内为他设置了灵堂，每位造访者进入灵堂向烈士灵位三鞠躬。后来许多职员为了纪念梁仁达，还专门为他编写了歌曲。永安百货公司职员还为每一个顾客货物上贴上“二九惨案”的宣传单，并继续宣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爱国精神。

就在这个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爱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其中上海的各个行业的职员纷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公开支持上海百货业职员的爱国行为。“二九惨案”的经历者郭沫若先生也为此写诗一首：

去年二月十日较场口，
今年二月九日劝工大楼，
“民主”与“和平”又出一次丑。
我虔诚地向受伤者致慰问，
你们是光荣的爱国者，永远不朽。
我们一定要把美军赶走！
把美货赶走！
把美帝国主义赶走！
还要把那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赶走。
否则，我们中国简直没救！

上海妇女联合会写信安慰梁仁达的妻子高韶珊：“我们深深体会到现在社会里的一个家庭失去了负担经济的男子是多么的痛苦，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我们以后一定会同甘共苦，我们自己有饭吃的时候，绝不会让你饿肚子……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们，烈士是为什么遇难的，让孩子们也认识这个世界，将来能继承烈士的遗志。这是你最后艰辛的责任。”高韶珊读完信，热泪盈眶。广大群众为梁仁达烈士进行募捐，一共募集一千多元钱。此情此景，更是鼓舞了上海百货业“抵制美货”的决心。

2月11日，“二九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宣言称：这次百货业发起爱用国货运动，是代表了全国人民呼声的。著名人士马寅初、胡子婴、

柳亚子、周建人、盛丕华等也发表讲话，怒斥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并声援受伤者以及“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而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十大律师，则义务承担起百货业职工的辩护诉讼。

得知众名流纷纷声援，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让吴国桢采取办法，封住媒体、报社的喉舌。吴国桢第一时间便通知了上海各报业集团，并且亲自站出来发表声明：“百货业职工假该行开会，提倡爱用国货运动，唯其中一部分工人突提抵制美货之口号，此种举动显系带有政治色彩，当场为另一部分工人所不满，以致引起冲突，发生互殴情形。”后来吴国桢的这种“谎话”站不住脚了，便又声明道：“梁仁达的死令人很痛心，我实在不能不替他哭，我决定把此次负责人找出来，在法律上道义上均要他负梁仁达死的责任！”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也说：“上海市有人假借爱用国货之名义，图遂其反美之阴谋，以致激起群众反感，发生劝工大楼之流血惨剧！”（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两个人一唱一和，真是配合默契啊，听到此“声明”，在南京瞻园里跷着二郎腿的叶秀峰很高兴。不过“二九惨案后援会”对于吴国桢和方治这两个跳梁小丑给予了淋漓的驳斥。

2月14日，“二九惨案后援会”驳斥吴国桢和方治此前的讲话，道：“自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我们看见了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前后发表的关于这次惨案的两篇重要讲话，以及其他许多报纸歪曲事实的记录和颠倒是非的言论，我们很感谢他们的言论，使我们得以认识这次惨案的背景和性质，正是国民党政府的责任，并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今天政府当局所唱的‘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的党政当局不但敢于拘捕挨打的受伤人员，敢于公开攻击‘召集开会者’，而且还‘要把主持大会人抓出来严办’。这却亦警告我们，今天的政治已经反动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如果还要说这次惨案是‘互殴事件’，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你们所拘捕的全部皆系当场被暴徒打伤者，为什么让凶手扬长而去，并无一人带进警局，事后也不加以严缉？其次，我们还要追问：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究竟犯的什么罪？主持爱用国货的演讲会，违反哪一种那一条法律要抓出来严办？这次惨案，谁是直接凶手，已经由吴方两氏上面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就是那些不满抵制美货和赶走美军的人，简单说就是不满‘反美’的人。只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及被其雇佣的特务分子，才会这样物理性地随便动手毒打这些素不相识的自己的同胞！”（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尽管“后援会”将国民党当局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吴国桢还是来到梁仁达的妻子高韶珊面前说：“梁先生的死实在令人惋惜……如果家里缺钱了，可尽管来我家取！”而方治也是如出一辙，为了“安抚”高韶珊的情绪，如此说道：“国民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自然应当主持公道，我们要做梁君家属的后盾！”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这样做更加激起人民对当局的憎恶。

“二九惨案”发生之后，众市民反美情绪一度高涨，尤其是百货业，众职员纷纷组织团队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叶秀峰非常讨厌“示威游行”，于是他立马致电吴国桢：“现在正是国家命运之转折的关键年份，总裁有令，凡是打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一律予以镇压！”

吴国桢似乎也有点黔驴技穷了，他无奈地摇摇头：“现在是纸包不住火，及时镇压恐怕也无济于事啊！”

得知叶秀峰的进一步行动，中共对此事件非常重视。于是周恩来通过电台叮嘱大家：现在国民党在军事战线、政治战线上接连溃败，于是他们便会更加疯狂地实施报复行动。在此情况下，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避免硬碰”，换一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

不久之后，一种新颖的斗争方式出台了：以吊唁、同情等方式取代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招非常巧妙，不费吹灰之力就化解了叶秀峰“打压、逮捕爱国同胞”的计划，这也宣告了叶秀峰的“新计划”彻底破产。

10.魔爪伸向台湾

劝工大楼之痛还没有消退，海峡对面的台湾又“祸起萧墙”！这起惨案的实施者，还是中统局第二任局长叶秀峰。

1945年10月25日乃台湾“光复”的日子，所谓“光复”，就是收复失地的日子。台湾人民历经50年的殖民统治后，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但是台湾“光复”后，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粮荒严重，治安环境恶劣，百业萧条，失业人数暴增……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而是采取了错误的管理方式。正是因为如此，台湾地区的矛盾激化，问题似乎比“光复”前还要严重。国民党当局的错误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制独裁

曾有社会学家分析：专制独裁才是导致矛盾和战争的根源所在。蒋介石是总裁，所谓总裁，就是专制独裁的意思。日本人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就接管了台湾。可以说从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完全照搬国民党那一套。于是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深了台湾地区的各种矛盾，而“战争”似乎也一触即发。

二、政治上排斥台湾人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地域歧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国民党似乎总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清剿异党，总是靠利益集团选择用人。蒋介石如此，他的手下也是如此。自从国民党接手台湾，蒋介石便派遣自己的部下管理台湾，而台湾当地人却鲜有机会与政治挂钩。于是“天平”向一侧倾斜，这种不公平令台湾人怨声载道。

三、利益冲突

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之久，遗留下来的日伪资产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几乎占据台湾GDP的90%。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将日伪资产统统劫收上来充公。也就是说，谁控制住日伪资产，谁就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后来国民党还在台湾设置了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烟酒等实行政府专营！种种行为下，都与台湾的民间企业、财团等发生利益冲突，更加激化了“问题”的矛盾。

台湾人本以为“光复”之后，便能过上当家做主、富裕丰饶的生活。没想到国民党的统治不但没有带来改观，而是每况愈下。于是无数的失望变成了绝望，无数的绝望又变成了仇恨。他们恨大陆人，更加恨国民

党。

1946年，蒋介石参加了台湾光复一周年的庆典活动，作为总裁，他如滔滔江水一般大侃、神侃。结果台下听众反应平平，甚至连零星半点的掌声都没有，此事令蒋介石非常失望。

更搞笑的是，蒋介石刚刚离开台湾，便有人挂出一幅漫画：“狗去肥猪来”，用以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

后来还有一台湾大学教授发牢骚：“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1000倍的蒋介石。”

说到这里，还要提一个人物：陈仪。此人是光复后的第一任台湾“省长”。陈仪，字公侠，绍兴东浦镇人。此人与蒋介石是同学，私交不错。1941年12月，此人就任行政院秘书长兼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1944年，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收归台湾开始做准备。台湾光复后，蒋介石命令他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上任之后，可谓是大权独揽，十分跋扈张扬，蒋介石为了制衡他，只好派CC系成员李翼中来台湾。但是台湾党部成立之后，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仪，与国民党内的CC系成员一向不睦。他任用了很多与省党部不合作的人士，如宋斐如、刘启光、沈仲九、周一鹗等，排挤CC系成员李翼中，于是令台湾省党部与市党部工作难以开展，令制衡他的李翼中十分苦恼。后来李翼中打报告给中央党部，要求约束陈仪。不过陈仪是个独断分子，他没把李翼中放在眼里，而台湾也变成了陈仪一个人的政治舞台。

与陈仪相比，CC系成员李翼中却实实在在做了点“好事”。为了让国民党在台湾扎根，李翼中组织访问团率领张兆焕、林紫贵等人去新竹、台中、苗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苏澳、宜兰、淡水、北投、台北、基隆等地视察工作，历时三个月，足迹遍及整个台湾。访问团本着“宣传重于组织、了解重于开展”的原则，慰问台湾群众，宣扬三民主义，宣达国民党中央，同时招纳优秀分子入党。李翼中多次举办“三民主义宣传大会”，与地方士绅及农工等各界领袖进行沟通，并择优介绍地方领导入党，成立区分部。后来一些大陆来的政客“汲引私人、乘机舞弊”，引起台湾民愤。1946年7月21日，李翼中在“国父纪念周”上分析了台湾省政治现状，并找出官民隔阂的症结，勉励台湾群众协助政府肃清贪污，共同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台湾。李翼中还成立了一个清查团，专门清理台湾各党派组织里的贪污腐败案件，后来竟然查出许多令人发指的贪腐案件，其中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变卖政府财产，获益几十万台币；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等等。

台湾不是政治“演练场”，岂能让这些政客折腾来折腾去？就连上海《观察周刊》也如此报道：“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果不其然，暴动终于发生了！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得到“走私消息”，于是派叶得根、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傅学通六名查缉员前往缉查。当他们抵达淡水时，仅仅查获了五箱走私香烟。后来，一个“眼线”举报

说："走私货已转移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于是叶得根等人便去缉查、抓人。下午7点30分，当他们来到那个地点时，走私贩早就闻讯逃跑了。他们仅查获一位40岁寡妇林江迈和她的几包公私烟。叶得根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暴力执法，将林江迈的公私烟和现金全部加以没收。林江迈仅仅是个寡妇，几包公私烟恐怕就是其全部家当，于是她跪下来向叶得根等人哀求："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香烟还给我吧……"但是叶得根置若罔闻，不予理会。当时围观的群众非常之多，纷纷替寡妇林江迈求情。林江迈情急之下，一把紧紧抱住了缉查员的大腿。

"放开，再不放手，我可就动手了？"叶得根目露凶光。

"请你们高抬贵手，给我留一条活路……"林江迈继续跪在地上哀求。

缉查队员的"暴徒面貌"毕露，挥起拳头雨点般地朝寡妇林江迈打去。林江迈寡不敌众，被打昏过去。此时围观的群众急眼了，怒斥缉查队员的暴行。

他们喊着："阿山不合理！"

也有人怒斥："猪仔太可恶……"

此时缉查队员也慌了神儿，而穷凶极恶的缉查队员傅学通掏出手枪鸣枪警告，竟然击中了无辜。此时围观群众的火气完全被点燃了，他们砸烂了缉查队员的卡车，强烈要求警察局枪毙傅学通。

2月28日一早，广大群众联合起来，他们一边敲着锣，一边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走到台北专卖局的时候，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们冲进专卖局，对专卖局的职员进行殴打，结果打死了两名，打伤数名。而此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宪兵队人数有限，所以未敢轻举妄动，此事马上就传到远在南京瞻园里办公的叶秀峰的耳朵里。

"台湾调统室来电，台北民众围攻专卖局，我们怎么办？"叶秀峰的机要秘书将电报递给叶秀峰。

叶秀峰并不以为然："让他们闹吧，形不成气候的！"

"我们是否回电？"

"不，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做定论！"叶秀峰拿起旁边的报纸，悠然自得地喝着茶水，此事并未引起叶秀峰的重视。

但是台北街头，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下午1点，一批群众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希望陈仪站出来讲话。陈仪有些惊慌，由于他将自己的部队悉数调回大陆，担心"暴民"反水，于是进退两难。此时人群中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三人，伤三人，顿时乱作一团。民众开始高呼："打死人了，政府给予说话！"甚至还有人喊："推翻他们，把他们赶回大陆……"

下午2时，广大群众在中山公园聚会，进而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先后用闽南语和日语向广大民众发布："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当年的台湾，无线电广播相当普及，民间收音机达数万台。台湾各地民众听到后无不义愤填膺。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抵抗风潮"很快在整个台湾蔓延开来。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得知"台湾民变"，立即掉头返回了上海。台湾广播电台被民众控制之后，长官公署失去了舆论导

向，使台北一隅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全岛。事件发展早已超出陈仪的预料，他只得将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于公署大楼。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缺乏足够警卫兵力保护，原本无武器的群众抢夺武器弹药，清洗了台北军火库，与台北国民党军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此时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他拍桌子发飙："因为几盒私烟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看来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他站起来，焦急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事关重大，他决定采取行动。他决定先向蒋介石汇报一下，然后拿出自己的措施。

他匆匆来到总裁室，此时的蒋介石脸色也不好。蒋介石见叶秀峰来了，便直言："台湾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吧？这群民众也太无法无天了！围攻政府，这不是准备造反吗？既然你来了，就讲讲自己的看法吧！"

"陈仪将自己的部队悉数调回大陆，他身边的军警人数有限，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依我看，要出兵控制一下。"叶秀峰十分冷静，对于民众暴动，叶秀峰向来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必须要有措施。这个陈仪，调自己的兵回大陆，简直是开玩笑嘛！你说派多少人过去最为合适？"

"三个师！"

"好吧，我这就安排部队火速前往台湾！如果掌握到新信息，你要及时汇报，以免贻误战情！"蒋介石接受叶秀峰的建议，于是电令驻昆山21军："全军开台平乱，146师从吴淞直开基隆，145师从连云港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

得知蒋介石派兵，叶秀峰十分有成就感。回到中统局，特务们问他结果如何？叶秀峰笑着道："平复之事，向来以枪杆子解决问题！总裁是顶顶聪明之人，怎能按兵不动呢？"

不过此时，台湾民众已经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群众，处理大纲32条，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的要求。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为应对"二·二八"突发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并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大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七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禁令，释放被拘民众。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发出广播，答应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与台北市参议员等台湾当地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一千多名师生联合起来，对陈仪进行严厉谴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民间代表林献堂和《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举行首次会议。无奈之下，陈仪向全省发出第二次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

一、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

二、被拘捕者准予释放；

三、伤者给付治疗；

四、死者优予抚恤。

但此时并未得到台湾民众的正面回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3月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等人商议，成

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与此同时还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台湾各地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

3月4日，中央社台北分社致电南京：“记者根据截至今日9时，分访各方面之观察，目前危机依然重重。适自军方获得消息，台中宪警均被缴械，嘉义暴民刻正包围军队，而掌握全省电力之台电公司，现已全由台人控制。倘各地情势再行恶化，倘台北刻已无米可购之市民，一旦变为饥民，则未来局势，更将不可设想。欲谋解救眼前之局面，多方面均认为中央宜及早处理，不可失之太迟，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且宜即派大员莅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但尤堪考虑者，即台省地方政府威信已失，中央出面处理时，必须步步稳健，不可再使中央政府失去威信。关于增兵一节，昨下曾表乐观之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今亦强调系不容稍缓之事。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亦言现有部队难于控制。渠并透露称：‘三日前，自新竹运抵台北之手榴弹约七千箱，仍停市区万华车站，迄今尚无余力送至军防地区’，而台北警察中之台籍警察，已于日前多数弃职逃逸，各派出所均已无人，可见目前军力之薄弱矣。”看到此电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大骂：“娘希匹，堂堂一个省长，手里竟无兵可用，事毕，我要拿他开刀！”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选自《蒋介石日记》）

3月6日，《自由报》社长王添灯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其中《处理纲要》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则提出“制定省自治法”，要求“台湾人自治”，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新闻舆论媒介言论要“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均由台湾本地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台湾本地人充任。当天晚上，陈仪接受了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台湾本土人士。

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处理纲要》进行了追加，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这10条款项大多符合事实，但其中有些条件过于苛刻，陈仪读完新10条款时勃然大怒，怒斥台湾民众简直是“蹬着鼻子上脸”、得理不饶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陈仪：21军直属部队本日由上海出发，大概10日凌晨抵达基隆，要求陈仪做好配合接待工作。蒋介石对此事仍旧不放心，于是又致电海军司令桂永清：令其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还电令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内容为：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做野心家的工具），以稳人心！

3月9日，国民党21军两万人马提前一天登陆台湾基隆港，开始对发起运动的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

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民众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武器等问题，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跑，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

3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父纪念周”上发表演讲，他说：“党国已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将派白崇禧赴台协助陈仪处理事件，并进行宣抚。”他还宣称：“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希望台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地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台湾民众自发运动，蒋介石依旧怀疑共产党从中作梗。后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分析“二·二八事件”大概有以下四个原因：一、共党作乱；二、日本的残余影响；三、经济问题；四、不法分子煽动而引发的阶级仇恨。

3月17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台湾进行宣抚工作。到了台湾之后，白崇禧向全省广播，宣称党国将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二·二八事件”，凡是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党分子外，一律从宽免究。后来白崇禧还声称，党国对台湾民众所关心的自身权益等问题，在许可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建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而后陈仪被迫辞职，接受国民党党部的审理。

“二·二八事件”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伤，至今无确切数字。有人回忆道：“街道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死伤万余人……”而时任台湾师范学院的教授杨亮功则统计：190人死亡，1761人受伤。不管死了多少人，“二·二八事件”的悲剧起源于叶秀峰那次“增兵三个师”的工作汇报！3月20日，叶秀峰听台湾调统室特务的工作汇报，得知“台湾局势已经稳定，运动已经彻底平复”，叶秀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11.“申九血案”

叶秀峰对连续制造血案惨案上了瘾，因为内战之后，中统局的任务就是反共，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按照蒋介石和陈立夫的说法，镇压学生、工人运动也是一种反共模式。因此，叶秀峰作为蒋介石的走狗，工作任务就是制造血案、惨案，打击共产党。“申九血案”就发生在工人运动最活跃的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别“照顾”的地方。

1947年，蒋介石不但发动了全面内战，而且还与美国勾结，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市的民族经济几乎陷入“泥潭”，几十万职员失业。尤其是棉纺企业，由于美货的性价比优于国内同类产品，许多国内棉纺企业纷纷关门、倒闭。作为上海纺织工业的明星企业——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拥有工人8000余名，年产布匹数量在全国同行业都排有名次，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个民营公司，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延长劳动时间，而且还想方设法克扣工人薪水。比如大米、煤炭等生活必需品能少发就少发，能不发则不发。有时

还会无缘无故将工人开除，从而引起工人们的严重不满。尤其到了年底，工人们甚至连年都没法过了。

早在几年前，统益纱厂的棉纺女工汤桂芬，原名汤大心，曾与共产党人佘敬成一起，率领47家棉纺厂的13万工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迫使资本家签订了18条协议。协议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工资与消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产假期间照发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那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此时，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等纺织厂推翻了“十八条”，不断加深对棉纺工人的剥削。棉纺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了时任沪西民营纱厂担任联合支部书记的汤桂芬。

“汤大姐，我们厂已经五个月没发煤球和大米了，这让我们怎么过啊？大冬天的，我们要冻死饿死了！”一个老工人发牢骚。

汤桂芬表情凝重：“不要担心，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权益。”

随后，汤桂芬向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汇报了情况，沪西民营纱厂地下组织工委也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反对年奖打折扣”是各民营纱厂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同样也是大势所趋的一件事。于是沪西民营纱厂地下工委决定在“申九”发动斗争，以带动其他民营棉纺厂一起抗争。

没想到，共产党的行动还没有展开，消息就传到了叶秀峰的耳朵里。叶秀峰迅速向陈立夫汇报了此事。

“立夫，上海市的棉纺工人又不安分了，肯定又是共产党在捣鬼！是不是应该敲一敲边鼓，警告他们一下？”叶秀峰问陈立夫。

“可是，万一事情处理不好，被共产党抓住把柄，又会给党国带来舆论压力！这些年，党国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啊！”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吧！万一他们把事情闹大了，总裁肯定会怪罪我们的。”

陈立夫叹了口气，最后冲叶秀峰挥了挥手，说：“这件事你自己去安排吧，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人，更不要开枪！”

“好！”

自叶秀峰上任以来，经手的“案件”大大小小也有十多起了，这些案件虽然改变不了国民党颓败的大局，但却向蒋介石等人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蒋介石也曾在甲种汇报会上公开表扬过叶秀峰，说他态度端正，值得广大国民党党员学习。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马上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季源溥，提醒他注意与上海宪兵队和警察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武装镇压的准备工作。

1948年1月30日中午12点30分，“申九”全部职工开始罢工。他们聚集起来，派出代表与厂方进行交涉。为了防止厂方报警或者对机器设备进行破坏，纺织工人们组成纠察队，分头看守大门、交通要道以及车间里的机器设备。后来，纺织工人还把印有“改善员工福利”的宣传单张贴在上海滩的重要角落及来往的汽车上，于是罢工的信号迅速传至整个上海。没一会儿，一支拥有七千多人的罢工队伍聚集在一起，与厂方形成对峙态势，并向厂方提出“七条”要求，其要求如下：

一、如期发放配给物资；

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

三、年底前被无故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

四、所有厂规要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才有效，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

五、女工产假为56天，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者仍可继续请假；

六、发还五一劳动节工资；

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这支队伍与厂方对峙了半天，厂方不但没有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而且还威胁工人："如果再不开工，损失由你们自己承担。"

罢工队伍见厂方没有丝毫退让，便拒不开工。

在"申九"工人罢工的前两天，上海同济大学发生学潮，上海十里洋场又发生舞女风潮，这些都刺激着国民党脆弱的神经，让叶秀峰最终决定，对"申九"罢工运动进行武装镇压。

沪西纱厂地下党工委也在"申九"罢工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决定"收缩罢工"，尽量避免与国民党特务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工委的决定还未传到"申九"罢工工人的耳朵里，中统局的行动就开始了。

2月1日，季源溥派特务到"申九"打探工人罢工的情况。特务们经过一番打探后，向季源溥汇报："申九工人很激动，罢工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

"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会罢休了！"季源溥迅速致电上海宪兵队和警察局，要求他们配合行动，一举打散罢工组织，揪出幕后操纵者。

于是，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2月2日一早，多数工人还在睡梦中，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打手等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包围了"申九"，并且控制了第一、第二道大门。工人们在嘈杂的叫喊声中醒来，发现警察和特务们已经包围了他们，工人纠察队就迅速用铁链锁住了"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与特务们对峙起来。



特务们见工人们不肯投降，便下令向工人发动进攻。工人们以“申

九”三楼的楼顶平台为据点，用准备好的石头、砖瓦、铁桶、火油桶、水龙头等作为自卫武器，打退了特务们的进攻。

随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竟然调来了武装车辆，强行撞开了工人们锁住的第三道大门。

当女工们筑起“人墙”准备阻挡武装车辆时，一辆辆武装车辆竟然硬生生地从她们身上碾过，18岁的女工王慕梅当场牺牲。

工人们见武装暴徒惨无人道，愤然向他们扑去……

共产党员徐泉福，开着卡车向暴徒们的武装车辆撞去，并用卡车死死堵住“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不让暴徒们冲进来。

后来，宣铁吾下令“格杀勿论”，特务们纷纷掏出手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射击。一时间，子弹如雨，枪声四起……

17岁的女工蒋贞新和24岁的女工朱云仙被杀害，另有100多名工人受伤。

“申九惨案”中，共有3名女工牺牲，40余人重伤，236人被捕。

“申九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责罚，竟然宣称“不许戴黑纱，谁戴黑纱谁就是共产党”，以此威胁、恐吓纺织工人。

沪西纱厂支部书记汤桂芬，以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纺织工人支持“申九罢工运动”！她准备好黑纱，召开了“工会理事会”，在理事会上，她呼吁所有的纺织工人都积极支持申九：“申九工人惨遭杀害，同为纺织工人，我们应该积极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我们应该戴上黑纱，缅怀牺牲的同志们！”工人们纷纷响应汤桂芬的号召，上海的纱厂工人们大都公开戴上了黑纱！

2月3日，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了《为申九惨案宣言》，号召上海市纺织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援助“申九工人运动”。各产业公会纷纷组织对“申九工人运功”进行募捐，短短几天内，竟然募集捐款3.2亿元。

“申九惨案”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各式各样的“抗暴运动”也随之在上海市蓬勃兴起。新华社报道了“申九工人运动”的消息，香港《生活》杂志也以事实为依据歌颂了申九工人英勇抗暴的事迹。解放区军民则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义务劳动一天，以实际行动支援申九工人的英勇斗争……

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令远在南京的叶秀峰恼怒不已，他勒令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们抓捕纺织工人的带头人汤桂芬，在汤桂芬被特务们抓捕后，他才胆战心惊地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汇报了“申九血案”。

12.打压学生运动，制造“五二零惨案”

除了打压工人运动，叶秀峰还拼命打压学生运动。

为什么当时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呢？还是让我们通过报纸的报道，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实况。

据1947年2月11日《文汇报》记载：当时米价狂升，市场仅糯米一种，均每升2000～3000千元左右。黑市已无米出售，唯各米号只有西贡米应市，每担7万元左右。若干米号已将白粳米屯于店内，对上门客皆告无米可售。旧主顾可暗中购得白粳米，每担价在11万元或12万元不

等。杂粮、食油、面粉等一致跟升，国内的经济物价已濒临崩盘，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1947年2月28日，《文汇报》刊出一个洗衣工人的呐喊："我是一个洗衣工，我们的工资是依照市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计算的，我们的工资一直没涨，然而物价不断上涨，简直是要我们死了完事！"

当然，为了平抑物价，蒋介石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一系列的限价政策出台之后，米价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更加严重地刺激了物价。

后来，白粳米28万元100市斤、豇豆19万元100市斤，卷烟、火柴、肥皂等悉数暴涨，在物价狂飙且商家囤货不肯出售的情况下，老百姓如何支撑自己的生活？

于是1947年的5月7日，南京浦镇发生"抢米事件"，翌日，上海也有12家米店被抢……

随后，上海老百姓先后向国民党总工会和社会局请求："解冻"生活指数！在上海百姓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工人和学生都发起了"反饥饿"运动。

现在，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选择运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内战

浩浩荡荡的内战，西起甘肃，北到热察，东至吉林，南达长江。国民党为了打赢这场内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俗话说：仗越打越穷！况且这个仗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则两头受气。战区的百姓，不但饿肚皮，而且在战火的硝烟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打仗就要"拼粮"，造成粮油如此高价的原因在于部队征粮、战争消耗。粮食都调去战场了，老百姓吃什么？总之，战火一日不停，老百姓便要饿一天肚子。在此情况下，学生们也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就无法学习。每当他们想起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学，却因为"饿肚子"而无法正常求学，他们就非常难受。在此情形下，他们只好将矛头指向内战。

二、内政

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政策往往是在"和平"的土壤里培养起来的。国民党当局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不仅发动了内战，而且还与美帝勾结，违背全国人民之民意。而后来的改组，亦是有目的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国民党打内战的本钱消耗殆尽，于是不得不借鸡下蛋，迎合美国人的不合理要求。为了筹到美钞继续打内战，不惜牺牲整个国民经济。同时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负责任，还时常将"罪名"转嫁给其他党派，其中最倒霉的就是共产党。比如叶秀峰就曾经说过：战争是共产党引起来的，而不是国民党！

三、经济

自从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经济就每况愈下，濒临破产。自从1946年，美国货在中国大量倾销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暴增。为了缓和局面，国民党滥发纸币，反而又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7年的各地物价是战前物价的两万倍。于是街头出现了大量饥民，就连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也过得非常清苦，至于那些身无分文的学生，他们甚至连一点粗粮都吃不上了！那些多少有点"闲

钱”的人则将资金投放到“高利贷”和黑市上。由于政府颁布经济方案无效，黑市上的美金、黄金等一路无休止地狂涨，从而导致美金公债无法销售，大多烂在投资者的手里。经济政策不给力，物价疯涨，全国各地再次出现“抢粮”事件。而在农村，国民党因为内战缘故而常常抓壮丁，农村的壮丁都被抓走了，耕地变成了荒地。内战打到最后，粮荒严重，真是可怜！

因此，学生们无心无力学习，在混乱的局势下，在饥饿的状况下，唯有运动一条路，可以谋得生存和学习的权利。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疯狂打压学生运动，几乎大大小小所有的学生运动和学生请愿行动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无情打压。尤其抗战结束后，以叶秀峰为首的中统特务，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运动上。青年学生屡屡遭到摧残和屠杀，人身毫无保障，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二·一惨案”。

在“五二零学生运动”之前，许多学生因运动而丧命。比如北平、广州等地，约有数千名学生因为“示威游行”而被逮捕；比如上海的一次学生运动中，有八十余人被逮捕，其中庄枫、杨莹、姚永祥、乔秀娟等学生一直下落不明，沈崇同学则被美国人强奸……学生们不仅饿着肚子，甚至无法保证个人的切身安全。因此，学生们再也无法忍受，“学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对于各地区的学生运动，叶秀峰可谓“门儿清”。关于学运的情报，每天都像雪花般地发至中统局，然后再由有关部门进行总结。

有一次，叶秀峰与陈立夫讨论起“学生运动”的问题。

陈立夫问叶秀峰：“过去我们留学美国，你见过美国的学生天天组织示威游行吗？”

叶秀峰冷笑道：“没有，中国的学生特别嘛！”

“我看是共党从中捣鬼！每一次学生运动，必然有共党作梗！共党分子真是‘毁人不倦’啊！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唉，只要共党存在一天，学生们就无法安心学习一天！”陈立夫说道。

“对于这些学生，不能放任自由，必须要打压，不能让其被共党分子所利用！共党蛊惑人心的招式有很多，他们企图以学生当盾牌，与政府进行对抗，不过恐怕共党把我们想象得太简单了！”叶秀峰非常自信地说，“还记得李公朴和闻一多吗？这两个人不就做了共党的替死鬼！”

叶秀峰继续说道：“抗战结束后，共党的羽翼渐渐丰满，以前总裁对他们过于仁慈了，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在的局面。”

“也不能这么说……”

“难道是我们的执行力度不够？”叶秀峰有些疑问。

“兼而有之吧！”

“最近上海、北平等地的学生似乎又开始蓄谋对抗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叶秀峰问陈立夫。

“这还用说？总裁不喜欢学生运动，咱们必须想办法阻止学生运动！”陈立夫接着强调，“对于学生，我们要进行甄别。对于那些共党‘细胞’，我们要严惩；对于普通学生，我们要想方设法说服教育！”

叶秀峰点头表示认同。

回到中统局后，叶秀峰看到满桌子的学潮情报，脸色阴沉，大发雷霆：“这些学生闹什么闹，再闹就往死里给我整！”

1947年4月27日，南京市18所公私立高级中学联名反对“毕业会考”，他们旁引实例，提出免去“毕业会考”的四大理由：

一、因战事影响，生活不安定，学业受损极巨；

二、各校课本参差不齐，难符卅年部颁课程标准；

三、敌伪时代若干科目未得正常进行；

四、时间仓促，补课准备之。

1947年5月5日，上海市三十五年度高中毕业生联名反对“会考”，并指出：会考不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又联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

1947年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增加副食费。学生们提出：“大学生副食费每月24000元，鉴于当前米价已破30万元，营养固谈不到，三餐也已经无法保证。”此次请愿没有结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中国穷，粮食少，批示难度大”为由劝大学生不要跟风，请大家以学业为重。

1947年5月14日，国立音乐学院等学生也联名召开全体大会，商讨改善伙食的问题。几日后，中大、剧专、音乐学院、金陵大学也纷纷举行游行，分别赴教育部和行政院请愿，并提出五项要求：

一、按生活指数增加公费生副食费；

二、半公费生及自费生普遍改为公费；

三、教育经费保持全国总预算的15%；

四、增加私立学校经费；

五、立刻停止内战。

后来金陵大学主席团成员要求见朱家骅面谈，朱家骅早闻学生代表求见而提早与学生代表玩起了“躲猫猫”。学生十分无奈，只好离开教育部。学生代表“请愿”不成，只好继续罢课。

1947年5月17日，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联名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和学

生公费。与此同时，南京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也成立了，并提出：

实行全面公费，改善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薪金。

后来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贺昌群提醒请愿学生：“冷静理智始可成功，感情用事容易失败。”

同一天，国立浙江大学生活自治会发表“改善教育、安定生活”的罢课宣言，用来响应南京多所学校的“反饥饿运动”。

此前，浙大还举行了签名活动，并强调：若教育部仍不增加伙食费，则集体去南京请愿。

在中大、金陵大学、浙大等学校的感染下，上海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也联合起来，响应“反饥饿运动”。后来这些学校成立了联谊会，并决定派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

得知许多学生代表来教育部请愿，教育部怕麻烦缠身，先是致电中统局，要求叶秀峰派特务进行防范，与此同时朱家骅还致电暨南、交大、同济、复旦等四个大学校长：“据报该校学生有响应中大学生要求提高公费待遇来京请愿之事。查学生副食费依照最近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比例增加已达四万八千元，加以食米二斗三升，为数已不过少。在财政如此困难之时，政府已尽最大努力，务希剀切劝导，体会时艰，并设法防阻集体行动，是为至要。”（选自《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档案》）

1947年5月18日，为了响应南京、上海、浙江等大学的“反饥饿运动”，北平的各大学纷纷以“教授贫苦，同学饥饿”为理由进行罢课，并在北平各地张贴“反内战、反饥饿”的标语，进行街头宣传。

看到大学生们的爱国举动，街头路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其中一个军人说：“政府抓壮丁去打仗，打仗就要买枪炮，没有钱便印钞票，钞票多了物价怎会不涨？”而一个商人则说：“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什么本事，有种去打美帝去！”

得知北平也乱成一团，叶秀峰非常郁闷。他立即致电中统华北区主任郭紫峻，让其密切监视北平学生的一举一动。郭紫峻见情况严重，于是向叶秀峰打报告申请镇压学运。叶秀峰犯了难，他心想：中统局“累活儿”、“脏活儿”干得太多，总不能次次都当冤大头。于是他没有立刻答应郭紫峻的请求，而是打电话给陈立夫。

“立夫，北平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陈立夫亦非常重视学生运动，他担心共产党趁机捣乱。

“这件事还是交给青年军处理比较合适……现在学生们叫嚷着‘取消特务’，我局也应该谨慎一些。”叶秀峰继续补充，“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信息，希望他们配合这次行动，驱散请愿学生团体。”

“好吧，我考虑一下！”

陈立夫明白叶秀峰的意思，于是致电北平警备区司令部配合驱散学生运动，制造了“五一八西单血案”。

5月18日下午5点，清华、北大、北洋三校学生组成宣传队向市民宣传呼吁“反对饥饿，停止内战”。当他们来到西单牌楼时，几辆载有青年军的卡车突然停下来，青年军们手持皮带，气冲冲地跑进人群中质问学生：“谁在打内战呢？”

有学生回答："我们没说谁打内战，我们只是反对内战。"

学生们的话音未落，青年军的暴徒们则拿起皮带朝学生们的身上抽去。

三十多个手无寸铁的学生遭到一百多名暴徒们的围殴。其中北大女生胡梦兰被十多名青年军围殴，头部受到重击，口鼻满是鲜血，重伤倒地。

后来这群暴徒高喊着"打倒共产党"，又对另外一群大学生进行围殴。

迫于无奈，学生们只好列队返校。后来，中统特务们也过来凑热闹，他们联合北平的警察，以"聚众捣乱、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逮捕学生数名。

此次血案造成8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血案发生后，北平、天津、唐山等大学当即通过了"五一八血案后援会"，并向暴徒们提出抗议，并于19日起举行大罢课。

后来"五一八血案后援会"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抗议五一八血案，确实保障人权；

二、派代表慰问受伤同学；

三、通过九项口号；

四、自十九日起各校全体罢课。（选自《申报》）

翌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了响应"四项决议"决定请愿游行，此外还有上海、浙江等大学的学生代表共赴南京。

见此情形，蒋介石也十分苦恼。他觉得：学生们不好好学习，简直是党国"奇耻大辱"。原本是国家之栋梁的学生，现在反倒成了拆台的"暴徒"。

于是蒋介石发表了"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讲话："立国之道，首重纲纪，建国之本，全在教育。必须学校有优良之学风，社会有安定之秩序，而后国家乃有建设之基础，人民乃有福利之可言。乃近来各地学生，时有越轨骚乱之行为及违理逾分之要求，旷废课业，相习成风，假游行请愿之名，为扰乱治安之举，甚至占夺车辆，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如此干法乱纪，蔽芾我纯洁的爱国青年学生之所为，而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余今日更欲提我全体青年学生之警觉，须知共产党潜伏各大学内之捣乱分子，正以各种之姿态，利用各种之口号，多方煽动，扩大学潮，以遂行其牺牲青年，破坏秩序之预定的阴谋。战争结束之后，本应早日停止，唯因共产党在各地暴力叛乱，经济秩序未能恢复，多数学生之家属，接济困难，政府不忍青年学业中断，故仍予继续，所以清寒学子者，实已尽其应尽之力量。总之，今日国事尚极艰难，人人应共体时艰，刻苦自矢，而守法重纪，尤为重要，国家法纪之尊严，应为全体国民所共同维护。用特剀切告诫，务望我爱国青年崇尚理智，明礼仪，知廉耻，自爱自重，勿为奸人之阴谋所陷害。而各校当局与负有教育之责者，均应竭尽职责，严整法纪，力挽颓风，以保存国家之元气，维护社会之安宁也。"（选自《申报》）

蒋介石刚刚讲完话，便召开"甲种会议"，以分析当前学潮之原因。陈立夫和叶秀峰在甲种会议上均发言。叶秀峰说，治根治本还是要挖出学潮里的共党"细胞"，"细胞"不除，问题还有加重之势。陈立夫同意叶

秀峰的说法。后来蒋介石同意了叶秀峰的请求，但也强调：“共党分子善用学潮和媒体，凡事要周善处理，不要让共党分子反咬一口！”

会议后，叶秀峰再一次来到陈立夫的办公室谈话。叶秀峰说：“立夫，恐怕最近要有大事发生！”

“嗯！”陈立夫也有预感，但说不出是什么大事。

“各地调统室汇报，全国各地学生代表现在已经赶往南京请愿，此事一定是共产党所为！总裁刚刚发表讲话，意思是让我们动手。可现在的问题又出现了，只要动手必然惊动媒体！”叶秀峰考虑得颇为全面。

但是陈立夫说：“事关紧急，应先阻断再说！”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阻断学生情愿，电令教育部、首都卫戍司令部给全国各大学校致电：禁止学生请愿，违者以“军法”论处。只可惜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阻挡学生们的行动。

1947年5月20日，震惊全国的“五二零”学生运动爆发了。

各地学生打着“停止内战，反对饥饿”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

全国各地学生代表，约有5000人齐聚南京，他们于20日上午9点在规定操场上集合，然后沿着中山北路、长江路、碑亭巷、成贤街等一早规定的路线进行游行请愿。

令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统、军统以及宪兵队等早早联手，对丁家桥医学院、音乐学校、剧专、金陵大学等进行了严密封锁。

不过金陵大学学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毫不畏惧、突出重围。

10点50分左右，游行队伍来到了珠江路。

此时的珠江路商店紧闭，所有的车辆转道而行，甚至连救护车也被赶走了，只有早早等候的警察、特务们，整个珠江路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此时学生们开始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宪警和学生团结起来”、“警察拿出良心来”等话。特务、宪警听到后，暴跳如雷，面目更加狰狞。随着一声口令，暴徒们拿着铁尺等凶器向学生们冲去。

他们打开高压水枪，并往学运队伍中投掷瓦斯。那些吃不饱肚子的学生，体质很弱，经受不住高压水枪的攻击，爬起来跌倒，跌倒再爬起……

另外一群手持棍棒和铁尺的特务也冲了上来，对着请愿学生一阵狂殴。瞬间，哭叫声、哀号声混成一片。

暴徒们已经打红了眼睛，他们像疯狗一般见人就打，只要力气许可，要打多少下就打多少下……

其中女学生赵海伦被十几个暴徒围殴，她反反复复被打倒，头部、胸部、四肢均遭到严重的殴打，其中一个特务还跳起来猛踩她的胸脯，造成严重的内伤。

男学生孙傲沧则遭到暴徒们铁器的猛击，腿骨粉碎性骨折。

黄斌同学为掩护女同学遭到特务们的棍棒袭击，当时便呕血昏厥。

20日下午2点许，天气突变，雷声大作，突降一场大暴雨。那些虚弱的学生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冻得直哆嗦。

此时叶秀峰致电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其与中统局进行联合，加大驱散“闹事”学生的力度。

下午3点，学生主席团率先突出重围，后来中途又被暴徒强行带至卫戍司令部。

在代表们的强烈痛斥和要求下，他们会见了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卫持平。

代表团成员向卫戍司令部提出四项要求：

一、释放被捕同学；

二、负担受伤同学医药费；

三、对死者负完全责任，并严惩凶手；

四、撤退武装宪警。（选自《申报》）

后来学生团代表又会见了邵力子，在邵力子的多方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做出退步，准备撤离阻挠学生团队的军警和特务。于是下午6点，骑宪队警察防护团奉命撤退，而学生则整队返校。

除了南京，北平、天津等地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北洋、师院、中法、辅仁等等大学万余名学生手持“停止内战，反对饥饿”的锦旗，由东城经长安街至西城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当他们抵达西单时，突然遭到特务和警察的阻拦和殴打，其中两人受伤，两人被捕。

在天津，市专科以上各院校师生分两批进行游行。其中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及保定工业职业学校的五六百名学生游行至罗斯福路下天仙附近时，遭到百余名特务流氓的殴打，游行队伍被打散。警察以“保护学生”为名，逮捕学生17人。据统计，此次“冲突”共造成30余人受伤，其中重伤6名。“血案”发生后，南开大学发表“血的控诉”斥责国民党当局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南开大学也组织男女学生750余人自天津六里台出发，打着“反内战、反饥饿”的旗帜进行游行。结果遭到200余名便衣特务的拦截、殴打，其中简正芳、赵桂华、顾新生等学生受伤严重，另有20多人受轻伤。

而浙江、河南等地，学生们也纷纷以“罢课”、“绝食”等方式要求国民党改善待遇、增加公费。在此情况下，社会名流也纷纷出来讲话，其中包括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冯玉祥、李济深、何香凝、茅盾、叶圣陶、臧克家、章伯钧、韩兆鹗、周谷城、杜若素、陈白尘、胡子婴等人。与此同时，大量媒体、社团也纷纷关注这次史无前例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其中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会、民盟等等纷纷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响应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学运”，40个学校联合进行罢课。

得知此事，叶秀峰立马致电上海区主任季源溥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令其采取行动，镇压上海学生运动！

吴国桢采取了四个紧急措施：

一、煽动罢工闹事者可由工厂、商店或工人商人报告该管分局或警备区司令部予以究办；

二、非本校学生或人士前往各学校宣传演讲者，各校当局可拒绝，其不接受者可报告该分局照妨碍公务及侵占罪办理；

三、占据学校之财产，不任学校使用者，由学校当局铁令迁出，其

不迁出者可由学校当局报告该管分局，照妨碍公务及侵占罪办理；

四、学生志愿上课可向各学校当局申请，由各校当局转告该管分局保护等。（选自《申报》）

因此上海市数家学校遭到特务围攻，其中5月25日400多名暴徒袭击上海交大，并且导致2人重伤，40余人轻伤。暨南大学也是如此，其中造成多人受伤害，多人被捕。

叶秀峰本来打算借镇压“学运”打击共产党，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栽了一个大跟头。后来历史专家进行分析：“国民党反复镇压‘学潮’也是导致最终覆灭、兵退台湾的重要因素！”

13.于子三事件

“五二零”学生运动发生后，“学潮”一浪高过一浪，令蒋介石、叶秀峰等人寝食难安！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加大力度对“学生运动”进行控制。为了挖出学生运动的共党“细胞”，国民党当局对学生采取甄别的方式，即“通过者即可上学，不通过者即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的“甄别”法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此法一经推出便招致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学生们怒斥当局：“对学生进行甄别，无疑是一种不尊重学生人格的行为，同样也是打击学生追求‘自由’、寻找‘真知’的勇气。”浙江地下党负责人翁迪民与杭州市内的各个学校学生组织进行研究，针对国民党的“甄别”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与此同时，杭州市内所有大中专院校一致响应“五二零学生运动”的思潮，高举“向炮口要饭吃”等旗帜，展开一次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当然此情此景必然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关注。蒋介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折腾了几天后便喊来叶秀峰，并对其进行怒斥。

蒋介石怒拍桌子道：“娘希匹！学生们翻了天，你这个堂堂中统局局长竟然坐视不管，你究竟想怎样？”

叶秀峰吓得不敢作声。

“南京乱成一锅粥，北平、上海也闹得厉害，现在浙江也闹起来了！这些事天天就像‘蚊子’那样，嘤嘤嘤嘤地闹个不停！你现在赶紧想办法，不要让学生们继续闹事！前线打着仗，后方闹‘学潮’，如不加以百倍防范，政权便岌岌可危了！”

叶秀峰迅疾回答：“我一定不会辜负总裁的期望！”

叶秀峰挨了一顿骂，回到中统局亦是一脸的闷闷不乐。他立即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他将蒋介石的训话内容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大家。随后，他致电浙江调统室主任俞嘉庸，让其监视浙江学生的一举一动，如有动静，则立刻展开行动，阻止学潮发生。

俞嘉庸得到命令后，便将刚刚成立不久的特务组织“浙大学运小组”从中统杭州区划归省调统室，并不断向浙大输入“细胞”，伪装成进步学生与学生组织领导进行接触，并骗取其信任，获取情报。就在此时，一个学生组织的领导者进入了中统特务的视线，此人叫于子三。

俞嘉庸对叶秀峰说：“于子三是浙大运动的积极人物，同样还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如果控制住他，就能够控制住学潮！”

“于子三的底细查了没有？他是不是共党分子？”叶秀峰问。

“不是，只是积极分子而已！”

“积极分子？难道共党给他好处了？”叶秀峰目露凶光，“既然是学生代表、运动的发起人，那就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如无法控制，可直接逮捕！”

俞嘉庸于是下令给特务室的特务以及浙大“细胞”，让他们密切监视于子三的一举一动，如有情况及时上报。

于子三原名于泽西，山东牟平县初家镇前七夼村人。1944年10月，于子三考入流亡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受浙大“求是”学风熏陶和革命思想启迪，他毅然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担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6年秋，加入浙江大学秘密进步团体“新潮社”，后担任该社浙大农学院分社社长。1947年春，于子三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请愿运动，于1947年5月被再次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说起于子三，不得不说说于子三所在的革命土壤“浙江大学”。其实浙江大学自建校以来就有“学运”传统。“九一八”事变后，浙大学生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政策进行反抗，他们联名来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一二·九”运动中，浙大响应北平学生不畏严寒、冒雪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1945年3月，浙大教授费巩早在重庆神秘“失踪”，浙大学生举行罢课，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后来此宣言得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校的热烈响应，成为全国学运高潮的新起点，因此浙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在这样的革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于子三，自然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五二零运动”前夕，于子三在浙大召开了第一次学生大会，并通过了“不达要求、无限罢课”的决议。

翌日，于子三带领一千多名学生到火车站欢送赴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五二零惨案”发生后，在于子三的号召和带领下，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活动，并得到了广大杭州市民的拥护。此举令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大骂：“浙大乃共党分子的大本营也！”于子三也因此登上中统局的“暗杀花名册”。

1947年6月初，浙江地下党组织将于子三等学运骨干秘密转移到上虞暂避，以防不测。不过后来，于子三再次回到浙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学生运动。

1947年10月期间，叶秀峰得到一封密函，密函中写道：于子三的两个同学黄世民、陈建新坐火车来杭参加另一同学汪敬羞的婚礼，期间还将讨论“新潮社”奉化农场的事宜。叶秀峰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电令俞嘉庸，密切监视于子三等人的一举一动，并伺机逮捕。接到命令后，俞嘉庸布置专人进行盯梢，并且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对于子三等人进行抓捕。

1947年10月25日，于子三与汪敬羞来到杭州火车站迎接从上海来的同学黄世民和陈建新，当四人刚刚踏出站门，便被埋伏好的特务们逮捕。后来特务们将于子三等四人秘密押送至省党通组的拘留所。

得知于子三等人被捕，叶秀峰非常高兴，他致电俞嘉庸："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也要挖出于子三身后的共党分子！"于是俞嘉庸来到拘留所，开始对于子三等采取非人道的折磨与审讯。

于子三等人失踪一事很快就传到浙大。浙大师生对此感到十分震惊，震惊之余则是愤慨。于是浙大学子立刻召开大会，通过了"罢课、抗议、斗争"的决议，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施压，要求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给予说法！后来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前往省政府进行交涉，还委托校秘书长和训导长去拘留所看望于子三。

急于立功的叶秀峰可不在乎，他要求特务们加大对于子三的审问力度，要求其交代"新潮社"的有关情况及浙大的地下党组织力量。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等均没有让于子三屈服，在特务面前，于子三大义凛然，他大喊："为自己争取权利有何过错？"特务们见于子三死不开口，于是把情况汇报给叶秀峰。叶秀峰气急败坏，于是致电："既然不招供，留着何用？"受叶秀峰的旨意，特务们对于子三进行轮番的殴打、施刑。10月29日，受尽严刑拷打的于子三不幸牺牲！

噩耗传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特务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迅速将其余三人移送法院，并给于子三伪造了用玻璃片戳断喉管的"自杀"现场，以混淆视听。得知此消息，浙大校长竺可桢、训导长顾谷宜、校医李天助、学生代表叶玉琪、雷学时等五人来到现场进行认领尸体，一眼便看穿了特务的诡计。竺可桢严词驳斥，拒不在尸体认领单上签字，后来他对上海《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

后来浙大的师生们纷纷以"罢课、罢教"等方式缅怀学子于子三，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惊，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也出来讲话，劝浙大师生以学业为重，尽快复课！不过此事遭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拒绝，竺可桢说："教授会决议无法更改！"11月4日，竺可桢决定辞去浙大校长一职。

10月31日，浙大全体同学为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四同学，并残杀于子三君"发出联合请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

二、严惩杀人凶手竺鸣涛；

三、赔偿死者一切损失；

四、保证以后无类似事件发生；

五、由政府确实保障人权。

11月12日，浙大学生自治会致函给蒋介石，向其控诉于子三被杀害一事，并请求蒋介石严惩杀人凶手，为天下不法者鉴！

于子三牺牲的消息传到北方后，清华、北大、燕京、天津南开、北洋等等院校也纷纷发表"反对迫害、保障人权"宣言。而南京的三所大学也通过"罢课"等方式抗议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的做法……全国各地的大学纷纷响应，再次掀起学生运动高潮。

1948年3月14日，也就是于子三遇害四个半月之后，浙大才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浙大学生代表三百余人组成出殡车队，在"学生魂"的挽幛和"于子三烈士千古"花圈的前引下，将于子三烈士的灵柩安葬在凤凰山北麓的万松岭南坡，于子三的墓碑也成了"学运"的纪念碑！

叶秀峰原本想杀掉一个于子三，便可以让“学运”停止，没想到叶秀峰还是下了一盘臭棋。

后来，蒋介石发怒了，他致电叶秀峰严密监视全国各大学的学生运动情况，如不行再进行镇压。可是这一次叶秀峰学乖了，他一直没有出手，仅仅是替总裁做“情报”搜集工作！直到1949年国民党兵退台湾，叶秀峰也再没有制造出其他重大惨案，而他的中统局局长的职位，也最终被副局长季源溥接任。

第六章 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

1.季源溥其人

1949年，国民党兵退台湾，然而就在兵退台湾之前，中统局还努力“折腾”了一把。在中统局在大陆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结束之时，中统局的第三任局长，也就是最后一任局长季源溥上台了！

季源溥虽不像徐恩曾、叶秀峰这两任局长那样出名，但也参与和制造了许多著名的血案。他的双手同样沾满了鲜血，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他同样是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

季源溥，字汇川，江苏沭阳人。由于季源溥的家乡沭阳县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沭河，沭河由南北两条分支汇合而成，于是季源溥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汇川”，取义汇流成河，海纳百川之义。

季源溥也算出身“书香门第”，季源溥的父亲季福霖，是沭阳县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季源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名叫季道溥，另一个名叫季任溥。

季源溥的母亲是中国传统的农家妇女，自从她嫁给季福霖之后，便开始围着锅台转，在家里相夫教子。季源溥的童年还是非常幸福的，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有勤劳的父母。

季源溥一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父亲的工作

过去秀才开办私塾教书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作为“生活津贴”还是可以改善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

二、耕地

季源溥一家拥有耕地十几亩，因为沭河流域土地肥沃，季源溥的母亲又十分勤劳，每年收成都不错。

季源溥一家一直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

而作为家中的老大，季源溥深受父亲的重视。季源溥还在“咿呀学语”时，就被父亲带到自己的私塾里学习知识。季福霖教大儿子季源溥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季源溥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

在父母眼里，季源溥是个用功的好孩子；在弟弟们眼里，季源溥是可以当作榜样去学习的大哥。十几岁的时候，季源溥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每年麦忙或者秋收的时候，都随父母下地收粮。

季源溥从小就勤奋好学、争强好胜，但是却心胸狭隘、城府颇深。就连和他一起玩的孩子们，都说他“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心胸太过狭窄”，不管是谁得罪了他，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对方。

季源溥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季福霖就想把儿子送出去读书。季源溥学习成绩很好，如果在沭阳上中学，未免有些屈才。

就在这时，季源溥生命中的第一个大贵人出现了！此人叫吕二，是沭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听说季源溥是个好苗子，就摇着蒲扇来到季家，对季福霖说：“老季啊，听说你家孩子读书用功，是个好苗子。你一定要好好培养他，将来做了大官，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啊！”

“哎呀，您言重了。我就是希望他能多识几个字，不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

吕二接着说：“可惜啊，咱们沭阳城太小，你应该送你大儿子去大一点的地方读书！”

“沭阳也挺好的。”

“唉，好男儿志在四方，难道你希望留他在身边跟你种一辈子地？更何况你讲的那些‘四书五经’早就老掉牙了，现在谁还学这个？老哥，听我一句劝，把孩子送到南京去念国中吧，那里才是国家栋梁的摇篮啊！”吕二摇着扇子，语重心长地开导季福霖。

季福霖是个怯懦的老实人，他不是不想送儿子去好一点的学校，而是不敢想，听吕二这么一说，心里活动起来，就低声问吕二：“可是我家孩子能进南京国中吗？”

“怎么不能进？有钱就能进！”

“要多少钱？”

“这个嘛……学费确实不低，但是考虑到孩子的前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花这个钱！如果你的钱不够，我倒是可以借你一些！”吕二非常热情，看来真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有所成就。

父爱如山，季福霖终于决定送季源溥去南京国中读书，可他翻遍家底，也没翻出多少钱来。季源溥家虽然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但衣服是自己裁布回来做的，粮食是自己种的，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存款少得可怜！最后，季福霖长叹一口气，决定去找吕二借钱，送儿子进南京国中上学。

吕二见季福霖登门，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知道你会来的，钱我都替你准备好了！南京我还有一门远房亲戚，汇川去了南京，可以去投奔我的亲戚，也好有大人照应！”

“吕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季某无以回报，我代表汇川和我们全家谢

谢您！”
“客气什么？只要汇川能好好读书就行了！”吕二十分大度。
季福霖拿着钱回到家，将此事告诉了季源溥和季源溥的母亲。季源溥的母亲听闻儿子要上南京国中上学，激动不已，她一把搂住季源溥，对季源溥说：“妈知道你从小爱读书，妈也希望你出去闯一闯，见见大世面！神仙显灵我们遇见了贵人，儿子，你一定要努力啊！”
季源溥一听，父母要送自己去300公里外的南京国中读书，心就飞出去了，从小到大，他还没出过远门呢！他一脸兴奋：“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就这样，季源溥进入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就读。三年后，不满二十岁的季源溥中学毕业，回到沭阳。回来后，他继承父业，在沭阳县第一小学做了一名教师。
其实教师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收入稳定，受人尊重。不久，季源溥就在媒人的介绍下认识了第一任妻子耿令娴。随后，两个人遵从父母之命结了婚，婚后，两人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然而，季源溥却并不甘于做一名教师，他不想当一辈子老师。他认为自己屈尊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教书，是生命中暂时的蛰伏。他千方百计想要离开沭阳，回到大城市南京。于是，他给远在南京工作的同学们写信，请他们帮自己找份工作。
终于有一天，季源溥收到南京同学的回信。同学在信中说：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在进行招聘考试，季君是否有兴趣来试试？
这封信让季源溥眼前一亮，他认定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迅速卷着铺盖回到阔别两年的南京，准备放手大干一场！
此时的南京，革命气氛浓郁，正是国民党“清党”的高峰期。当然此时的季源溥心中，并无任何“主义”可言，只要能混进政府部门工作，他便知足了！经过笔试、面试等层层选拔，季源溥竟然考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陈立夫的“中统局”。当得知自己已经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录取，季源溥非常兴奋，立即致电沭阳的父母。
一名小学教师一跃成为国民党组织部的一名要员，这种跨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一年是1928年，党务调查科刚刚成立，正是用人之时，所以年仅22岁的季源溥很快就成为一名专业特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季源溥进入中统局后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大贵人，那就是陈立夫。陈立夫见到季源溥后，发现此人仪表堂堂、憨厚老实，于是问他：“在来我局之前，你从事过什么职业？”
“小学老师！”季源溥颇有些紧张。
“不错啊，教书育人是高尚的职业。你为什么不做教师，报考我局？”陈立夫问道。
季源溥解释：“要想搞好教育，先要平复世界！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男人要有宏伟的志气！”
陈立夫觉得季源溥说得很实在，无撒谎之嫌，哪个年轻人没点野心呢？季源溥实话实说，诚实可嘉。于是陈立夫拍了拍季源溥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干，党国不会亏待你的！”季源溥听了信心十足，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为了在中统局站稳脚跟，季源溥可谓倾尽所能，尽展自己的才能。

党务调查科成立伊始，全科上下仅有20个人。科员、秘书、科长等均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于是季源溥的所有努力陈立夫均能看到。季源溥像个学生，时不时向陈立夫请示，而陈立夫也倾囊授予季源溥各种特务专长！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稳固提升，陈立夫把季源溥也拉进了自己的CC系统里。随后，陈立夫推荐季源溥去日本东京直属支部学习，意欲将季打造成中统的王牌特工。

“九一八事变”之后，季源溥从日本学成归来，他满载而归，带着一身特务特长回到党务调查科！但此时大恩人陈立夫已经上调，科长换成了大特务徐恩曾。徐恩曾并不太喜欢季源溥，将其分配到上海，担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总队副总队长。

初到上海时，季源溥有些害怕。毕竟人生地不熟，况且特务工作又相当危险。老特务们都说，特务工作就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所以季源溥常常担心有人暗杀自己，后来他还给自己配了保镖，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都安置了岗哨，要求岗哨24小时轮流执勤。

想在上海滩打开局面，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有些工作必须要做到位，才能打开局面——比如人际关系！上海滩的三位大佬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都是季源溥亟需沟通和拜访的重要人物。

季源溥到上海后，先是主动登门拜访了杜月笙，并主动投靠其门下。杜月笙与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关系都很好，在得知季源溥是CC系的人之后，积极配合他展开工作。季源溥就此进入青帮，一步步成为青帮的“头头”，后来竟公开设香堂广招青帮分子，季源溥的根儿就此扎在了上海滩上，而且越扎越深。

1935年，季源溥的父亲季福霖去世了。得知此噩耗，季源溥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沭阳。此时的季源溥已经不是过去的季源溥了，他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陈立夫眼里的红人。于是，他一到沭阳，便被沭阳的官吏、乡绅和富农团团围住，连他的大恩人吕二都赶来相见，竖起大拇指对他说：你是咱们沭阳的骄傲啊！

季源溥是个孝子，他给老父亲季福霖举行了风光的大葬。他找来沭阳县的县长祁伦捷，请其为老父亲主持葬礼，而后又花大价钱请来乐队吹奏哀乐。得知季源溥的父亲去世，国民党许多政要也纷纷送挽联吊祭。连蒋介石都送来了挽联，挽联上这样写道：“古道可风”；而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送来挽联，挽联上写道：“乡闾矜式”（意思是乡间的模范）；陈立夫、陈果夫、吴铁城、徐恩曾等人也都纷纷送来挽联。

办完丧事，季源溥回到了南京。随即，徐恩曾派其到铁道部担任了劳工科科长一职。

劳工科刚刚成立，只有几个人而已，除了整理资料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人能从事特务工作。

鉴于以上两个问题，季源溥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巩固其地位，树立绝对权威形象；

二、大范围招收特务人员，扩充编制。

在“巩固地位、树立权威”方面，季源溥要求凡是各铁路局调查室呈报情报，都必须经他亲自批阅，而招收特务人员方面，须经本人面试通过后，方可批准！在“招收学员”方面，季源溥是十分认真的，每一个特

务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派至各地方铁路调查室进行情报搜集及破坏工作。除此之外，季源溥还制定了一个通讯员制度，大力扩编自己的队伍，不过到了后期，招纳人员的味道有些变质，凡是愿意参加者，只要交点报名费，均可以参加，于是招纳人员就成了季源溥变相敛财的一种方式。

1938年，季源溥为了继续扩大势力，准备成立“中国劳工协会”。季源溥将此想法上报给陈立夫，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立夫的反对。

“不行，这个名字太显眼，区区几个人就冠以‘中国’之名，实在有所不妥！”陈立夫是个低调的人，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手下太高调，于是季源溥只好将“中国劳工协会”改名为“战时劳工社”。

此时的季源溥，野心急剧膨胀，在交通部由南京迁至重庆后，季源溥到处走动斡旋，将“战时劳工社”改名为“中国劳工协进社”。翌年，又将“中国劳工协进社”改名为“中国劳动协会”！季源溥也因此而名声大振，中统局也因此有了更有利的行动掩护。

徐恩曾对季源溥的能力颇为认可，他在“中国劳动协会”成立后，夸奖季源溥：“你的这个做法非常好，既扩大了中统局的影响力，也得到了上面领导的关注！”

季源溥很少得到徐老板的夸奖，这不仅是徐老板第一次认可他，并且还对他说：“要不这样吧！为了更好地发挥劳动协会的作用，局内每月下发一定的活动费给劳动协会，予以大力支持。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是的，是的！”

后来，季源溥又先后成立了数家劳动分社，而且还在1943年举行了一次成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季源溥还为“中国劳动协会”选了一个风水阳宅，此阳宅是一座位于中统局本部旁边的四开间的平房，季源溥还指定瞿纷如、吴光远、程福葆等担任中国劳动协会的理事！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季源溥还开办了报纸，且取名《战时劳工》报。

叶秀峰上台后，季源溥又被派遣回上海，担任中统局上海区区长，以接替因“花柳病”而暴毙的吴兴伯。季源溥上任伊始，便屡屡制造“血案”，其中《文萃》案最为出名！他还劫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并为自己狂赚了一笔。季源溥的疯狂敛财还惊动了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秀峰，为了“保护”季源溥，替其掩盖罪行，叶秀峰迅速将其调回中统局本部担任副局长一职，这才转移了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注意力，让季源溥涉险过关。

1949年5月，中统局分化成为内政部调查局后，季源溥终于坐上中统局局长的宝座。上任后，他又对中统局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只可惜此时解放军的大部队早已渡过长江，季源溥的中统局局长宝座还没坐热，便随国民党撤到台湾去了！

2.风光的劳工科科长

纵观季源溥在中统局的岁月，最辉煌的还应该是他担任劳工科科长的那段岁月。1934年冬天，徐恩曾成立了浙赣铁路调查室，任命瞿绥如

为该室主任，谌小岑为该室肃反专员。后来这两人随铁道部部长曾养甫一同调至广东任职。随后，徐恩曾派季源溥担任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打入铁道部内部。

季源溥上任后立功心切，希望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要想立功，首先要抓捕共产党以示决心，于是季源溥开始四处寻找共产党员。

有一天，季源溥来到一个流动书摊，发现此书摊竟然贩卖进步书刊。季源溥怀疑此书摊是共产党办的，于是交代手下对此书摊的摊主进行跟踪调查，以落实身份。

几日后，一个特务向季源溥汇报："科长，书摊的摊主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季源溥皱起了眉头，继续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是衡阳车站的黄站长！"

"也许黄站长是共党打入我党阵营的特务呢？"季源溥吩咐道，"你们继续跟踪调查黄站长，发现异常，果断逮捕！"

特务们继续监视黄站长的一举一动。

当时，这个衡阳站的黄站长，为了发泄个人情感，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反动"文章。这几篇"反动"文章，便成了季源溥将他打成共党分子的有力证据。于是季源溥指示特务将黄站长拘捕，并将其带回劳工科亲自审问。

"黄站长，知道这次请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季源溥眼露凶光。

"不知道！"

季源溥将搜集来的几份报纸摆到黄站长面前："证据在此，你还想抵赖？"

"你认为我是共产党？"黄站长笑了，"我是赤诚的国民党党员，你说我叛变我就叛变了？现在党国腐败不堪，难道还不许自家人说几句？"

这两句话竟然难住了季源溥，毕竟季源溥还没有黄站长私通共产党的确凿证据。无奈，他反问黄站长："难道共党分子的脸上会写着'共党'二字吗？黄站长，我希望你能够好好配合，只要你说出铁路系统的共党分子的人员名单，我不但会放了你，而且好处也是大大的！"

"不是就是不是，凭什么说我是？"

黄站长跟季源溥争吵起来。季源溥恼羞成怒，吩咐特务们对其实施刑罚。但折腾来折腾去，黄站长也没交代出什么来。

此事随即在衡阳铁路职工中传开了，铁路职工们纷纷罢工，向铁道部劳工科科长季源溥施压，要求释放黄站长。眼看"工作"上毫无进展，又找不到丝毫有力的证据证明黄站长是共产党，季源溥只好释放黄站长。没几天，黄站长就申请调离了衡阳火车站。

送走了黄站长，季源溥又迎来了粤汉铁路党部书记徐锡巽。徐锡巽在任期间，因为个人思想倾向的问题，遭到铁道部免职。但季源溥鉴于此人在粤汉铁路上工作多年，有一定的人脉，重新起用他担任粤汉铁路职教委员。

1938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兵撤武汉。与此同时，沦陷区铁道部的员工们也纷纷来武汉扎堆儿。一时间武汉人满为患，大家纷纷向国民政

府开口要救济、要工作。而国民政府立足未稳，只能想办法敷衍拖延。但敷衍拖延也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党部致交通部部长张嘉傲，请张嘉傲拿出个主意。

张嘉傲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季源溥最合适做群众工作，于是找他商议："汇川啊，近期从沦陷区的铁路上来了一批人，这些人来了之后无事可做，时间一长恐生事端。过去你在党务调查科管理过人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您所说的我早已有所耳闻，只是谁来授权我去处理？"

"这个你放心，上级已经发话了，只求稳住这批人，不要生出事端，至于谁去负责，我说了算！"张嘉傲如是回答。

季源溥听了心中十分得意，这正是他借机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对张嘉傲说："部长请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绝不会让部长您失望！"

季源溥来到武汉街头，果然看到江边站着一群无所事事的铁路职工。于是他脑子一转，一个计划新鲜出炉：要想笼住这群人，必须成立一个组织，只有成立了组织，这些人才能为己所用。当然，仅仅有组织还不行，还要让他们接受思想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人尽所能。于是季源溥下令，让手下的特务们拿着喇叭号子去街头"拉皮条"，劝说大家到铁道部劳工科来谋出路！在特务们的诱骗下，数百名铁路职员来到了季源溥的办公室的门前。

季源溥挺着肚子，踱着方步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先是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吹嘘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党国创办的这个'赈济委员会'，就是为大家而创办的，可见党国的良苦用心！当前抗战形势严峻，希望大家体谅政府，凡事以大局为重。"

季源溥讲完话，便将这些铁路职工带到湖南湘潭开始集训。他把前来报名的铁路职工进行编号，然后带着他们来到湖南湘潭，成立了临时训练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

训练内容主要有两项：

一、政治思想灌输

无非是灌输老生常谈的《三民主义》、《唯生论》之类的书籍上的思想。

二、特务技能训练

此训练质量与中统局的特务训练没有可比性，仅仅是盯梢、乔装打扮等简单技能。

三个月后，季源溥将这群人集中编为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这里的"服务"无非是特务工作。总队下又设四个大队，四个大队又下分中队。季源溥任总队长，季源溥的心腹则担任下属大队队长。

那段时间，季源溥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交通员工服务总队上，他几乎天天视察工作，偶尔还会召开总结大会。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季源溥还从调统室抽来督察员若干，对大家进行思想监督和学习监督。

季源溥以为，自己这样积极努力，大张声势地行动，一定会令交通部部长张嘉傲放心和开心。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嘉傲觉得季源溥太出风头，野心膨胀，唯恐自己日后不能控制季源溥，在一年之后，竟然

自作主张解散了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这令季源溥十分伤心。

在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被解散后，季源溥成立了“中国劳动协会”。成立了劳动协会后，季源溥不遗余力地奔走各地，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劳动分会”。不久，他与粤汉、湘桂铁路中统室的特务们开办了第一个劳动分会：衡阳劳工分社。该社一成立，便大肆扩编。季源溥说：“一定要按照‘组织发展组织，人发展人’的思路扩大分社规模！”事实上，衡阳社后来发展了数百名“特务”，成为中统外围组织的一股重要力量。

1943年，季源溥的劳工社已颇具规模，季源溥在重庆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劳工社代表大会。

各地分社成员在接到开会通知后，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重庆。

会议期间，季源溥还选出了劳工社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理事，季源溥本人出任理事长，理事则是由几个中统特务担任。

会议结束后，有特务偷偷问季源溥：“会长，你为何不另起炉灶，自立门户呢？”

“这当然不可以，我们是中统的中坚力量，一定要效忠中统局。”其实季源溥说的都是违心的话，他正在为自立门户努力奋斗着。

不久之后，季源溥便在广东、福建、兰州、上海等地开设了“劳工分社”。尤以上海劳工分社在抗战胜利后劫收日伪资产方面“贡献”突出。

上海分社成立后，季源溥将劳工社的日常事务交给上海工运组组长吴光远处理。吴光远也很给力，在国际电台和电信局发展了十多名成员，并将上海工运组改名为“劳工协进社”。该会打着“劳工”的名义，监视搜集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为中统局提供进步人士黑名单。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劳工组织，季源溥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劳工协进社理事会议。中国劳工协会愈发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然而，劳工协进社却屡屡因为缺乏资金而运转不灵。因此，吴光远多次向季源溥提及，季源溥却无可奈何：“国难当前，资金紧张，党部不给拨款！”

后来，季源溥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开动脑筋，四处寻找商机。当时上海滩流行三样东西：美国的玻璃丝袜、胡蝶的电影以及梅兰芳的京剧。季源溥是个京剧迷，于是他打算向“京剧”下手。

经过一番思考，季源溥吩咐吴光远：“既然协会缺钱，那就筹办义演进行募捐！”

“义演？”吴光远皱着眉头问，“这样能行吗？”

“肯定行，你负责找个剧院就成了！”

随后，季源溥假借建立劳工组织的名义，派特务李永祥去请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参加义演。这三位京剧名伶都是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当局颇为不满，一致拒绝参加义演。

李永祥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就向季源溥汇报：“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这三个老东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就是唱出戏吗？让他们义演算是给足他们面子了！没想到这帮人还真拿自己当回事，端起架子来了！科长，你说咱怎么办？”

“看来，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季源溥目露凶光，“我倒要找座大山来压一压他们的气焰！”

随后，季源溥致电叶秀峰和陈立夫、陈果夫，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

邀请名伶们来参加劳工协进社的义演。

在季源溥的游说下，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季源溥随后又派李永祥再次到三位大师的家门前送请帖。李永祥使出浑身解数，加上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秀峰的电话邀请，梅兰芳、周信芳和马连良三位大师终于同意参加劳工协进社的义演。

义演设在上海市西藏路皇后大戏院，这家戏院是当时上海设施一流的大戏院，许多名伶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过。季源溥还找来上海滩最好的设计师，制作了几张巨幅海报，悬挂在皇后大戏院的两侧，招揽观众。

此次义演，演出阵容强大，堪称上海滩有史以来最豪华、最有实力的“京剧名伶秀场”。演出门票也贵得很，据说每场门票15万新法币一张，普通人是绝对看不起的。

义演连续演了三天，场场爆满，三天的门票收入可谓一笔庞大的财富。这是季源溥筹划的最为风光的一次活动，不仅名利双收，而且让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秀峰都对他啧啧称赞。

然而，上海劳工协进社的发展并不顺利，协进会在争夺上海工人工会实权时，与上海另外一家工会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简称工福会）发生了矛盾。工福会声称，工人社会福利的问题本该工福会管理，与劳工协进会无关，可季源溥怎肯放手上海工人工会。

后来，工福会的人还跑到国民党社会部部长吴开先面前告状，吴开先不是中统局的人，所以对特务出身的季源溥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吴开先下令终止了上海劳工协进会的一切活动，并且勒令上海劳工协进会收缩规模，不得开办支社。

季源溥因此大怒，背靠CC系的他，根本就没有把社会部部长吴开先放在眼里，吴开先的命令激怒了他，他更加努力地开挖工福会的“墙角”！

最后，吴开先无奈，出面道歉，将工福会的头头陆京士和季源溥拉坐一桌，协商“共存”。然而季源溥却不买账，表面笑呵呵，背后藏暗箭，最后竟然击垮了“工福会”，独霸上海工人工会的实权。

然而好景不长，历史的车轮很快就推进到了1949年，国民党最终退守台湾，尽管季源溥后来当上了中统局的局长，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毛泽民、陈潭秋被害案

说到季源溥，不得不说说毛泽民、陈潭秋被害一案。

1943年9月27日，在中国的新疆，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中共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陈潭秋和中共新疆库车县县长兼乌什县县长林基路三名同志，在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被杀害，此事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惊了整个中华大地！

毛泽民等人的牺牲一直是一个谜！许多党史、传记均说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刽子手是新疆大军阀盛世才。但据后来许多史料记载和事件经历者回忆，杀害三人的人并非只有盛世才一人，中统大特务季

源溥也是残害毛泽民的凶手之一！为了解开这个谜，还要从日本侵略中国的1937年说起。

1937年5月份，中共代表陈云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维护统一、一致对外”达成协议，并成立中共新疆办事处。随后，盛世才把四百多名红军官兵安全带到了迪化。双方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共产党一方派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入驻新疆办事处，盛世才还邀请了国内诸多名流来新疆协助共产党一同工作。

先来了解一下盛世才和毛泽民这两个人。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期间，盛世才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奉军，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再次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回国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历任总司令部参谋。1930年，他受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邀请，来新疆工作，并担任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任东路剿匪总指挥。1933年，野心勃勃的盛世才觉得时机成熟，揭竿而起，发动政变，用武力逼金树仁让座。于是，他终于坐上了新疆督办的位子，并于翌年当上了新疆主席。

盛世才刚刚当上“新疆王”，便向新疆地区宣传“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所谓“亲苏”，就是亲近苏联苏维埃政权，通过这样的口号，盛世才意欲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而“民平”，就是希望在新疆范围内停止战争。由此可见，盛世才其实是打算一边向苏联靠拢，一边拉拢共产党的，他希望中共派有志之士前来新疆搞建设。

而且，盛世才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多次写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盛世才曾经于1924、1934、1937年三次写入党申请书申请入党，但是由于他的“军阀”身份，一直没有获批。虽然共产党一直没有同意盛世才入党，但对盛世才要求引进优秀共产党人才到新疆一事还是给予了鼎力支持。而且当盛世才得知毛泽民是毛泽东的亲弟弟，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理财专家之后，他请求毛泽民留在新疆，为新疆的建设出谋划策。

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字润莲，1921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毛泽东在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辗转上海、武汉、天津、香港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7月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1931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任第一任行长。长征之后，毛泽民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他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他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毛泽民来到新疆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就在盛世才与毛泽民等人通力合作，发展新疆之际，中统局的特务们，将目光投向了新疆。

1939年春天，中统特务孙步墀、干事张效仁向陈立夫、徐恩曾汇报：“共产党在新疆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老百姓拥护，其中共党分子有徐杰（陈潭秋化名）、周彬（毛泽民化名）、林基路、马明芳、杜宁（杨之华化名）等人。除此之外，共产党在新疆还建立了航空学校，准备‘借鸡下蛋’，建立空军，可见共产党有

长期经营新疆的计划和打算。”

陈立夫听完汇报后，一刻也没有延误，迅速密报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陈立夫的密报，颇有些惊讶，他皱起了眉头，对陈立夫说：“新疆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后方根据地，没想到共产党提早下手了，我们得想个办法应对才是！”

陈立夫频频点头。

蒋介石问道：“现任新疆主席是谁？”

“盛世才，此人曾三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都没有被共党批准入党！盛世才也算一厢情愿，共产党不买他的账！”陈立夫回答道。

“看来共产党如今也是不需要盛世才，而是需要新疆啊！”蒋介石摇摇头，接着问道，“共产党在新疆的活动情况你掌握了没有？”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新疆，现在全面负责新疆的财政！”

“毛泽民？毛泽东派自己的胞弟去新疆了？这说明新疆对他很重要啊！想办法制止共党控制新疆，决不能让共党得逞！”蒋介石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对陈立夫说，“盛世才三次入党都得不到共党的批准，看来，盛世才的工作不会太难做！”

“还请总裁明示。”

“这说明共产党眼里根本没有盛世才，那么盛世才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共党的冷屁股呢？立夫啊，明天一早你去新疆一趟，做一做盛世才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为党国卖命！”

次日，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可洛夫一同前往新疆。

其实，陈立夫与盛世才的私交原本就不错，他深知盛世才多疑，和共产党也有些宿怨，所以此去新疆，陈立夫心中也有几分把握。陈立夫之所以拉上苏联大使，是因为盛世才是个亲苏分子，拉上苏联大使，也算他陈立夫出师有名；另外，苏联援助的飞机急需油料，只有苏联大使才能请盛世才帮忙供给一些油料。

陈立夫一到新疆，便直奔盛世才的府上。两个人见面后，一番嘘寒问暖，随即便切入正题。

一开始，陈立夫并未进行策反，而是以“教育部部长”的名义了解新疆的教育现状。随后，他又谈起“苏联援华飞机经过新疆，请盛世才支援一些油料”一事。随着两个人的交谈深入，陈立夫才撂下架子，慢慢展开“策反”攻势。

陈立夫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只是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妙啊！”

“为什么这么说？”

“盛老兄，咱们是老朋友我才说这些话！你三次申请加入共党，可是共党却无动于衷，你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呵呵，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的身份问题！”

“不是！”陈立夫严肃地向盛世才解释，“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把你当成了外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赤化新疆，而不是你盛世才！你想想看，毛泽东派自己的胞弟来新疆，目的何在？还不是想借机赤化新疆？倘若新疆成了共党的天下，你盛世才还能在这里称王？老兄，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啊！”

陈立夫见盛世才皱起了眉头，继续说：“共产党已经与新疆民众打成了一片，他们还想借你的财力成立空军学校和土木学校，为自己培养后

方人才。你可否想过，你这样做根本就是在为敌人卖命，为共产党做嫁衣裳！总裁得知你的境况，也非常着急！你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为什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拱手让给共产党了呢？说实话，我非常不解！”

“陈老弟，其实我心里也不大舒服，他们一来就占据了要位，还对我的部队指手画脚。长此以往，恐怕我的兵权也会被他们抢去！”

“呵呵，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陈立夫的一番分析，对盛世才的触动很大。盛世才虽然认可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但也非常担心共产党的力量壮大后，削弱自己的力量，甚至挤走自己。在听了陈立夫的一番话后，盛世才派出了岗哨，对毛泽民、陈潭秋等人暗中进行监视。

陈立夫除了对盛世才展开思想攻势之外，还曲线救国，借视察“师范学校”之名，与盛世才的老婆进行了一番长谈，目的自然还是劝盛世才的老婆说服盛世才归顺国民党。

英雄也怕枕边风，盛世才的老婆当晚就对盛世才展开了温柔的劝说：“陈部长说得对啊，你对共产党这么好，共产党可否感激过你？既然蒋总裁有意栽培你，为什么你不跟着国民党干？”

“妇道人家懂什么？不说话还把你当哑巴不成？”盛世才颇有些气恼，毕竟当下共产党派驻新疆的人数较多，有的还担任要职，而盛世才在许多方面还需苏联方面的支持，怎可轻易和共产党翻脸。

随后，在陈立夫和枕边风的蛊惑下，盛世才对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态度冷淡了许多。没几日，盛世才便找了个借口，撤了毛泽民的省财政厅厅长的职务。

陈立夫见盛世才撤了毛泽民的职务，心中大喜，便回重庆向蒋介石邀功去了。

蒋介石见陈立夫归来，十分关切地问道：“盛世才有无反共之心？”

“总裁放心，此人已经开始反共了，他已经撤了毛泽民的职！”

随即，陈立夫递给蒋介石一份文件：“总裁，这是在新疆任职的主要共党分子的名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名单，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蒋介石迅速指示陈立夫：“密切监视盛世才以及毛泽民等共党分子的活动情况，如有变化及时汇报！”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日本人开始了侵华大扫荡！内忧外患之下，盛世才急需一个靠山。但在陈立夫的屡次挑拨下，他已经不再信任中国共产党。盛世才最后决定，投靠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派遣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到新疆与盛世才谈判。

1942年春，蒋介石为了招安盛世才，致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他力劝盛世才投靠国民党。马步芳接到命令后，立即去了新疆，而且他还命令“西北王”胡宗南的部队封锁了新疆的各个出口，向盛世才施压，在多重压力下，盛世才最终投靠了蒋介石。

1942年7月30日，新疆政府撤下区旗，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改旗易帜”！随后，盛世才下令，要求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统统返回迪化，随后，盛世才将入驻新疆的共产党员集中监视了起来。蒋介石听

闻此讯，高兴不已，迅速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

1942年8月17日，盛世才第一次去重庆参加国民党党内会议，会议中，盛世才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汇报了新疆的情况。蒋介石高度赞扬盛世才，说新疆当下的和平稳定，全靠他新疆王盛世才！

最后，蒋介石还暗示盛世才："新疆有些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有人企图分裂新疆，必须迅速逮捕！"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终于和共产党撕破了脸皮，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软禁在刘公馆。

紧接着，盛世才又将林基路等20余名共产党囚禁在三角洲招待所内。

随后，国民党当局致电盛世才，指使其将入驻新疆的所有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统统抓起来，总计逮捕了140余人。

在将共产党人逮捕殆尽之后，盛世才致电陈立夫："陈老弟，新疆境内的共党要人已经统统抓起来了，该如何处置他们？"

陈立夫恶狠狠地说："这些共党分子都是死硬分子，只能严厉处置！"言外之意，陈立夫要求盛世才对共产党人施以极刑。

1943年3月，盛世才上报重庆当局，请蒋介石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新疆的共党人员。蒋介石就此组织了一个"新疆审判团"，专门审理盛世才编造的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杜重远阴谋暴动案"、"阿山案"。这个审判团的头号成员，就是中统大特务季源溥。

时任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派季源溥带领审判团深入新疆，并派陈建中、李宏基等大特务到新疆进行监督工作。

季源溥等人到达新疆后，马上成立了审判委员会，季源溥为审判长，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郑大纶、盛世骥为审判委员，郑大纶和裘朝永负责审判记录。而盛世才又将审理委员会分为三个审判组：季源溥等5人专审"共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王德溥等3人专审"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朱树声等3人专审"阿山案"。

第一次审讯的时间是1943年的3月份，季源溥等人刚刚抵达新疆迪化，便开始对毛泽民等人进行审讯。

季源溥知道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所以第一次审讯时，季源溥还是妄图说服毛泽民离开新疆，并且妄图让毛泽民去说服毛泽东不要再和国民党作对，然而毛泽民根本不买季源溥的账，把这个大特务臭骂了一顿。

季源溥恼羞成怒，他严厉问毛泽民："你们为什么要来新疆？"

毛泽民不屑一顾，冷笑道："你不应该问我，而是应该问问盛督办，是他请我们来的。没有他的盛情相邀，我们怎会来新疆？"

"胡搅蛮缠！你们来新疆明明是来谋反！"

"我们为什么要谋反？我们所做之事，盛督办最清楚！"

此时，陈潭秋高呼起来："我们来新疆的目的是抗日，难道抗日也有错吗？委员长不是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吗？"

季源溥无话可说，气急败坏，黔驴技穷，只能对毛泽民、陈潭秋施以重刑。特务们将两人押至大牢，先是鞭刑，而后是压竹杠、坐老虎凳……经过一系列的酷刑，毛泽民、陈潭秋等人不胜暴打，昏厥过去。

然而，季源溥却不肯罢休，命令特务们继续拷打毛泽民等人，对毛泽民、陈潭秋等人施以坐飞机、打手掌、挂炸弹等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

在经历了几天几夜的毒打后，毛泽民等人依然咬紧牙关，不屈如初。

4月24日，季源溥又来到审讯室，再一次审讯奄奄一息的毛泽民："你们在新疆到底有没有组织？"

"这里没有组织，只有六大政策！"毛泽民说。

"什么六大政策？"

"这个你要问盛世才，政策是他制定的，我只是执行政策！"

季源溥继续问："那么'阿山事件'是不是受到第三国际的指示？"

毛泽民回答："第三国际没有指示，我们认为阿山案子很离奇，口供不符实。"

季源溥又恶狠狠地问毛泽民："如果你们的组织在新疆搞阴谋暴动怎么办？"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季源溥见毛泽民不招，再次命令打手对奄奄一息的毛泽民施刑。

5月5、6日，季源溥再次对毛泽民进行了第五次、第六次审讯。这一次审讯，季源溥吩咐打手继续对毛泽民施刑逼供，并采取"车轮"方式，轮流对毛泽民进行"坐飞机"、"压竹杠"、"挂炸弹"，打昏之后，再用阿姆尼亚药品刺激毛泽民醒来……这一次非人性的折磨是漫长的，前后历经七天七夜……与此同时，陈潭秋也被打成了一个血人。

季源溥

毛泽民

季源溥审讯毛泽民

季源溥最终终于明白了，想要从毛泽民、陈潭秋嘴里得到点什么，

根本是徒劳的！所以他决定伪造“证据”，直接定罪。

5月底，季源溥伪造了一份“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判决书，与此同时，王德溥、朱树声也在炮制“杜重远案”和“阿山案”的判决书。他们琢磨了半天，最终引用《刑法》中的有关条文，写下了如下判罚：

> 在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的指挥下，李一欧召集和主持秘密会议数次，决议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时，实行武装暴动。
>
> 首先由自卫队上台将盛世才卫队缴下枪支。
>
> 推定李一欧刺杀督办盛世才，孟一鸣刺杀参谋长汪鸿藻，潘柏南刺杀民政厅厅长李溥霖，刘西屏刺杀财政厅厅长彭吉元，李啸平刺杀教育厅厅长程东白。
>
> 同时航空队派飞机在大会上空示威，散发传单。
>
> 另派人率领武装分别占领督办公署、省政府及邮电、银行、仓库等各机关。暴动成功，即组织新疆新政府，推徐杰、周彬为负责人。
>
> 核其所为，被告徐杰、周彬等20余人，触犯《刑法》第二章“内乱罪”，应依法判决。
>
> 判处徐杰、周彬、林基路死刑，李一欧、孟一鸣、潘柏南、刘西屏、李啸平无期徒刑，其余被告3年以上15年以下徒刑。

宣判结束后，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被关押到新疆第四监狱。

季源溥带着判决书高高兴兴地回了重庆。

季源溥一回到重庆，就来到陈立夫的办公室，向陈立夫汇报：

“案子审判时有些曲折，但他们‘预谋叛变’一事却是铁板钉钉，所以以《刑法》第二章‘内乱罪，判他们死刑！”

“共党方面有什么反应没有？”陈立夫问。

“这个案子没有公开审判，共党方面还不知道此事！”

陈立夫迅疾提醒季源溥，“一定要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声张！你马上致电盛世才，让他做好保密工作！”

季源溥离开陈立夫办公室后，又向徐恩曾汇报了工作。

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在监狱里，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场斗争。

青年共产党人、曾时任库车县、乌什县县长的林基路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在第四监狱的五号牢房里，对同住一个牢房的共产党员高登榜、陈谷音、曹建培等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想办法组织起来，反抗到底！”

“对啊，难道抗日还有错吗？凭什么判我们有罪？”

“就是！”

大家纷纷痛斥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为，林基路号召大家继续抗争，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将生命交付出去！林基路还自编了《囚徒歌》，由同一个牢房的共产党员、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谷音配曲，大家一起

在监狱里高唱《囚徒歌》！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943年9月，盛世才接到重庆密电，命其枪毙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盛世才看到电报，内心五味杂陈，毕竟毛泽民、陈潭秋都是他请来的，重庆要他杀掉这些共产党人，他也有些难以下手。而远在重庆的陈立夫，也深知盛世才优柔寡断，唯恐他不肯执行命令，所以派了季源溥等特务到新疆来协助盛世才执行总裁的命令。

1943年9月27日，几个打手把毛泽民从牢房里拉出去，毛泽民跟着打手们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根棍子猛击在他的头顶……毛泽民就这样死在了特务们的手里，时年47岁。

4.筹划暗杀杨虎城

在毛泽民、陈潭秋被害之后，季源溥日渐受到陈立夫的重视，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一只手”，这只手的任务就是“杀人”。

季源溥之所以愿意充当陈立夫的身前打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陈立夫是CC系首脑，CC系控制着国民党的党组织；

二、陈立夫是自己的上司，曾经有恩于他。

陈立夫对季源溥可谓恩重如山，季源溥之所以能够留在党务调查科，主要依赖陈立夫的认可。后来，陈立夫推荐季源溥去日本留学，留学归来后，又推荐他去上海工作。季源溥与徐恩曾曾经关系吃紧，多亏了陈立夫从中斡旋。而1946年季源溥当上中统局副局长，也是陈立夫所赐。所以，陈立夫是季源溥的大恩人，季源溥自然愿意做陈立夫的一只手，替他去杀人。而陈立夫只要有“露脸”的机会，也会交给季源溥处理，比如“毛泽民案”，再比如，“西安事变”后暗杀杨虎城一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监禁事件，直接软禁了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此时最为“着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戴笠，另一个是陈立夫。作为蒋介石左膀右臂之一的陈立夫陷入了慌乱之中：如果救出蒋介石，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如果救不出，政权恐旁落他人之手！于是他打算采用武力的方式讨伐西安！但是此办法遭到了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的反对。然而陈立夫却坚决不肯让步，他对冯玉祥等将领说：“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虞，唯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在国民党老臣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人的支持下，陈立夫决定武力讨伐西安。然而，陈立夫还没派出人马，宋美龄便从上海回到了南京，她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救出被囚禁的蒋介石。宋美龄的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党内元老的支持，这就使得陈立夫的“武力营救计划”暂时搁置。

1936年12月26日，令大家意外的是，蒋介石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

了，而且是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了南京。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陈立夫便跑去蒋介石办公室问候。

陈立夫先是安慰了蒋介石一番，然后又痛斥了共产党一顿，最后又滔滔不绝地提了许多建议和看法。可是蒋介石始终未正眼瞧他一眼，而是慢慢地说："有事以后再说，我要休息！"其实届时，蒋介石已经知道，陈立夫之前筹划用武力方式向西安发难，倘若真的施以武力，必然会危及蒋介石的性命。所以陈立夫的武力计划，令多疑的蒋介石感到不满和恼怒。

不久之后，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蒋介石和陈立夫心里总算痛快了些，然而杨虎城却仍旧"逍遥法外"，这令蒋介石心中不快！陈立夫自然了解蒋介石的心意，他决定对杨虎城下手，以暗杀的方式去为蒋介石消解怨气。

于是陈立夫找到了季源溥："汇川啊，西安之事你明白吗？"

季源溥点点头："委员长受惊了！"

"你可知劫持委员长的人是谁吗？"陈立夫竟然兜起圈子来。

"张学良、杨虎城！"

"委员长回来之后，茶饭不思，长此以往会对国家命运不利啊！现在张学良已被控制，但是杨虎城还逍遥法外！委员长对此人恨之入骨，须除掉此人才能解委员长心头之痛啊！"

季源溥一听就明白了，点头如啄米："您放心，我一定办好此事！"

暗杀杨虎城不是小事，季源溥为此绞尽了脑汁。要暗杀劫持蒋介石的杨虎城，需要一个天赋极高的杀手，季源溥屈指一算，在当时纵横上海滩的杀手里，王亚樵是首屈一指的，但此人是"斧头帮老大"，不会听命于自己。那么到底选谁去刺杀杨虎城呢？季源溥想来想去，想到了特务褚龙吟。

褚龙吟是何许人也？褚龙吟原本是中统局特务，负责管理中统局的监狱，后来因"私放共产党"被大特务顾建中逮捕并投入监狱若干年，"西安事变"前刚刚被放出来。褚龙吟的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虎城枪毙。季源溥想到了褚龙吟，就是因为褚龙吟与杨虎城有杀父之仇。1937年春，季源溥给任职江苏监察使署的褚龙吟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面谈！褚龙吟接到电话后，难免有些莫名，中统局的特务找我有什么事？

翌日，褚龙吟一到南京，就来到季源溥的办公室，他没有想到，季源溥竟然没有一点"官架子"，先吩咐工作人员给他倒茶，而后竟然同褚龙吟家长里短了一番，颇让褚龙吟摸不着头脑。

"老弟近期工作是否顺利？"

褚龙吟点点头道："好好，托您的福！"

"老弟坐了那么多年牢，也是受尽苦头了。如今出来，就要好好享受享受生活！顺便把自己想做之事做好，以了心愿！"季源溥话里藏话，暗指褚龙吟的"杀父之仇"。

褚龙吟听得云里雾里，虽然隐约觉出季源溥有事要自己去办，但怎么也听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事情。褚龙吟直接问季源溥："季主任，这次您找我有什么事？"

"呵呵，事情明天再谈！"季源溥埋下伏笔，"老弟今日鞍马劳顿，先

好好休息，明天陈立夫陈先生有话跟你面谈！明天一早9点，我去你的住处接你。”随后，季源溥让手下的特务为褚龙吟安排好了住处。

当夜，褚龙吟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季源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觉得压力空前。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后来干脆起来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一大早，季源溥的黑色小轿车就来了。褚龙吟上车后，颇为紧张。季源溥见褚龙吟忐忑不安，笑着对他说：“老弟别害怕，陈先生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了！”

半个小时后，轿车抵达陈立夫的官府，褚龙吟与季源溥一前一后上了二楼会客室。

到了会客室，季源溥故作热情地说道：“过去你也在中统工作过，成绩也是有的，顾建中关了你那么多年，真是不应该。你的个人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你放走过一个共产党，对党国不无微疵，但毕竟是仗义救友，道义上是说得过去的……”

季源溥说了半天，直到陈立夫走进会客室，才闭上了嘴。

陈立夫进来后，径直坐到褚龙吟的身旁。他先是寒暄了几句，然后直入正题：“龙吟哪，这次请你来是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等你去做！西安一事，想必你有所耳闻！此事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这对我党‘清党’一事极为不利！‘挟持’一事不但损害了委员长的人格，而且还被共产党所利用，将党国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也不利于抗日啊！张学良、杨虎城不但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反而拥兵叛变，劫持统帅，党国上下，无不愤慨！对此次犯上作乱的张学良，委员长豁达大度，仅判他十年徒刑，呈请国府特赦。然而对于杨虎城，委员长却未加惩处，让他逍遥法外，党内军内对此意见纷纷。如果说张学良东北易帜、统一华北对党国是有功劳的，那么杨虎城则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做这种忤逆师长之事，实在当诛！许多人问过我，有功之臣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那么杨虎城该当何罪？我自入党以来，一直跟着委员长，前后不离，委员长视我如亲生儿子一般……作为党国秘书处负责人，我应该为委员长着想，为党国利益考虑。所以这次请你来，就是为了商量此事！”

褚龙吟听完这番话，倒吸一口冷气！他当然明白陈立夫的意思是让他去杀杨虎城，但他深知杨虎城刚正不阿，虽然杨虎城杀了自己的父亲，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为父报仇，杀死杨虎城。

陈立夫盯着褚龙吟，似乎看到他眼中的软弱和退避。

陈立夫拉长了声调，拍拍褚龙吟的肩膀道：“这是一项集体行动，不一定由你亲自动手。只要你承认人是你杀的，我以人格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事情搞定后，顶多让你坐上五个月的牢。风波过后，我会请提党国特赦，资助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工作官衔全权由我负责，请你放心！此事季长官会与你商量具体事宜。这是报效党国的好时机，希望你要好好珍惜。”

“可是……”褚龙吟还是迟疑不决。

陈立夫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对他说：“你不必再多想了，做完这件事，我保证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褚龙吟犹疑了半天，还是开了口：“谢谢您的好意，可是我，真的不能做！”

“为什么？”陈立夫颇有些不解

“我已经离开中统局了。”褚龙吟说着低下了头，不敢与陈立夫对视。

“杨虎城杀了你父亲，难道你不想报杀父之仇？”

“陈部长，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否？”褚龙吟终于鼓足勇气，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请讲！”

“我觉得杨将军、张将军挟持委员长一事，既然‘国法’不容，不妨按国法将其绳之以法，处以极刑，何必要我以‘杀父之仇’的名义去处死杨将军呢？这着实不妥。褚某倘若应下，恐被后人耻笑！如放到五年前，或许我会这样做，但如今杨将军作为抗日之先锋，举抗日大旗挟持委员长，也算形势所迫，以民族为大之举。当初家父被杀，也因家父私通外敌，犯下了军法当斩之罪！如果当下让我对杨将军痛下毒手，我怕我就此变成民族的罪人，被千夫所指啊！”褚龙吟这番话令陈立夫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褚龙吟竟会摆出如此一番道理来拒绝他的命令。

陈立夫随即反问褚龙吟：“你不报杀父之仇，难道不会令后人耻笑，遭千夫所指？”

“如果因个人恩怨杀了一位民族英雄，那我便是愚孝，一样会被后人所唾弃！”褚龙吟正面回击。

陈立夫不肯就此罢休，便向褚龙吟谈起共产党：“西安一事，实乃共产党的阴谋诡计。共产党假借抗日之事壮大朋党，企图推翻党国，难道你连此等计谋都看不出来吗？况且杨虎城早就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与共产党密谋造反，挟持了蒋总裁！你切莫因为个人情绪而误了党国的大事啊！”

陈立夫随后又搬出《唯生论》，企图对褚龙吟进行洗脑：“党国军人之所以变节，是因为没有革命哲学作为基础，人生观不确定，容易被外界干扰！共产党的洗脑法则，就是利用某些人薄弱的人生观、思想观，对其进行重点突破，以便达到洗脑的目的！说到抗日，共产党只是言语之词，并未表现出实际行动！如此拙劣骗术，你也未能识破，只能说明你经验不足！如今我帮你捅破这张窗户纸，就是让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将功赎过，为党国、为自己赎罪！”陈立夫费尽了口舌，褚龙吟还是不为所动。陈立夫见褚龙吟是块榆木疙瘩，最终摇摇头说：“可惜啊，可惜啊！”

季源溥也非常不耐烦，寻思着实在不行，另外找人算了，但是想到暗杀杨虎城的计划已经透漏给了褚龙吟，所以不管怎样，都要派人监视好褚龙吟的一举一动了，万一褚龙吟给杨虎城通风报信，那自己就不得不派人干掉褚龙吟了。

最后，季源溥与陈立夫交换了一下眼神，陈立夫随后对褚龙吟说：“你回去之后再认真想想，想通了就直接找季主任！希望你能够站在党国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这一次谈话，令陈立夫很是失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褚龙吟竟然敢当面驳斥他，并且拒绝他的命令。

送褚龙吟回去的路上，季源溥连连叹息：“哎呀老弟，陈部长有意栽培你，你怎么不领情呢，你的大好前程就此断送了，真是可惜啊！你知

道不知道，想要申请这件美差的人排长队呢！”

“可是我不想当民族的罪人！让我用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换万世的骂名，我做不到！”褚龙吟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季源溥不再说话，带着褚龙吟来到了一家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深宅。褚龙吟猜想，肯定是陈立夫怒火中烧，打算杀了他。

季源溥下车之后，跟这所宅子的管家打了个招呼：“老丁啊，这位贵客要在此住几天，请你好好照顾一下！”

“放心吧，您带来的人我都会好好招待的！”

随后，季源溥带着褚龙吟走进了深宅。

季源溥并未着急离开，而是与褚龙吟在宅子里的凉亭里聊了一会儿。

季源溥问道：“龙吟啊，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当年放走那个共产党，是你提出来放他走的，还是那个共产党自己要求你放他走的？”

“哦，那人是我的朋友，在共党分子中，也只不过是个编外人员。当年我都说得清清楚楚，顾队长和陈部长那里都有笔录！”

“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被共党分子迷惑！此次西安事件，其实不能完全怪罪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也是中了共党的‘离间计’。只可惜杨虎城的做法简直是背叛师门，大逆不道啊！老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为什么还要帮这个大逆不道的叛徒？我想不明白啊！”季源溥说的是心里话，他费尽心思找来的人，现在却令他失望至极。

褚龙吟又开始紧张起来，他唯恐季源溥一起身，就会有早就藏匿在四周的杀手冲上来。

季源溥见褚龙吟十分紧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龙吟老弟别想太多，你暂时住在这里，有什么事直接喊老丁。老丁是我的老朋友，不必客气！”

褚龙吟尴尬地点点头：“嗯，好！”褚龙吟见季源溥如此客气，心里越发发毛，忍不住问道：“季主任，是不是因为我没答应陈部长的要求，你们要惩罚我？”

季源溥笑了起来：“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再说你看看，这哪是关人的地方啊！虽然你没有答应陈部长，陈部长确实有些生气，但以君之腹度陈部长之心，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杨虎城这几天就来南京了，陈部长不过是怕他对你不利，所以请你暂时委屈在这里住几天。老弟，这个地方虽然偏僻，但是不会走漏风声。你好好在这里住几天，事情完了，我就送你回镇江！陈部长非常谨慎，如此安排，也是为了你和党国利益着想！至于此事，你不去做，也有别人去做。不过请兄弟谨记，千万不要离开此地！事过之后，我再来找你！”季源溥说完，便坐车离去。

季源溥走后，褚龙吟还是不放心。他坐卧不安，甚至连觉都不敢睡，有一点风吹草动便紧张不已。不过几日后，见毫无异样，便也就安心在这里等待，等待季源溥来找他。

季源溥安顿了褚龙吟，又找了一个女杀手，此人叫甄芝彦。

甄芝彦又是何人？与褚龙吟一样，也身背杀父之仇，此人之父是被杨虎城处决的地方武装头子甄士仁。季源溥还是按照策动褚龙吟的办

法，如法炮制策动甄芝彦，甄芝彦后来又经陈立夫的一番洗脑，最终决定去潼关暗伏，刺杀杨虎城。

然而，就在甄芝彦准备下手之时，却遭到了后来担任陕西省法院副院长的彭毓泰的阻止。彭毓泰和甄芝彦交情颇深，听甄芝彦说要去刺杀杨虎城，就对她说："替父报仇的心愿，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杨虎城将军必定不是常人。他高举抗日大旗，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囚禁蒋介石，是何等的民族大义啊！你一定要撇开仇恨，想一想这样做应不应该？"彭毓泰的话令甄芝彦陷入了深思。

甄芝彦问彭毓泰："杀父之仇不报，我如何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

"如果换作我，我宁可不报杀父之仇，也不能让自己的良心泯灭！再者说，即使你不杀杨虎城将军，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你又何必操之过急，背上千古罪名呢？"彭毓泰的话动摇了甄芝彦刺杀杨虎城的决心。

后来甄芝彦思考了几个晚上，最终决定放弃暗杀杨虎城一事。于是她致电季源溥，说自己是一女子，无法潜入秘密地点，准备放弃刺杀杨虎城的计划。季源溥虽然有些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此事汇报陈立夫。

陈立夫郁闷至极，没想到竟然找不到人去暗杀杨虎城，于是他找自己的哥哥陈果夫商议。

陈立夫对陈果夫说："西安一事，制造者当以诛杀！现在此人仍旧逍遥法外，不如想办法除掉他！"

没想到此话一出，竟然遭到陈果夫的反对，陈果夫拍着弟弟的肩头说："你为委员长报仇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此话怎讲？"

"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委员长是有借口的：他们说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消极抵抗，所以用此法逼委员长抗日。现在张、杨二人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爱国将领，如果暗杀了杨虎城，便置委员长与党国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实在得不偿失，想要干掉杨虎城，缓缓再说吧！"

"可是张学良都定了罪，为什么要让杨虎城逍遥法外？"

陈果夫听了冷笑一声，说："我看未必！况且总裁一直以'仁'治国，或许他下不了这个手罢了！等着看吧，总会有结果的！"

陈立夫在陈果夫的规劝下，决定放弃刺杀杨虎城，于是他找到季源溥，跟他说不必再奔走乡间寻找杀手了。季源溥虽然感到有些莫名，但对于陈立夫的话，他从来言听计从，所以他迅速找到褚龙吟，告诉他可以回老家了。

褚龙吟对于季源溥如此迅速地放走了自己，颇感意外，他问季源溥："你们不杀杨虎城了？"

季源溥垂头丧气地回答："不杀了！果老说，现在刺杀杨虎城风险太大，以后再说！所以陈部长改变主意了，决定暂缓此事！龙吟哪，虽然此事没有成行，但是此事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对外人讲！如果从你嘴里透漏了消息，引起了事端，政府不会放过你的！"

褚龙吟答应了季源溥的要求，发誓保守秘密，于是季源溥放他回了镇江。然而褚龙吟害怕季源溥"出尔反尔"将他暗杀，刚到镇江，便连夜

返回自己的老家避难去了。

暗杀一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杨虎城将军最终也没能逃出蒋介石的魔掌。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幼子、幼女以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被军统特务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终年56岁。

5.制造《文萃》案

作为陈立夫的一只手，季源溥手上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文萃》案。

1946年初，季源溥接任吴星伯出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一职。除接收日伪资产外，还有一些任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学生、工人运动，查封先进报刊……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又以《生活周刊》和《文萃》期刊最为有名。所以季源溥瞄准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文萃》期刊。

《文萃》期刊，1945年10月9日创刊。初为文摘性周刊，其创刊宗旨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文萃》最初是由几位来自国统区的青年记者创办的民间刊物，主要以选摘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大后方”报刊上的文章为主。翌年，《文萃》期刊改为时事政论性期刊，其宗旨更为明确，言辞也更加犀利，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诸多名流都为其撰稿，其中李南山、胡绳、宦乡、乔冠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施复亮等经常为《文萃》执笔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茅盾、骆宾基、刘白羽、臧克家、丁聪、方成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刊物撰写文艺作品。

随着《文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共产党也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并成立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有黎澍、孟秋江、王坪、黄立文、计惜英，其中黎澍任主编。同年秋天，随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步的新闻界工作者陆陆续续来到上海，《文萃》期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似乎有超过国民党党刊之势。不过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上海办事处无奈撤回延安，而《文萃》期刊的主编黎澍的共产党身份也随之暴露，于是在《文萃》期刊危急存亡时，黎澍与中共上海局文教负责人姚溱商议，由陈子涛担任《文萃》期刊的主编。《文萃》期刊也随之转入地下，出版发行更为小心隐蔽，刊发方式也由期刊改为丛刊，一共刊出10期。

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继续扩大影响，组织选派了书报摊党支部司徒钧、陈予忠、陈殿型、周阿大、汪文彬、郭丰业、陈可定等人以股东形式参与《文萃》周刊，并成立组成书报摊发行组，公开经营《人人周刊》、《时与文》、《大众歌声》、《越剧大参考》等刊物，从而掩护《文萃》的发行。后来上海地下党还决定让汪震宇创办“人人书报社”，社址迁至原李公朴创办的“读书出版社”的上海市虹口北四川路仁智里155号。

作为一个政治倾向明显的刊物，《文萃》周刊刊出的政论性时评、

通讯、专访等文章多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正面目，同时也刊登一些诗歌、漫画等作品，很快就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发行量最多时，在全国有30多个特约经销处，还出版过合订本、北平航空版等。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进步刊物存在，于是命令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对《文萃》进行侦察。

时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季源溥早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知共产党往往利用“报纸媒介”对国民党当局进行“诋毁”，从而达到其目的。于是他与上海滩上的青帮组织、军警等达成合作协议，先后成立了党派工作队、青运、工运等情报组。为了查封《文萃》期刊，他更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由于《文萃》期刊已经转入地下，季源溥只能派出大量特务对上海市各书报摊进行“地毯式”的搜查。虽然搜查力度很大，但是收获甚微，并未查获《文萃》期刊。季源溥并不死心，他下令特务在书报摊周围进行24小时轮流蹲守，一旦发现送报者，便立即逮捕。

1947年4月5日，《文萃》周刊第二期刊出《台湾真相》，深刻披露了“二·二八惨案”事情经过，并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省。得知此事，叶秀峰大为恼火，他立刻打电话给上海的季源溥，先是将其臭骂一顿：“小小一本《文萃》竟然弄得鸡犬不宁，就连总裁都大为恼火！作为上海办事处主任，搜查多时竟无收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共党分子狡猾得很，我们人员一直在书报摊蹲守，但没有发现可疑分子……”季源溥吓得直冒冷汗。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限期破案！我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只要捣毁它，杀人也成！”叶秀峰再次提醒季源溥，“现在国内形势并不好，不要让这些激进的刊物胡说八道！除此之外，能封则封！”

季源溥遭到叶秀峰的警告，气得直骂娘！他立马召开动员会，命令特务们进一步加大力度进行查找。为了加快侦破速度，季源溥找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商量对策，并致电上海警察局配合搜查、逮捕工作。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文萃》发行组成员采取了“打游击”的方式：比如在特务少出没的书摊，则采取公开出售的方式；而在特务比较活跃的地方，则是将《文萃》夹在其他报纸里，直接送到读者手里。如此一来，季源溥的搜查工作进展缓慢，甚至连上海警察局的警察都无奈地摇头：“难道《文萃》期刊长了腿了？！”

远在南京的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决定亲自来上海督办此案。

1947年3月，叶秀峰来到上海后，被一则名为“找寻银发老太太”的广告吸引住了。叶秀峰端着报纸一边看一遍琢磨：银发老太太到底是谁？难道又是共产党制造的噱头？叶秀峰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喊季源溥、陈庆斋等人商议此事。

叶秀峰一脸狐疑道：“想必大家都看报纸了，你们对这个‘银发老太太’有什么看法？”

陈庆斋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就是一宗普通失踪案？在上海滩，这种事多了去了，不用管它！”

“不，”季源溥摇着头道，“这个‘银发老太’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觉得此事可能与共党分子有关，应该立刻派人去查一查！”多疑

的季源溥就像一只吸血蝙蝠，似乎对这等事有着先天的敏感。

“是啊，我也觉得如此！”叶秀峰下令，“这样吧……你们在这个报纸上刊登一个回应广告，约好时间、地点，派人蹲守！我倒想要看看，这个寻找‘银发老太’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好，我立马去办！”

第二天一早，季源溥便找人刊登了一个下文，名为“白发娘望儿归”，并署名：银发老太太，地点约定在亚尔培路某号。

不过季源溥派去的特务一连蹲守好几天，也没发现一个可疑人的行踪。特务们疲劳不堪，暗自骂季源溥：“他妈的，这等‘好事’谁摊上谁倒霉！姓季的生孩子没屁眼儿！”不过骂归骂，蹲守还要继续。有的特务为了提神儿，竟然弄来了大烟。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派卢志英（潜伏在中统局内的地下党）去蹲守，并暗中指派行动队队长苏麟阁进行监视。几天之后，卢志英向上汇报：未见有可疑人出现。

其实刊发“找寻银发老太太”一文的人确实是共产党。此人叫骆何民，字家骝，江苏扬州人，1929年2月至1939年2月，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任中共中央交通员、沪西团区委组织部长，后在《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工作。1938年8月，由黎澍推荐进湖南《开明日报》任总编。1940年1月16日被捕，出狱后去香港。1945年7月，国民党制造“羊枣大狱”，被株连在福州关押一年多，1946年冬回到上海。为了及时找到党组织，他便花了点钱刊登出此广告，打算引起党组织重视，早日联络到党组织。不过骆何民并未看到季源溥刊登的下文，也就没有去约定的地点“接头”。

不过叶秀峰和季源溥并未放弃搜索，反而更加疯狂了。后来在“眼线”的通风报信儿下，季源溥得知《文萃》期刊的掩体是“人人书报社”，于是他派特务去“人人书报社”进行调查。

1947年6月12日，一群便衣特务和警察来到“人人书报社”，敲门大喊道：“屋里有人吗？把你们的汪经理喊出来，我们要进去检查！”

汪震宇听到叫喊声，便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他权衡再三，还是下楼迎接！打开门，汪震宇便故作热情道：“哎呀，欢迎你们来我们的小报社进行检查，请多多给本社提宝贵意见！”

特务们来到了楼上，汪震宇吩咐工作人员沏茶款待。

特务们问汪震宇：“你们的书报社，是新开办的，还是旧社？”

“既是新社，也是老社！”汪震宇回答道。

“为什么？”

汪震宇慢慢解释：“说新社呢，我们的社确实刚刚开业；说老社呢，原本这个地方有一家书社。”

“哦，”特务们喝了口茶继续盘问，“你就是书社老板？”

汪震宇点点头：“鄙人就是书社老板……不过我们是小本经营，而且刚刚开张，还未有盈余，请大家海涵！开着这家书社无非就是糊口而已！”

此时一个特务突然站起来，看了看墙上张贴的标语，问：“可否将你们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看一下？”

“好，这就拿！”汪震宇起身，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营业执照，然后

递给特务，“我们已经在社会局登记了，手续都是合法的！”

“哦！”特务拿着营业执照看了一眼，突然发难：“听说《论纸老虎》一刊也是你们书社出版的吧？”

汪震宇故作恍然大悟状，感叹道：“哎呀，我们书社虽然不大，但是经营的书刊却不少。我们是生意人，只要有利可图，就去经营。实话说，我们的文化水准有限，那些刊物也看不懂……”

“如何证明你说的话？”

“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库房检查！”其实汪震宇早有准备，及早将《文萃》等期刊隐藏好了，特务们是不会查找到的。汪震宇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检查。

特务们把库房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文萃》的影子。于是他们只好离开“人人书报社”，向季源溥汇报。

季源溥一听，脸色铁青，他自言自语道：“难道这些人都是孙悟空？”于是他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也摇摇头道：“与共产党交手这么多年，每一次都无必胜把握！”后来吴国桢组织召开“党政军警特宪紧急会议”，把侦破《文萃》期刊当作重中之重。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得知此情报，立即通知姚溱尽快关闭“人人书报社”！姚溱立刻告知《文萃》主编陈子涛，让陈子涛等人出去避避风头。得到通知后，陈子涛以郊游为名，在联义山庄召开了人人书报社会，并宣布立即停止营业，从仁爱里撤退。得到通知的汪震宇、吴承德等人也迅速隐藏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卢志英不慎暴露身份，被特务逮捕。但季源溥并没有从卢志英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是派大批特务对路边的书报摊和上海市各印刷厂进行秘密侦察。“死不罢休”的季源溥最终还是查到了一个线索：杜美公园门前的一书摊正在销售《文萃》期刊。得知此消息，季源溥兴奋异常，他拍着大腿说：“看来《文萃》马上就要完蛋了！”于是他示意特务们“顺藤摸瓜”，争取将《文萃》以及其地下党人一网打尽。

1947年7月18日，《文萃》的几名地下发行员在杜美公园和陕西路、亚尔培路被特务们发现并逮捕；23日，友益印刷厂被特务发现，特务还跟踪到骆何民的住所，并且把隐藏在此的陈子涛逮捕，而正在装订最后一期《文萃》期刊的吴承德也被逮捕。自此，除少数《文萃》期刊的发行人员逃脱之外，大多数人员都被逮捕。为了迅速侦破此案，季源溥亲自参与了审问工作。

季源溥问《文萃》期刊主编陈子涛：“你为什么刊发不利党国的舆论，是不是有地下党暗中指使？”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们只是凭良心说话！”陈子涛大义凛然，毫不惧怕铁面阎罗季源溥。

“如果你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人身自由。如果你不说，恐怕就麻烦了！”季源溥目露凶光，“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你就不要瞎忙活了，我是不会交代的！”

季源溥见陈子涛“铁板”一块，于是脸色一变，喝令打手对陈子涛进行大刑伺候。陈子涛先是被打手们吊起来鞭打，而后又坐了特务们的老虎凳、经历了恐怖的“挂炸弹”和“坐飞机”。但是陈子涛只是漠视打手

们，并冷笑道："打死我好了，打死我，你们也就省心了！"

季源溥见陈子涛死不开口，便企图撬开吴承德、卢志英、骆何民等人的嘴。但是这些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战胜了手段残忍的季源溥。季源溥见以上四人拒不交代，便打报告给叶秀峰和陈立夫。

陈立夫说："既然这些人不开口，就杀了他们算了，省得留下祸根儿！"

季源溥得到指令后，便下令将陈子涛、卢志英、骆何民三人押至南京雨花台，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活埋"。而另一个共产党人吴承德则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1949年5月9日被枪杀于宁波南门外薛家山大坟滩上。

季源溥制造的《文萃》案，再次轰动全国！不过令季源溥叹息的是，一个《文萃》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文萃》站了起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书刊不但没有倒下，而是有更多的期刊积极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

1949年12月7日，上海文化新闻界为《文萃》案烈士殉难一周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讣告中说："《文萃》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时期，真实报道消息，指明正确方向，为千万人民增强了革命信心。"而《文萃》期刊的刊发人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人们称为《文萃》三烈士，被后人永远纪念。

6.打造上海特务机关

季源溥作为中统的主要特务之一，主要活动的地点就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1945年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成立之后，季源溥就在上海打造了一个仅次于"南京总部"的特务王国。

中统上海办事处的人员设置是这样的：

处长季源溥，大特务朱凌云担任秘书，总务王汇百，情报专员郭乾辉，组训科长杜超群，行动组长赵伯谦、国际组组长冯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庆斋……可以看得出，季源溥的手下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大特务。

上海办事处虽然名义上挂着"上海"，其实则管辖整个华东地区，比如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台湾等。上海办事处原本只有60人，每月活动费仅有几十万法币（还不够去酒楼摆一桌席）。后来经过季源溥的扩编，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人数超过6000人，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帝国"。

除此之外，季源溥还在上海建立东、西、南、北、中、浦东、吴淞等七个分区，每个分区设两名专员，由于经费不足，要求各分区自供自足。后来这些分区通过"坑蒙拐骗抢"等不但解决了日常开支，竟然还上缴部分钱财孝敬季源溥。

季源溥手下的6000多名特务在全国各分区也是之最，这些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青帮分子

季源溥曾经拜在青帮门下，拜杜月笙为把兄弟，其人在青帮圈内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所以那些流落街头的青帮残余势力听到季源溥在出国留学后重返上海滩，便兴奋地大呼小叫起来。青帮分子是上海滩民间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源溥自然也不会放过。

二、汪伪政府的便衣特务

这些特务许多曾经是中统局门下，上海沦陷后，这些人随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加入了敌伪，为日本人卖命。日本投降后，这些敌伪特务如同孤魂野鬼一般在上海滩四处飘荡。所以季源溥有意识地将这些闲散人员集合起来，让他们再次为中统局卖命。

三、逃亡上海的地主

这些人多半来自解放区，由于共产党搞土地革命，地主的地多半被“革”，于是这些人跑到国统区寻找依靠，其中一部分来到上海后投靠了季源溥。

季源溥手下虽有6000人之巨，但是好用的人手却不多！那些人大多素质低下，多半是依傍季源溥发私财，对破坏上海地下党一事并不十分卖力。季源溥为了管理好这群闲散人员，便印制了大量调查证，并将此证派发给那群人，而这种调查证，名曰“派司”。

拥有“派司”的人，就是中统局的合法特务。不过这些持“派司”的特务虽有名分之实，却无工资和奖金，收入只能靠坑蒙拐骗。

比如1947年的夏天，上海南京东路国际饭店发生抢劫案，涉案劫犯在逃跑过程中偶遇警察局警察，结果不幸被击毙。事后，警察局的人在劫犯身上搜出“派司”，只是后来季源溥死不承认，慑于季源溥的淫威，警察局只得作罢，停止调查。

季源溥通过下发“派司”，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控制效果，反倒麻烦缠身。其中许多持“派司”的人多次参与抢劫、强奸等犯罪行为，一时令季源溥穷于应付。后来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下令回收“派司”，只可惜此时的上海滩“山寨派司”泛滥。不过季源溥的确在上海迅速为中统局扩充了势力，由此得到叶秀峰、陈立夫等人的一致表扬。

有一次，叶秀峰来上海视察工作，便得到了季源溥热情的接待。他先是指派豪华轿车去火车站接站，而后还安排了军乐手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

叶秀峰一下火车，便受到了“皇帝”般的礼遇。

季源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瓦亮，迈着军步走向前，热情迎接叶秀峰的到来。季源溥依旧摆一番毕恭毕敬的样子，说道：“局长辛苦了，局长此次来上海一定要提宝贵意见，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大有益处。”

“汇川啊，有你在上海，我就放心了！”叶秀峰知道季源溥是陈立夫的一只手，而且年轻有为，所以话说得比较客气。

“局长，你是了解我的，上海形势复杂，我怕事情多了，日后担不起这副担子啊！”

“呵呵，如果你不行，我们中统局也就没人行了！”叶秀峰笑着拍拍季源溥的肩膀道，“好好干吧，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季源溥把叶秀峰安排至上海滩最高档的酒店以表“忠心”，随后又陪着叶秀峰参观了上海区的各个分部，并安排了豪华晚宴和精英演讲会。除此之外，季源溥还备了一份大礼：金条！他知道叶秀峰好财不好色，

所以提前让特务们准备好了金条，送给了叶秀峰。

叶秀峰对季源溥的安排十分满意，临走前竟然发起感叹：“上海是个好地方，比南京、重庆好多了！这地方，要什么有什么，怪不得共产党也想争夺这个地方！”叶秀峰看看季源溥，说：“汇川啊，你也是咱们局的元老了，过去在重庆也吃了不少苦。如今抗战胜利了，应该享享清福。”

“局长，现在共产党依旧猖獗，我哪敢享清福啊！若是享福，也要让局长先享！”

最后，叶秀峰交代：“关于日伪资产的事情，你要叮嘱大家，能多抢就多抢点，日后给兄弟们多点补贴，也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季源溥连连点头：“好的。”

送走了叶秀峰，季源溥的胆量更大了。其实季源溥并不惧怕叶秀峰，只是觉得自己的势力不够大，还不足以扳倒叶秀峰而已。

为了早点爬上中统局的宝座，季源溥决定搞出点“成绩”来，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因此，他筹建了“工运”和“学运”组织，用这两个组织来专门对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当时，上海纺织业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其中上海纺织业工人协会曾经多次组织工人力量进行罢工等运动，颇令蒋介石头疼。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领导企业，中纺公司更是闻名遐迩。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大名鼎鼎的宋子文，而宋子文长期与中统局不和，所以也不愿意中统局的力量打入中纺公司。于是季源溥想到了三个办法对抗宋子文。

一、派特务打入宋子文的中纺公司，试图瓦解中纺的工人力量，挫败宋子文的嚣张气焰。就在此时，一个人突然间冒了出来。

此人名叫李升伯，时任中纺公司副经理，以前曾任日伪花纱布统制委员会委员。由于此人曾任职“日伪委员”，所以遭到了无名者的检举。为了逃避检举，李升伯打算弄个“派司”，洗掉自己的“卖国罪名”。于是，他找到上海办事处，打算借“中统”身份保全自己。在得知李升伯是中纺公司的副经理后，季源溥决定亲自与他谈一谈。

季源溥依旧一副笑面虎的样子，先是恭维了李升伯一番：“其实我们也不是外人了，大家都是为上海做贡献嘛！至于身份问题，我局会给你提供证明的，你尽管放心就是！”季源溥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谈条件：“可是老弟你也要为我办一件事情，近期上海纺织行业工人情绪不稳定，一直在酝酿暴动！蒋总裁刚刚发话，要对纺织工人进行监视！所以我想派几个人去你们中纺公司担任人事监理，你看这事如何？”

李升伯颇有些为难，中统特务的行径他也早有耳闻，所以吞吞吐吐地说：“季主任，不是我不帮这个忙，实在是小弟权力有限，可能难以满足你的要求啊！”

“没关系了，等有机会了，你再答复我不迟！”

“嗯，好的！”

然而，大家都知道，季源溥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李升伯也怕他加害于自己，终于在中纺公司扩展规模登报招收技术管理职员的时候，通知了季源溥。招收条件非常低，只要是年龄在16～20岁，中等文化程度的男性，均可免试录取！

季源溥一听非常高兴，迅速致电叶秀峰，请示分派特务入驻中纺公

司。叶秀峰对季源溥的策略大加赞赏，从中统局中精挑细选了40名特务交给季源溥。随后，李升伯也非常给力，先后将这40名特务安插到了中纺公司的各个位置。

不过这40名特务并未给季源溥带来多少有价值的情报，他们竟然老老实实在中纺公司当了三年学徒。三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倒台，仓皇逃到台湾，季源溥的安插计划也就此破产。

二、成立新公司与宋子文争烟草，主要事例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河集团”一事。

三、争取上海市参议院名额，与宋子文在上海滩分庭抗争，在政治上取得一席之地。

其实这个主意并不是季源溥想出来的，而是二陈想出来的，他们借季源溥之手，对抗宋子文。

1947年，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搞出一套“假民主”，在全国各地采取参议院选举，名为人民选举，实则由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社会局掌握选举权。所以上海的参议员名额，由上海党部和社会局掌管分配。为了取得政治上的席位，季源溥找到上海党部社会处处长陈宝泰，提出当选参议员之事。

陈宝泰老谋深算，先是拒绝了季源溥的要求：“老弟啊，不是老哥不帮你，而是上级有严格的名额分配，此次分配没有中统局的名额啊！”

“如果中统局没有名额，那些别的局室更不应该有！”季源溥发飙，“难道你就不念旧情吗？此事并非我的想法，而是果老和陈部长的意见！”

“那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分配名额啊！”

见陈宝泰不给名额，季源溥只得另想办法。

季源溥号召办事处的所有高级特务“投票”，并派人发话给陈宝泰，声称他季源溥若不能当选参议员，便派人攻击郊区的各票柜，阻止选举活动。陈宝泰听闻此事，大为恼怒，怒斥季源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然而，碍于季源溥的势力，陈宝泰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给了中统办事处两个名额。得知此消息后，季源溥非常高兴，为自己留了个参议员的席位，另一个名额给了赋闲在家的原上海办事处主任孙云峰。

季源溥对付宋子文的“三部曲”可谓缜密周到，只是此时的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任凭他季源溥再怎么折腾，也是秋后的蚂蚱了。

除此之外，为了控制共产党的“海上生命线”，季源溥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民船联谊社”的组织。当时由于陆路“生命线”大多被国民党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只能通过“海运”方式运输粮草等战略物资。而在此种情况下，季源溥的“民船联谊社”，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共产党的“生命线”。季源溥下令吴淞分区，监视长江航道上的一举一动，并对可疑船只进行逐一检查。

1947年秋，民船联谊社扣留可疑民船九艘，船员数十人。“民船联谊社”名义上是控制共产党海上生命线，其实就是“打家劫舍”！凡是途经吴淞口的民船，一律交数万元法币的入会费才能通过吴淞口，如果不交入会费就会被查办、扣留！许多民船并不想惹这个麻烦，于是纷纷交钱，最后大多数进出吴淞口的民船都入了“民船联谊社”，从而让上海办事处的中统局特务们大捞了一笔。

当然季源溥在上海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内讧”、“敛财”，而是想方设法破坏共产党组织。季源溥按照上级指示，把马思南路107号的共产党上海办事处作为目标，派出大量特务，并配以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日夜守候、跟踪。尤其是周恩来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季源溥像打鸡血般兴奋，他竟也像徐恩曾那样妄想活捉周恩来。于是他要求特务们每天晚上都将盯梢情况汇报给负责情报搜集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庆斋。

后来上海办事处因“内战”撤离上海，但是季源溥依旧不死心，派特务们到中共上海办事处的旧宅里进行大肆搜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季源溥大发雷霆，竟然大骂自己的手下是蠢货！

季源溥没有找到太多有价值的情报，但是在破坏中共地下活动组织、学生及工人组织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查封了“学生生活周刊社”和一个广播电台，逮捕了一个年轻的女小学教员，逮捕威海卫路糖果店的老板郑某等七人，逮捕上海怡和纱厂工人庄某某，特别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中逮捕了大量爱国学生，制造了数起血案，当然著名的“劝工大楼”惨案也是出自季源溥之手。经过两年时间的打造，季源溥的上海特务帝国总算建造完成，这也为日后登上“中统局”宝座打下了基础。

7.大肆敛财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当官就是为了财。季源溥也是如此，他来到上海后，在花红柳绿的大上海大肆敛财！

1947年5月18日，国民党当局颁发《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设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规定学生团体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超过十人；如有学生罢课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制止！国民党当局颁布此“办法”无疑是对人民爱国运动的一次打压。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禁止黄浦、老闸等区的摊贩营业，导致上千名摊贩集体请愿游行。此事发生后，季源溥派打手、特务“维持秩序”，结果打死7人，打伤、逮捕若干名。后来摊贩们悲愤至极，继续与之斗争。结果又有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季源溥的“打压”政策无法控制民愤，悲愤的市民全力支持摊贩们的行为，反蒋运动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经济监察团”，企图用军事和特务的力量来监察、控制上海市各领域内的经济活动。此经济监察团团长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宣铁吾毕业于黄埔一期，其父与蒋介石是拜把子的兄弟，所以蒋介石视宣铁吾为子侄。

经济监察团下分五个组，分别是行庄管理组、交通管理组、工厂管理组、经济管理组、贸易管理组。五个组的组长分别由淞沪警备司令

部、中统局、警察局、军统局、上海市党部各派一人兼任。中统局派出的是季源溥的亲信、大特务赵毓麟，他担任经济监察团行庄管理组组长，行庄管理组共有成员10名，主要任务是禁止上海公私银行钱庄等经营黑市黄金生意，以及查禁利用银行资金扰乱市场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稳定、巩固上海的经济秩序。

赵毓麟抵达上海不久，季源溥便接到了两名义务通讯员陈咸池和文介夫的检举信。信中详细阐述了陈氏兄弟经营黑市黄金的情况。季源溥对此事非常重视，于是问刚刚上任的赵毓麟："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想必此事一定是官商勾结所为！既然如此，我们要更加重视！经济监察团刚刚成立，五个组必然会相互竞争！如果我们能破此案，必然为我们中统局赢得名誉！"赵毓麟信誓旦旦地说。

季源溥把检举信交给赵毓麟："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一定要严查此事，争取早日破案！"

赵毓麟拿着检举信找到了两名检举人，并与检举人进行一番长谈。了解内幕之后，赵毓麟先是将此事汇报给经济监察团的主任秘书李锐，李锐又向宣铁吾申请逮捕令。宣铁吾同意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便派警察来到黄金交易现场，将正在进行黑市交易的陈氏兄弟逮捕起来，并押送至上海市地方法院起诉。

国民党当局为了鼓励老百姓检举，下了一个条文：凡是举报金融案属实并查获者，可得收缴"赃物"总数的30%作为奖励。由此可以看出，陈咸池和文介夫也是为了"发财"而已。

陈氏兄弟被抓，并当场缴获黄金120两，因此两人共分的黄金36两，每人各18两。与此同时，承办方还可以得到10%的奖励，也就是说，赵毓麟在此案件中共拿到黄金12两（折合新法币500万元）。但是赵毓麟没敢独吞这笔钱，而是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季源溥。于是季源溥觉得"检举黄金案"也是一个发家途径，便开动员会，要求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们积极行动起来，把"检举"当成头等大事来做。

有些特务并不想"走弯路"，他们打算直接敲诈地下黑市黄金交易者——其中上海办事处第三组特务人员梁希明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此人准备进行敲诈时，却被潜伏在周围的警察当场抓获。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原是军统特务，由于军统与中统的矛盾根深蒂固，所以此人要求对梁希明进行严惩。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与季源溥关系不错，便把此事告知了季源溥。

季源溥一听火冒三丈，他大骂道："谁给他的胆子？竟然自己下手。看我怎么收拾他！"

"季主任，请息怒，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咱们还是想办法把梁希明弄出来！此人落在军统的手里，恐怕会利用梁希明做文章！"赵毓麟劝季源溥。

季源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了一下。他想：军统局的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留下把柄！于是他拿起电话给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打了过去："老兄，汇川有件事还要劳你麻烦一下。"

"呵呵，是不是你那个手下的事？"俞叔平早已经猜到了季源溥的意图。

"是啊！此人做事太过鲁莽，本来是好事，结果却被他做坏了！但是

此人毕竟是我处的人，我处也有我处的内部处罚条例。希望贵局能够将此人移交给我处处理！”

“好吧，我给副局长打个招呼，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

梁希明被带回来后，暴怒的季源溥一上来就给了梁希明几个耳刮子！他怒骂梁希明：“你这个兔崽子竟然还能活着回来，我的老脸都给你丢尽了！”

梁希明不敢吱声，站在原地任季源溥怒骂。后来季源溥撤了梁希明的职位，并将其关押进亚尔培路2号的地下监狱里，直到1949年4月份才将其释放。

不过赵毓麟自从“尝过那次甜头”之后，竟然与那两个义务通讯员陈咸池和文介夫走到了一起。这两个人对赵毓麟毕恭毕敬，认为赵毓麟可以利用。毕竟赵毓麟是高级特务，当他得知陈咸池与上海滩大帮会头子骆清华是同乡，与宣铁吾、俞叔平是小同乡，而且此人还是上海商报馆的资料室主任，还做过采访记者。他竟然感叹：小小一个义务通讯员竟然有如此深的背景，这样的人是有利用价值的！

赵毓麟刚来上海时，几乎是两手空空，甚至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后来他见上海办事处的季源溥、王汇百、郭乾辉、朱凌云、杜超群等都住上了劫收的日伪资产豪华洋房，尤其是季源溥的洋房是那样富丽堂皇，他着实心中不平。刚来上海的赵毓麟没有住房，全家人只能挤在襄阳北路1号的会客室内，生活起居非常不便。于是他找到季源溥，想让季源溥帮其解决住房问题。

“主任哪，有一件事还要麻烦你一下！”赵毓麟鼓起勇气开口说。

“是不是住房的事情？”

赵毓麟连连点头：“现在我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小屋内，生活非常不方便！老婆经常跟我吵架，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季源溥笑了，安慰赵毓麟：“为了革命工作让你们受苦，是我安排不周啊！这样吧，现在上海滩上还有许多日伪留下的房子，你留意一下！如果相中了，办事处想办法接收过来，然后再让你们全家搬过去！”

“谢谢主任！”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恰逢上海高等法院致函季源溥，让办事处彻查一个姓郑的汉奸在抗日期间勾结日伪军发展自己企业的劣迹。此人的公司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名为茂昌冰蛋公司，主要从事出口贸易。而这一案件，也属于赵毓麟所掌管的“党政经济贪污调查”范围之内，于是季源溥又将此事交予赵毓麟处理。

此时赵毓麟便想到陈咸池、文介夫二人，于是找二人商谈。赵毓麟问陈咸池道：“季主任交给我一个案子，请问你们是否了解茂昌冰蛋公司郑老板的实际情况？”

没想到陈咸池对姓郑的非常熟悉，便说：“此人是宁波人，现在是上海冰蛋业公会理事长，他一直搞进出口贸易工作，算是上海的巨商之一了！”

“那么郑老板发大财一事可否与敌伪勾结有关？”

“呵呵，小事一桩，查一下便知！”陈咸池将调查一事揽过来，而赵毓麟也做“顺水人情”，交由陈去处理。

一个星期后，陈咸池就把报告交给了赵毓麟，报告上详细写明了郑

某创办冰蛋公司的经过以及在敌伪时期勾结日本人发展茂昌公司的事实。赵毓麟看完报告后非常高兴，他表扬陈咸池：“你的调查报告写得非常好，对侦破案子而言非常有用啊！”

到了晚上，陈咸池再次来到赵毓麟家，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我与郑某相识多年，此人也知道我在调查他，他希望您在函复上海高等法院时，能笔下留情，而后定当回报！”

赵毓麟一想，自己的住房问题还没解决，于是开口道：“我现在就是没地儿住，那就让他帮我找个住处吧！”

“嗯，好，我代为传达！”

又过了一周，陈咸池转告赵毓麟：“郑某回话了，在上海找房子太困难。”说完此话，陈咸池便从口袋里掏出美钞3000块递到赵毓麟的手里：“他请我把这个转交给您，恳请您对他多加照应！”

赵毓麟一看美钞，两眼发出金光。他想：有了美钞，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于是他眼都没眨，便将3000美钞收下了，当然，赵毓麟是不会跟季源溥分享这笔意外之财的。

这个案子刚刚处理完，上海高院监察处致电季源溥，要求办事处迅速彻查上海汇丰银行龚某在敌伪时期勾结日伪分子经营出口贸易之事。季源溥认为赵毓麟办事效率高，所以又将此事交由赵毓麟处理。

发财的机会一个接着一个，赵毓麟非常开心！他再次找到陈咸池如法炮制一番，结果与郑某的案子一样，龚某的案子也很快落实完毕。龚某贿赂陈咸池60两黄金，赵毓麟坐地分赃20两。几天之后，陈咸池怕走漏了风声，干脆也贿赂了季源溥，给他送了为数不少的黄金。

1948年2月，赵毓麟官升一级，担任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主任。正好有人检举“浙赣铁路上海枕木办事处在上海购买枕木存在大量贪污公款”的事实。于是赵毓麟再次找到陈咸池，让陈咸池下去调查。结果枕木办事处的人担心受处分，也采取了“送黄金”的办法贿赂赵毓麟，后来赵毓麟又得到黄金20两。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颓势明显，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状况越来越糟。此时，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们也坐不住了，他们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

有个特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我们回农村种地得了！”

“你作恶多端，难道共产党能放过你？”

“那怎么办？”

“跑呗！去没有共产党的地方，那里最安全！”

像这些特务一样，季源溥也有点坐不住了。虽然贵为中统局的二把手，但他也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完蛋是早晚的事。于是他想：不如趁水摸鱼，先捞上一笔再说。于是，叶秀峰、季源溥等人瞅准了上海九江路证券交易所，此交易所类似美国纽约的华尔街，是上海乃至全国商界、金融界、纺织界等进行投机买卖的大本营。

1948年夏天，叶秀峰的表弟陈铭赦来到上海，找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主任赵毓麟谈话。陈铭赦说：“局长来上海之后，听说郑重仁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里最大的亨鼠，此人恃其雄厚资金，兴风作浪，哄抬这个上海物价。在此情况下，全国各城市都受此影响。赵主任，你是负责经济调查的，所以局长让我跟你谈谈。”

赵毓麟知道叶秀峰是个贪财之人，于是笑着答应："好、好！"

当时兴风作浪的并非只有一个郑重仁，还有许多巨贾。这些巨商且划为帮派，其中郑重仁是苏州帮的代表。此人在证券交易市场购买股票，一出手就是一亿股（黄金万两），从而左右了市场行情。

翌日上午9点，陈铭赦与郑重仁一同来到上海襄阳北路1号——上海经济调查处赵毓麟的办公室。赵毓麟见郑重仁来了，便问："你就是苏州帮会的会长郑重仁？"

"是！"

"你到底经手了哪些股票？"

"我买了永安纱厂的股票……"郑重仁吞吞吐吐地说，"赵主任，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对，干扰了市场秩序。"

"是啊！"赵毓麟阴着脸说，"你的出手是垄断性的，对市场影响太大了！现在战乱，经济不景气，你这样做是不能被允许的！"

"是，是。"

"以后要恪守法令，不许再违法操纵！"

赵毓麟简单说了几句话，陈铭赦便插嘴道："郑老板都清楚了，他一定会改！我看赵主任很忙，咱们还是走吧！"郑重仁见陈铭赦为其解围，得知"事情已经办妥"，便如释重负，匆匆挥别而去。

事后，赵毓麟得知陈铭赦得到郑重仁一笔不少的好处费，而陈铭赦背后的叶秀峰所得金额更是大得惊人。后来季源溥也开始效仿赵毓麟、叶秀峰的做法如法炮制，捞到了大量的黄金。除此之外，季源溥还为自己提早找好了出路。1948年夏天，他以视察业务为名，与二老婆施秀文一起飞赴台湾，并在台北、台南预先购置两栋别墅，后又将自己的大老婆送至了台湾。

1948年初秋，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也公然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自己的小老婆勾结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在证券交易中暗中操控市场，捞得巨资！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蒋介石得知上海经济秩序乱成一锅粥，便派其子蒋经国来上海，整顿上海经济。

蒋经国来到上海后，先经过一番调查，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扰乱上海经济的主要有"三害"，即贪官污吏、奸商、流氓。

"三害"之一贪官污吏，指的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挖社会墙角之徒，主要代表人物有宋子文、宣铁吾、季源溥等；

"三害"之二奸商，主要就是指的郑重仁等利用自己的巨资操纵股市等人；

"三害"之三流氓，大多指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利用流氓手段欺行霸市、掌控市场经济。

要想整顿上海经济，必须从"三害"下手，于是蒋经国先从沸沸扬扬的"张亚民案"下手。

蒋经国先是派人进行调查，经查实后，便以国防部的名义逮捕了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宣铁吾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所以未遭牵连。经过一番审讯，张亚民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蒋经国觉得要想整顿上海经济，"除害"一定要坚决、果断，于是他下令枪毙了张亚民，以儆效尤。

令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张亚民被枪决后，其妻竟然大设灵堂，为

张亚民举办风光大葬！与此同时，上海滩上的社会名流也纷纷致送挽联、花圈，搞得非常“热闹”。不仅如此，后来《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竟然刊登了出殡的日期和经过。那个不知好歹的宣铁吾竟然倒打一耙，三番五次跑去蒋介石面前大倒苦水，并说了一些蒋经国的坏话。当然，蒋介石自然不会怪罪亲儿子而替这个“子侄”说好话，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杀了一个贪官污吏，蒋经国的大刀又挥向了“二害”奸商。

当时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仁（荣毅仁的七弟）在北四川路建造了一座十分奢华的花园洋房。蒋经国看到此别墅十分愤怒，他怒斥道：“国难当前，大家都苦于生计，反倒这个荣鸿仁盖起了别墅，你们要把他抓起来审一审！”说完话，蒋经国立即致电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逮捕荣鸿仁。

荣鸿仁是上海商界的巨擘，“荣氏家族”在中国也是赫赫有名的。得知其被捕，宋子文跑出来向蒋经国求情。蒋经国碍于面子，最后下令释放了荣鸿仁。荣鸿仁被释放后，觉得上海已是多事之地，于是便飞赴香港避难。

没有扳倒“荣氏家族”，蒋经国却找了另外一个垫背的：某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王某，此人因套购国家外汇的罪名被蒋经国枪决，也算为打击“奸商行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蒋经国的第三刀挥向“流氓”，当时上海滩上最出名的流氓就是杜月笙。蒋经国并没有与杜月笙硬碰硬，而是先让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抓了几个流氓头目，而后邀请杜月笙去开“上海市面整顿会”。其实蒋经国聪明得很，这个做法不过是“杀鸡给猴看”，以此警告杜月笙。

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季源溥竟然接到了蒋经国发来的电令，蒋经国要求上海办事处采用多种手段，开展调查贪官污吏的工作。

由于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所以这个命令也就是“圣旨”！

季源溥接到这个通知，非常高兴，因为季源溥没有被蒋经国划定为贪官，而且此等重要事情交予他处理，也算是一种信任，于是他竟然放开手脚，全力侦破此事！

不久之后，季源溥接到中统局总部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宣铁吾徇私舞弊一案，需彻查！

季源溥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给赵毓麟，让赵搜集证据。与此同时，他还多方找人，从多个角度彻查宣铁吾。经过一番调查，季源溥将搜集来的证据交给了蒋经国。不过鉴于宣与蒋的关系，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财政部开始对外发行金圆券，旧法币以200： 1的比例进行回收，同时也宣布黄金白银国有。8月21日，蒋经国在中央银行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与上海各界经济界重要人物协商如何贯彻执行《金银国有条例》，用法币兑换金圆券。

不过此时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难，根本没有多少钱去兑换金圆券。对人民来说，这是国民党在崩溃前夕的一次大搜刮！在此情况下，季源溥也带着金条等来到中国通商银行兑换金圆券。对于季源溥而言，这是难得的“洗黑钱”的机会，他岂能放过？

为了配合发行金圆券，蒋经国还采取了冻结工资与物价的办法。不

过此办法一出，上海滩便引发了震荡，许多商店提前打烊、关门，而去饭店吃饭，则要排起“长龙”，而晚来者则往往没有饭吃。为了配合冻结物价的工作，蒋经国还鼓励上海的老百姓检举囤积居奇行为，结果导致所有的目光转向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企业。

此举还引起了杜月笙等人的不满，他们联名奏折，发动流氓检举四大家族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并爆料此公司藏匿大量民生日用物资，从而迫使蒋经国查封此仓库。后来孔令侃打电话向自己的姨妈宋美龄哭诉，蒋介石听从了宋美龄的劝说，亲自来上海一趟，制止了蒋经国的“六亲不认”的粗暴做法。

不过蒋经国的办法还是卓有成效的，一时间控制住了上海物价。此时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建议增加工商税率，用以充实军需民用，其中一方面不准工商业给商品提价，另一方面则要求加税。稀里糊涂的蒋介石竟然采纳了王云五的荒唐建议，结果导致各地物价如脱缰野马般往上狂飙，刚刚稳定下来的上海经济，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1948年8月下旬，叶秀峰派徐兆麟接替季源溥出任上海办事处处长一职，工商部特经处主任一职也由陈伯中顶替。季源溥回到南京后，担任中统局时改名为党通局副局长一职，野心膨胀的季源溥开始向他的“总统宝座”发起最后的冲击。

8.中统局最后一个局长

1948年，国民党已经是江河日下，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大反攻时期。此时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混乱，民不聊生，老百姓更加渴望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蒋介石为了稳住人心，开始玩弄“施政于民”的把戏，搞出了一个“宪政”，并匆匆召开“宪政国大”，先过了把“总统瘾”。

在“宪政”实施前，中统局的局长还是叶秀峰，而中统局的头目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灼，因为一旦“宪政”实施，国民党的党务经费便不能由国库开支。如果失去了国库支持，中统局就会像断奶的婴儿般无法继续生存了。于是中统局急于在“宪政”前重新寻找一个奶妈，投身其怀中“吸奶”！

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陈立夫，焦灼不堪。中统局乃他一手创办，中统局之于陈立夫，就像是儿子之于父亲一样。儿子断奶，最着急的莫过于这个“无奶”的父亲。陈立夫非常纠结，但为中统局找一个“后妈”并非一件容易事，他找来叶秀峰和季源溥。

季源溥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过去我在铁道部工作时，咱们的外延组织不就挂靠在铁道部的名下吗，如今我们也可以转而挂在铁道部名下吧。”

“如今哪个部门日子都不好过，谁愿意接收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呢？”

季源溥又提议，“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效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挂靠在司法院的门下！”

“你说说看！”

“中统局成立以来，一直以情报‘调查’工作为主，其工作范围和性质也是司法范畴内的。”

陈立夫接受了季源溥的建议，向司法部部长居正提出，将中统局挂靠在司法部名下。然而居正是个老古董，这个人的思维很陈旧，而且不喜欢CC系，所以尽管陈立夫找到居正，与居正谈了很长时间，居正也没有给陈立夫面子。他最后直言道：“司法乃清静之地，你把特务们都转移到我这里来，难道把我的司法院当成收容所？不成，不成！”居正强烈反对，陈立夫也只好作罢。

前面已经提过，陈立夫后来还想到了内政部，尽管内政部部长是CC系成员张厉生，张厉生同意将中统局转归内政部，然而反对声一片，最后，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威压下，中统局终于转归了内政部。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挂牌成立。此时蒋介石的总统职位已由李宗仁代理，而内政部部长张厉生也下台了，由桂系军阀李汉魂代替。李汉魂刚刚上任，不敢得罪高高在上的二陈，于是允诺中统局挂靠内政部门下，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让自己的心腹张益民出任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一职。

内政部调查局虽然成立了，但内部矛盾重重，麻烦多多。首先，原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一直自认为是部级干部，所以不愿意屈尊在内政部调查局担任局长工作。他既想保留原党通局局长的名义，又想“垂帘听政”，遥控指挥内政部调查局。于是他大力推荐自己的亲信王保身出任内政部调查局局长，以达到其目的。不过觊觎此职位的不仅仅只有王保身一人，还有季源溥和王思诚。

第一候选人就是季源溥。季源溥是叶秀峰的亲信，也是陈立夫的亲信。由于季源溥在交通部劳工科担任科长时，成立了“中国劳工组织”，为中统局培养了大批优秀特务。因此季源溥在中统局的呼声很高，而且他还是中统局的副局长。

第二个候选人是王思诚，此人是中统局骨灰级特务，毕业于黄埔六期。此人进入中统局后，先后担任组长、秘书、主任秘书一职，长期从事党派调查工作，在徐恩曾时期红极一时。但是叶秀峰上任之后，便对中统局进行了一番大清洗。王思诚遭到清洗后，在二陈的安排下重新上岗，担任了粮食部督导处处长。

相比这两人，王保身并没有什么胜出的优势可言。

最后，季源溥在陈立夫的推荐下荣升内政部调查局局长，终于坐上了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的宝座。

新官上任三把火，季源溥一上任就点了三把。其中第一把就点在了前任叶秀峰的身上。叶秀峰本打算推荐王保身出任副局长一职牵制季源溥，但是没想到季源溥并不给前任面子，而是接受李汉魂的交换条件，让张益民出任副局长一职。失去了对中统局的控制，叶秀峰暗暗怒骂季源溥是过河拆桥的小人！不过骂归骂，此时的季源溥已与叶秀峰平起平坐，叶秀峰也奈何他不得。

季源溥的第二把火，就是重新组建新的中统局。就在这时，一个新问题摆在了季源溥面前，那就是如何才能在保证中统局“原汁原味”的同时又能适应当前形势呢。在这个问题上，季源溥请教了二陈。二陈与季源溥商议后，决定保留中统局赖以生存的首脑部门和情报部门，而其他

部门和外延单位则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对庞大的组织机构进行有效瘦身。所以内政部调查局除局长季源溥外，只设立副局长一名，兼任秘书一名，下面只设四处四室。

1949年，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之后，中统局便从南京瞻园迁至广州抗日中路55号和法政路77号。随着国统区的面积越来越小，各省市内的特务室也随之逐一取缔。无奈之下，季源溥只能不断精减人员，压缩编制，规定各地区特务室只设立处长、副处长各一名，秘书一名，下设总务、业务、交通三个科，并对其旁支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减。

1949年的内政部调查局，下设四处：

其中第一处是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

第二处是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诚；

第三处是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

第四处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

人事室主任由季源溥的亲信李裕德担任，会计室主任是王大光。

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设置好之后，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其中贵阳办事处由陈庆斋负责，重庆办事处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海口办事处由大特务杜衡负责，华北办事处由张庆恩负责，台湾办事处由季源溥的心腹郭乾辉负责。

后来，季源溥又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在贵州、云南、四川、西昌、广西、广东、江西、湖南、湖北、香港、浙江等地设立了调查处，可是有的调查处刚刚设立便被南下的解放军连窝端掉了！针对这种情况，季源溥还成立了一个袖珍班组，配备了先进的电台设备，时常在各办事处之间进行“游击”指挥。不过后来季源溥也坐不住了，他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提早送到了台湾，然后自己留在大陆，打算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不过季源溥心里明白得很，“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最后，他找到二陈商量，商讨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造成极大的破坏，三人商议后，季源溥开始着手三件大事：

第一，季源溥派指导处副处长朱凌云在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培训班。

此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准备在共产党解放内地之后派遣特务继续对中共组织实施破坏。朱凌云不仅是季源溥的心腹，而且还在中统局缅甸情报局担任过书记，对潜伏、破坏这类技艺十分在行，所以季源溥让其创办潜伏特务培训班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搞破坏！

第二，季源溥与指导处处长张庆恩进行密谋，派特务黄雨青去华北创办秘密潜伏点。

这个秘密潜伏点具体地址不详，可能在绥远，也可能在北平，而这两处都是张庆恩的活动老巢。1940年，张庆恩曾经出任绥远省党部书记长，而且此人与傅作义将军关系不错，所以搞情报、搞破坏均有先天优势条件。不过后来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季源溥的这一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

第三，季源溥把情报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东南亚一带，企图对大陆形成情报包围之势。

季源溥为此拟订计划，并向蒋介石打报告。报告通过后，蒋介石下拨10万银元作为“海外工作布置费”。季源溥拿到活动经费后，便派特务

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情报组织。徐公严，江苏人，抗日期间曾担任中央政治学校发育教授，1940年担任重庆试验区考核科科长。此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能力一般，只因此人是陈果夫的心腹，季源溥才勉强同意此人去越南工作。由于此人能力一般，海外计划也很快破产了！

除此之外，季源溥还在西南各省进行一些布置，原因也有三个方面：

一、西南地区仍属国民党军阀势力范围，此地区长期割据，各特务系统保留完善；

二、西南曾是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尤其在重庆时代，蒋介石把西南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并在此地囤积大量人力物力，以待复辟；

三、西南还属偏远地带，距离解放区较远，共产党短时间内无法解放此地区。因此，季源溥对大西南地区仍旧抱有幻想，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

其中，季源溥在保留四川、重庆、贵州三处班底不变之外，派其亲信余仲篪担任西康调查处处长；委派中央党校毕业的孙秉礼担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让曾经担任重庆区区长的老特务李拓天在云南筹建一秘密潜伏据点，以接应东南亚特务人员的潜入活动。后来季源溥还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处成立调查处，并委任自己的老班底刁寄萍担任处长一职。

1949年10月，重庆已经解放，西南各省也已经“摇摇欲坠”。季源溥仍旧不死心，竟然偷偷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任命大特务甘青山为调查处处长，计划将此处迁至西昌，通过老特务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德亮的关系建立地方武装，继续与共产党“打游击”。

除此之外，野心勃勃的季源溥还打算拉拢川滇边区武装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是那些地方武装有自知之明，他们为了保留元气，最后选择弃枪投降。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季源溥还从台湾偷偷乘飞机回到重庆，秘密指挥工作。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来重庆，主要精力竟然用在处理内部矛盾上。

曾经在党通局期间担任重庆区区长的王难三，此时担任重庆调查处处长一职。但是此人不愿接受地方势力操纵，得罪了许多地方势力，情报工作难以开展，于是招致了重庆党部组织处处长龚曼华和立法委员陈铁夫的不满。

龚曼华和陈铁夫秘密商议，决定推荐代理过重庆区区长的刘介鲁担任重庆调查处处长一职。

此时季源溥的心腹甘青山也随季源溥一同来到重庆，而甘与刘介鲁是老朋友，自然无话不谈。甘青山告诉刘介鲁自己虽然已经在经济部担任要职，然而还是想做重庆调查处的处长，并且托刘介鲁在季源溥面前为自己美言。

事实上，刘介鲁也一直觊觎着重庆调查处处长的位置。

于是，王难三、刘介鲁和甘青山的三角矛盾就此形成！

几天后，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在重庆皇后餐厅为季源溥召开欢迎会，与会人员有二百多人，其中还有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张益民及甘青

山、刘介鲁等人。宴会上，季源溥发表了讲话，并强调“现在时局艰难，但希望在座各位团结一致，争取最后胜利”之类的话。在座之人也没有心情听季源溥啰唆，对于季源溥的“精神灌输”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宴会结束后，季源溥便单独拉着刘介鲁和甘青山来到附近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坐下不久，季源溥竟对刘介鲁说：“龚曼华、陈铁夫等人推举你当重庆调查处处长，现在大敌当前，凡是要以大局为重！我的意思是暂时不予变动，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此时，甘青山听到刘介鲁也有此野心，心中暗骂。

几天后，龚曼华再次找到刘介鲁，试图通过刘介鲁向季源溥施压，赶王难三下台。不过季源溥思路已定，为了暂缓重庆调查处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决定由重庆市党部、重庆调查处、重庆市参议会三方各推荐三人组成九人工作小组，并指定王难三为小组组长。

听到这个消息，刘介鲁和甘青山等人都非常失望！

季源溥在重庆待了几天，又去成都视察。他先是视察了四川调查处，并下令调查处想方设法掌握地方武装势力，继而与共产党打游击。随后，他又拜访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并向王陵基推荐了1个专员，10个县长，让其掌握一个地区的地盘，并依附地方势力开展武装破坏工作。不过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季源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季源溥前脚刚走，陈立夫后脚就到了重庆，陈立夫此次来重庆的目的也为传达“精神”的，与陈立夫一同来重庆的还有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听到陈立夫来访，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打算给陈立夫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陈立夫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决定闭门不出，没给王难三面子。在王难三的多次请求后，陈立夫才决定一切从简，和大家见个面。

按照陈立夫的要求，王难三将“见面”地点安排在江苏同乡会，并在皇后餐厅搞了一个六菜一汤的湖北菜。来此“宴会”的都是内政部调查局科级以上人员，还有个别的参议员、立法委员，大概几十人，规模不大。宴会开始后，陈立夫便开始发表讲话，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1949年11月，解放军兵分三路向西南进军，驻守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害怕了。为了不给共产党留下“重要情报”，季源溥制订了一个应变计划：

一、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携带，其余文件则一律销毁；

二、给每个专职特务发放三个月薪酬作为安家费，本人须与本党组织、机关共同进退；

三、对“细胞”分子，凡身份未暴露者，可继续布置任务，对于身份已暴露者，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

四、尽一切可能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必要的情况下与共产党打游击。

计划不如变化快，许多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解放军的子弹打落了，重庆调查处乱成了一锅粥，特务们纷纷选择逃命。

首先逃跑的是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张益民，然后特务们各自奔逃。

大多数特务跑到了成都，偷偷藏匿于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的办公地点内。

张益民跑了之后，重庆调查处已经群龙无首。

四川指导处在接到电报后，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匆匆赶到重庆收拾残局，不料发现重庆已经乱作一团，于是撒了个谎便匆匆离开重庆。

而交通处的副处长袁更也率领其部下逃到成都，成都成了特务们的临时大本营。

此时，季源溥已经安全抵达台湾家中，他的中统局局长的美梦终于结束了！

1949年12月，特务们的临时大本营成都也被和平解放了。中统局以及其所属的四川、重庆、川康滇边区等调查处瞬间土崩瓦解。

12月9日，死不服输的蒋介石派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去云南，将国民党政府迁至昆明，但是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随后卢汉将张群软禁，并于当晚宣布起义。国民党最后的“后花园”也随之覆灭。

中统局，终于随着国民党的覆灭，结束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

1950年初，季源溥在台北西门町闹市区的一栋民房里翻开了报纸，这里，就是国民党中统局的“新家”！报纸上赫然写道：共产党成功举行政协会议……

1950年的3月1日，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商议，重新调整“情报组织”，由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将季源溥的“中统局”划归“国防部总政战部”名下。随后，蒋经国对“中统局”进行整改，清除了过去与之有矛盾的CC系成员，换上了自己的人手。但此时的中统已非曾经的中统，各个机构形同虚设。1957年，失望透顶的季源溥终于离开了中统局，晋升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而中统局局长也被张庆恩接替。几个月后，军统大特务沈之岳又顶替了张庆恩，出任调查局局长一职。

1979年10月28日，中统局最后一个大特务季源溥离世，享年73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统特务实录 / 安子编著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17-2984-6

Ⅰ. ①中… Ⅱ. ①安… Ⅲ. ①中统局－史料 Ⅳ.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146 号

中统特务实录

作　　者 / 安　子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封面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285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84-6